

# 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日本为何要发动侵略战争？什么是日本精神的实质？

美国政府研究报告 揭示面具后的日本人

拨开迷雾昭示真相 “三国”演绎《菊与刀》

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

《国破山河在》作者 旅日工程师

萨苏评注

百余帧国内首次公开图片 十数万字生动直白论说

〔插图评注版〕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 著

刘 锋 / 译 萨 苏 / 评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 目 录

1. [序言 “菊与刀” 和 “三国演义”](#)
2. [菊与刀（上）](#)
  1. [第一章 任务——了解日本](#)
  2. [第二章 交战中的日本人](#)
  3. [第三章 各安其位](#)
  4. [第四章 明治维新](#)
  5. [第五章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
  6. [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7. [第七章 情义“最难承受”](#)
3. [菊与刀（下）](#)
  1. [第八章 维护名誉](#)
  2. [第九章 人情世故](#)
  3.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4. [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
  5. [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6.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 序言

# “菊与刀”和“三国演义”

其实，《菊与刀》这本书和《三国演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是美国人写的一本关于日本人的书，再加上一点中国人的评论，却正是可以凑齐三国了。

第一次看《菊与刀》，是七年前去日本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忽然发现，对日本这个东邻，实际上我们相当陌生。由于七十年前那场战争的影响，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不会太好，这自然减少了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兴趣。结果意外地发现，凡是日本人正儿八经介绍自己国家的书，都对我有极好的催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求教于朋友们，看看有什么好的作品可以推荐。

于是，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向我推荐《菊与刀》这本书——当时的书名是直接从英文翻译成的，叫做《菊与剑》。他们说，这本书对日本人的性格、对日本国家的描述如此到位，以至于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受益极深。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在二战结束前就已经发表，而战争结束后，它对于美国怎样占领和控制日本，依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正是补充了有关战后的内容，这本书才最后完成。

这让我感到颇为纳罕——第一，这本书的作者居然是一个美国女性作家，也就是说公认把日本人描述得最成功的，居然是一个日本人眼里的外国人；第二，这个书名太古怪，好像从来没听说日本人对剑有什么造诣的，就我的了解，他们的传统武器分明是刀。

当我带着满腹狐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老实说我的怀疑只有更为深重——我看到的章节里面，作者描述从中国传来的道教占据了日本宗教的主要地位。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实在无法想象在日本有一大群道士招摇过市。在仔细琢磨之后，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是把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教当做一回事了。

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合上书了。

因为我要用两只手给这位叫做本尼迪克特的老太太鼓掌。

老太太真是了不起。说实话，她的研究条件颇为艰难。就像前面描述的道教问题，本尼迪克特对于东方的文化并不是很熟悉，而她的研究对象，则或是胜海舟这样的历史人物，或是衫本女士这样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其中最接近真实日本人的，也不过是日军战俘而

已。说起来，历史人物的传记和他们的真容是否相符在任何时代都是扑朔迷离的事情。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直到今天在日本社会还是离奇的另类。而试图从日军战俘身上看清日本社会的本质，如同专心研究动物园的老虎就能弄清老虎在山林中的生活一样南辕北辙——他们都是在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尽管面临如此的困难，老太太依然敏锐地对日本人、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的结论，对照我在日本多年接触的情况而言，大部分是正确的，而且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本尼迪克特老太太一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面对这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并从中找出真正有用的线索。

本尼迪克特的结论至今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她注意到日本人在失败后表现出对强者异乎寻常的恭顺——这一点，我们的很多朋友也从小就听说过：对日本人要硬不要软，你硬，他就软了。然而，本尼迪克特却更深一步地给出了我们常常忽略的内容——要让日本人承认失败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有你确确实实打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才会真心屈服。在这之前，日本人的抵抗将非常顽强，甚至超越人类的极限。所以，一定要看到击败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不能只看到日本人被击败后的恭顺。日本人屈服于强者，但并不是屈服于强硬者。

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难以理解在对日问题上什么是最重要的，那肯定不是态度，而是实力。

走在日本街头的时候，经常会有脚着木屐身穿和服的日本人从你身边走过，有老有少。我第一次租房的时候，房东告诉我他家的土地是几百年前某位将军封赏给先祖的。未经历过革命的日本，其实改变并不是太多、太快，所以，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对于了解今天的日本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读这本书，我又有另外的体会。比如，本尼迪克特写的“日本道士”或者根本不理解刀与剑在东方有多大差别和象征意义，是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笑料呢？换一个角度，也许我们就会想到——其实本尼迪克特对中国、对日本的不熟悉，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日本，都是遥远而不需要了解的事情。本尼迪克特曾经在文中写道：日本的文化受太平洋土人的影响最大，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知道老太太肯定是搞错了，因为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太平洋土著部落的，日本从来没有正眼瞧过那些未开化的部族。这里面，除了表现出了作者对东方的不熟悉，还更进一步表现出了一个美国人的视野问题——其实，在美国人看来，

波利尼西亚的土人是比中国人更靠近“文明世界”的人。美国人的“文明世界”是以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为中心的。

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所以，《菊与刀》，不但可以作为一本读日本的书，也可以是一本通过本尼迪克特来读美国的书。

由于业务关系，我曾经在美国工作过两年，又在日本生活了七年，对这两个国家的近距离接触，常常使我感到需要对自己的认识加以修正。

比如，我曾经很佩服日本学生冬天依然穿短裙、短裤的习惯，并且觉得这是顽强的象征，是对意志品质的培养。然而，到了日本以后，却发现日本街头的老人中，患有关节炎和痛风类疾病的比例远远超过我到过的世界其他地方。他们的病症，很多来自于年轻时对身体缺乏爱护，包括这种穿着习惯。显然，即便日本人依靠精神维护着顽强的传统，生理上却无法违反自然规律。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呢？还是一个坏的习惯呢？我不得不说，迷惘。

再比如，我印象中的美国人都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总统或者政府部门总是有着千般抱怨。然而，当我走在美国的土地上，却发现这里最常见的就是美国国旗，在公园里迎风招展，在某个居民的家门前猎猎飘扬。这种强烈的爱国心让我有些吃惊，认为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然而和美国人相处多了就明白——美国人的爱国和爱政府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的观念中对政府就像防贼一样，用自己的警惕来保证它为民服务；而他们的爱国，是出于对这片给了他们美好生活的土地的自然眷恋。

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从《菊与刀》里面读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真实，大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而得出的结论，大约又会让我们的感叹世界的复杂。正是这种复杂让世界更加绚丽和丰富。

特别是，假如这个旁观者是中国人，那么他的感触还要有趣些。

凭借一个中国人的感受，他会觉得中、美、日简直就是现代“三国演义”，因为从文化角度来说，这三个国家有着奇妙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有着强烈的戏剧性。

以这种“三国演义”的心态看完《菊与刀》，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是站在一边的，因为我们同属东方国家和东方文化，日本的哲学、文字的渊源都与中国息息相关。于是，当美国人对日本家庭中的家长制表示深深不解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替日本的这种制度找出充分的存在理由。因为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过长时间的家长制时代。这一点，中日文化隐隐相通。

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发现，中国和日本在本质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近。有时候，中国和美国更接近些。比如，在对待不同文

化的宽容上，中国和美国都比日本宽容得多。其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和美国都是多民族形成的大陆国家，经历过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对于“我家炖肉你家吃斋”的事情习以为常。而日本是单一民族，海岛国家，它自古就是一个民族，一种道德，一种风俗（各地区区别很小），所以日本人中比较激烈的人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就是要么你顺我，要么我顺你，而无法理解不同文化之间怎样能相互共存。

同样，我们有时候又发现日本和美国如此相似，而中国和他们两国都格格不入。比如，中国人很难理解二战中日本为何有那么强烈的侵略欲望，同样不太好理解美国兵毫不在意远涉重洋和异国作战。原因呢，我的看法，美国和日本的传统利益都是全球性的，美国是处于世界经济政治霸主的地位，日本是因为原料和市场都要依赖海外。所以，他们的利益在全球是网状的，越扩张，网越大越密。而中国自古有些“自闭症”，“攘外必先安内”，重视内部斗争，而对外的侵略性较弱，中国的利益是球形的，向外扩张一点点，都要有比原来多得多的内容来填充。所以，越扩张，动力越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像日本和美国那样对世界构成威胁。

通过这个“三国演义”，从全新的角度看自己，很吸引人，也吸引我利用自己在日、美两国生活中的所得作为参照，为这一版《菊与刀》做一点评注的工作。可惜自己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不当之处，还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顺便说一下，我个人对这次的版本翻译工作十分欣赏。翻译这本书的朋友真正遵循了“信，达，雅”的原则，经他翻译的文章，对照原文可以看出其所下功力。我先前所读的版本，虽然也做到了尊重原著，但文字颇为晦涩，迫使我需要不断查看原文，才能够理解书中含义。而这次的翻译就显得远为流畅。比如，文中曾经出现一个日语词“義理”，我当年看的版本中，被干脆地从日语直译成中文汉字就算翻译完成。结果这个词让人如坠云雾中。这次的版本中，很高兴看到译者把它贴切地意译为“情义”，这样，全文就好理解多了。也希望译者的辛勤劳动能够让我们的读者从这本书中获得更多的启迪。

萨苏

2007年10月于日本伊丹

编者按：书中图片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原文或评注有关的图片，均按章排列序号。另一类是珍贵的史料图片，没有排列序号。

# 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上

〔插图评注版〕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 著

刘 锋 / 译

萨 苏 / 评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插图评注版．上册 / (美) 本尼迪克特著；刘锋译；萨苏评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5090-0284-1

I. 菊… II. ①本…②刘…③萨…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G131.32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1817号

## 菊与刀：插图评注版 (上册)

---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5.87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284-1/G·014  
定 价：38.00元 (上下册)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第一章

## 任务——了解日本



美军在硫磺岛升旗。这张照片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著名一页，标志了以“活死人”精神战斗的日军最终失败。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而我们与其他国家交战时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1905年前的沙俄所面对的一样，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sup>[1]</sup>因而，对于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而言，就不仅仅包括一系列在岛屿、海滩上进行的登陆，也不仅仅只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困难可想而知。七十五年前，日本打开了紧闭的国门。<sup>[2]</sup>可是，当人们在提及日本人时，仍然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而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却远非如此。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以外的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不会说某一个国家的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也极易适应激烈变革”；不会说一个民族温良恭顺，又进行过多的解释，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管理；不会说该民族忠诚、宽厚时，又声称“但他们又背信弃义，充满恶意”；不会既说他们英勇无畏，又细述他们如何胆怯；不会既说他们是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行事，又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准则；不会既说他们在军队中遵守机械式的纪律，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从管理，甚至作乱犯上。也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衷于西方的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他不会在一本书描述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的论述脉络。的确，这些矛盾都是真实的，刀与菊便是这图景中的一部分。<sup>[3]</sup>从很大程度上讲，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过分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他

们的劣迹不为人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压倒。他们的士兵恪守纪律，却又叛逆犯上。<sup>[4]</sup>

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明显的矛盾置之不理了。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比如，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有用的情报？我们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各持己见。如果战争结束，为了维持秩序，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国际和平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谁将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呢？如果没有发生革命，那日本民族是否将会灭亡？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尽早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同年夏初，美国对日本开始了大规模进攻。<sup>[5]</sup>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三年，或许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而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进行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之遥！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和媒体几乎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旧相信他们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sup>[6]</sup>

然而，战争形势在6月之后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在军事上置于优先考虑；现在由于对德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这种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区，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将要彻底战败的重要的战役。<sup>[7]</sup>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便逐渐与日军短兵相接。并且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sup>[8]</sup>、瓜达尔卡纳尔<sup>[9]</sup>、缅甸<sup>[10]</sup>、阿图<sup>[11]</sup>、塔拉瓦<sup>[12]</sup>、比亚克<sup>[13]</sup>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可怕的敌人。



【图4】塔拉瓦地狱岛，状如布满环形山的月球。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民族，我们有许多许多疑问需要解决。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还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需要获得有深刻的洞察力的答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战争，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有关它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抛开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并尽量避免得出那些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出相同的事情的草率结论。[\[14\]](#)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sup>[15]</sup>在战争中，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敌手是很容易的。但是，试图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却困难得多。然而，这也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标。我们需要搞清的问题是，日本将采取何种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做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不利的条件。<sup>[16]</sup>我应该把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当做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军事问题来研究。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与和平时期一样，也自有其特点。那么，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呢？他们的领导者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在战场上调度士兵——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把什么视为在战争中可利用的优势。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发现日本人的真实面目。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我无法到日本去，也无法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并区分哪些是关键性的，而哪些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对于他们进行决策的复杂过程，我无法亲眼目睹；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的。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所著的《须惠村》，这是他在实地研究一所日本乡村之后的成果。但是那本书却未能解决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却相信，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是可以利用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为信赖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面对面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的自身经历，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而且，他们的描述能够极大地弥补我知识中的很多不足。<sup>[17]</sup>我想，这些知识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学家则是通过图书馆，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并从日本人的书面或口头宣传资料中寻求其答案。但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如果不对生活在那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就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查阅资料，或者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参考许多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使我的研究工作具备了优势。对于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而言，他们不具备这

个优势，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有文字。如果不能使用文字，这些部落就无法用语言来表现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的评述很少；即便是有，也大都是蜻蜓点水，没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对于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行学者的帮助下，探究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在古旧的文献当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不少展示自身不寻常的书。与其他的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冲动，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描写他们宏伟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全面描述，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日本人对自己进行描述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可能他们太熟悉这些东西了，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自我展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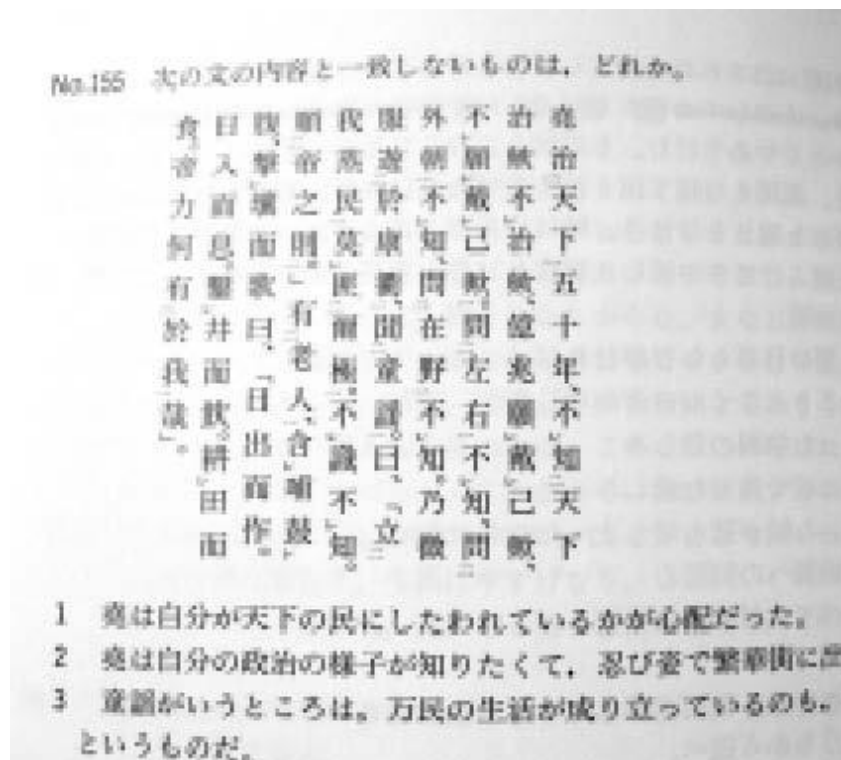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阅读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令我费解的东西。比如我如何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众多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情进行强烈的谴责，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如此轻易地容忍？<sup>[18]</sup>是什么心理在支持着这种态度？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种场景的症结何在？”“要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和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之后，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详细的探讨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自身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sup>[19]</sup>当我不甚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显然却不会如此。而且，我和他们对电影情节、动机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构建方式来理解。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在对内容的理解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维护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类人中获益最多。但他们所认定的规范自我的情形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sup>[20]</sup>

如果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中的人们身上搜集资料并寻求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也就是重复所有有才能的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这只是一个人类学家所有的工作的话，那他不可能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因此才获得了某些特殊能力。正是由于这些能

力，所以花费一些时间试图对这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是值得的。<sup>[21]</sup>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文化中有一些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风俗和习惯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的内容来推测古代的移民或相互交流的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认为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不在于研究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借助于这些相似点或差异获得了解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线索。<sup>[22]</sup>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文化也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伟大的文化遗产，因而，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与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也反复说明，这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具有何等的价值。一个部落可能有90%的正式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有可能对这些习俗进行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修改过程中或许会排斥某些基本习俗，尽管他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率非常小，但也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独特的发展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就是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sup>[23]</sup>



【图8】今日日本公务员考试中的中国古文理解题，显示出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何等深厚。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最大程度的差异。<sup>[24]</sup>要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人类学家必须改进研究技巧。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某些情况并需要做出判断时，思考方式则因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而不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责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即使对于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而言，也难以理解。人类学家必须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到这些习俗的制约，从而将祖先的传统世代相传下去。

应该对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制约及其后果进行专业探究，并将其应用于研究日本的过程中。现在，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两国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关于日本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凡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日本就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也相信这种观点，并且简单地认为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了解这个民族，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能够充分证明，即使存在最奇异的差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较，人类学家应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来看待。从表面来看，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人类学者就应更加关注。在研究当中，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事实，而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对于所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当中的任何细节，他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人未受过比较文化方面的训练，那么在研究西方国家时，他往往会忽视许多整体行为，并将很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一致观点却不进行研究。他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接受的说法渗透着该民族的整体特性，并且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开发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被研究的部落中平凡的事情，也许会与研究者本国的习俗截然不同。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毒的一面，或是另一部落最胆怯的一面，或是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进行认真观察，并认真对待细节；而人们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却常常忽略这一点。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挖掘。

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研究日本文化。只有对一个民族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进行高度关注，人们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所提

出的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不论是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民族，个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行为的学习。不论他们的行为或观点是如何怪异，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其经历有关的。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我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是有某些最普通的事件造成了这种奇特的行为。越是深入研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小事，我的研究就越有价值。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下述前提开始进行研究的，即最孤立的行为之间也存在某种系统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如何形成了一个总体模式。一个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活方式设计某种模式，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法表示认同，那个社会中的人便会把这些解决方法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无论有多大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融合起来。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一定要在个人的生活中按照相同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无效和混乱当中。<sup>[25]</sup>他们将力求保持统一，并建立了一些共同的原理和动机。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和谐，否则整个体系必将崩溃。

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配合在一起。如果一个层面发生的变化比其他层面更加迅速，其他层面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本身正是来自一致的需要。<sup>[26]</sup>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对权利的追逐不仅表现在宗教仪式上，也体现在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当中。后来，一些文明民族拥有了书面文字，教会必然会保留关于历史的记录；而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却不能够这样做。但是，随着人们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逐渐认可，教会逐渐在一些领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虽然保留了记录，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sup>[27]</sup>宗教教义、经济和政治活动不再局限于各自的领域之内，而是超出了各自的范围，互相汇合，以至难以分开。真理就是这样的：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展到有关经济、宗教、性生活乃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了解他所研究的领域；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搜集资料，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越能把任何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要求理解为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在这本著作当中，我并没有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而是研究了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观点。同时，它也描述日本人在表露自我时的一些观点。本书主要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一个弊端是，各国之间由于缺乏了解而彼此相互误解。我们不仅对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仍然有一些模糊不清



甚至是偏颇的观念，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原因，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问题均是如此。有时，纠纷仅是毫厘之差，而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根据自身的整体经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形成与我们的设想截然相反的路线和方针时，我们却大肆谈论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寻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行动方针不见得有多糟糕，只是因为不了解它。<sup>[28]</sup>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个民族关于自身思想和行动的观点。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试图描述他们自己，但这却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头都不同。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这种方式观察事物的。<sup>[29]</sup>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对任何民族来说，他们所接受的聚焦方法和视点形成了自身的人生观，这仿佛是上帝安排好的风景。我们从不期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了解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期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的世界观。当我们想了解眼镜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医生，他就会写出眼镜的度数。无疑，将来我们也许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工作既要求具备某种硬心肠，又要求持有一定的宽容心。有时，一些善意人士指责所谓的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希望使全世界的人们相信：无论“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的，所有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做人类的“手足情谊”。<sup>[30]</sup>但我对此观点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手足情谊”，而不能说日本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来这些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将自己的好意基于这样的理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要求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要求。硬心肠的人认为必须存在差异，而且他们也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它能够包容各种差异。美国可以是纯粹的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于法国、日本也是如此。<sup>[31]</sup>如果研究者不相信文化差异就像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不同社会的区别，那么他所作的研究无疑是荒谬的。同样他也无须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并未丧失其英国的特点。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才能够世代相传。<sup>[32]</sup>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一定的硬心肠和宽容心。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发展。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是不信教的人，但决不是狂热者。如果人们还在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的唯一解决办法，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会繁荣。这种人决不会懂得，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不能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体验。他们是如此坚守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解决方法。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所有的民族接受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信念。<sup>[33]</sup>但是，对于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的。这就像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像东非某些土著居民那样学会单腿站立进行休息。

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人习惯的书，而这些习惯在日本是人们所期望和认为理所当然的。它将谈及在哪些情况下，日本人希望能够得到礼遇，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何时会感到羞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内容的最理想、最权威的证据，恐怕就是那些无名的、身份多样的街谈巷议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亲自置身于那些特定的场景之中，而是说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行事。<sup>[34]</sup>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这个目标最终不能实现，但这是研究的理想目标。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者将很快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材料的增多并不能保证一些现象确定性的增加。譬如，对于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解释这些公认的习惯性行为，只需要一些人证实一下，而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相同的信息。<sup>[35]</sup>

如果研究者试图发现日本人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前提，这项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艰巨得多。他所需要迫切了解的问题是，日本人如何用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来观察生活；他还必须解释日本人的一些观点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出发点和角度；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美国人也能够理解，他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来观察人生。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证据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这是普通日本人的代称。<sup>[36]</sup>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多余的。

美国人在对社会进行研究时，很少研究建设文明民族的文化所依赖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观点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经常使用统

计法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大量的人口调查资料、调查问卷的答案、访谈者的回答、心理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在舆论领域进行调查时，可以通过科学地选择人口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意调查。这种有价值的技术现已在美国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某一公共职位的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的人数，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收入高低、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美国是一个实行普选的国家，由人民的代表起草并且颁布法律。因此，上述调查结果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sup>[37]</sup>

美国人可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提及的前提：那就是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够增强我们已有的认识。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人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而定性的研究，然后再使用投票的方式，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sup>[38]</sup>通过仔细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和反对政府者的数量。<sup>[39]</sup>但是，如果事先了解他们对国家的观点，抽样调查结果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只有了解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才能够懂得各种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为何争论。与标志着各政党实力的数字相比，公众对政府的观点更加具有概括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对美国人而言，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在私人企业中的人员的地位高。<sup>[40]</sup>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民在国家观念上的差别是如此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这种观念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价中，如何反映在日本民族历史的神话中以及庆祝民族节日的祝词当中。<sup>[41]</sup>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了解日本人的国家观念。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能够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对某一民族基本的生活观以及他们所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应进行谨慎、详细的研究。日本的基本生活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当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人生观的差别并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对那些日本人行为中充满矛盾的东西而感到奇怪了。我开始明白到，对于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人为什么会将它们看做是和系统本身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够说明其中的原因了。当我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时，那些原本令人感到奇怪的词句和观点，现在

却具有了重大含义，并且充满了长久积累的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道德观、罪恶观与日本人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属于佛教，[\[42\]](#)也不属于儒教，[\[43\]](#)而是日本人自身独有的，既包含了日本人的长处，也包含了其不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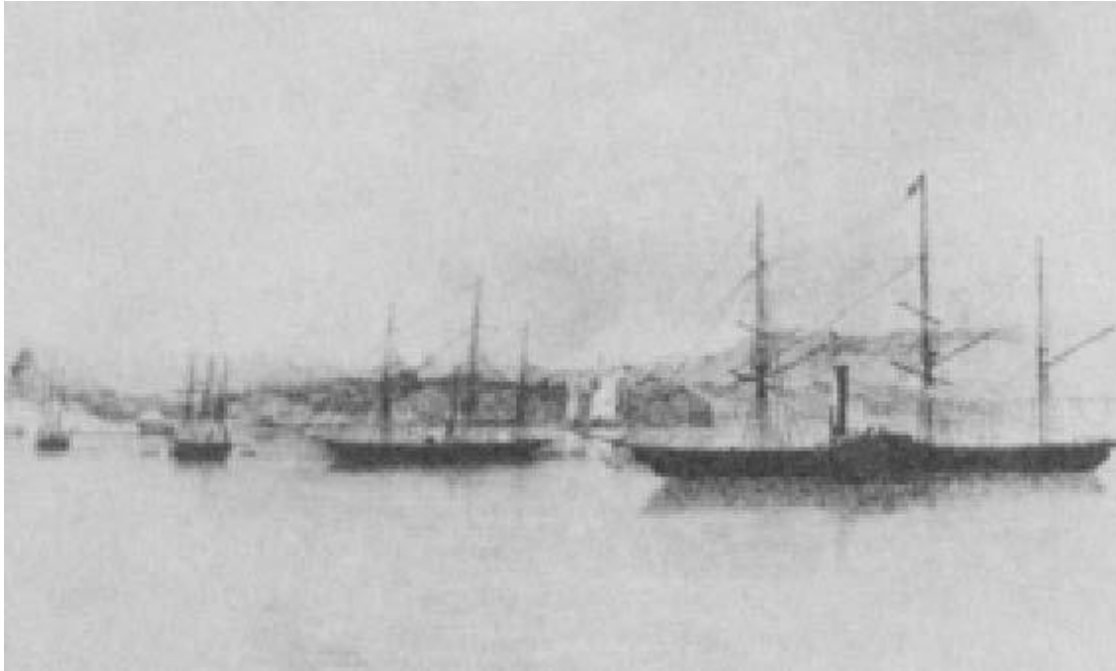
[\[1\]](#)萨评：日本人从来没有加入过要求善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他们对于一个军人还会被俘这种事嗤之以鼻。

[\[2\]](#)萨评：1944年向前推七十五年，是1868年，明治维新的开始，作者以此为日本打开国门的时间。不过日本人的概念与美国人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打开国门的时间更早，可以上溯到1853年，那一年美国人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国门。有趣的是，今天日本在下关每年都有“黑船节”来庆祝佩里舰队的到来。日本人这种“被强者征服是光荣的”概念，放在中国人身上难以理解。



【图1】佩里





【图2】黑船舰队

[3] 萨评：虽然作者屡次提到日本人矛盾的国民性，但她毕竟可以总结出日本人的特点来。因为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性格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他们矛盾，但是，他们都一样地矛盾。我想，如果让作者去研究中国人，她会加倍地困惑，因为一个中国人实际上是如此的不同，就是同一个时代里，我们也可以有李叔同又有韩复榘，有鲁迅又有韩素音。面对一个长相都差不多而个性又如此不同的民族，大概，作者只能说——有的中国人高尚，有的中国人卑鄙，有的中国人勇敢，有的中国人怯懦……也许，这就是日本可以被征服，而中国终无法被征服的原因吧。

[4] 萨评：以个人的经验而言，作者的这段评价对日本人是比较贴切的。但是，这样自相矛盾的性格，怎么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呢？日本人又没得精神分裂症。实际上，作者没有写出的前提是“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条件就是，面对的是弱者还是强者。当面对弱者时，所有这些生性好斗、桀骜不驯、顽固不化、保守、勇敢等等修饰词，都可以在日本人的身上找到影子；反之，当面对强者时，温和谦让、能屈能伸、怯懦等性格又可以鲜明地体现在同一个日本人身上。一句话，在日本文化中，崇拜强者而藐视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恐怕会伴随这个民族的始终了。

[5] 萨评：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太平洋战争实际上也是遵循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描述的过程。战争初期的半年，盟军是处于防御阶段，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袭击珍珠港、攻占菲律宾、直下印度尼西亚，甚至横扫印度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队的冲击力也在衰弱，中途岛海战的失利是双方转入相持阶段的标志。此后，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双方反复胶着的战斗反映了战争相持阶段的特点。最终，跨越半个太平洋来支持一场战役的日本帝国败下阵来。失去了大量舰艇、飞机、士兵，甚至总指挥官山本五十六，日军不可避



免地转入了防御阶段。盟军的反攻阶段实际并不是1944年夏初开始的，而是在1943年11月，伴随着美军发动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登陆作战，日本的“外围国防圈”被撕开，对日的反攻阶段已经开始了。



【图3】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美军歼灭日军一木清直支队。一木清直是卢沟桥事变日军前线指挥官。

[6] 萨评：不过当时日本的公报已经令人“恐惧”，动辄击沉美军战舰多少艘、航空母舰多少艘。就是拿整个美国太平洋舰队来填，也无法跟上日军的“战果”。这样荒唐的数字，战后询问日本人，大多数日本国民竟然是无条件地相信。

[7] 萨评：作者此时预言正确。实际上，以当时的实力对比，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比如在塞班岛，日军既没有空中掩护又没有海上掩护，没有补给，没有援兵，岛上兵力远远少于美军，装备也无法相比，可以说没打就败局已定。美军所不明白的是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干吗还要死拼到底。

[8] 萨评：此地，日军的莱城航空队十分活跃，曾经差一点打掉了为出风头到前线视察的未来美国总统约翰逊。约翰逊当时任美参议员。

[9] 萨评：人称“饥饿岛”，双方的激战中大批舰艇沉没，该岛周围的海域由此改名叫做铁底湾。

[10] 萨评：这一年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反攻缅北。在密支那激战中，日军抵抗极为顽固，连中将水上源藏都自杀身亡。

[11] 萨评：阿图岛属于美国阿留申群岛，曾被日军占领。阿图岛战役中，日军发明了叫做“自杀冲锋”的战法。

[12] 萨评：此战美军以二十倍兵力攻击弹丸小岛，损失惨重方才获胜，许多经验丰富的官兵瞑目荒岛。

[13] 萨评：此战日军阵地布置极为狡猾，守将葛目直行，号称使麦克阿瑟“鼻青脸肿”。

[14] 萨评：其实这个问题如果问中国人，早就可以知道。平型关战役八路军为抢救日本伤员而牺牲的战士，已经给出了血的答案。

[15] 萨评：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大谈“百年来美国和日本始终不渝的友谊是西太平洋和平的基石”，举座皆惊。若本尼迪克特女士听见只怕要大呼——你学习不好不看我的书也就罢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你老爹的飞机让日本兵打下来你总不会忘了吧？——中国人说，周朝时候我们就有个成语传下来了，叫“数典忘祖”。

[16] 萨评：这就是我们看《菊与刀》的有趣之处——不但可以从中琢磨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儿，还可以从作者的分析方法看美国人是怎么回事儿。“正值”、“负值”，美国人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喜欢把它量化，这一点上传统的中国人很少去做。中国人习惯的是看大势作决断，认为数字是细枝末节。谁的方法更好？我们说，这就叫文化差异。

[17] 萨评：这是可取的研究方法，但如果以在美国长大的日本人“二世”为研究对象，那就南辕北辙了。动物学家曾经在实验室教会一头叫做“科克”的猩猩用手语交谈，希望它告诉我们更多猩猩世界的秘密，结果很沮丧。原因呢？科学家们发现，如果给一堆动物照片让科克分类，它总是能很正确地分好——只是科克把自己的照片却是和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分在一起的——科克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头猩猩。



【图5】二战中日军也曾享有被美国人骂作猿猴的“殊荣”。

[18] 萨评：比如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只是纠缠于“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却对各种记录里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视而不见。



【图6】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等日军头目的指挥下，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日军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也对中国文化珍品大肆掠劫。仅1938年3月，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本照片是日军在下关码头拍摄的中国遇害者遗体。尽管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作过很多“质疑”，但因证据确凿，日本官方从未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19] 萨评：从看电影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作者的困惑。一个美国人眼里的电影，一定有一个美满的结尾，这是好莱坞的定式。而日本的电影，主角最后往往是壮烈殉难，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日本人这种对死亡和悲剧的欣赏，美国人肯定难以理解。

[20] 萨评：这种惯于走极端的性格，其实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受益匪浅，但“中庸”的概念在日本绝对没有市场。岛国残酷的环境，孕育了日本人非死即荣的偏激的国民性，不是几本儒家经典可以改变的。

[21] 萨评：作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对于“权威”的信任。而这一点，倒是被日本学了个似模似样，老舍的《四世同堂》就记录过这样一段：说日本人派了“权威”对冠晓荷和瑞丰来打分，以便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顺民”，结果各项测试中，晓荷的平均分数是九十八；瑞丰是九十二！据“权威”说，能得到平均分数八十分的就可以做第一等的顺民，而晓荷与瑞丰应当是超等！老舍说，日本人是崇拜权威的。





【图7】日军占领北平

[22] 萨评：这段描述会让我们这些中国的读者瞠目结舌。作者显然认为日本的文化和波利尼西亚土人更接近，而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根本不了解。千百年来，日本始终在从中国文明中汲取养分，无论它的文字、政体、经济等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看到鲜明的中国烙印。至于和马来西亚、新几内亚乃至波利尼西亚，要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如果问之日本人，中日之间在这件事上会有着难得的一致。这类错误不止一处，就是提醒我们这是美国人写的书，她看东西的角度和我们根本不一样。从这里面，或许我们还能悟出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很多误会是怎样产生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明白《菊与刀》这本书并不是真理，它只是一本1944年美国人怎么看日本人的书罢了。说起来，我们有一种不自觉的错误想法，认为作者了解中国应该比日本多些。其实1944年的美国人对日本了解得不多，对中国了解得更少——因为从美国看来，日本地理上更近一些，国情也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那时候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他们眼里，中国是更接近非洲的地方。

[23] 萨评：这个研究方法是对的，但所谓马来西亚、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文化与日本文化相似的看法，本身就令人啼笑皆非。他们的区别可不仅仅10%。除了都带有太平洋海岛背景，都喜欢吃鱼外，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完全属于两种文化。日本的人种来自蒙古利亚高原，冰河时代渡过冰封的鞑靼海峡和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此后，日本人的目光始终面对大陆，视那里为文明的渊源，而背对太平洋的方向——浩瀚的大洋和太平洋东部复杂的海流超出了古代日本人所能掌握的航海能力。历史上，日本是一个东亚大陆农耕文明的边缘国家。而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直到二十世纪前期，始终还处在狩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过渡阶段。除了马来西亚有与中国较多的交流外，另外两个都是典型的大洋洲热带原始文化。还好，从后面的章节看，作者并没有把这个观点作为全书的基点。否则，按照这个“相似”研究下去，这本书大概就要进入穿越小说的范畴了，不看也罢。

[24] 萨评：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看法相似，但日本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对于多种文化共同生存的认识要更消极。只因为中国、美国都是传统的多民族国家，习惯于多种文明的共处，而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缺乏这种经历，对外来文明便难免有要么全面投降，要么将其消灭的看法了。



徐永昌上将在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签字。

[25] 萨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网络社会的法则，正是对作者这种观念的颠覆。今天的一个人，只要本人不因之精神分裂，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而不必担心引发混乱和不便。尼古拉·尼葛洛庞蒂管这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叫——数字化生存。看来，从1944年以来，人类到底还是有了些进步呢。

[26] 萨评：社会是一部机器。如果某个齿轮转得快一点，可能带来良性的压力带动整个机器的加速，比如深圳特区就可算是这样一个齿轮；但如果转得太快了，这种过分的压力就会迫使本来合作的其他齿轮变成阻力，最终把这个转得太快的齿轮破坏掉，比如变法的王安石就好似这种过快的齿轮。领先时代一步是天才，领先三步是疯子。

[27] 萨评：作者认为是文字的出现使教会失去了权威，我们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个笔误，因为以西方最流行的基督教会而言，文字的产生也远在教会产生之前。但作者的潜意识是要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当教会失去对文字的垄断之时，宗教的权威就崩溃了。



这是符合欧洲的情况的。文艺复兴中，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文字产品的生产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而成本大大降低，超过了教廷能够控制的范围。文字产品的扩散意味着知识和思想的普及化，教会的神圣与威严也伴随着这个过程而衰落。也许正因为印刷术的如此贡献，西方才将其列入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中，而没有把科学上更尖端的圆周率之类列进来。

[28] 萨评：这种事生活中倒是不少。我们公司有这样一件事，一个颇为敬业的法国工程师坚决要求辞职。调查结果原来纯属文化背景不同的原因。一天晚上加班到半夜，法国人出去吃夜宵，而作为上司的韩国人看到此人桌上杂乱无章，非常不满。法国人回来后，韩国人就为此说教一番，法国人反驳，双方很快短兵相接，差点儿打起来……这其中，法国人认为我加班已经占据绝对的道德制高点，可是韩国人认为加班是天经地义的；韩国人认为下属不应和上司顶撞，而法国人觉得每年罢工几十天都纯属正常……若两个韩国人，或两个法国人，想来是打不起来的。

[29] 萨评：其实作者也不例外，她的“美国式”视角在全篇中比比皆是，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大概是一种秉性难移。

[30] 萨评：或者翻译成“普遍人性”，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对于成功的追求和对于失败的沮丧等等，这些，全人类都差不多。然而，具体到生活方式，则本尼迪克特的说法更有道理，大家各有自己的特色。

[31] 萨评：这里所说的安全的世界，其实颇有些类似今日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不能理解这种差异可以共存的人，常常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视作你死我活，认为它们是狼和鹿的关系。实际上，不同的文化与当地的环境、历史、经济息息相关，强求一致即便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诚心诚意地进行改造也不可能全盘照搬成功。不同的文化不是狼和鹿的关系，即便它们是狼和鹿的关系，狼和鹿也是在自然界共生几百万年的物种，并非一定要消灭一个物种，另一个物种才能生存。

[32] 萨评：世界本来就是多彩的，一个暂时看起来不合理的或者落后的文化，其本质可能并不真正是落后。比如，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尊崇数，甚至不惜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信仰。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些人肯定荒诞而莫名其妙，照今天某些人看法就是完全背离“普世价值观”，应当毫不留情地消灭。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才明白毕达哥拉斯学派原来是过早地提出了“数字时代”的概念。

[33] 萨评：遗憾的是即便今天，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具有这种优越感，并且试图用军队实现这种“理想”。想一想，当年的基督教会在美洲摧毁印加人的文化时，在欧洲烧死布鲁诺时，他们曾经具有同样的优越感，并且相信真理在自己的口袋里。

[34] 萨评：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得看碰上谁。要是碰上崇祯朝的御史高官，那就惨了——这些人都是道理说得比谁都明白都慷慨，投降起来比谁都快都彻底的职业骗子。美国没有出过朱熹，他们对这一点不明白，是正常的。

[35] 萨评：这倒说的不错，日本人对于一些固定的规则，特别是礼仪的遵守，常常达到死板的地步。举例而言，抗战的时候，山东文登曾有日军试穿便衣偷袭八路军赛时礼部，但被

轻易识破。理由很简单，虽然换了便衣，但日军军规中有一条——士兵出营必须戴帽。恪守军规的日军因此为每一个便衣兵配了瓜皮帽一顶。于是，八路军哨兵就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些“老百姓”迎面而来，有拣粪的，有串亲戚的，有要饭的，却无一例外人人一顶暂新的瓜皮帽……不打，才怪呢。



【图9】戴瓜皮帽的日本兵

[36] 萨评：“田中”大概是和平时期世界人民最熟悉的日本人名字了。这是因为“田中先生”是日语课本里面最重要的对话角色。

[37] 萨评：提到普选，我们的看法就是“一人一票”，其实，普选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今天日本也是实行普选的国家，但是方法和美国不相同。美国的普选制度同时决定执政党和总统，而日本仅仅决定执政党。日本的首相拥有和美国总统类似的地位，但是日本人没有权利选举首相，首相是由执政党提名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由执政党的总裁担任。

[38] 萨评：这就是本尼迪克特高于一般美国人的地方。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模式是理所当然的，这不免在他们处理对外问题时造成某种误导，那就是看到外国的社会模式与自己的不同，就认为对方“不正常”，而面对“不正常”的国家，显然美国怎么做都是上帝的使者。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显然忽略了很可能在美国建国之前，那些“不正常”的生活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之上的事实。

[39] 萨评：作者没有写出的另一个前提是美国还没有因为这种调查进行思想清洗的传统。假如换在“康乾”搞文字狱的年间，这种调查恐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难道陈近南会在答卷上选“我支持反清复明”？

[40] 萨评：这里面，带有东西方另一个观念的区别，即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东方传统上有朝廷等同于国家的概念，所以忠君与爱国是一码事。但在西方，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并不等

同。比如美国人民普遍爱国，那乡间随处可见的星条旗就是证明，而美国人民好像没有爱政府的概念，政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服务机构而已。

[\[41\]](#)萨评：这方面的概念，即便同样有“朕即国家”传统的中国，与日本也不同。中国还有个“秦亡其鹿，天下共逐之”，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日本可是“万世一系”，从来把天皇“不当人”看的。

[\[42\]](#)萨评：虽然日本人很多信佛教，并且以谈禅为乐，但佛教的一些概念日本人无法接受，比如众生平等，而日本至今是一个视等级森严为正常的社会。佛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对来世的寄托。

[\[43\]](#)萨评：也就是中国方式的。日本人的行为颇受儒家影响，但当初引进儒家思想，是为了解决日本的问题。在大化改新等变革中日本式的儒家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正如儒家在中国解决不了工业革命以后的问题一样，在日本也解决不了。被西方打破了国门、见识了西方的强大之后，日本人就很平静地抛弃儒家，去照抄西方的新思想了。

## 第二章

### 交战中的日本人





美军在日本花冈挖掘出的死难的中国人的尸骨。日本从中国强掠劳动力到日本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造成大批人员死亡。在花冈的中国劳工曾勇敢地举行了暴动，结果420人死难于此。

每种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战争的正统观点，不管这些看法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其中有一些还是西方国家所共有的。例如，在号召大家全力进行战争方面；[\[1\]](#)如果出现局部战役的失败，往往要鼓舞士气；[\[2\]](#)规定死亡人数达到何种比例时可以投降；[\[3\]](#)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行动规则，[\[4\]](#)等等。因为这些国家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包括战争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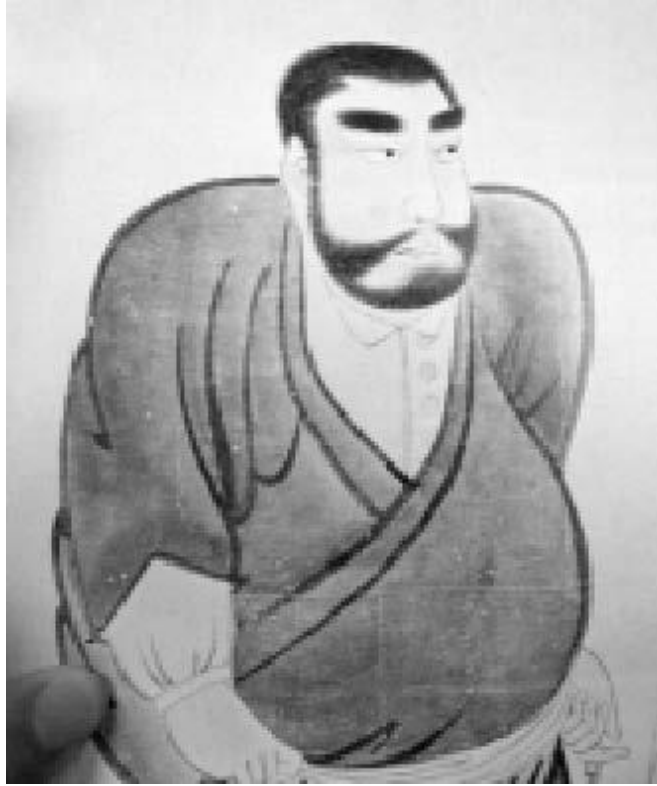
日本人与西方人对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能为更好地了解日本人的的人生观以及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观点提供一些参考。我们的目的是要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而对于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在军事上是否关键则不去讨论。[\[5\]](#)他们所有的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这些行为显示出关于日本人性的一些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去解答的。[\[6\]](#)



【图1】法西斯三轴心（二战中日本的宣传画）

日本人评判其战争正义性的前提与美国人截然相反，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不同的。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征服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实施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违反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这

条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破坏了针对自由企业的“门户开放”政策。<sup>[7]</sup>而日本人对战争的原因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世界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制度而斗争，而这个任务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等级制度的国家，也只有它懂得“各安其位”的必要性。<sup>[8]</sup>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及和平，平定了叛乱，<sup>[9]</sup>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产业。<sup>[10]</sup>据日本官方统计数字，日本99.5%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根据日本等级制度的前提，它应该帮落后的年轻兄弟——中国。<sup>[11]</sup>同时，日本和“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它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然后再来对付英国和俄国，让它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sup>[12]</sup>各国应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在日本文化中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所具有的含义，这种幻想是日本人创造的，并且适合他们。然而很不幸，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不认同这种观点。<sup>[13]</sup>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不应该从道德角度上批判“大东亚”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中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野心。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对钟情于平等的美国人而言，这些思想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等级制在日本的含义以及对日本的好处。<sup>[14]</sup>



【图2】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中活跃的政治家，由于此后的内战失败而自杀，日本政府当时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现今所能找到的只有画像。

同理，日本对胜利所寄托的基础也与美国一贯所理解的有所差异。日本叫嚣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对此早已了解，根本不会理睬。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所创造的。”<sup>[15]</sup>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之间的竞赛，而是日本人所信仰的精神与美国人所信仰的物质之间的较量。”如果美军打了胜仗，他们还会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定将会失败。”在塞班岛、硫黄岛战役溃败时，毫无疑问，这一说法成了很自然的辩解之辞，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托词。在日军胜利的日子里，也一直鼓舞着士气。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宣传口号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sup>[16]</sup>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对于



日本民族而言，日本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弘扬皇道，不必担心力量之不足。为何日本人要担心物质的东西？”

当然，像其他任何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也很担忧。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于军备的财政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很大比重，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sup>[17]</sup>在偷袭珍珠港那年，将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用于陆、海军的军事装备。只有17%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用。对于物质化的军备不关心并不是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气概的象征一样。”<sup>[18]</sup>

美国一贯注重国力的强大，而日本始终强调非物质资源的重要性。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的增产运动基于它自身的前提。日本人认为，精神代表了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是必须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就会消失。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物质当然不能维持千年。”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完全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争手册中有一句宣传口号：

“以我们的训练来对抗敌军数量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这就是军队传统的理念，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战争而制订。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自杀式冲击”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无数“精神战胜物质”的例子之一。<sup>[19]</sup>日军将这支部队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有这样一个故事：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他的船队在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sup>[20]</sup>

即使在民间，日本当局也大肆宣传精神优于物质这一信条。例如，人们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整夜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高”，“越是疲倦，就越能起到锻炼效果”。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热身体操，声称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极其缺乏的粮食。而一般老百姓需要粮食来维持正常的体力，他们说：“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食品缺少，不可能做什么体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越是缺乏食物，我们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通过消耗更多的体力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观点是，计算昨天是否达到8小时或5小时的睡眠，是否有合理的饮食，是否寒冷，再计算还有多少体力可以用来消耗。与此相反，日本人从来不计算体力贮存这样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sup>[21]</sup>

日本的广播在战争中的做法更为极端。它们甚至宣称在战斗中有精神可以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一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勇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地返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在从飞机上下来之后，他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机场时，他计算着数量，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坚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并提交给总部。在总部，他向司令官进行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突然摔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上去搀扶，但他已经死亡。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有一个弹伤。一个刚刚死亡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凉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像冰块一样凉。所以，大尉肯定是死了很久了。但是，他的精神支撑他进行了这次汇报。正是这个大尉所具备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他们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sup>[22]</sup>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认为这则广播是在吹牛。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首先他们指出：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发生呢？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显然，这位大尉是一位自我修行的行家。既然日本人都懂得“伟大的精神可以存在千年”，那为什么这种精神就不能在这位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他将责任视为自己的核心准则。日本人相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已经这样做了，并且已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贫穷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时期，如果我们如此看待日本人，我们就很难对付他们。特殊的训练和纪律以及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这些信条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是，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sup>[23]</sup>只有当美国人了解这些信条之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矛’来守住阵地只是一种幻想”的真正内涵。<sup>[24]</sup>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能够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之后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他们在战争中“完全依赖主观感觉”。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关于各种事情的看法，例如等级制的必要性和精神力量高于一切，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素材。他们大

肆宣扬安全、士气等问题只不过是进行了预先警告。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溃败、菲律宾的失守等等，政府总是对日本民众进行如下解释：我们早已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担心。收音机仍然大肆进行宣传，期望日本人能够继续坚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之中。<sup>[25]</sup>“美军占领了基斯卡岛，从而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sup>[26]</sup>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同时向我们发动攻击。我们的作战计划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考虑。”日本战俘，即便是那些希望日本尽早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失败的战俘也认为，轰炸不可能完全摧毁日本本土，“因为他们早就做了预先警告”。<sup>[27]</sup>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上发表讲话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此事，并对此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轰炸，因而，没有什么担忧的事情。”一切均在“我们预料”，“我们对此已有备无患”，只有坚持这样的信念，日本人才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必要主张。那就是，“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被动地受到了进攻，而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日本人会说：“敌人啊，如果你愿意进攻就进攻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等待的事情终于到来了。我们欢迎它们。”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说：“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遇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面对困难，必须自己创造机会。”<sup>[28]</sup>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sup>[29]</sup>“微微一笑地说：敌人的行动正合我意……”“马尼拉市在敌军于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后就陷落了，山下将军可能事先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因而将军的部署与战况的发展相一致。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逐步实施。”换句话说，只有失败才意味着成功。<sup>[30]</sup>



【图5】直到今天，日本的街道上仍然经常发现当时的未爆炸弹。

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所以美国人要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教训敌人一下。如果发言人意图恢复公众的信心，那么他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事件时，决不会说：“这些事件都已在我们计划的预料之中。”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蓄意挑衅，我们只能对他们还以颜色。”美国人使生活适应充满挑战的世界，并时刻准备迎接挑战。而日本人却认为世界万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对他们而言，真正的威胁来自于那些未曾料到的状况。<sup>[31]</sup>

日本人在作战时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能够揭示日本人的特点。他们会经常说：“我们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因而，在作战过程中他们必须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民族的大无畏精神。”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受到鱼雷攻击，上级命令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体面的方式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整个世界都要嘲笑你，美国人会把你们的狼狈姿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sup>[32]</sup>日本人非常重视他们给世界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也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当中。

关于日本人态度的问题，最吸引人的就是他们是如何看待天皇陛下的。天皇对他的臣民到底真正拥有多大权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认为：其实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天皇不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每个人首先最应该效忠的就是他的封建领主，即“大名”，以及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的效忠似乎可有可无。天皇深居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要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而通常由将军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如果一个



等级很高的封建领主对天皇表示敬意，那么这将会被视为背叛行为。对一般日本民众来说，天皇几乎等同于不存在一样。<sup>[33]</sup>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熟悉日本的历史，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天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存在于民众的记忆当中。那为什么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并最终将日本这个保守民族凝聚起来？美国学者还认为：有一些日本评论家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其实他们的观点太夸张了，他们的坚持则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性。因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持谨慎的态度。对日本近来编造出的那种邪恶的元首理念，我们才应该给予坚决的打击。在当代日本，天皇是神道教的核心，<sup>[34]</sup>而这种宗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将其摧毁，那么，敌国日本就会瓦解。

一些有才干的美国人了解日本。在他们读了来自前线或日本方面的报道之后，往往会对上述理论持相反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会比用言语贬低天皇或对天皇进行直接攻击更能刺痛日本人的心、激起他们的斗志了。这些人不相信日本人会把对天皇的攻击看做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一战后，当“民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时，军国主义的名声是如此之坏，以至于士兵去东京的街头都要换上便服。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们仍然对天皇狂热地崇拜。<sup>[3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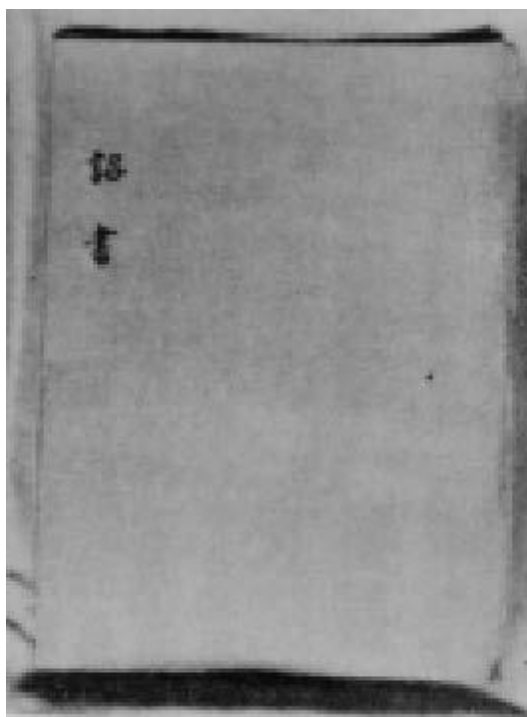
这些人士也指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希特勒万岁”进行比较，后者是纳粹党兴衰的标志，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相连。

当然，日本俘虏的口供也能够证实上述观点。日本战俘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sup>[36]</sup>在被俘后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应答，这与西方的军人不同。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混乱的。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有关。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才有所改变，但只限于特定的军队和地方部队。我们应该对于这些战俘的口供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它们是日本军人意见的集中体现。除了极少数以外，其他都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本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咎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是为了“让天皇安心”，并愿意“根据天皇的命令而献身”。他们认为“天皇发动了战争，我们只能服从命令”。但是，那些反对目前战争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信念归功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代表了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一直都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一直都反对战争”，“东条英机欺骗了

他”，“天皇在‘满洲事件’时就表示出对军方的反对态度”。<sup>[37]</sup>

“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军方发动了战争。<sup>[38]</sup>天皇不喜欢战争，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的处境是如何之差。”而德国战俘的证词则完全不同，不论他们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的背叛行为<sup>[39]</sup>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最大的煽动者，是他准备并发动了战争。而日本战俘的态度非常明确：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图7】天皇发动战争的诏书

对于日本战俘而言，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不可想象。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sup>[40]</sup>“人们不会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而不是天皇来承担责任”，“即使日本战败，全体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在美国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于天皇超越一切批评的论调觉得是欺骗人的东西。<sup>[41]</sup>但事实上，即使战败之后，日本国民仍然没有改变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反对天

皇”的内容，因为所有的战俘都拒绝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对日军进行广播过的人。在所有接受审讯的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表示过对天皇轻微的反。其中一份的内容比较极端：“保留天皇在位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只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假设：“天皇可能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且如果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得到解放，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了。”<sup>[42]</sup>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御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长节<sup>[43]</sup>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全体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同朗诵天皇向军人颁赐的“圣言”，“诵读之声回荡在树林当中”。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心，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陛下的心愿”、“消除天皇的担忧”，并愿意“对天皇的善行表示尊敬”，但是，这种对天皇的顺从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矛，日本人也会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勇猛的满洲关东军也不例外”；“只有天皇的命令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继续生活下去，进行战后家园的重建”。<sup>[44]</sup>

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是无条件的，并且是毫无保留的。而对其他的人和集体又是横加批评，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以及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评意见。<sup>[45]</sup>战俘们大肆指责那些指挥官们，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共患难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退而让士兵们拼死抵抗的指挥官们，日本战俘们更是痛恨至极。一般而言，战俘们对有的军官大加称赞，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地批评。这说明日本人并不缺乏辨别善恶的意愿。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对“政府”进行批评，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领导、更高效的协调。他们甚至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介绍了一些由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一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自己的某些言语将会受到谴责。他们心存疑虑，往往只做表面文章，胆小怕事。这样，我们决不能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询问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意见，可他们

就是不能敞开心扉。人们都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种情况就无法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胆小怕事，因而本来能够激发的战斗力也不可能激发出来。”

所以，日本人即使在战时也批评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优点。然而，对待天皇却是个例外——天皇不会受批判。天皇的崇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崇拜他？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古怪的特点会使天皇保有如此神圣的地位？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使用“竹矛”战斗至死。同样，如果天皇下令，日本人也会平静地承认战败，并接受占领。这种无稽之谈是否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或者的确是事实呢？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在战争中行为的关键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到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影响日本国内，而且也影响到前线。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对日军有着特殊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关于军队人数消耗的问题。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特遣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sup>[46]</sup>时，日本电台极端惊讶，其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美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击败了日军。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地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护送回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sup>[47]</sup>

所有的救援行动，所有对落难者的救助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勇敢的行为如果能够挽救“受到伤害的人”，就更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安全设施称作“怯懦”。<sup>[48]</sup>日本的报纸、广播不断地就此发表议论。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死才是最高尚的，预防措施是毫无价值的。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时，他们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医疗用品严重不足，都难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而这些伤员在他们眼中就是废物。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加剧了医疗服务的缺乏。但这并不代表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日军士兵往往受到这样的教育：死亡本身就是精神胜利，我们对病者的精心治疗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像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



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美国人更加注重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程度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sup>[49]</sup>即使是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美国的这种精神。而日本人对此却是很陌生。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前线和后方医疗系统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更谈不上对医疗药品补给的关心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干脆就把伤病员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往往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他们没有转移伤病人员的习惯，即便当时有机会这样做。只是部队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或者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時候，他们才计划采取一些措施。负责的军医所要做做的就是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sup>[50]</sup>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那么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美军战俘。<sup>[51]</sup>依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犯有暴行。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曾在台湾被监禁三年，在讲述他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

“美军战俘获得的治疗要比日军好。在战俘营中，盟军的军医可以照顾盟军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给日军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后来变成了一个中士。这位中士说他自己每年也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极端。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如果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那么就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战士，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还是对于家族而言，他都不会感到羞耻。然而，日本人对此却有不同的定义。荣誉与战斗至死密切相关。如果身处绝境，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进行集体自杀性的攻击，但决不能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的了”。他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已经“死”了。<sup>[52]</sup>



【图11】“日本第一个战俘”酒卷直男

当然，日本军队中确有这些规定，[\[53\]](#)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遵守着这条军规，以至于在北缅会战中，[\[54\]](#)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这142名俘虏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昏迷，只有少数是例外。[\[55\]](#)独自一人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几乎没有。[\[56\]](#)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1/4或1/3时，就要停止战斗。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比1。日军在荷兰迪亚[\[57\]](#)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上述比例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相比已是大有进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仅仅投降这一件事就让那些美国战俘名誉扫地了。即使没有受伤、患疟疾或赤痢等病，他们也不能被称为“完整的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描述，在俘虏营里大笑是如何危险，如何会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做战俘是奇耻大辱，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种羞辱，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另外，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这是日本军官的要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58\]](#)美国人说，日本哨兵严格要求美国战俘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最大的犯罪则是公开违抗命令。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就行了。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重罪，因为这是在挑战日本哨兵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即便仅仅是“顶嘴”，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

很讨厌顶嘴的，而军队对此行为更要严惩。战俘营里的确有很多暴行和残害，虽然我们把它作为文化习惯而导致的行为和虐待行为进行区分，但并不表示我们宽恕这样的暴行。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很多日本士兵对下列传言都深信不疑：敌军会虐待并且杀死战俘。所以士兵们更加觉得被俘是一种羞辱。日本国内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说美军用坦克碾压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投降的战俘。<sup>[59]</sup>也有一些日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深表怀疑，从预防的角度考虑，就把他们都杀了。这种怀疑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能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将是一个别无生路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正如一个日本战俘所言：“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没有英雄行为的死亡才是奇耻大辱。”正是这种思想才使我军提高警惕，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行径，这一观念已在日本人的意识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规则不同，而日本人却视为很自然的行为。同样，日本人对我们的一些行为也觉得不可理解。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庭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sup>[60]</sup>日本人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和蔑视，认为这不可思议。日本普通兵没有想到在巴丹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浴血奋战。他们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与西方士兵相比，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最令人惊异的差别，无疑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如何生存。<sup>[61]</sup>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蒙受了耻辱，他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结束。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里，才有少数人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返回祖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的风俗不允许这样，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更出色：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告诉我们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为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虽然现在生活的内容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他们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忠诚。<sup>[62]</sup>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战俘都有如此表现。也有少数顽固不化的人。而且，不论情况如何，必须先给这些人提供一些有利条件才可能由此转变。因而，有些美军指挥官不愿意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战俘营，美军根本不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任何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帮助的战俘营中，必须首先消除原来的怀疑，随后逐渐在日本战俘忠诚的基础上建立对他们的信任感。

美国人并未期望每个战俘都会作出这样彻底的转变，因为这与我们的规范不相符。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好像是：一旦确定了一条行动路线，就全力以赴去做；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sup>[63]</sup>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战后利用他们这种行为方式？或者，这只是个别被俘士兵身上出现的特殊情况？就像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它们迫使我们在战时对其进行思考。它提出了很多问题——制约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运行方式以及日本人所学到的思维和行动习惯。

---

<sup>[1]</sup>萨评：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西方的战争只是军队之间的事情，老百姓不能参与，因而有人以此为依据指责八路军军民鱼水方式的游击战违背这一准则。实际上，无论是独立战争时的列克兴敦的美国民兵、法国大革命时期高唱马赛曲的法国民兵，还是拿破仑战争时代俄国的白衣兵团都是一声号角就上前线的。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西方对于老百姓在本国国土遭到敌人入侵时奋起抵抗，持的是相当正面的看法，否则，就没有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了。

<sup>[2]</sup>萨评：二战中，日军对其在战争中遭到败绩的官兵，往往不是鼓舞其重新站起来，而是要他以死谢罪。

<sup>[3]</sup>萨评：这倒也没有一个规定的标准，但西方对于在显然没有战胜希望的情况下投降，抱有比较宽容的态度。

<sup>[4]</sup>萨评：所谓骑士精神等等看似高贵的西方法则，很长时间只是在两个西方国家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从没听说美国兵对印第安人，或者英国兵对祖鲁土著遵循过同样的规则——至于今天这种精神适用的范围显然更为宽广了，我们得说，那是非西方民族用百年以上的抗争为自己夺得了更为平等的尊严。

<sup>[5]</sup>萨评：作者这样想显见缺乏战争实践。如果美国军队也这样想就糟了，比如对一个重伤毫无希望的日本兵而去叫救护人员救治，那迎接他们的可能是一次战果赫赫的“肉弹自杀攻击”。

<sup>[6]</sup>萨评：从技术角度讲，日本现代军事思想大多来自西方，而且学得极为认真。可惜，作为一支军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人没有学，就是它的军魂。日本军队的军魂是什么？日本人给出的答案是“和魂洋才”。也就是说，尽管技术上日本军队是一支不折不扣抄袭西方的军队，但精神层面上，他们还是遵循日本的一切理念，这也是日军与真正的西方军队的主要差别。

<sup>[7]</sup>萨评：如果前一句话说的是道义，后一句话说的就是利益。“门户开放”政策是1899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政策，意思是在中国应当对所有国家开放同等的机会。这又是一个不容中国人开口的“关于中国的政策”。

<sup>[8]</sup>萨评：这种逻辑在二战前的日本无疑很容易被接受，因为自古以来日本社会就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用严格的控制和禁欲主义约束每个人，使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日本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的上司，都是被管理者，社会



对他们的要求是像一个机器零件一样地工作。所以，二战之前的日本人对于平等基本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各国间能够平等共存的概念，而认为总要有一个最高的管理者，世界才会安定。

[\[9\]](#)萨评：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西乡隆盛在西南发动的叛乱，被日本政府军讨平。在日本人眼里，这场“西南战争”类似美国的南北战争。

[\[10\]](#)萨评：二战前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国家，也因此具有极高的自我优越感。

[\[11\]](#)萨评：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帮助”，它要“帮助”中国也成为他们所喜爱的这种等级体系中的一员，而无须问中国人是不是喜欢。

[\[12\]](#)萨评：这倒有点儿反殖民主义的倾向了。只不过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说的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日本人说的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虽然只差几个字，其内涵却大相径庭。

[\[13\]](#)萨评：日本作为一个长期孤立的岛国，从几乎不知国际事务为何物忽然一下闯进五彩缤纷的世界舞台，使得脑子里产生了如此荒诞的想法。

[\[14\]](#)萨评：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曾使一些中国的有志之士认真学习它的经验。然而蒋百里将军曾说：“中国从日本学了两样东西流毒不浅，其一是陆军，其二是教育。”盖军事和教育是强盛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国当时学习日本的时候就对这两个领域特别重视。不幸的是，日本的军队和大学，偏巧是它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两个地方。学了这个，中国不但不能强国，反而更加扼杀了当时中国追求进步与变革的可能。

[\[15\]](#)萨评：美国人还是不够了解日本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迷信上层，既然上面说了“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民众便会盲目地相信一切都在轨道上，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无须思想。至于这轨道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日本人是不会自己去想的。所以，日本报纸才会说这些话，这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把日本国民拉在战车上。

[\[16\]](#)萨评：荒木大将，即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图3】审判战犯时候的荒木贞夫（前排右一）

[\[17\]](#)萨评：日本海军的造舰经费一度占国民总收入的30%，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18\]](#)萨评：说到这一点，中国人也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正是在甲午战争中，装备不亚于日军、兵力远胜日军的清朝辫子兵却大败于日本，使日本国民对“精神胜过物质”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可以说，甲午战争对日本人此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19\]](#)萨评：我们要说，作者对日本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不过，究竟日本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美国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她并没有说。美国人真是正确的吗？长津湖畔美国大兵的溃败就没有了道理。还是让我们用一句中国特色的话来评价吧——战争是一门综合艺术，单纯强调物质与单纯强调精神，都是要吃苦头的，二者需要一个平衡。

[\[20\]](#)萨评：其实所谓“神风”发生在忽必烈的两次东征中，这两次东征都因为台风而失败。后人评价，假如蒙古人不是仓促使用了原金朝简陋的造船厂生产的战舰，而是用征服南宋获得的泉州或广州造船厂生产的坚固的大船，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图4】日军自杀飞行员

[21] 萨评：美国的计算方法在日本军队中曾经遭到嘲笑，讽刺美国人是带着各种充足的给养和装备才敢打仗的军队，完全忽略了人可以凭借发挥潜能创造奇迹。这我们倒不能完全认为是日本人的专利，因为大多数装备不足、补给不足的军队都会强调精神作用。然而，想出用做体操的方法弥补食物的不足，那就是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了。

[22] 萨评：这里本尼迪克特有一点主观主义，其实这个故事的蓝本正是来自西方。战场上一个骑兵给拿破仑送报告，拿破仑一边看信一边问：“你受伤了？”“不！”那士兵回答，“我被杀死了。”说完翻身落马而死。这两个故事很相似，不过双方的解释截然不同——西方根据拿破仑骑兵的事引导出了肾上腺在危急时刻对人体的作用，而日本的解释是精神战胜物质。

[23] 萨评：在若干美国人心中，今天的拉登和基地组织之所以会和美国作对，就因为他们精神有病。这种看法让美国人觉得省事，可以免于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但在实际中只能使麻烦更大。

[24] 萨评：美军攻占冲绳的时候，很多狂热的日本人正在用竹枪训练，准备“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这一幕被当时的照片如实地保留了下来。然而，日本的领导者对此却是明白的。天皇决定投降，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御前会议上军部汇报用于本土决战的部队装备不足，连防守东京沿海九十九里滨的师团都配不齐枪，于是天皇勃然变色，放弃了本土决战，改而宣布投降。

[25] 萨评：二战时期，包括这之前的日本人即便受到相当的教育，也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可以对某一个技术问题作出有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判断上，他们自然地把自己当做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并且相信这个零件的命运和机器整体完全一致，于是将思考的责任交给开动机器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是军部和天皇，既然他们还没有觉得惊惶失

措，就说明这台机器的运转没有问题。既然这台机器运转没有问题，自然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的自己就没有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对上司极端信任的日本人和把政府天然看做恶人的美国人，没有共同语言。

[26] 萨评：基斯卡岛属于美国阿留申群岛，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一度攻占此处，后因美军反攻而放弃。不过，这里接近北极圈，气候恶劣，日本人没必要担心美国人由此轰炸日本本土。估计是作者弄混了基斯卡岛和南方的塞班岛。塞班岛被美军攻占后，B-29轰炸机开始由此轰炸日本。此外，成都等中国空军机场，也始终是轰炸日本的重要基地。

[27] 萨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美军的轰炸直到最后也没能摧毁日本人的意志，但是，轰炸却摧毁了日本的工业基础，使日本的军事机器无法给日军生产出作战所需要的足够的飞机、军舰和大炮。即使意志再坚强，日本人也不能变魔术一样从炸成碎片的工厂里生产出战斗机来。所以，意志和士气不是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充分条件，这倒又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好例子。

[28] 萨评：日本人也有引用名人名言的传统。如前所述，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后虽在内战中失败，但因其颇有文采，在日本民间很有威望。

[29] 萨评：山下奉文，日本陆军著名将领，甲级战犯，卢沟桥事变时是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指挥官之一。因突袭攻占新加坡而得名“马来之虎”，二战末期担任日军在菲律宾的最高指挥官。

[30] 萨评：作者的道理说得不错，但这个例子不太对头。事实上就这件事而言，日本人倒是说了实话，战后缴获的日军作战计划表明，鉴于双方实力的差距，菲律宾战役中山下奉文从来就没有准备和美军在无险可守的马尼拉硬拼，留在那里的都是一些准备牺牲掉的二流部队。美军还没登陆，他早就带着“菲奸”劳雷尔一行和日军主力撤退到了碧瑶山区。山下认为，菲律宾的日军制空制海权都已经丧失，只能利用山区崎岖的地形和美军纠缠，事实上他这一手的确有些道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虽然轻取马尼拉，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山下奉文。直到日本战败，山下所部的日军一直在当地和麦克阿瑟的部队打游击。二战后，山下奉文被判处死刑。这个严厉的刑罚固然罪有应得，但也有人认为是山下在菲律宾阴魂不散的打法激怒了麦克阿瑟，如果早早投降，即便犯了反人类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麦克阿瑟也可能会饶他一命的。

[31] 萨评：现在的世界则有些颠倒过来了，和西方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强烈地依赖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一个项目，从一开始他们就会做一个完善的计划，把一切都放在掌握之中，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在数字化时代，他们的计划总是近乎完美，但是，一旦中间出现了计划外不可控的因素，他们就往往一脸茫然。这方面，倒是一直过着“变化比计划还快”生活的中国人更能应付。

[32] 萨评：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查看日本方面的记录，我没有找到相应的条文，不知道作者的资料来自何方。我推测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日本方面素来对自己战败时该怎么办考虑极少，可能觉得预设这种立场本身思想就有问题。关于弃舰，我能看到的只是要求必须先将军舰上供奉的天皇照片转移到救生艇去。不过作者所说日本人好面子这一点，确实如此。



[33] 萨评：这指的是日本战国时代以来形成的幕府制度，当时日本的实权经过军阀混战落入掌握实权的将军——即“征夷大将军”手中，并且世代相传。此时，天皇只是日本名义上的统治者，天皇大权旁落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然而，这些所谓美国权威人士却忽略了，此处的“每个人”在日本指的实际是“每个武士”，他们的是以某某人的家臣自居，说只知领主不知天皇完全没错。然而，日本的普通民众心目中则一直把天皇当做日本的象征，而不会把将军当做日本的象征，这就像西方世界中上帝和教皇的区别一样。

[34] 萨评：的确，日本天皇在二战结束前，始终不是以人而是以神的形象存在于日本。

[35] 萨评：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心目中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所以，天皇的地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皇帝。曾有人问一个日本教授——假如你们的天皇暴虐无道，做尽坏事，你们会怎么办呢？结果日本人的回答是：那我们就会到樱田门（日本皇宫大门）外痛哭，期待吾王悔过。说起来，还是一点儿揭竿而起的念头都没有。



【图6】日本的圣地——皇宫

[36] 萨评：在二战中，美军有专门配漫画的教材，教育士兵怎样应付被俘后的日子，这本教材我曾见过日文译本，堪称图文并茂。可是，这对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来说用处并不大，因为，美军这种教材是建立在“战俘有战俘的权利”、“如果你不说，对方也拿你没办法”、“敌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恫吓”这类观念基础上。被俘的美国兵没想到日军根本对所谓战俘的权利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保密教育也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

[37] 萨评：“九一八”事变后，裕仁的确曾表现过“不满”，但这种姿态毫不妨碍他在次年一月发布《赐关东军敕语》，嘉奖关东军攻占东北的行动，并且绝无意因为自己“不满”而把东北还给中国。天皇裕仁的这种态度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东方的君主有让属下做坏人、自己做好人的传统，因此碰到这种不合公理的事情，天皇总要作一个表态，来维护自己“好人”的形象。第二种，则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日本人的性格是做事最初小心翼翼缺乏果断，但一旦初步得手，就会疯狂投入，乃至失控。那么，天皇最初的“不满”，无非是这个

日本人谨慎阶段的反映，而随后的表彰，则是得到利益以后迅速完成思想“革命”的表现了。“九一八”轻易得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疯狂的重要步骤，从此再也无法理智地刹车。

[38] 萨评：天皇在日本当时还有一个身份——“陆海空军大元帅”，不通过他就发动战争，要么是说话的人热昏，要么是日军当时根本没有军纪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进攻南京，还是袭击珍珠港，都是经过这位天皇的批准才发生的，这些有充分的史料证明。

[39] 萨评：指的是德国国防军贝克上将等人于1944年7月20日发动的刺杀希特勒、试图结束战争的事件。由于炸弹威力不够而失败，负伤的希特勒将所有涉案人员一律处死，其中甚至包括像谍报局长卡纳里斯上将、陆军元帅隆美尔等德军中的“精英”。

[40] 萨评：矛盾在这里找到了交集，即便是在反对法西斯的日本人眼里，首相或者军部代表的是具体的政府，为法西斯政府做事是错的，但天皇代表的是日本这个抽象的国家，为国家做事是没有错的。所以，死在二战战场上的日本兵就有了两个身份——法西斯麾下的恶人和为天皇即国家而死的英雄。这也是至今日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难以得到邻国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41] 萨评：实际上直到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天皇才承认自己是人。在这之前，如果说天皇是人，在日本是一项“大不敬”的罪名。



【图8】二战后终于承认自己是人，并且以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日本天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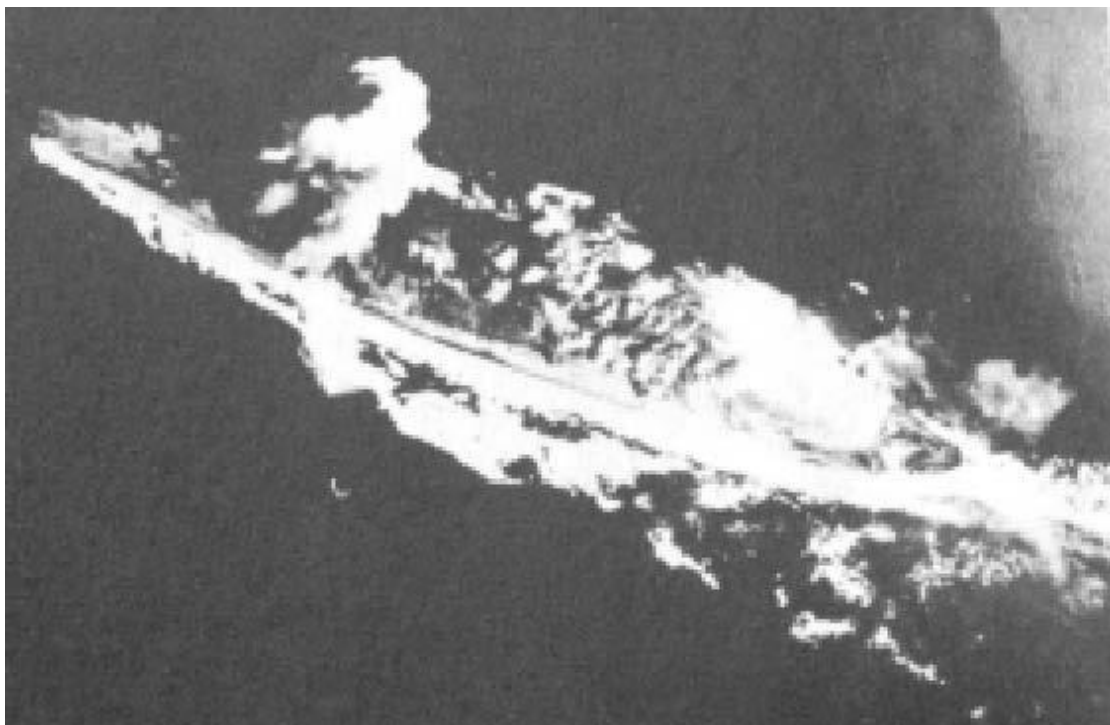
[42] 萨评：在日本真正反对天皇制的人至今不多，最有名的应该是大江健三郎，他拒绝了天皇颁给的奖章，理由是他根本不赞成日本应该有一个天皇，这种勇气使他成为日本文化界的异类。

[43] 萨评：天长节的说法来自中国，本是皇帝的生日之意。传到日本后成为法定节日之一，二战期间为4月29日，即昭和天皇的生日。这种时候日军往往会变本加厉地投入作战，

1938年日军为庆祝天长节，不顾气象条件，疯狂空袭武汉，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迎头痛击，被击落轰炸机、战斗机共21架，铩羽而归，史称天长节空战。

[44] 萨评：天皇下令停止抵抗后，日本陆相阿南曾策划兵变，被认为是天皇与法西斯军政权有所区别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当时无论是谁下达投降命令，都会产生同样动荡，倒是天皇来下这个命令，引起的动荡最小。这并不能证明天皇的无辜。

[45] 萨评：例如，日本电影《男人的大和号》拍得冠冕堂皇，然而真实的日本最大的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时，绝望的水兵们曾经大喊：“把少佐以上的军官统统干掉，要救日本只此一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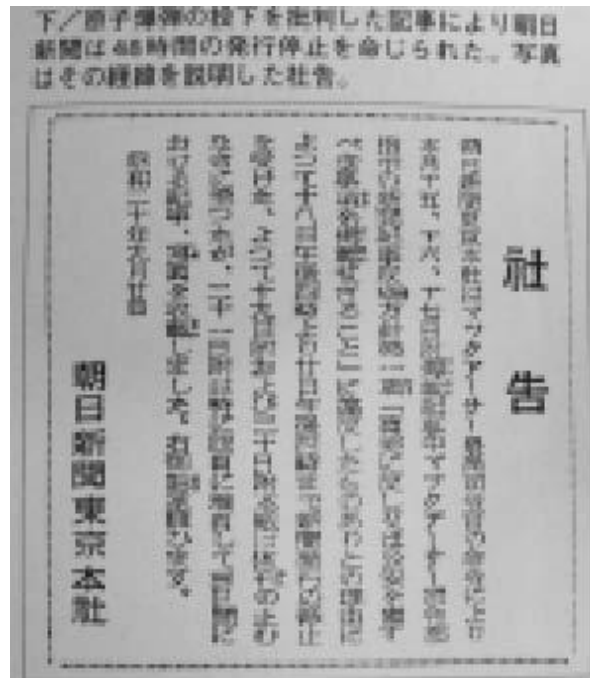


【图9】最后战斗中的“大和号”战舰，这艘当时最大的战舰最终被盟军击沉。

[46] 萨评：麦肯因，是今天美国人气甚高的参议员麦凯因三世的祖父。1944年12月17日，美国海军舰队在菲律宾战役中遭到强烈台风袭击，3艘驱逐舰沉没，7艘军舰严重受损，损毁飞机186架，人员死亡800人。这是美军在战争中最大的非战斗损失。这次灾难中，身为太平洋战区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和38特混舰队司令的麦肯因竭力挽救自己的属下舰艇，尽量减少了损失并因此受到表彰。

[47] 萨评：这有什么奇怪，在纽约甚至救一条狗也可以上新闻呢。

[48] 萨评：著名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作战中日本飞行员很少带降落伞，带了也多当做座垫——因为他们的战斗机常常要飞很长路线到敌军战线作战，如果飞机受伤后跳伞，就可能成为俘虏，而日军坚决拒绝官兵接受自己可以被俘的概念。其间接结果就是日本有经验的飞行员损耗大，以至于到了马里亚纳海战，新飞行员“菜鸟”们被美军当做火鸡打。



美国的确是提倡“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民主自由不是没边的。比如，批评美军的报道，就属于“不真实或者对公共安全不利”的内容。这是1945年9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就奉占领军命令停刊48小时的说明，原因是它曾批评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

[49] 萨评：这种习惯让巴顿将军吃了苦头，他因为发表言论称“任何人说他患了战斗恐惧症就是在逃避危险并强迫那些比他更能吃苦耐劳的人去承担风险”而遭到美国舆论的强烈抨击，以至于赫赫战功也不能挽救他被闲置的命运。

[50] 萨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弹尽援绝的时候发动“自杀冲锋”，扑到敌军飞来的子弹上去自杀。而这种命令在二战中也被日本士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图10】在巴丹投降的美军

[51] 萨评：日军在二战中对战俘的虐待令人发指，对美国战俘的虐待事件中，最著名的是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9日，菲律宾美军最后的抵抗据点巴丹半岛的守军投降，日军勒令七万八千名美菲军战俘在无食无水的情况下步行六十多英里山路前往战俘营，途中倒毙和被杀的战俘达一万五千人，到达战俘营后又因为极度恶劣的条件迅即死亡两万六千人。有报道推测，这是日军为了减少战俘对给养的消耗而有意为之。

[52] 萨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悉尼号”巡洋舰在重创德国海上幽灵“艾姆登号”时曾向德国舰长发出奥林匹克式的劝降信，德国舰长接受劝降的回信同样不卑不亢。然而，这种浪漫的事情在日军身上毫无意义。硫磺岛战役中，美军曾经以骑士般的劝降书敦促曾在奥运会获得马术冠军的日军战车联队长西竹一男爵保留有用之身，但深受西方影响的西竹一在此刻却毫不犹豫地表现了日本人的方式——在发动一场无济于事的反击后剖腹自杀。即便是日本战败以后，做过战俘的日本人在故乡也依然生活在某种阴影之下，比如乘有去无回的袖珍潜艇偷袭珍珠港被俘、被称作“日本第一个战俘”的酒卷直男，在战后回到家乡，就曾经遭遇过相当尴尬的情形。

[53] 萨评：不是正式命令，而是强调士兵应该尊崇武士道精神的《战阵训》，其中就有不能当俘虏的内容。

[54] 萨评：即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此战，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突破胡康河谷，力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几乎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等组成的三十三军。

[55] 萨评：不过，此战日军俘虏少的原因，在中国的报道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讲孙立人将军曾命令部下——去查一下，去过中国的一律枪毙……

[56] 萨评：在冲绳等地，主动投降的日军逐渐增加，但这里面包含了大量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的“娃娃兵”。传统的正规日军还是多半选择战斗到死或自杀。

[57] 萨评：此地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1944年4月，美军攻占霍兰迪亚，是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国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一个较大胜仗，这之前胜仗如瓜达尔卡纳尔是以美海军陆战队为主、陆军为辅的作战，麦克阿瑟一直耿耿于怀。不过霍兰迪亚之战日军的失败主要是在后勤方面，美军评价全靠精神支撑的日军“好像他们只靠空气、树叶和水就能打仗似的”。

[58] 萨评：曾经有外国人万分惊讶日军在整个战争中缺乏对于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但是，研究日本的民族性就会体会到，这本身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日本古代不推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崇尚像灿烂而短命的樱花一样死去。有这种思想基础的日本兵，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与大多数其他民族不太一样。有趣的是蒋介石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没有意识到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经历，使身为军人的蒋介石对这种敢于赴死的精神十分推崇，于是就有了他当政后“不成功则成仁”的口号。可惜国民党军人并不是日本人，内战里面作为传统的中国人更推崇中庸之道，于是大量蒋先生发给部属用于无奈时自尽的“成功成仁”短剑成了战利品。

[59] 萨评：这段历史似是而非。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被坦克轧的是日军一木支队，这支骄横的日军认为只要白刃战就可以天下无敌，所以登陆时连反坦克炮都不带，结果遭到美军战车的碾压而大败，支队长一木清直在焚毁军旗后自杀。但是，整个过程和投降杀俘没有什么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一木清直，就是在卢沟桥进攻二十九军的吉星文部的团长，是挑起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

[60] 萨评：这一点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的看法大相径庭。志愿军对美军被俘士兵有这样的要求十分理解，他们认为这些美军士兵都是美国的劳动人民，来打仗是被迫的，是自己的远方阶级兄弟，所以，有这种想和家里通个信的要求，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这种观点与美国大兵真实的想法并不是完全吻合，但是这种宽容的精神，直到几十年后依然为当时的美国战俘所赞颂。

[61] 萨评：您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被外星人劫持以后会怎么做，大体就是这些日本俘虏的感受了。

[62] 萨评：有相当多的照片表现这些被俘日军怎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昔日的敌人劝降日军、指点路线等等。虽然顽抗和合作完全是两回事，但日本人一样的“力争上游”。

[63] 萨评：日本人不是这样灵活变通的——而是如果失败，别人给指一条路，他会一如既往地投入地走下去，哪怕和原来方向完全相反，但是要是没人指路，那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了。



【图12、13】和盟军合作愉快的日军战俘



### 第三章

### 各安其位



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战后日本公布的日方原子弹研究机构。由于盟军轰炸的影响，日本的核研究被迫在山洞中进行。对比曼哈顿工程的宏伟，大体可以理解日本的战败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tianbooks

理解日文中“各安其位”<sup>[1]</sup>这几个字的意思，对了解日本人至关重要。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赖方式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一样，虽然这两种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美国人而言，将等级制度视为一种适当的社会机制非常困难；但日本人却笃信等级制的作用，这是他们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体概念的基础。因而，我们只有对诸如家庭、国家、宗教及经济机构等各方面进行一番描述，才有可能了解日本人对生活的看法。

对于国际关系问题，日本人也采用审视国内问题的方式，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一直将自己描绘于高居国际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但是，西方国家却取代了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对现实的接受仍然是建立在等级观念基础之上。日本的外交文件不断表明对这一观念的重视。在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日本政府声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保持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是各国都能获得自己的适当位置……”<sup>[2]</sup>天皇在签订此条约后所发的诏书中再次提到了这点。诏书中说：

努力在世界伸张正义、推动世界大同，这是我们皇祖的训谕，我们应当将此日夜铭记在心。当今世界危机四伏，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我三国政府订立协定，希望早日消除祸乱，恢复和平。

要使各国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让各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所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实现该目标，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明确的声明，其中一点写道：

……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是……使各国都能在国际社会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日本政府不能容忍的是现有的、与日本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的状况。

这份声明是针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而发表的。赫尔在这份备忘录中强调了美国所尊重的几条最基本的原则，它们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与等级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同等重要。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即：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调解；平等的原则。<sup>[3]</sup>这些原则是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权利精神中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对美国人而言，平等是追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基础，是最崇高和最富有道德意味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拥有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的基础。即使是在我们自己违反了这一原则的时候，<sup>[4]</sup>我们依旧支持平等的力量；我们满怀义愤与等级制度作斗争。<sup>[5]</sup>

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持有这样的原则。杰佛逊把这些原则写入了《独立宣言》。写入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也是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能够在公开文件里正式地写入这些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而欧洲人却对此感到陌生。一位法国年轻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了美国，之后写了一些有关平等问题的书。作为一位睿智、敏锐的观察家，他很快便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发现许多优点。对阿列克斯·托克维而言，美洲大陆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托克维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的，在他的那些个阶层里，仍旧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和冲击，又受到了全新而且极端的《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在托克维的书里，他高度评价了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以一个法国贵族的视角报道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他确信美国领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将在欧洲发生，尽管欧洲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而，托克维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这个新世界。他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真正认为实现了彼此平等。人与人之间都以一种全新、轻松的方式交往。人们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美国人在对待关于等级的礼节上，既不勉强自己遵循，也不强求别人恪守。他们乐于说自己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那里不存在贵族式的或是罗马式的家族，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里不复存在。托克维说，在美国人心中，没有什么可以和平等相提并论，即使是自由也不例外，因为人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忽视它，而平等却是人们生活的基石。

托克维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的生活，许多美国人读后都深受鼓舞。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社会也发生



了很多变化，但它的基本轮廓还是依然如初。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认为，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了。杰佛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贵族式社会秩序情有独钟，而现在一些美国人也仍然抱守这样的理想。但即使是汉密尔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贵族式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向日本声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些高尚的道德基础之上，这是我们信赖的原则。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不断完善这个有缺憾的世界。<sup>[6]</sup>同理，日本人信奉的“各安其位”的原则，也是他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的生活准则，这种原则已经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根深蒂固。<sup>[7]</sup>长久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有组织的生活准则，这些准则最容易被设想到，并且已被广泛接受，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然而，这还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简单的权威主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来行事的。现在日本已经接受了将美国的权威地位放置在他们最高的等级位置上，因而我们就更应该深入探究他们的习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尽管日本越来越被西化，但它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sup>[8]</sup>当日本人表达“吃”或“坐”的意思时，他会区分对象的熟悉程度以及地位的高低，从而用不同的表达方法。比如“你”这个词在日文中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sup>[9]</sup>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许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相同。在使用这些“敬语”的时候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sup>[10]</sup>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有具体的规矩和习俗的。鞠躬时，不仅要弄清楚鞠躬的对象，而且还得懂得鞠躬的程度。一个对主人来说十分恰当合理的鞠躬，对另外一个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了。鞠躬的方式也很多，可以是双腿跪地、双手扶地、用前额接触双手跪拜，也可以就是简单点头和晃动肩膀。因而日本人必须从小就得学习行礼，而且得学习在特定的场合行适当的礼。

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等级差别时常通过适当的行为来认可，同时还需适当地考虑双方的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甚至同样的两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彼此间表现的亲疏远近程度也不相同。通常，一般人在与自己的好朋友交往时可以不用鞠躬；但如果对方穿上军装，那个穿平民服装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如何尊重等级制度是一门艺术，它要求综合权衡多种因素。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一些因素往往相互抵消，而另一些情况则会有增强作用。<sup>[11]</sup>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彼此交往中没有那么多礼节。比如在美国，人们一回到自己家中，就会把最细小的礼节都抛掉。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仔细观察礼仪的地方。在婴儿还被母亲背着的时候，母亲就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授孩子礼节。幼儿还在蹒跚学步时，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要向兄弟们鞠躬，不论兄弟们的年龄大小。鞠躬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表现，它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含义。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他的意思就是承认受礼者有权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情进行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建立在性别、辈分、长子身份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2]</sup>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高尚道德准则。<sup>[13]</sup>在公元六七世纪，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以及世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孝道思想也很早就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然而，孝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以适应中日两国不同的家庭结构。甚至在现在的中国，一个人也必须效忠整个宗族。宗族对成千上万的成员进行管理，它也获得每个成员的支持。当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也有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宗族几乎包括了一个村庄的全部居民。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属于同一个宗族。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都属于同一个宗族。即使在城市里也会有同宗，虽然他们远离乡村。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联合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某些日子里，宗族成员共同向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行礼致祭，他们都来自于同一祖先。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接受教育。它联系分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印刷一次认真修订过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个宗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如果宗族与当局的意见不一致，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审判。在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往往是名义上承认受政府当局的管理，而那些由不断更迭的政府指派来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区则被视为外人。<sup>[14]</sup>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也只有贵族和武士宗族可以使用自己的姓氏。在中国，姓就是整个宗族的根本所在，如果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不可能获得发展。<sup>[15]</sup>某些宗族保留族谱的作用就类似于姓氏。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保留族谱，<sup>[16]</sup>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向上追溯，而不是从古至今记录所有的后代。这是一种不同的方法。再加上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是封建领

主而不是宗族，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僚不同，因为后者是这个地区的外人。在日本，重要的是某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人们与所属的藩有密切的联系。

祭祖是另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法，即在神庙或圣地祭拜远祖或宗族神。在日本，即使是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可以参加。但在日本却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平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并不需要证明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sup>[17]</sup>有些人往往因为住在某位祭神的领地上，就被称作这个祭神的“孩子”。当然，人们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不同村庄的祭拜者还是有某种联系的，这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只是他们不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罢了。

一般家庭的客厅里都会摆着与六七个最近去世的先人的灵牌，人们在这里祭拜祖先，这与神社不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祖先面前会供有食品，祭坛上供奉灵牌，类似于微型墓碑。<sup>[18]</sup>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墓地中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人们甚至会迅速忘记三代之前祖先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接近于西方国家，也许和法国在这一点上最为相近。<sup>[19]</sup>

因此，日本人的“孝道”只是局限在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之间。最多也仅仅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意思是每个人应该在这个团体中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大户人家的范围可能大一些，但往往会分成几个独立的分支，然后次子再另立门户。在这个狭小的家庭范围内，对于“各安其位”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长者还主持家务，其他人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今天，即便是一个人已经养育了几个成年儿子，在他的父亲还未正式停止主持家务时，凡事都必须向年迈的父亲请示，获得他的允许。即便是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还是完全安排他们的婚姻。<sup>[20]</sup>父亲作为一家之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享用，沐浴时也是他优先，<sup>[21]</sup>全家人在向他鞠躬时，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谜语，用我国的解谜形式来解释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sup>[22]</sup>提出建议就像要求和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论他怎么想去这样做，都不可能。”

“各安其位”包含着辈分和年龄上的差异。日本人在说自己非常困惑时，常说“既不是哥哥又不是弟弟”，就像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对于日本人而言，长子保持兄长的气魄就应该像鱼在水里生活那么自然，因为长子是继承者。去过日本的旅游者们往往会提到“日本的长子很小就表现出了责任感”。<sup>[23]</sup>长子几乎与父亲一样拥



有相同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会早早地就依赖长兄。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长子要留在家中，弟弟们或许会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去闯荡，接受更多的教育，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观念仍然十分强大。

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兄长观念也清晰可见。1942年春天，就“共荣圈”问题，陆军部的一个中佐发言人有如下观点：“日本和他们是兄弟之间的关系。要使占领地区的人民都清楚这一事实。不要对被征服者体谅过多，否则他们会过度依靠日本人的好意，这会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换句话说，在对弟弟作决定时，哥哥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强力推行这些事时不必“过多考虑”弟弟的意见。<sup>[24]</sup>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sup>[25]</sup>而且她的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有些场合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循规蹈矩，而礼物、关心和教育费全都用在了她兄弟身上。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主要内容，而就严格的智力训练而言，则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sup>[26]</sup>一位这种学校的校长曾经建议，为那些来自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教授一些欧洲语言的知识，其目的是使她们在帮丈夫掸掉书籍上的灰尘后，能正确地插入书架，放回原处。

但是，与亚洲其他大多数的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这也不仅仅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商店，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深藏于家中等等，这些都让印度妇女惊叹不已。在日本，妻子进行家庭采购，执掌财务支出。如果出现财务吃紧的情况，她就挑选一些用品送进当铺。家庭主妇管理着家里的用人，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严格管理家庭事务，仿佛自己前半生从未当过言听计从的儿媳妇。<sup>[27]</sup>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形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这些行使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行，倒不如说他们是代表这些因素来行使权利。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所有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家庭成员。他必须作出重大决策并贯彻下去。但是，他并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他的行动必须对家庭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庭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成为合格的继承人。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要祈求祖先能够保佑



他的高尚品德。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家庭的责任要高于个人的要求。<sup>[28]</sup>

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不论门第如何，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进行开会讨论。例如，对于一个有关婚约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对于决定过程，大家都有发言权，并不是因人的地位高低而有区别。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改变决定。当家人如果不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则会使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当然，对于有关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事情，个人可能不会完全依从于会议的决定。但是，长辈们会竭尽全力要求晚辈们完全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就像他们当年一样。<sup>[29]</sup>普鲁士从法律和传统上给予男人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而上述日本家庭要求的约束力则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并未减弱，但效果则不同。日本人并不在家庭生活中学习对专制权威的尊重，也不培养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sup>[30]</sup>无论要求多么苛刻，每个成员都必须以最高价值的名义服从家族的意志。因为这个决定与每个人的利益生死攸关，这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进行要求的。<sup>[31]</sup>

所有的日本人最早都是从家庭中学习等级制思想的。人们通过在那里的学习，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应用到经济和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他懂得，要向“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所有的尊重，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只要他的地位高于自己。<sup>[32]</sup>即使是一个男人受到妻子或者弟弟的支配，也应受到正式的尊重。尽管有人在幕后操纵，但特权之间形成的外在界限也不会受到破坏；同样，外在界限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权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种现象有时甚至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便利，比如他们没有正式身份但却可能掌握实权，这样就有可能保全自己。日本人从家庭生活经验中懂得：要作出一项决定，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让整个家庭相信这么做可以维护家庭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偶然成为家长的专制者强加于人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要求。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服从家庭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不太尊重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sup>[33]</sup>即便是当家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家庭中的等级思想仍旧延续下来。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准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庭中强大而公认的情感纽带很难接受。日本家庭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团结性，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日本人如何培养了这样的团结性。同时，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如政

治、经济生活等）的要求，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环境中彻底地学习这种习惯的。

等级思想对日本人生活和阶级关系都有巨大的影响。从历史上讲，日本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延续了几个世纪，对日本民族而言，这既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自有文字历史以来，等级制一直是日本生活中的准则，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学习了生活方式，并使其适应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日本的外交使节惊异于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因而日本的皇帝和官员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中的习俗来丰富日本的文化。他们以无以伦比的精力来推进日本文化的发展。<sup>[34]</sup>而在那以前，日本甚至连书面语言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用以书写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当时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sup>[35]</sup>它掌管着山岳、村庄，给人们带来好运。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依然存在，成为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使其成为“保护国家的理想”宗教。在此以前，日本的官方和私人没有宏伟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以中国的京城为蓝本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它们都是模仿中国式样，<sup>[36]</sup>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衔、等级以及法律制度。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此成功、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再找到另一个例子。<sup>[37]</sup>

不过，从最初日本就未能复制出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衔，在中国是授给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那些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形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sup>[38]</sup>日本有许多半独立性质的藩国，而各个藩主又相互嫉妒对方的实力，许多重要的社会习俗都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却最终未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日本人也没有接受中国人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室的人称为“云上人”，<sup>[39]</sup>其意为只有皇家的人才能继承皇位。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日本却从来没有。<sup>[40]</sup>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臣民也是神圣的。当初日本天皇及其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人在这些方面作了哪些安排，也想象不到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尽管日本所有的文化都来自中国，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只是为世袭领主和他的家臣们扫平了夺取国家统治权利的道路。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取得了统治地位，剥夺了天皇的实权。后来，封建领主们

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之中。其中著名的源赖朝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将军”是一个古老的军事头衔，全称是“征夷大将军”。<sup>[41]</sup>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后代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他们就可以世袭这种特权。天皇已成为一个形同虚设的角色，但将军必须依赖他举行仪式进行授权，这是天皇唯一的重要性。幕府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主用武力进行镇压。<sup>[42]</sup>每个封建领主——大名，<sup>[43]</sup>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sup>[44]</sup>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争夺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正当地位”。

公元十六世纪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内战，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为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sup>[45]</sup>这种将军特权世袭了约有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在日本国内以武装维持和平，直到最后崩溃，并有效实行了为德川氏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并且无法轻易解决。在内战中，一些最强大藩国的藩主曾经是他的敌手，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他们就是所谓的“外样”。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控制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的确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们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重要的职务会一律保留给“谱代”，即在内战中拥护德川者。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统治，德川家康采用了一种战略，防止各个藩主们积蓄力量并形成联合力量，因为这可能威胁到将军的统治。德川氏没有废除封建体制，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他还强化了这一体制，并使它更加巩固。<sup>[46]</sup>

日本的封建社会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极为复杂，每个人的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德川氏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并且规范了各个阶层人的日常具体行为。每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表明自己阶层地位的标志以及有关世袭的内容。根据世袭等级的相关规定，对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合法居住的房舍进行管理。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等级最低的是贱民。<sup>[47]</sup>而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被人们所忌讳的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在日本社会中，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



做人看。甚至连通过他们居住村庄的道路的里程也不被计算，似乎这些地方和居民都不存在。这类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也保证他们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他们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48\]](#)



【图9】日本传统社会街景

商人的地位仅比贱民好一些，也许美国人对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理解，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客观事实。商人制度总是会破坏封建制度。因为当商人获得人们的尊敬而商业繁荣的时候，封建制度就会衰败。[\[49\]](#)十七世纪，德川氏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实行过，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基础。[\[50\]](#)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必定获得发展。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对于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载商品。[\[51\]](#)关税壁垒严格限制了国内贸易，藩界都设有关卡，严禁商品的进出。其他的相关法律强调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佩带的雨伞、操办婚礼丧礼时的花费数额等等。商人们不能住在武士的社区。法律并不保护商人们免受武士这一特权阶层的伤害。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建立在货币经



济基础之上的，而德川氏却企图把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货币经济下无疑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德川却试图这样去做。[\[52\]](#)



【图10】典型的日本武士

德川幕府将武士和农民这两个能够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阶层固定起来。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战之前，通过实施著名的“缴刀令”，伟大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完成对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德川家康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权利。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便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必须靠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大米作为俸禄以维生。[\[53\]](#)大名把大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依赖于领主。在日本历史的早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在各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具有了经济性质。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日本的武士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诸侯，也不是富有的士兵。[\[54\]](#)他们只能依靠

一定量的俸禄生活，而在德川初年，就为其家族确定了俸禄数量。这份俸禄并不充裕，根据日本学者的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当，只够维持生活。更头疼的是，这份微薄的俸禄有时还要和其他的家族继承人来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家族的规模。对他们而言，最令人难堪的事情莫过于承认威望实际上是建立在财富和光鲜的外表上。所以，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俭朴是人的最高美德。<sup>[55]</sup>

武士与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之间还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后三个阶级被称为“庶民”。武士不属于“庶民”。武士的佩刀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还表明他的特权，并且是他社会等级的象征。他们可以对平民使用佩刀，这是德川时代以前的传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贵族行为不端的庶民，应立刻被斩首。”<sup>[56]</sup>这条法令仅仅是认可以前的传统罢了，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庶民与武士阶层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基础之上。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服从大名的统治，接受他的直接统率。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上到下，每个阶层各有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以及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两个阶层的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形势的变化会让两个阶级之间时而发生联系，但这种联系本身并不是等级制度当中固有的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仅仅依靠舞刀弄剑，他们还日益成为藩主的理财专家和精通古典戏剧、茶道等各种高雅艺术的专家。他们进行各种外交活动，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谋略。<sup>[57]</sup>在两百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使用武力。就像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发展了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像商人们一样发展了各种高雅艺术。

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农民不应受到武士的欺辱，政府每年还要征收沉重的米赋，并且对他们实行各种限制，但农民还是享有某些安全保障。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这在日本会给人带来声望。在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农民永久性地转让土地。<sup>[58]</sup>这条法律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而不是封建领主的利益，这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农民非常珍视对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他们世代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对它倍加关心。这个阶层就像希腊神话中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的擎天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包括将军府的政府、大名府的机构，并为武士提供俸禄等等。他们要向大名交纳实物税，也就是一定比例的农作物。同样是出产水稻的国家，暹罗的传统

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国中的比例高达80%。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役和工作的情况，这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的规模。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变化。<sup>[59]</sup>对一个亚洲国家而言，人口能够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基本保持不变，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对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实行斯巴达式的限制。但在下属与上级之间则存在着相对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原则受到侵犯，连最贫困的人都要进行反抗。

即使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农民也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和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十六年间，至少有一千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额外的赋税。如果实在忍无可忍，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农民们写好要求重新调整赋税的正式请愿书，然后递交给藩主的管家。如果请愿书被管家扣压，或者藩主不予理睬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书面控诉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案件当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轿子，直接将请愿书呈送给高官。尽管农民在请愿当中要冒很大风险，但幕府当局会立刻进行调查，其中一半的判决对农民有利。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请愿所作的裁决却并不符合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虽然农民的抱怨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的尊重也是明智的，但是农民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效忠”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农民视为英雄。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请愿的领导者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但在场的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律，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并将他们尊奉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sup>[60]</sup>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在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在每个藩中，大名高居等级制度的顶端，因而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面临的最主要行政问题是控制大名，他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大名之间结盟，或者实施侵略计划。各藩边界都有哨所和海关人员，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非法贩运妇女出境或走私武器入境。在没有将军许可的情况下，大名不能联姻，防止形成危险的政治联盟。藩与藩之间不能进行自由通



商，甚至彼此之间的桥梁也不能通过。另外，将军的密探也随时向他通报各地大名财政支出情况，一旦发现哪个藩主的财力充沛，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并使其恢复到原有的财力水平。其中有一项规定最为出名，那就是一年当中，大名必须在江户住上半年。当自己返回领地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确保了自己的权势，并强化了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也是通过天皇任命才能执掌政权，因而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度中，将军并不是关键力量。但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天皇和他的世袭贵族（公卿）们大都被迫隐居在京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还不如一些地位低下的大名，皇宫中的一切仪式也受到幕府规定的严格限制。但是，即便是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从没采取措施来废除这种由天皇和实际统治者构建的双重统治的局面。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十二世纪起，大元帅（将军）就经常剥夺天皇的实权，自己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曾有一个时期，这种双重统治的现象极其突出，以至于作为傀儡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权力又由首领世袭的政治顾问来行使。经常会发生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的现象。即使在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佩里将军也没有料到将军背后还有天皇。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使节哈里斯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依靠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位天皇。<sup>[61]</sup>

实际上，日本天皇与太平洋各岛上的皇帝概念是一样的。天皇是神圣的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皇帝自己行使权力；而在另一些岛屿上，皇帝则将权力委托下去。但是皇帝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的首领是如此神圣，以致不能亲自进食，而且使用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必须由人抬送他才能外出，因为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将自动地成为圣地，从而归他所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脱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的政府与日本政府最为相似，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sup>[62]</sup>的神圣首领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主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在亲自举行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中要使用“天堂已经空了”这样的词语。死后，他一般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参与政治。<sup>[63]</sup>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sup>[64]</sup>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参与世俗事务的程度并不是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征夷大将军统治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珍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只是西方人认为天皇的作用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严格的等级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从天皇到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受到了封建时期极其明显的等级思想的影响。毕竟，从法律意义而言，日本封建统治不过是七十五年前才结束。而那种强大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失。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进行精心谋划，希望能够大量地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尽管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sup>[65]</sup>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更是受到这个连最具体的行为细节也进行了详细安排、对社会地位也进行了规定的世界的制约。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这样，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也能够防止大名之间的内战。如果民众们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进行请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面临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做法却得到公众的认可。在幕府统治时期，最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而且只有将军拥有这个箱子的钥匙，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将自己的抗议信投入箱中。在日本，只要出现与现存行为规范相悖的行为，就有真正的保障来矫正侵权行为。<sup>[66]</sup>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可以通过遵守现存规范来表现自己的勇气、优秀，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修改或反抗上。<sup>[67]</sup>这个世界在许可的范围内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摩西十诫中的一些抽象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办；兄长该如何行事，而弟弟又该如何行事等等。

在这种制度下，日本并没有成为一个顺从的民族，这一点与那些受到强力等级制度统治的民族不同。重要的是要承认，日本各个阶级都获得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sup>[68]</sup>也获得保障，以垄断他们的特殊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获得了当局认可。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却有秩序和安全。

印度却没有日本等级限制中的某种灵活性。在日本的习俗当中，你可以在不破坏公认的方式的情况下，采用技巧来利用等级制度。一个人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之后他们就会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于上流社会。比如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的确，农民的土地不允许转让，但是由于日本的地租很高，所以让农民继续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事情。高利贷主可以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且能够对土地收取佣金。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是有名有利的。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变成贵族。

另外一个利用等级制度的传统方法是收养，这是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方法。德川氏对商业严加限制并没有阻碍商人很快富裕起来。<sup>[69]</sup>因而，商人们就想尽办法让武士收养自己的儿子。日本人大多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称“婿养子”，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但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的户口要从生父家的户籍中删除，然后转入妻子家的户籍，从此后就要采用妻子家的姓氏，并要和岳父岳母一起生活。代价尽管很高，但获益却不少。当富有商人的后代成为武士之后，原先贫穷的武士家庭实际上就与财富建立了联系。没有发生反对等级制度的暴力行为，它依然保持原状。富人们也通过利用这种制度逐渐跻身于上流阶层。<sup>[70]</sup>

因此，日本的等级制并不是要求人们只能在同一阶层内部进行通婚。有好几种认可的方式让人们在不同等级间通婚。这些方法使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到较为低级的武士阶层，而这种情况使西欧与日本间在这方面的对比越来越明显。在欧洲，一个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迫使各国封建制度的最终崩溃，而这个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而在日本却没有出现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sup>[71]</sup>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认可的方式“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另外，商人还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然而，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垂死阶段之时，与欧洲大陆相比，日本允许各个阶层拥有更大的流动性。对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会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很容易说明，日本这两个阶级拥有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类情况在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过几个类似的例子，但整体说来，欧洲的阶级的固定性依旧十分强大。在法国，阶级冲突竟导致剥夺贵族的财产。但在日本，不同的阶级之间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联盟推翻了衰朽的幕府统

治。虽然近代日本仍保留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sup>[72]</sup>

日本人喜欢并信任他们那套复杂的行为规范，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只要人们遵守规定，就可以获得安全保障；这种规范允许对非法侵犯的抗议，并对规范进行适度调整，以便对自己有利；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sup>[73]</sup>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1848年的革命。<sup>[74]</sup>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已无法维持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身陷财务危机的大名已无力支付自己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网络已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名们企图对农民增收已经非常沉重的赋税来避免崩溃，常年预征使农民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幕府的统治也岌岌可危，濒临崩溃。当佩里司令官于1853年率兵到达日本的时候，那里的危机已是一触即发。他用武力强行进入日本，并于1858年与其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已无力反抗。<sup>[75]</sup>

但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这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落后的。另外一个与“复辟”这个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sup>[76]</sup>国民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而极少数懂得这种方式不可行的领导人虽然努力奋斗，却纷纷被暗杀。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似乎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五十年后竟能与西方国家进行竞争了。但这一切竟然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这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完成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没有一个西方人会认为日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sup>[77]</sup>在地平线的上方并没有看到巴掌大的乌云预示二十年后会有一场变革的风暴横扫日本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落后、受等级思想束缚的日本的民众转向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地走了下去。

---

<sup>[1]</sup>萨评：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sup>[2]</sup>萨评：即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代表在柏林签署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文本日本的排名在后。这是所谓“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的标志，因为这个条约中这三个国家自称为“改造世界的轴心”，所以历史学界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也因此，轴心（AXIS）一词在西方也就和法西斯、凶残、野蛮等等概念挂上了钩。





【图1】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的庆祝仪式

[3] 萨评：可以对比一下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乎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同在东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念与西方更为接近，在根本的观念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4] 萨评：作者可谓坦诚。

[5] 萨评：这里恐怕要澄清一下，这应该指的是美国普通人和政府之间的相处原则，而不是美国政府对外的原则。等级制度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并且有时候良好地解决着当地的问题（比如在日本）。如果美国政府见到等级制度就对外宣战的话，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打到最后，美国会得到一个比“世界警察”更糟糕的名声——世界的毁灭者。

[6] 萨评：自由平等可说是美国人的一种理想，也是美国成为今日美国的基石。虽然美国在世界上颇为霸道，但如果接触它的人民多了，就会发现“美国人”和“美国”还不是一个概念，美国人大多是些理想主义的大孩子。而说到美国，虽然对日本人的“国际新秩序”不适应，但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可不是这样的理想主义，它和德意日的矛盾是利益的矛盾，充其量是实用主义而已。

[7] 萨评：日本坚持的等级制度，还有和其他国家等级制度不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不仅坚持等级制度是必须的，而且坚持现有的等级制度不能变更，比如天皇，那就是只能天皇来做，小泉或者安倍是绝对不可以做天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在传统上也很强大，但是，第一，我们今天不会公开支持等级制度，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生根发芽；第二，中国人支持等级制度，但也支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所以，大和尚朱元璋也可以当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区别呢？其一，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革命”，只有



“维新”，这使他们的内心潜意识里拒绝接受对现有秩序的彻底颠覆。中国的历次革命使等级制度屡次被打破，自由平等的观念就在这种破坏中开始发芽。其二，中国自古以“天下”自居，认为周围都是蛮夷，只要解决了内部问题，外面的事情就可迎刃而解，所以来一次革命解决内部问题并不觉得有多么过分；而日本人有岛国天生的对外恐惧症，习惯抱成团，在内部闹革命就被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了。

[8] 萨评：两个日本人早晨相遇，上级对下级只要说“哟寺”，平级要说“噢哈哟”，下级对上级呢，就要说“噢哈哟骨杂义马斯”了，至今如此。



【图2】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并不代表传统等级制的废弛。

[9] 萨评：作者这里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确切地说，日语中根本没有“你”这个词。我们常把日语中的“阿纳塔”翻译成“你”，这是不确切的，这个词翻译过来是“你小子”，要是恋人之间这样说倒也无所谓，外国人这样说，也可以理解你不是故意的，但普通日本人对老板来这样一句，估计会招来勃然大怒。那么，日本人之间该用“你”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求预先弄清对方的姓名，以姓名相称，来表示尊重——你若是想和人家打交道，而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在日本被认为是失礼的举动。

[10] 萨评：这个可能有点儿误会，把中国封建社会“跪”的含义安到日本人头上去了。日本人喜欢鞠躬不假，跪下的情况也有，但拜并不太多。大概是他们用榻榻米，吃饭谈话等等的时候，沿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喜欢跪着吧。这倒不是什么谦恭或等级的表现，而是生活习惯。这种场合，就是将军、天皇，也是一样跪着的。

[11] 萨评：艺术如果放在舞台上自然光彩夺目，如果生活中一言一行都艺术化，就是模特也要累死——不过，日本人就硬是能适应下来并且安之若素。想想这一点，日本人在体育比赛中那种顽强也就可以理解了。

[12] 萨评：现在日本人也明白外国人弄不懂他们这些礼节，不过，出席一些活动时，不管你的反应如何，他们对你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礼节。“对牛弹琴”为何如此上心，原因

是日本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上等人，不是粗坯，而外国人懂不懂，他们并不在乎。这是礼貌之举还是自以为是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3] 萨评：又是一个美国人的误解。日本对于“孝”并不重视。日本的子女与父母感情淡薄，至今如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多是住在最好的房间，而日本，子女很少与父母住在一起，如果住在一起，老人的房间往往是最差的。即使这房子本是老人买的。古代日本残酷的自然环境，让孝道难以得到发展。



【图3】明治年间境遇悲惨的日本老年妇女

[14] 萨评：其实，这种官与民的区别，倒是中国民本主义的发源呢。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和平时间，官虽然称父母，但只有打官司、征粮赋的时候，老百姓才和他打交道。其他时候，老百姓是自由的，这和日本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零件这种概念完全不同。如果说中国社会有类似日本的时代，那就要说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吧，可是至今仍被称作暴政呢。

[15] 萨评：这个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宗族门阀的观念不如中国那样强大。但是，由于日本没有发生过革命，这个不那样强大的门阀制度，影响却比中国还要长久，二战也不能将其彻底废除。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日本政坛看到宗族的影子。

[16] 萨评：这里要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生活中要说某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会被认为是骂人，但如果这样说日本天皇，却是毫无错误。因为日本天皇的家族至今没有姓，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17] 萨评：日本的神社类似于中国的庙，和祠堂没有关系。



【图4】日本的神社

[\[18\]](#) 萨评：日本的祖先牌位旁边还有供奉一个小盅的习惯，每天家里饭熟时，就要用这个小盅装一点饭，作为祭祀，意思是祖先虽然亡故，还是和家人一起吃饭的。

[\[19\]](#) 萨评：西方对于血缘亲戚关系大多没有东方热心，为何单独拉出法国人示众？

[\[20\]](#) 萨评：这其实反映了日本的父权与夫权之强大——在他们老得离开岗位之前。

[\[21\]](#) 萨评：这在中国人可能有点儿不好理解，需要解释一下，日本人传统上用浴缸洗澡（虽然事先要淋浴的），全家人共用一缸水。所以第一个洗的水最干净，最后一个洗的呢，那就不好说了。

[\[22\]](#) 萨评：应该是父亲，日本传统中母亲没有多大影响。



【图5】日本的沐浴，可以看到人们顺序在浴桶外面洗净身体，然后到浴桶中用同一桶水享受泡澡的愉快。

[23] 萨评：如果看今天日本的王室，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太子德仁是长子，他弟弟秋萩宫亲王是次子，两人的气质就截然不同。日前德仁太子因为妻子不能生男的问题和天皇闹矛盾，有人怀疑日本王室会更换太子，这即便从两人的个性来说也不大可能。因为德仁和他弟弟秋萩宫从一生下来，培养的方法和建立的气质就不一样，骤然更换，要秋萩宫做好太子那份活计谈何容易。





【图6、7】德仁和秋筱宫，可以看到两人的不同。

[\[24\]](#)萨评：其他国家也不要误会日本是要强调双方有“兄弟之谊”，伪满皇帝就曾为日本所说的这种兄弟之谊激动不已，后来才发现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同。因为日本的文化中，长兄是权威的象征，日本所说的“兄弟之谊”，实际要说的是要其他国家在日本面前做儿皇帝。

[\[25\]](#)萨评：而且他们走路的方式也不一样，日本男性要求大步而行，表现其威严，女子要小步趋进，展示其服从。看日本电影就可以发现这两者的区别。

[\[26\]](#)萨评：二战前日本女校最热门的专业就是“家政”，就是教学生怎样做家务。所以她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将来从事某项工作，而是相夫教子。

[\[27\]](#)萨评：基本评价正确，日本男主外而女主内，妇女在日本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只不过日本的天不是按照左半边和右半边分的，而是按照上半边与下半边分的，日本妇女那一半，恰好在下面。

[28]萨评：所以二战中一些疯狂而残忍的日军将领，生活中又往往是清廉而勤勉的，似乎又不像能做出这样坏事的人。如此矛盾的人格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做那些疯狂而残忍的事情时，自以为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责任”而做，所以丝毫不会感到不安。

[29]萨评：这里面带有对日本习惯的美化，估计是日本俘虏见到美国文明后为了表示日本有同样的文明而加以误导的。在一个只有父亲和儿子的日本家庭里，也可能出现这样“民主集中制”的会议，但到了较大家族，或者到了社会上，这种大会其实只是用来宣布结果而非讨论。在大会上出现针锋相对的争吵局面，被日本人认为是对秩序的挑战而难以适应。日本人是典型的“会上不说，会下串通”。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的国会，甚至可以拳脚相加，互泼凉水，但那更多的是政治家在作秀吸引镜头罢了。真正关键的决议，还是在议会之外就已经得出了结论，然后到议会走个形式。至于会下串联的巧妙，受东方的传统影响，日本历史上的合纵连横之巧妙，阴谋诡计之普及，连发明了“纵横家”一词的中国都要惊讶。

[30]萨评：日本的这种教育用潜移默化来说更为合适。比如，在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学校，传统上对强者称王称霸采取放任态度，自然让孩子养成尊敬强者的习惯——虽然从我们外国人看来，拳头和公理相比，对后者的尊重更重要。

[31]萨评：正因为日本人把对于权威和强者的服从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很少像中国人那样问：“他凭什么……”好的一面是这样互相扯皮的事情少了，坏的一面是如果这种决定是错的，日本人纠正它的机会也就非常有限。

[32]萨评：罗马的独裁者苏拉曾经说：“这么多的奴隶啊，总会找到主子的。”对于一个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是件可怕的事情，他需要给自己找个上司，需要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有被作为社会垃圾抛弃的危机。这一点和很多中国人习惯于“找组织”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点儿不同。中国人找组织是因为相信组织可以庇护他，为他解决问题；日本人找组织是因为习惯，需要有人管理他。

[33]萨评：日本人的确很少在家庭中使用暴力，比如爸爸打儿子屁股这种事儿就不多见，但这不是因为日本人人情味重、溺爱孩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合规矩，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日本的家庭暴力在另一种情况下达到极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子侄丢下一把刀，令其自尽来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维护家庭的荣誉。而这种家庭内不使用暴力不包括夫妻之间，因为日本俘虏提到的日本家庭情况，会有意无意忽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因为她们并不具备和男性相等的地位。日本的女性地位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出门工作才逐渐得到提高，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没有挨过丈夫耳光的日本太太可是不多的。而至今，日本的法律也没有婚内强奸这一类保护女性地位的条款。

[34]萨评：指的是日本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开始的遣隋使、遣唐使。应该说，日本人这次学习的诚意是很高的，到中国来的也都是当时日本的精英之辈，但态度谦卑，因此得到了“东夷性柔顺”的评价。



【图8】遣唐使

[35] 萨评：美国人把日本的神仙裁剪了六分之一，在日本人的信仰中，神道教共有四万八千神仙，居住在高天原。

[36] 萨评：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和尚到日本后在奈良修建的，其金堂至今犹存，结构完全为唐代式样，被日本尊为国宝。

[37] 萨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提法不够贴切，比如欧洲的达契亚人，也曾主动学习罗马帝国的文明，并依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至于罗马，干脆连神话故事都照抄希腊的。

[38] 萨评：按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应该比日本的封建世袭制度更为先进，但从选拔出的官员能力和清廉程度来看，古代日本的官员就算不优于中国的，至少也不比中国考试产生的大员们差。这充分显示了历史研究中道理和现实常常不能吻合的现象。

[39] 萨评：干脆说就是不承认天皇家族是人，所以，人自然是不能取代天皇的。

[40] 萨评：这不是绝对的，日本历史上也曾出过一个敢于取天皇而代之的人物，就是平将门。平将门自立为天皇，打破了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堪称日本的革命者。不过，平将门的“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天皇很快又在诸侯的拥戴下复辟。平将门在日本历史上，就像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只被认为是一个特例，却不被认为可以效仿。后世的日本人把推翻天皇的平将门只当作怪物，而不认为他有合理的动机，还是不能理解中国改朝换代的理由。

[41] 萨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夷”本是中国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带有一定的蔑视含义。“征夷大将军”来镇压身在东方的日本诸侯无疑颇为贴切，用日本人的说法“代天讨伐不义”，可将军自己怎么算呢？也是“夷”吗？估计这是当时日本没人敢问的禁忌问题（一说这个“夷”在日本是少数民族虾夷的意思，但虾夷的势力在日本微不足道，所以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42] 萨评：天皇的权力复苏，要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日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变革，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变革，第一个成果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对头——皇权。

[43] 萨评：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

[44] 萨评：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

[45] 萨评：将德川家康称作伟大的武士，恐怕日本人不会苟同，这位将军是和武田信玄等日本史上的名将伍不假，但在这些名将参加的战斗中，他要么扮演挨打的角色，要么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善于和对手比耐心——不是比作战中等待时机的耐心，而是比谁命长的耐心。最终，德川赢得了这场漫长的比赛，获得了将军的大位。

[46] 萨评：德川幕府的统治，和抗战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很相似，幕府将军就相当于蒋介石，谱代大名相当于蒋介石属下的嫡系，外样大名就相当于李宗仁、阎锡山等归附的军阀。可见，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斗争和时而发生的内战，也与民国时代差不多。

[47] 萨评：这样的制度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和元代中国的四等级制，不过印度和蒙元的不同等级带有鲜明的民族烙印，而日本的不同等级都是同一民族。至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则显然抄袭中国，微妙的区别是第一等级的“士”，中国指的是文人，日本指的是武夫。即便在宋朝那样重文轻武的社会，中国的朝廷对于武功的赏赐从来都很丰厚，但社会地位方面，武人一直深受歧视，没有日本武士的荣耀。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历代都有武将造反、夺取政权的事情，所以封建王朝要保持稳定，限制和压制武将权力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而日本这种没有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使日本的统治者这方面戒心明显小得多。奇怪的是，日本武士造反的事情还真是少见，就是有，也是只反将军不反天皇，可算是极有职业道德的武夫。这种现象只能归结于日本习惯于恪守规则的民族性了吧。

[48] 萨评：日本的“贱民”，指的是一个特殊阶层，包括“秽多”和“非人”。秽多主要包括屠宰和皮革行业的工匠，非人主要为乞丐。在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经常辱骂中国人为“秽多”，源头就在这里。

[49] 萨评：注意一下作者所说的“封建”含义与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不一样。西方人眼里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就不能算典型的封建社会了，因为从秦朝开始中国是“大一统”。西方眼中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国王把国土当作蛋糕，分给大领主，大领主再分给小领主，层层承包的社会格局。切蛋糕的过程叫做“封”，得了蛋糕怕被别人抢去而修了城堡并加以维护叫做“建”。从这个角度说，日本一直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中国，只有周代才算。可是周代在中国人眼里还是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时期。

[50] 萨评：歧视商人是世界封建政权共同的特点，中国历代皇朝也是如此，商人因为不依赖于土地，从事商品交易，所以也是诞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51] 萨评：从措施上说，清朝为了封锁台湾郑氏下达的禁令更加可怕，命令“片板不得下海”。但是，清朝发布禁海令有战争的考量，也有游牧民族天生害怕海洋的心理因素，总算还有些道理。而日本这个海洋国家下达如此禁令就像中国古代要求大家都不能务农只许做买卖一样，近乎发疯。没有哪个中国皇帝敢下这样的命令，否则不是被推翻就是在一片吾皇万岁的逢迎中被悬在半空完全执行不下去。但日本居然不但下达了，而且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日本人



的服从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锁国令”问题上，他们不是忠于道理，而是忠于强权。这就带出了一个可怕的逻辑问题——如果统治了这样一个民族，即便带着他们去毁灭世界，他们也会欣然相从。虽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这样，但大多数日本人不假思索的服从性的确超过其他民族。

[52] 萨评：“锁国令”和“奢侈取缔令”甚至等级制度的蓝本从何而来？可以看出其内容与明朝中期以后采取的政策颇为相似。大多数中国人在研究日本的时候，只注意到遣唐使。实际上，日本对大陆文明的拿来主义即便到了明清依然如故。尽管从世界而言，明清时的中国在发展上已经趋于落后，但其封建制已经走向成熟的阶段。同样不能理解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日本，自然还是热心于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朱元璋和他以下的几代皇帝，很了不起地注意到了封建王朝的兴替规律，并且试图寻找到一种“长治久安”的方法。当然，他们不会想到民主集中制或者社会契约这类东西，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把中国的社会凝固下来，让它不再发展而自行运转，这样，农民的生活如果比较平稳，就会满足于自然经济而不去造反。同时遏制武将，避免统治阶级上层的动荡。这样的统治方式自然不容易积累财富——明代的政府收入远不如工商业发达的南宋，可是社会也比较安定。如果不是明末出现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同时和北方满族的战争又迫使明朝统治者主动去破坏自然经济收取“辽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未必发生，而这种固化的社会可能像木乃伊一样存在下去。事实上，清朝也是采取同样的治国策略。禁海、抑制工商，表面上是为了防倭寇、戒骄奢，其深层原因却在于此。日本幕府显然也想达到同样的目的，不过，他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照搬方法，以至于根本没有考虑中国是大陆国家，而日本是海洋国家这样重大的区别。

[53] 萨评：一般是几十石米。大阪是“百万石大名”，意思是此地收入为百万石，而摄津是一万五千石大名。那么，不同的大名可以养多少武士、有多大的实力，也就一目了然了。

[54] 萨评：但是武士在忠于领主、承担军事任务以及遵守一些信条方面又和士兵非常相似。

[55] 萨评：不但是武士，在其他阶层中也崇尚节俭，这个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所以日本的家庭主妇连洗澡用几桶水都要计算一下，来节约开支。与此同时是惊人的浪费。比如价格高昂的实木家具，一旦淘汰绝大部分被当做垃圾焚毁，而不对木材作再利用。这种浪费又是日本战后从美国引进的文明了——促进消费。或许有道理，但外国人不免有丢西瓜捡芝麻的感受。

[56] 萨评：人们会感到这太过分了，即便是元朝的四级制度，第一等级的人杀了第四等级的人还要赔一头驴呢。事实上日本武士地位很高，连平民造的房子，格局上都要保证不能从楼上俯视街上的武士。说话含糊，做事极端，算是日本文化的又一个特点。

[57] 萨评：因为德川时代之前是战国时代，武士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的地位也是那时候确立的。不打仗了，武士们就有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中间还有大量武士被剥夺了职位。日本电视剧《捕吏晓兰之介》，有一段就讲的是落魄武士沦为卖伞商人，妻子为了恢复他的身份四处钻营的例子。

[58] 萨评：日本通过大化改新尝试用中国的均田制解决农业国日本的社会问题，也吸收了中国“永业田不得买卖”的规则，应该说，这种学习的结果对日本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帮

助。可是，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政府控制的田地已经不足以维持均田制的继续进行，农民的破产也就不可避免。所以，明治维新的发生一方面是受到外界刺激，一方面也是日本社会走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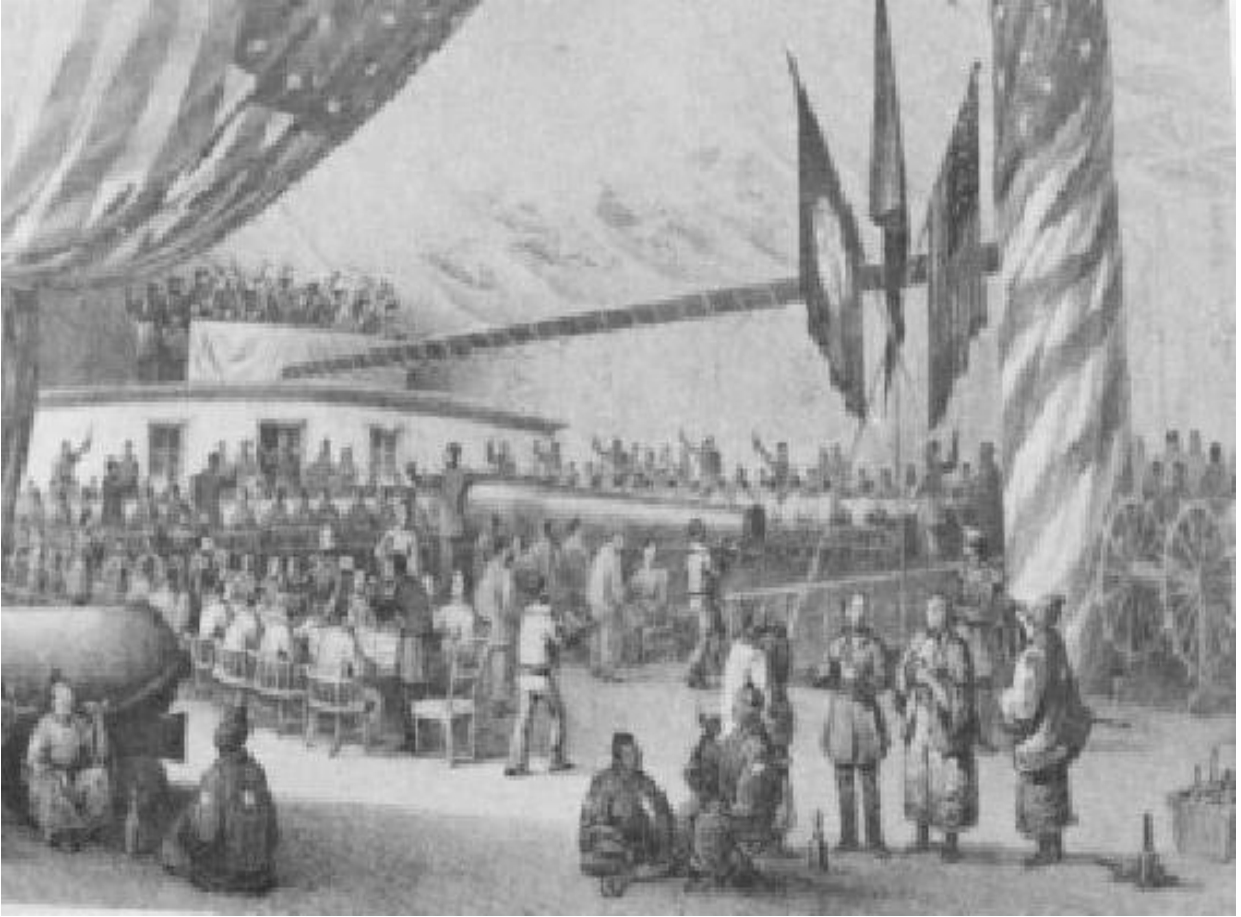
[59] 萨评：人口问题在农业社会没有实现机械化前是一个让统治者头疼的事情——他们都希望自己统辖的人口越多越好，但是，靠天吃饭的宿命会造成丰年人口大增，而歉收年这些人口要么饿死要么起来造反，对统治威胁极大。各国统治阶层采用了不同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埃及法老用建造金字塔的方式消耗掉丰年的过剩粮食，斯巴达人定期屠杀种田的希洛人，而中国则为国家增加了收集余粮、在歉收时提供赈济的政府功能。日本这二百万寄生阶级，也有意无意地起着金字塔的作用，当没有足够粮食的时候，武士们的俸禄就会被扣留或打折发放，同时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公忠体国”。

[60] 萨评：除了开采石川银矿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时代，古代日本由于贫困不得不长期采取严格的半配给制度。在“太平盛世”，农民谨慎地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贵族谨慎地按等级享受规定的奢华，很少有人逾越社会的规则，他们宁可服从和忍耐。这样的社会就像用薄纸编的篮子运一大堆鸡蛋一样，人人都必须小心翼翼。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不是很怕动荡，大不了逃荒罢了。而日本人决不抱这种奢望——狭隘的岛国意味着他们无处可逃。或许，这是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军国主义的肇端？



【图11】军国主义对个性的扼杀、对规则的推崇，也许对日本人来说并不觉得苛刻。

[61] 萨评：将军们还采用把自己的基因融入皇家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从通婚到赠送怀孕了的妾给天皇，招数五花八门，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去取代天皇。这个框框不仅扎根在将军的脑袋里，也固化在所有日本人的脑袋里。



【图12】参观佩里军舰的日本人。佩里一直以为这个国家地位最高的就是那位军政府大元帅——德川将军，从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皇帝。

[62] 萨评：汤加王国在南太平洋西部，西距斐济650公里，西南距新西兰1770公里，又名友爱群岛。国俗肥胖为美，君主制，面积699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延庆县，人口11万。

[63] 萨评：在一些文章中，太平洋部落的“王”被称作“祭司”，虽然实际上他们的职责并不是管理宗教事务，这个称呼反映了他们超越世俗的地位特征。

[64] 萨评：政治上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不过精神上地位更高，又类似教皇。

[65] 萨评：与其说是政治家们试图将其保留下来，不如说这是日本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内容，离开了这种制度，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怎样地生活。



战后，在日本被监禁的朝鲜政治犯获得释放。这是在日朝鲜人于监狱前欢迎的场面。

[66] 萨评：在古代，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方更加相似，都强调法律至上，因此，违反法律的行为应该受到惩处。然而中国和他们奉行完全不同的理念。中国的官府认为，违反法律固然是可恶的，但诉讼同样是可恶的，错误的行为首先应该在道德层面得到解决，而不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统治的失败。因此，中国传统优秀的地方官，不是每天都能完成大量案件审理的官员，而是从上任到离开没有一件案件可审的。这种奇怪的观点，在现在人看来匪夷所思，但确实曾经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上。有人认为这里面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行政成本的超前意识。

[67] 萨评：这一点从欧美的角度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在社会困苦的时候都把问题归结于体制，并认为只有推翻体制或者解散内阁重选才能解决问题。

[68] 萨评：中国古代也时而有贱民一说，比如广东的蛋民，但最典型的是明代的“贱籍”，即在靖难之变中站在建文帝一边的大臣家属，一直到清朝，他们都被置于和日本的“秽多”相同的地位。今天日本依然有贱民的存在，但随着对他们人权的承认，日本社会倒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在录取公务员的时候，如果有贱民身份往往会获得破格待遇，因为政府官员都怕担上“歧视贱民”的大帽子。日本近年曾发生过一起警察勾结黑社会欺诈平民的严重案件，发现其中参与的犯罪警察平时就作风极差，劣迹昭彰，却无人敢管，消息传出与



论大哗。最后调查的结果是这个警察出身“贱民”，上司同僚也是因为怕“歧视贱民”的大帽子不敢管他。

[69] 萨评：德川幕府的统治中心是日本关东地区的中心江户（东京），这也是前文所说，大名们要在江户住半年，而且他们的妻子要留在江户的原因。当时的天皇所在的京都虽是首都，却无重大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首都才正式定为东京。而当时日本商人则集中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直到今天，大阪依然是以商业著称的城市，而东京则是政治中心。这有些像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又有些像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

[70] 萨评：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终资产阶级与贵族也逐渐妥协，很多资产阶级也成为了爵士，不过，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购买爵位和封地。很难想象拿破仑政府的将军们去当波旁贵族的干儿子来获得爵位，这也是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地方吧。

[71] 萨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始终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是贫困的雇员，没有存款，没有自己的房子。

[72] 萨评：日本人和法国人的性格简直可以作为对比，日本人死板，法国人浪漫；日本人注重规则，法国人喜欢革命；工厂主不给涨工资，日本人会用增加产量来羞辱厂主，法国人则举起旗帜上街罢工；日本人会为天皇剖腹，法国人可以砍国王的脑袋。奇怪的是，日本人对法国却非常崇拜，巴黎永远是比纽约更让日本人醉心的地方，而日本最初发展的时候，也与法国合作极为密切，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旗舰就是法国人设计制造的。这种奇特的现象，从中国人的逻辑来说，很难理解，或许是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吧。

[73] 萨评：德川幕府的崩溃，指的是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通过“大政奉还令”还政于天皇以及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战争的结果，战败的幕府在维新派人士又是幕府忠臣的胜海舟的调解下退缩为一个普通诸侯，并没有受到清洗。此后德川庆喜一直过着逍遥自在的打猎、旅行、摄影生涯。

[74] 萨评：此处指发生于1848年2月的法国二月革命。

[75] 萨评：实际上这之后还发生过四国联军共同炮击萨摩、夺取炮台的事件。那个时候，日本和中国的处境很相似，都是被迫打开国门，既惊恐不平又打不过“船坚炮利”的对手。

[76] 萨评：这里的“夷”与中国同时代的看法相同，都指的是西方殖民者。他们从东方海上入侵中国，进入日本，按照儒家东方属于“夷”的说法，他们被冠以这个给野蛮人的称呼。

[77] 萨评：在当时的西方文献中，经常把日本与越南这样的国家并列，从没想到它会变得如此富强和具有影响力。但这只能说明西方对东方的不了解——哪怕是越南，这个看来小而且软弱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曾经让西方人栽了大跟头。

## 第四章

### 明治维新



在战后日本，给美军做保姆是极好的职业，原因是不但工资高待遇好，而且可以就近学习英语——当时日本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可比现在高多了。

“恢复天皇、驱逐蛮夷”<sup>[1]</sup>口号宣告了近代日本的到来。此口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日本免遭外国侵略，使日本恢复到十世纪实行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黄金时代。京都的天皇朝廷最保守。在支持天皇势力的人看来，保皇派的胜利意味着要使外国人受到屈辱，并把他们驱逐出去；就是要在日本重新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要剥夺“改革派”在所有事务上的发言权。其中，强大的外样大名<sup>[2]</sup>充当了倒幕派的先锋，试图通过“复辟”的方式来取代德川氏家族而统治日本。农民们希望能多保留一些自己种植的稻米，却痛恨“变革”。武士们既想继续保持俸禄，又希望能够为荣誉挥刀上阵。而那些在财政上支持复辟势力的商人们，虽然希望国家能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却从未指责过封建制度。

1868年，由于倒幕势力取得胜利，<sup>[3]</sup>复辟成功，日本结束了它“双重统治”的时代。当时，从西方标准的角度看，胜利者将推行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推行了相反的方针。在它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另外，它取消了土地登记，原来的政策是“四公六民”，即农民要把收成中的四成交给大名，而现在这个“四成”要交给政府。但对这种剥夺还进行补偿，政府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供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和大名的生活都依赖于政府提供的俸禄。随后的五年内，新政府又逐步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同阶层间的不平等，并废除了标志不同等级、地位的标记和服装，甚至颁布了“散发令”。<sup>[4]</sup>贱民被解放了。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各藩间的关卡被拆除了，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政府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五到十五年的俸禄一次性合并发放。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收入而定。在新的非封建的经济中，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开办企业了。“在德川时代，商人、金融巨头和封建土地贵族已经进行了特殊的联合，现在的这些措施只不过最后证明了这种现象。”<sup>[5]</sup>





【图2】维新志士们

大家并不拥护新生的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与这些措施比起来，当时的老百姓可能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朝战争更有普遍的热情。明治政府不仅从未动摇自己的激烈改革方针，而且还彻底否决了入侵朝鲜的计划。<sup>[6]</sup>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支持建立明治政府人的希望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到1877年，这些反对者的伟大领导人西乡隆盛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起义。他的军队代表了前封建年代保皇派所有愿望，而明治政府却在复辟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随后，政府招募来一支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sup>[7]</sup>不过，叛乱本身就证明了日本民众对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政策是何等不满。

农民对新政府的不满也引人注目。在明治时代的前十年，从1868年到1878年，日本至少爆发了190多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缓慢地减轻农民身上的沉重税收负担。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太轻视他们了。<sup>[8]</sup>另外，农民们反对建立学校、征兵制度、

丈量土地、散发令、给贱民以法律上的平等、官方极端限制佛教、改用阳历，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措施。

那么，是什么导致政府采取如此激烈、不得人心的变革？那就是日本那种下层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合”，甚至是在封建时代，日本特殊的习俗就已经培养了这种联合。这些商人都曾是大名的心腹家臣，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他们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一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有能力并且自信的管理者推上台，为明治政府制定政策，并组织实施。<sup>[9]</sup>不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有能力和务实。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才刚刚脱离中世纪不久，它的国力与今日的泰国一样衰弱，在这种情况下，却能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他们成功地实施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这是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事业。<sup>[10]</sup>这些领导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根植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探讨这种民族性格在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了解明治政府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革命而进行，他们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想进行彻底的改革，因为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封建阶级，也没有完全没收其财产，而是对他们实行利诱，使他们最终能支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方面改革之所以迟缓了十年，与其说是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对政府的要求，还不如说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空虚。

不过，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却都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度。通过将天皇的权威置于最高的位置并且废除将军，“复辟”运动简化了社会的等级结构。他们废除了藩，使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度的习惯，只是赋予了这些习惯一个新的位置。为了迫使人民接受自己杰出的施政纲领，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强权和恩惠的手段，使改革计划能够贯彻下去。但是，他们却从未打算去迎合公众舆论，虽然公众不赞成改换日历、建立更多的公共学校、废除对贱民的歧视等等。<sup>[11]</sup>

统治阶级赐予的恩惠，有一条就是1889年天皇向他的臣民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明确规定了人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并建立了议会。“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精心起草了这部宪法。<sup>[12]</sup>然而，在起草的过程中，制定者采取了“一切

预防措施，以防止公众的干涉，以及舆论的影响”，[\[13\]](#)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隶属于皇家内务部的一个部门，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图4】伊藤博文



【图5】木户孝允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sup>[14]</sup>听取斯宾塞<sup>[15]</sup>对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的意见。经过深入的交谈，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呈递给了伊藤。在提到等级制时，斯宾塞写道：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国家富有的基础——对“长辈”的传统义务，特别是对天皇的义务，对日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困难。斯宾塞的评价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明治政府非常满意。他们力图在现代世界中仍保持遵守“各安其位”带来的好处，他们不愿破坏等级制度的习惯。

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宗教领域和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都对国家和人民间的义务作了明确的划分，要求“各安其位”。<sup>[16]</sup>这种划分与美国和英国完全不同，因而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些基本点。当然，日本的统治阶级进行着强有力的统治，不必完全受公众舆论左右。政府由上层人物进行管理，由选举产生的人物是不会被包括进来的。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1940年，政府最高层的组成人员大多



是可以直接拜见天皇的人、天皇的顾问以及天皇亲自任命的官员，这些官员包括内阁大臣、地方官员、法官、各局局长以及其他官员。<sup>[17]</sup>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在内阁大臣、大藏省<sup>[18]</sup>、运输省领导的人事任免上就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代表选民的意見，虽然有一定的权利对政府高官提出批评和质询，但却在人事任免、决策、财政预算等方面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也不能提出立法要求。众议院还要受到不经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制约。参议院中的议员一半是贵族，另有四分之一是经天皇特别任命的。<sup>[19]</sup>在对法律批准问题上，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平等的权利，这又是一种等级性的制约。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阁下”们占据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日本地方没有自治权。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采取何种政治体制，权力总是从上端慢慢往下延伸到中层，在那里与地方自治权发生碰撞。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是，民主的范围达到了什么程度；责任的大小；地方的领导是对整个地方负责，还是会被地方大资本家所垄断，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只包括五至十户人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邻组”，<sup>[20]</sup>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

“邻组”的组长对组内的一切事务具有领导权。他要确保其成员行为端正，报告可疑的行为，发现在逃犯要立即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邻组”，但后来又恢复了它。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甚至积极培植这样的组织。但在今天的农村中“邻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和它比起来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sup>[21]</sup>“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但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编入政府的行政体系。它往往是一些国家行政权利管辖不到的地方。这些部落由十五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直至今日，<sup>[22]</sup>部落首领由大家轮流担任，仍然发挥着组织的作用，他的重要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物；对部落帮助遇丧家庭或遭受火灾村民的情况进行监督；确定集体农耕的适当时间、盖房和修路；遇火灾摇铃进行警告；在地方假期和休息日的时候敲钟击鼓，以示告知。”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日本的部落首领们不能在社区范围内征收国家赋税，这不属于他们的责任。<sup>[23]</sup>因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很明确，是在民主的职责范围内行使职责。

现代日本的平民政府正式承认市、町和村的地方行政机构。由选举的“长者”推选出一人，由他来代表本地区与中央政府或府县政府交涉办理事务。这个人必须是村里的老住户，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家族成员。承担这一职务后，可能要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但却获得很多威望。他与长者们共同负责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和学校，特别是要对财产和个人档案进行登记。村委会工作相当繁忙，它负责管理由国家

提供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sup>[24]</sup>征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由本村负担的额外的教育经费，还要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村子的公共财产的使用和租赁情况；负责土地改良，并进行植树造林，以及记录所有财产的交易情况，而村委会正式对交易进行登记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对于本村的正式居民，村委会还负责登记他们的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信息，个人有无犯罪记录以及其他资料。每户家庭也要保留同样的记录。在日本的任何地方，个人的材料可以从原居住地迁到他新的户口所在地，并且记入他的档案。<sup>[25]</sup>在人们申请就业、接受审判以及因其他原因需要身份证明时，可以给他的原居住地所在的市、町和村委会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去取，办理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再交给有关机构。因而人们不会轻易冒险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留下什么不好记录的。<sup>[26]</sup>

因此，市、町、村等承担有巨大的责任，<sup>[27]</sup>而且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的政党。对任何国家而言，这都意味着会出现“执政党”与“在野党”交替掌权的情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仍然主要由长者们来领导，为社会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领域没有自治权，包括：一切法官均要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师都属于国家雇员。由于民事案件在日本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警察却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每逢有公共集会，他们都必须到场。但是，这类职责却是间断性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为了使警务人员成为局外人，不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政府会常常对警官队伍进行人事变更。<sup>[28]</sup>学校的教师也常有调动。日本和法国一样，对学校有着详细的规定，全国的每所学校在同一天授课内容都是相同的；每天早晨，每个学校都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广播的伴奏下，做着同样的广播体操。学校、警察和法院不受市、町、村等自治权的管辖。

上述日本政府机构设置和美国政府的设置相比，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在美国，选举产生的代表能够行使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的管理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法院来实施。然而，从形式上讲，与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相比，日本政府机构与他们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一切法律，国会实际上从未进行过立法。在荷兰，根据法律规定，甚至镇长、市长也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的形式权力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实际上，虽然女王通常会赞同地方的提名，但必须由女王任命才能生效。<sup>[29]</sup>荷兰的警察和法院也是直接对女王负

责。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组织都可以自由地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是沿袭了法国的模式。在荷兰，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的开发事业等都是整个地方政府的责任，而不仅仅只是由政治选举所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过去的经历使日本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已经固化于他们的道德体系和礼仪当中。只要那些“阁下”们身居其位，他们的等级特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赞同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最大的错误就是破坏等级特权的界限。在政策的高层，“公众舆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政府只是要求“公众的支持”。<sup>[30]</sup>当中央政府越俎代庖来影响地方事务时，它们的裁决也会获得尊重。对内实施管理的政府，在美国人眼里通常是不必要的麻烦；而在日本人眼里则不然，他们认为国家几乎是至善至美的。

另外，日本政府在承认国民意志的“各得其所”时也非常谨慎。在合法的公众裁决领域，即使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还是恳求民众，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说法绝对不夸张。日本农业发展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同美国爱达华州的同行们一样，他们并没有使用行政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人进行多次深入的交流，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事务需要当地的解决方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给予适当的权利，但同时把这个权利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因而“上级”们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sup>[31]</sup>但同时他们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利范围。日本人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与政治制度相比，明治政府在宗教领域却制定了许多古怪的制度。然而，它们正是实践了日本人的那条格言。一个国家往往把宗教信仰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将其视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而对于其他信仰，则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在日本，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神道教。<sup>[32]</sup>就如同美国人对国旗特殊的崇敬之情一样，由于神道教与民族象征的特殊联系，它在日本也受到了人们特殊的尊敬。因此，日本政府说神道教不是宗教。这样，就像美国政府要求凡是美国人都必须对星条旗敬礼一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要求全体国民都信奉神道教，但他们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这只是一种忠贞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授神道教，而无须担心西方国家的批评。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就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国的历史，成了对“永世统治者”天皇的崇拜。神道教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受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不论是佛教、



基督教，甚至是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礼神道，日本政府都让日本公民自己决定，这点几乎是和美国一样的。在行政上甚至是在财政上，宗教中的这两种不同领域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教受内务部神职司的管辖，它的神职人员、祭祀活动乃至神社等的费用均由国家提供；其他教派的神道、佛教及基督教各派系均由文部省宗教司管理，经费主要依赖于教徒的自愿捐赠。<sup>[33]</sup>

由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因而人们不能说神道教是个庞大的“法定教会”，只可以说它是个庞大的组织。它拥有十一万多座神社，从专门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主神社到一些特别祭奠时祭神官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应有尽有。日本神职人员的等级结构类似于政府行政系统，从最底层的神职人员到各郡、市和府、县的神职人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官。与其说是他们领导民众进行祭祀，还不如说是为了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教与我们所熟悉的去教堂做礼拜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法律禁止国家神道教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理解的那些宗教仪式了。相反，在频繁举行的祭祀日子里，各个地方的正式代表都来参拜神社。他们都站在神官面前，然后神官就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短杖，在他们面前来回地舞动，为他们驱邪。随后，神官就打开神庙的内门，尖叫着召唤众神来享用供品。<sup>[34]</sup>神官不停地祷告，参拜者们则按身份辈分排列，毕恭毕敬地一一献上从古至今都被视为神圣物的小树枝，树枝上还吊着几根细长的白色纸条。然后，神官再次尖叫着送走众神，再关上神庙的内门。在神道教特别的大祭日里，天皇会亲自为国民主持祭祀仪式，政府各部门也放假。国家神道教的假日与地方神社的祭祀、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它不是百姓祭祀的节日，而后两者都属于“自由”领域，不属于国家神道教的范畴。<sup>[35]</sup>





【图9】日本神道教的活动，很多市民都会参加，并视为节日。

在这个自由领域，日本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各种祭祀活动。佛教在日本拥有众多的信徒，其中各个教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宗教活动异常活跃。<sup>[36]</sup>即便是神道教也有不少其他教派，它们独立于国家神道教之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还没有采用民族主义之前，有些神道教教派已开始极力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了。另有一些教派把自己比作“基督教科学”，它们推行信仰治疗的方法。还有一些派别信奉儒家的教义。甚至有一些教派只专门从事入定和朝拜圣山神社活动。大多数民众祭祀的节日多数并不属于国家神道教的节日。在这种祭祀日子里，老百姓都蜂拥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然后打铃、击掌召唤神灵的降临。接着，他们向神灵鞠躬表示敬意，之后再次打铃、击掌送回众神。<sup>[37]</sup>然后再进行这一天最主要的活动：这就是在小摊贩处购买各种小摆设和美味的食品，看相扑、驱魔术以及有小丑逗乐的神乐舞。人们通常非常喜欢这样的聚会。一位曾在日本久居的英国人说他每逢日本的祭祀节日就会想起诗人威廉姆·布莱

克的诗：

如果教堂赐我们几杯啤酒，  
和那温暖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终日歌唱祈祷，  
绝不会叛教堕落。

除了极少数献身于宗教的专职神职人员以外，大多数日本人都不会认为宗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日本人甚至热衷于宗教朝圣，在节假日更是如此。

因此，对于国家在政治中的职权范围以及国家神道教在宗教领域的职权范围，明治政府进行了谨慎的划分。而人民在其他领域则享有充分的自主权。<sup>[38]</sup>新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官员则会对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情确保可以进行控制。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明治政府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加彻底。在军队中他们甚至废除了日本人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一些旧的习惯仍然存在。另外，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执行的彻底程度在其他领域是少见的。正是如此，军队在日本人中才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这确实是一种使新军队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另外军队连、排当中的士兵都来自于同一地区，<sup>[39]</sup>在和平时期士兵服兵役的地方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政府有了某种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的关系、老兵和新兵的关系已经代替了武士与农民或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军队在许多方面促进了民主的发展，是真正的人民兵。在大多数国家中，军队往往都是维持现状的工具，而在日本，军队却对小农阶级有着天然的感情，因而在无数次反抗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都是站在农民一边的。<sup>[40]</sup>

日本政治家并不见得赞同建立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但他们认为军队在等级制度中占据高的位置是不适当的。军队为了确保这个目标的实现，在权力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虽然并没有将这些措施写入宪法。他们保留了军队首脑独立于平民政府这一传统的程序。例如，与外务及内政各省大臣不同，陆、海军大臣有权直接面见天皇，可以不用通知内阁当中的文官成员或与他们协商，直接以天皇的名义强制采取一些措施。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以阻止他们不信任的内阁成立。若没有这么高级的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是无法组

成的，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这些职务的。同样，如果军部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感到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就会迫使内阁解散。<sup>[41]</sup>在决策的最高层，军部首脑是绝不容忍任何干涉的。如果还需要更多的保证，那么宪法中有一条规定，即“如果议会否决了所提交的财政预算，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方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虽然外务省一再反对，但关东军还是以武力占领了中国东北。<sup>[42]</sup>这是在内阁意见还不一致时，军部首脑支持当地指挥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日本国民都倾向于接受等级特权所导致的一切后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赞成这样的政策，而是由于他们不愿意违反特权的界限。

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采用了一条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方针。在这个领域，也是由“阁下”们来规划并制定规则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而且还要为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提供资金。由政府官僚机构对企业进行组织与管理。<sup>[43]</sup>日本引进了外国技术人员，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这些产业组织完善，业务获得发展”的时候，政府就把这些企业出售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企最后甚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由政府精心挑选的有名的金融财阀，主要是三井、三菱家族。日本的政治家认为：日本工业的发展关乎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不能相信简单的供求规律和自由企业的政策。但这种思想又决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的教条，最后获得丰厚利润的则是那些日本大财团。日本所取得的成绩，是用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一批它最需要的企业。

通过这些方式，日本修改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点和后续生产的正常顺序”。日本的企业不是从日用消费品和轻工产品开始起步；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兴办关键的重工业。优先建设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等大型项目，发展速度惊人，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当然，现在这些企业也并没有完全转让给私人企业，一些大型军事工业依然由政府控制，并获得了政府特别财政的支持。<sup>[44]</sup>

在国家给予特别扶植和支持的产业领域里，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机构管理的企业是没有“适当的位置”的。只有国家和由于国家信任而在政治上获得特权的大财阀才能在这些领域建立产业。就像日本人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产业领域中的某些部分也是很自由的，主要包括那些投入少、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这些轻工产业不依赖现代技术依然能够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在美国人称为的那种“家庭血汗工厂”中工作。<sup>[45]</sup>一个实力很小的制造商在购买原料后，先交给一个家庭，或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车间进行



加工，然后回收产品，再交给另外的一个小厂进行加工，几经反复之后，最后把产品卖给商人或出口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约有53%的产业工人都是在不超过五人的小车间或类似的家庭工厂里工作。

[46]这些员工中很多受到学徒制中家长式的风俗保护，在大城市的一些家庭中，许多母亲都肩背着婴儿，在家里干着计件的零活。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性一样，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在塑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是，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一个财阀贵族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度相匹配时，就为这些贵族创办一批战略性的企业，挑选一批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商人家族，并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使双方能“各得其所”。对于政府和这些在政策保护下获利的财阀的联系，日本的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要削弱，政府不仅要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按日本人对利润和金钱的传统态度，财界贵族难免受到民众的攻击。而政府尽量根据公认的等级思想来发展这些财阀。不过，并没有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的少壮派军官团体以及农民的攻击。[47]事实上，日本舆论所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就是人们通常指的“暴发户”（nouveau riche），但这个词并不能确切代表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nouveau riche这个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新来者”的意思。人们之所以嘲笑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没有时间提高自己的教养水平。[48]然而，人们的这种偏见却被他们的成功故事所抵消。因为他们是从破木屋中起家，有些是从赶骡子的变成石油行业的百万富翁。日语中“成金”一词起源于日本象棋，意思是说一个棋子从一名小卒一跃而成了女王。它像“大人物”一样横冲直撞。但从等级制度上讲，它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因而，人们都对“暴发户”进行抨击，认为它主要是靠诈骗、剥削他人而敛财的。日本人对投机者的批评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在等级制度中给财富留下了“一席之地”，并与它建立联盟。但如果不是从这种领域获得财富，日本舆论就会猛烈抨击它。

总之，日本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都不断参考等级制度。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人际关系当中，年龄、辈分、性别、阶层都规定着行为。政治、宗教、军队、实业等领域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超出自己的特权范围，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保持着“各安其位”，日本人就仍会心安理得地生活，就会感到安全。当然，就他们“最高幸福得到保护”的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并不总是觉得安全。他们所感到安全的是由于他们将这种等级思想视为



合法。这是日本人对人生的判断，就如同美国人相信平等和自由企业一样，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sup>[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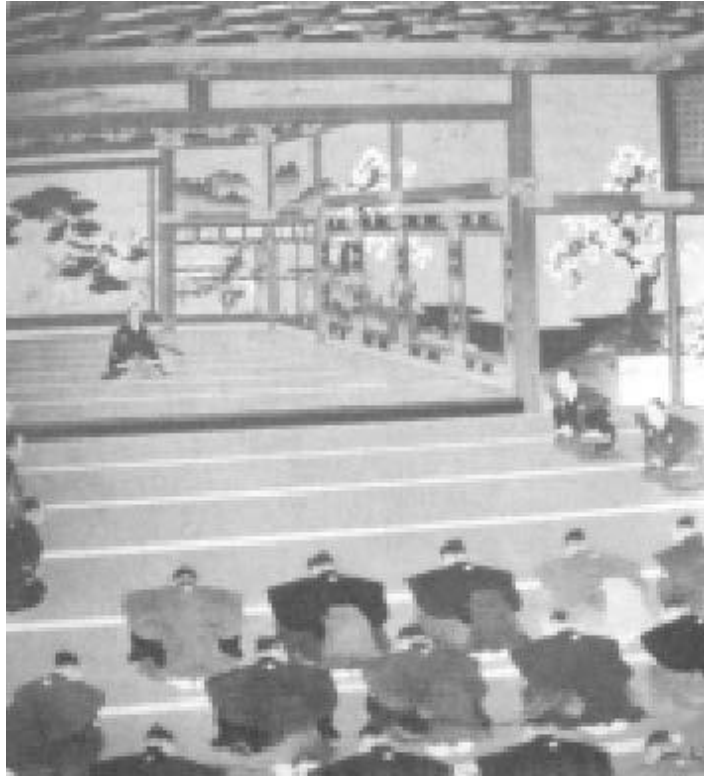
但是，当日本试图向外输出这种“安全”公式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障碍。在日本，人们对等级思想有认同感，因为是等级制度塑造了这种思想。只有在日本那个环境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那种特有的野心。但是，要把等级制思想输出，可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对于日本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其他国家都认为是傲慢无礼，甚至更加恶劣。在每一个占领国，当日本的官兵们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却是整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位置；难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也不想要等级制度吗？日本军部曾拍摄了几部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的影片，描写了一些痛苦绝望、精神失常的中国姑娘，她们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sup>[50]</sup>和纳粹的征服理论相比，这些问题还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同样是无法取得成功。日本不能以自身的标准来强求别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可以，那就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对于自身满足于“各安其位”的伦理观，日本人是不能强迫所有国家都去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道德观，它是真正日本的产物。日本作家们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体系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没有对这种思想加以论述。我们要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必须首先了解这种道德体系。

---

<sup>[1]</sup>萨评：“尊王攘夷”的口号也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提出来的，意思是当时周室衰微，桓公要出来带领各诸侯重新恢复周天子的威信，并且击退当时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本来是周天子的责任之一。日本的诸侯们采用了这样一个口号，心里打的算盘可想而知。

<sup>[2]</sup>萨评：具体说来，这些强大的大名就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它们的领土都在比较靠南的地方，所以位于江户的幕府对他们鞭长莫及。四强藩历史上是出强悍武士的地方，同时利用地理优势大搞工商贸易，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有实力和幕府对抗。

<sup>[3]</sup>萨评：指的是1868年在伏见、鸟羽两地四强藩大败德川幕府的军队，幕府从此失势。



【图1】幕府宣布还政于天皇的仪式

[4] 萨评：注意不要把散发令当成解放贱民的法令，这是明治政府对武士的法令，要求他们剃发，采用和平民一样的发式，有点儿像辛亥革命时的割辫子。爱德华·泽维克电影《最后的武士》忠实地再现了这一过程。

[5] 萨评：明治维新表面上的“复古”，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行改革之事。其实倒幕战争中最活跃的，并不是诸侯，而是所谓“维新志士”，典型的是阪本龙马、胜海舟、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他们从思想上都是接受并力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挽救日本危亡的，并在战争中获得了实力。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旧势力集团中又属于实力派，所以很快成为幕府倒台后新政府中的中坚力量。本来是大名和幕府将军的战争，胜利以后大名们却无法收获胜利果实，被这支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新兴势力坐收渔利。通过废藩置县、改革藩制，大名们都被架空，日本的封建割据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大概是战争之前大名和将军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吧。看得太远会被鞋带绊倒，看得太近呢？

[6] 萨评：1873年，由于警觉到日本借国书试图在朝鲜取得和清朝皇帝一样的地位，朝鲜方面拒绝了日本的国书。日本议会以此为主要借口讨论“征韩”，包括木户孝允等重臣都主张出兵朝鲜。不过，尽管有人叫嚣“五十天就可以俘虏朝鲜国王”，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不足，又担心清军会入朝作战，“征韩”最终被否决。

[7] 萨评：西乡隆盛是倒幕战争的实际统帅，有百战百胜的称号，他的反叛的确令朝野震动，但他的兵力只有政府方面的五分之一，失败也是正常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军队不仅是“平民组成的义勇军”，还包括了大量拥护幕府的武士，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拥护幕府的武士为何全力帮助打败幕府的政府军作战？既然幕府战败了，承认失败以后就要以十二分的忠诚为胜利者服务，这其实是日本人典型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这是做人应有的原则，不足为怪。可要放在其他国家，就难免让人侧目了。

[8] 萨评：明治政府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去剥削农民，哪儿来的钱呢？

[9] 萨评：值得玩味的是天皇在这一次剧变中的态度，他的做法不能不说非常明智而且机巧——尽管维新人士显然不是真的要复古，天皇却默许他们对传统的攻击。结果，天皇并没有成为多数立宪国家中象征性的元首，却成了权力的核心！这是因为，尽管新政府中的人员来自各个阶层，彼此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忠于天皇。所以，如果不是天皇来做他们的真正领袖，日本此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了。天皇显然也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成了这次巨变中最大的受益者。



【图3】维新的最大赢家——明治天皇，他获得权力以后与早年的形象判若两人，难道权力真的有让人气质为之一变的魅力？

[10] 萨评：我的看法是因为采用了变革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拥有一个共同效忠的对象——天皇，加上日本民族性中对规则的强烈服从心理，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的旧有精英能够团结在明治政府之中，共同实施变革，而不是全部重新选拔一批人才，这是走了利用人才的捷径。

[11] 萨评：日本人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儿，有一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理论并不明白，但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是强盛的捷径，于

是就一丝不苟地学习起来，其中虽有食古不化之嫌，可是对于反对意见也的确是给予了坚决的抗拒。

[12] 萨评：自古以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多都是在下层强烈的要求下被迫出台的，比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土地改革，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下层人民的革命。然而，日本这个宪法的出台却有些与众不同，它基本是上层强行推进的一次改革。当时日本社会的矛盾尖锐不假，但假如询问下层的日本人到底想要怎样的改革，那结果肯定五花八门，而要求复古和闭国的绝对不在少数。制定这部资本主义性质宪法的“维新志士”反而显得另类，因为他们提倡的那套资本主义观念，普通老百姓既没有经历过，也难以理解。所以，出台这样一部宪法，从直接意义上说，根本不是为了避免老百姓的起义。那么，日本人为何会制定出这样一部宪法呢？理由在于，这些日本政府的高层人员已经对西方的文明心服口服，并且因为对西方的钦服而认为他们的道路就是自己唯一该选择的道路。在这种对强者钦仰的心理作用下，这些“维新志士”要做的就是不加选择地全盘照搬西方的一切，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宪法，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无论日本是否急需，自然也在照搬之列了——有人的利益会受损失？这不在考虑之列，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被更优先地考虑。

[13] 萨评：以“反动手段”行“革命之事”，可谓一大奇观。但此后直到二战日本对于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藐视，就此种下根苗。

[14] 萨评：伊藤博文和木户孝允都是长州人，明治维新中属于坚定的倒幕派人士。伊藤博文在日本被视为名臣，但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此后对朝鲜的吞并中所实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在亚洲其他国家则被视为恶魔。不过，这个日本首相在明治维新中留下的照片，是一个极似今天电影中忍者的形象，他的太太又是一个艺伎。关于日本宪法的形成，这里的记述可能有误，因为木户孝允在1877年已经死去，不可能在1880年前往英国。倒是伊藤博文自己曾经在1882年前往普鲁士，为日本宪法寻求蓝本。普鲁士当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以王室为国家中枢的体制，与日本颇为相似，日本明治时代的宪法也与当时的普鲁士宪法更为接近。而英国皇室徒有虚名，所以难以为重视天皇作用的日本人所仿效。

[15] 萨评：斯宾塞，即赫伯特·斯宾塞，英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原理》一书的作者，被认为是“最高明的保守主义者”。确曾于1880年写信给伊藤博文，阐述关于他对日本宪法的看法。

[16] 萨评：也就是说，没有“人人生来平等”这回事。

[17] 萨评：这也有些偏颇，这种现象是日本在军国主义化以后的情况。经过对华战争，军部——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已经执掌了日本的国柄。在这之前，日本的首相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只不过选举的方式与美国有些不同，不是国民直接选举，而是先由国民选出执政团体，再由他们指定首相（还要天皇批准）。但“九一八”以后，日本的军人仗恃武力，已经不再服从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的领导，甚至发生了军官佐藤贤了会在国会喝令议员“住口”的事件。

[18] 萨评：相当于败政部。



[19]萨评：贵族院的议员有很多本身就是军人或者预备役的军人，因此抗日战争中日本贵族院的议员比如高月保、乘兼悦郎多被我国军队打死打伤。

[20]萨评：所谓和中国一样，应该指的是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当时实施的保甲制度类似。保甲制度起源于宋代王安石进行的新政改革，国民党时期重新起用，用来加强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不过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实际贯彻得并不彻底，在很多地方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

[21]萨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经常将中国的村子称为“部落”，而中文中“部落”指的是不开化民族的聚居团体，所以仅仅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中国人怒火中烧。

[22]萨评：这个“今日”指的是1944年的日本，到了二十一世纪，“部落”在日本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代替它的是“自治会”，其性质倒是相似的。管理的财产也不过是大家一起打扫街道时使用的扫帚、推车等等，当然，组织居民巡夜防火之类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23]萨评：今天日本的自治机构如地方自治会可以征收少量的自治会费，但要求必须定期公开账目，以确保所有开支用于公共服务，同时，这笔费用不再上缴。因此，日本的地方自治会和税收没有关系。

[24]萨评：日本由国家提供的小学教育正式开始于1896年，在前一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向日本赔款三亿七千万两白银，日本用这笔赔款在全国每个乡村都修建了小学校。可以说，这奠定了直到1945年之前，在中日之间，日本始终处于优势的基础。

[25]萨评：这在中国大家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也有同样的档案制度，同时，在没有太多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档案记录了一个人的基本情况，对于政府管理和行政事务处理是极大的帮助。档案这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很难回答，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中性的东西。然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属于“侵犯人权”的东西。原因是美国没有人有档案，所以假如一个人没有犯罪，就很难了解他的经历情况。日本在二战后向美国学习，所以，今天的日本人也是没有档案的。中国人可以理解美国人没有档案，而对于美国人认为档案“侵犯人权”也可理出其中道理，但要中国人接受档案是“侵犯人权”，就像结婚不要单身证明一样，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有不同看法的。

[26]萨评：抗战期间，日军曾在占领地区试图照搬其行政模式，比如在中国的电影《粮食》中就可以看到“村公所”这种机构。只不过在很多地方，这种机构同时既是日本侵略者的基层傀儡政权，也是抗日武装的地方组织，那就是日军想不到的了。

[27]萨评：上面还有两层——地区和县。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大区，如华北、东北、华南。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市，相当于中国的县。町，相当于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村类似。不过因为日本国土狭窄，这些行政区划都是袖珍的。

[28]萨评：日本的警察确实是比较负责任的，态度也较好，但办案能力就难说了，前两天看到电视上播放有日本警察被歹徒追着跑的，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为此大怒，要求整顿警察的作风。



【图6】日本的警察，装备一流，破案率却不好说是一流的。

[29] 萨评：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形式上荷兰的政治比日本更接近专制，但是事实上正相反。日本的制度中专制的一面由于其文化而得到充分发育，荷兰则没有那样的土壤。

[30] 萨评：所以，在日本，战前的国家、战后的公司，个人永远是整个机器的一个零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这种观念为日本国家所要求，也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美国人就无法理解了。

[31] 萨评：同时具有更多的特权。

[32] 萨评：神道教是日本独有的宗教，核心为信奉天照大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每个人如果对国家和天皇恪守本分方面有突出贡献也会成神。其神物为一镜一剑。按照某些研究人士的看法，神道教很可能是中国秦代方士徐福（日本有看法认为徐福即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率军东渡征服日本以后，在当地原始多神教的基础上建立的宗教，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和子孙的统治。由于日本历代天皇陵包括神武天皇陵禁止考古发掘，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图7】日本神社和前来祈祷的人们

[33] 萨评：同时，由于神道教这种特殊的现实意义，日本人对于信奉它的同时信奉其他宗教抱有非常宽容的态度。很多日本人在信奉神道教的同时也信奉佛教或者基督教，却心安理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韩国等国家对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敏感。因为表面上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设施，但是历史上，作为神道教的最高神社，它代表的却是日本政府的意志，这种观念，至今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34] 萨评：外国人常常会对日本神社神龛中到底供奉的是什么感到困惑，据我的亲眼所见，神道教的神龛中并无偶像，而是牌位。有一个不无恶作剧的猜想——如果神道教真的是徐福所创，这里面最初供奉的，会不会是徐福的祖先牌位呢？

[35] 萨评：这段描写如果日本人看到会感到大不敬，因为此处神官的形象宛如遇到歹徒的修女。然而，在外国人眼里，神道教神官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确实与此相去不远。日本的神官不可能像基督教会的教士一样传教，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神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义务宣

扬神的教义，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崇拜神的愿望而提供服务。与基督教的神父相比，一个是卖方市场，一个是买方市场，地位是不一样的。

[36] 萨评：日本佛教的教派繁多，最为流行的包括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等。而如果把日本的各种教派都算起来，总共竟有十几万种之多，最小的只有十几个人。可说日本是宗教的天堂。当然，其中也不乏恶性发展的邪教，比如奥姆真理教。



【图8】战后的日本开放宗教信仰，带来了自由的空气，也带来了若干副产品，这张照片中，就是某个新创立的宗教在狂热信徒的带领下进行传教宣传——这些莫名其妙的教派在缺乏信仰的时代多膨胀极快，但绝大部分在今天都被打上了邪教的标签。

[37] 萨评：日本的神社祈祷流程如下——先向布施箱内投入钱，一般是五日元的硬币，因为这种硬币带有孔，很像古代的铜钱，据说神是最熟悉这种钱的。而后拉一根神社大殿前垂下的麻绳，这麻绳上方有一个大铃铛。铃铛响后，击掌两次，表示唤醒神，而后默祷，完毕后击掌一次。据我所见，关西地区的日本神社并无祈祷完毕后再次拉绳振动铃声的程序。击掌也有先二后一的规矩，这种做法，大约可以避免神误会你的自言自语也是某种祈祷吧。

[38] 萨评：这种划分实际上确立了明治天皇在不同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在世俗行政事务上，天皇是最高决断者，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军事事务上，天皇是统帅；在宗教事务上，天皇保留了在神道教中“神族”的地位。这样的天皇，与一般所说的君主立宪制君王的权力不可同日而语，他已经具备一个独裁者的全部权力。

[39] 萨评：甚至在更高层，除了近卫师团以外，其他日军部队也是按照地区划分的。比如第四师团，即被称为大阪师团；第二师团，即被称为仙台师团。于是，这些部队也就都有



了鲜明的地方烙印。这种做法，在日军中有促进竞争的含义。而在美军或者今天的中国军队中，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每支部队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兵源组成的。

[40] 萨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军队和官僚的关系，有些类似中国古代庶族和士族的对立。但是，这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三等级与贵族的矛盾不同。原因是无论日本军队和官僚，还是中国庶族和士族的矛盾，都是同一个阶层中不同集团的对抗，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欧洲的第三等级代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封建领主无法妥协。所以，日本军队和官僚的矛盾，不会如同第三等级与贵族的矛盾一样带来颠覆性的革命。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是乐于看到这种矛盾的，因为军队的兴起，意味着他能够获得一批真正忠于自己的新兴政治力量。

[41] 萨评：正因为日本军队被赋予了如此强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成为了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温床。可以看到，无论德国还是意大利，在走向军国主义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法西斯政党提供政治上的支持，而日本并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军队本身就是政治力量之一，它自己就可以扮演这个法西斯政党的角色。

[42] 萨评：即“九一八”事变。该事变是关东军自行策划的，当时执政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并不支持，天皇的态度开始也很暧昧。然而，当占领东北主要城市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天皇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军队的行动。结果是一次下级将领策划的行动，导致了日本内阁的倒台。“下克上”的军官们胜利了。

[43] 萨评：实际结果就是垄断企业越发强大，形成了三菱、三井等大财阀势力。形成规模的大型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但是也更加促进了日本政府与财阀的一体化。到后来日本政府已经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清除财阀的势力了。日本在战前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财阀”的势力至今依然在日本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4] 萨评：所以，如果看二战前日本的工业结构，它更加接近此后苏联的情况，而与欧美不同。这使得日本的经济呈现强烈的畸形，军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也很明显。但是，这种畸形却很长时间没有给日本带来苏联那样的崩溃性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日本一直在不断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进行掠夺性开发，以战养战和对外扩张掩盖了日本经济的不平衡。

[45] 萨评：二战前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大量日资矿产和纺织企业，就属于这种“血汗工厂”。

[46] 萨评：日本人把如何发挥这些小作坊的能力做到了极致。比如东京奥运会的圣火坛就是交给一个家族小作坊完成的。美国人占领日本后，曾为很多庞大的设备居然出自如此简陋的地方瞠目结舌。

[47] 萨评：其实，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仅仅靠财阀不能在选举政治中稳定执政的问题。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对于农业和农村异常重视。如自民党，几十年来一直提供高额的农业补贴，并对道路建设提供大量资金，所以，获得了农民的稳定支持。有了这个基数庞大的投票人群，再加上大财阀的支持，多年来日本的自民党得以牢固地占据日本政治顶峰。

[48] 萨评：在日本二战期间的影视中，这样的“成金”多半是从中国东北发财的。于是，日本百姓一面嘲笑他们，一面也诱发了到中国淘金的贪欲。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东北就像

是英国人眼里的印度，或者美国人眼里的美国西部一样。日本政府利用了这种宣传，向中国东北大量派遣了殖民开拓团。不过这些抱着梦想到中国的日本国民，大多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其引发的“残留邦人”问题至今还有余波。

[49] 萨评：在二战中，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是军服挎刀——当时日本人普遍个头不高，却喜欢挎很长的军刀，而这个冷兵器时代的玩意儿在实战中能有多少作用很令人怀疑。这种矛盾的形象不免让西方人感到困惑。今天的日本，则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有趣现象——日本人特别喜欢穿制服，无论铁路员工还是警察，穿着制服都有双眼发亮的自信。个人理解，无论军服还是制服，都清楚地标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宣布他们是这个体制中的一环，这让日本人感到安全而且自豪。至于军刀，因为普通士兵无权佩带，更是说明了自己在这个体制中等级还比较高，无疑让挎刀的日本人趾高气扬。



【图10】交出指挥刀，对日本人是一种几乎等同于死的痛苦。因此战后日本军队很合作的缴械行为，让盟军曾经极为惊讶。

[50] 萨评：这指的是日军羽翼下的“满铁映画”、“中华电影公司”所拍摄的若干影片，如《万古流芳》等。实际上，即便在日本占领区，这些影片也让中国人感到惊讶，觉得影片中女主角的思维无法理解——至少，作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惊讶对了。这些影片的女主角，虽然用的是中国名字，实际上却是日本人。比如满铁映画的著名女演员“李香兰”，真实的名字是山口淑子，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这一点，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因汉奸罪收审才得以外界知晓，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一无所知。作为希望中日友好的人士，山口淑子本人后来对曾经拍摄这样的影片非常后悔，她曾经说过：“中国人不知道我

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图11】李香兰

## 第五章

#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





日本战犯嫌疑人在盟军宪兵的面前整齐列队。照片上这些曾经嚣张一时的人物包括小矶国昭、永野修身、南次郎、土肥原贤二。

我们在英语中经常谈及“历史的继承者”。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在讲这句话时多多少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但人们并没有因这种变化而觉得对历史有所惭愧等等。<sup>[1]</sup>东方各个民族与他们则正好相反，总觉得自己是历史的负恩者。<sup>[2]</sup>当西方人说到东方人在崇拜祖先时，他们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对祖先的崇拜，而只是一种仪式，以此来表示人们对过去的一切负恩很多。而且，他们不仅从历史中得到了很多恩惠，即使在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中，也增加了他们所欠的恩情。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尽管我们在关怀、教育、福利甚至是出生各方面获得了特殊照顾，但西方人很少认为自己亏欠世界什么。<sup>[3]</sup>因此，日本人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品德高尚的日本人从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这一点与美国人不同。他们不忽视过去。日本人理解的“义”，就是要在巨大的人情世故网络中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网络包括祖先和同龄人。

用言语来描述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并不难，但要理解实际生活中的这种差异却很困难。也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日本所具有的这种差异后，我们才能理解那种我们所熟悉的日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极端自我牺牲精神，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某些情况下非常容易发怒，而我们觉得毫无必要。日本人的行为证明，凡是负恩的人都非常容易动怒，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sup>[4]</sup>

中文和日文中都有许多词语有obligation（义务）这个词的含义。这些词语不是简单的同义词，它们特定的含义也无法直接翻译成英文，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概念对西方人来说很陌生。义务这个词在日文中主要表示一人所负的债务或恩情。当译成英文时，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词，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不等。但这些词都不免曲解了其原意。如果“恩”也有“爱”甚至是“义务”的意思，那么日本人就可以说“受孩子的恩”了，但这个词是不可能这么用的。“恩”也不能表示忠诚的意思。在日语中，有其他的词来表示忠诚，那些词与“恩”不是同义词。“恩”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表示一个人承受的最大的负担、债务、感情负担。人们一般是从长辈或上级那里受恩，如果不是从他们那里或者至少是从同辈那里受恩，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不快的自卑感。当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意思实际

是说“我对某人负有很多义务”，因而他们把这位债主、行善的人称做“恩人”。<sup>[5]</sup>

“牢记恩情”实际上是一种彼此奉献的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小故事是日本道德课程中的一段故事：<sup>[6]</sup>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一出生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那人像疼爱自己的小孩一样疼爱它。因此，它那弱小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就陪伴主人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主人。

后来主人去世了。哈齐还是每天等待它的主人，也不知道它知不知道这个现实。在那个车站，每当电车到站时，它就仔细地注视人群，搜寻自己的主人。

岁月荏苒。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人们还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已经衰老的哈齐在那个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个小故事的道德含义是：忠诚就意味着爱。一个对母亲关怀备至的儿子可以说不忘母恩，就像哈齐对主人的一片忠心。然而，“恩”这个词并不仅指他对母亲的爱，更重要的是指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婴儿时期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孩提时期母亲为他所做的牺牲、在他成年后母亲对他的兴趣所做的支持，以及母亲在世时他所欠母亲的一切。“恩”意味着人们对所欠恩情有所回报，因而它就意味着爱，但“恩”的主要意思是欠债。<sup>[7]</sup>美国人认为爱是自由给予的，不受义务约束。

当人们受到首要的、最大的恩情，也就是通常说的“皇恩”时，“恩”具有了无限忠诚的意思。这是天皇的恩情，一个人应当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接受它。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度上生存，如果没有天皇恩情的话，那么一个人对他的国家、自己的生活、大小万事就不会感到称心如意。有史以来，日本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就是一个人生活范围内的最高上级。这个最高统治人物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代表。可以是各地的封建君主，可以是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几百年来“牢记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惯当中占有首要位置，因此，谁是最高上级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近代日本使用一切手段将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日本人生活方式中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期间，以天皇名义分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都被强调是每个士兵所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在他们看来，神风敢死队自杀式的撞机就是在报答皇恩；所有为守卫太平洋上的岛屿而捐躯的士兵也是在报答浩荡无边的皇恩。<sup>[8]</sup>

此外，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们那里受恩。当然，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获得恩情，这正是东方著名的孝道文化的基础，父母在这种文化中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绝对的权威。其原因是，孩子欠了父母的恩，必须努力偿还。所以，子女必须完全服从父母，而这一点与德国不同。尽管德国也是一个父母拥有绝对权威的国家，但通常是家长强加给子女并要求服从的。日本人对这一东方文明中孝道的理解非常现实。关于子女对父母的恩情有一句格言：养儿方知父母恩。这也就是说，父母的恩情实际上就是日常对儿女的照顾和操心。日本人对祖先的崇拜只包括父母及一些记忆中的先辈，因而他们非常重视那些在年幼时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一个公认的真理——婴儿时期都离不开父母的照料，都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然后才能长大成人。日本人强烈地感到美国人几乎遗忘了这一点。如同一位作者所说：“在美国，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实只是对父母好而已。”当然，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负有“报恩”的责任，但是，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就等于是对自己小时候受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是更加精心，这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的恩情。对子女的义务只不过是包含于“父母养育之恩”之中。

日本人觉得对老师、上司负有特殊的恩情。他们都是帮助自己一路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照顾之恩。将来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人们应对他们有求必应，或在他们去世之后，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而减少，而是时间越久，恩情也就越重，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利息。对任何人而言，受人之恩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那样：“对于他人的恩情，我们往往是连它的万分之一都难以报答。”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而，“恩情的力量”常常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偏爱。<sup>[9]</sup>

这种报恩的理论能否被顺利地运用，取决于人们能否把自己看做是负恩者，在履行义务时毫无怨言。<sup>[10]</sup>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等级制度在日本是如何被彻底地组织起来。认知、遵守等级制度的习惯，使日本人在道德上对报恩的认识高度达到了西方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如果把上级都看做施祝福者，那么这种报恩比较容易实现。在日语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证明上级在下属的眼中是“充满爱意”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英文中的love这个词。在十九世纪，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中的love概念时，认为日语中只有“爱”能够表达这个意思。他们在翻译圣经时，也用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愛以及人类对上帝的愛。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



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具有“庇护”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它还表示对他人的关爱。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当代日语中，“爱”仍然是上级对下级的感情。但可能由于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或者由于官方为了努力打破等级界限，这个词现在也用来表达同辈之间的一种感情。[\[11\]](#)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日本人更易于接受报恩的思想。但在日本，人们不喜欢因为随便接受他人恩惠而欠上人情。当日本人说“让人受恩”的时候，译成英文最接近的意思就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在美国，“imposing”却有强求别人的含义在内。而在日本，“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助别人。对日本人而言，随便接受陌生人的好意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旧的等级关系的交往中，接受他人恩惠所带来的那些麻烦。如果对方是熟人或与自己接近的同辈，他们更会不高兴。总之，他们宁愿避免卷入由于受恩而受到的影响。日本人通常都对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不大关心，这并不仅仅是缺乏主动性的原因。而是他们认为，任何非官方的干预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惠的包袱。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就是：“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插手。”[\[1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明确的授权，对他人的帮助就会被怀疑是意图获得不当的利益。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他人有负于你，因而人们通常都不主动干预，而是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日本人对自己的行为都非常谨慎，以免卷入恩情当中。即使是一支陌生人递上的香烟，也会使他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礼貌的方式表示感谢：“真是过意不去。”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表示你的为难更好，因为你从未想过要为对方做点什么，因而你对接受他的恩惠感到羞耻。”因此，日语“真是过意不去”有时译作“谢谢你”，接受香烟时可译作“不好意思”，在表达感恩时译作“承蒙您如此高看，但实在不好意思”。上面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是十分贴切。

在表达接受他人恩惠而感到惴惴不安时，日语中有很多类似“谢谢你”的表示方法。其中含义最清楚的、被现代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广泛采用的是“这可太难办了”。日本人常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顾客们的采购给商店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利润。这是一种恭维。在接受他人礼物时或者在许多场合中也使用这句话。[\[13\]](#)

另外还有几种表示“感谢”的词句，如“真是过意不去”，这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店主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并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的意思是：“我受了您的恩惠。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您，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14\]](#)这个词在

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I’m grateful”或“I’m sorry”、“I apologize”。譬如在大街上，别人帮你拣回了被风吹走的帽子，这句话则是最合适这种场合了。当他把帽子归还给你，出于礼貌，你要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你会觉得“这个陌生人现在施恩于我，而我却无法报答，对此我深感内疚。只有道歉才能使我好受一些”。

“这并没有结束”是日文中使用最多的道谢语。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接受了他的恩，接过帽子并不意味着恩情的结束。但我却毫无办法，因为我们是陌路人。”

在日本人看来，比“谢谢你”表达负恩心情的程度更强烈的词是“受之有愧”，这个词字面是羞辱、丢脸，表达的是“真难为情”和“感激”。<sup>[15]</sup>日文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恩惠，而自己并不配接受这个恩惠，就会感到羞愧和耻辱。如果你使用这个词，就说明你承认在受恩时感到特别羞愧，而这种羞愧（耻）感是日本人最难接受的。老派的日本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受之有愧”、“真难为情”，顾客买货要求结账时也说这个词。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出身卑微的美丽姑娘如果被藩主选中为妾，她们会说“受之有愧”，意思是说：“我不配受到如此恩宠，对您的仁慈，我真是受宠若惊。”同样，在决斗中被政府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会说“受之有愧”，意思是说：“接受您如此恩惠，我简直没脸见人了。我不该如此作践自己，十分抱歉，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种种说法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恩情的力量”，要比其他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人们在接受恩惠时的心情往往充满了矛盾。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人人都受到巨大的欠恩感的推动，竭力报答他人的恩情。然而，人们往往对欠恩感到难受，因而很容易产生反感。对于这种心态，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sup>[16]</sup>在他的代表作《哥儿》中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哥儿是一位自幼在东京长大的青年，他起初在一个小镇上教书，但很快就对很多同事感到厌恶，无法相处。但和其中一位年轻的教师相处融洽。有一次外出途中，那位称做“豪猪”的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价格是一钱五厘，大约是零点二美分。

不久以后，就有一位教师告诉哥儿，说他的好朋友在背后讲他的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挑拨离间者的话，随后又想起了那个朋友请他喝冰水时的恩情：

虽然只是喝了一杯冰水，但是接受这种人的恩惠，实在影响到了我的荣誉。不论一钱还是五厘，接受这种人的恩惠，我实在是死不安宁……毫无表示地接受别人的恩惠，就表明我将

他视为一个体面的人，尊重他。我自己没有坚持要为那杯冰水付账，而是接受了他的“恩惠”并表示了感谢，这种感激是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但我也有独立的人格。要我去接受别人的恩情，还不如让我偿还他一百万日元！

豪猪为我破费了一钱五厘，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谢至少值一百万日元。

第二天，他把那一钱五厘丢到了他那好朋友的桌子上。因为只有结束了对这一杯冰水的恩情，他才能真正解决他们之间的<sup>[17]</sup>问题，即豪猪侮辱性的语言。他们也许会互相殴打，但必须事先了结恩情，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

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伤害，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青少年帮派的不良记录或者患过精神病人的病历当中。<sup>[18]</sup>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觉得很少有日本人行事会如此极端。当然，那可能也是由于多数日本人比较懒散。日本的评论家在谈到《哥儿》这部小说时，说哥儿是“一个性情暴躁、纯似水晶、为正义战斗到底的人”。实际上，作者曾说，“哥儿”是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觉得如此。这是一个关于崇高美德的故事，受恩者只有把自己的感谢当作价值“百万日元”的东西，并相应地采取行动，才能彻底摆脱负恩者的境地。并且，只能从“体面的人”那里接受恩惠。哥儿在愤怒中，将自己得到的豪猪的恩情与长久以来一直关心自己的老奶妈的恩情进行了对比。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偏爱，总感觉家里人都不喜欢他，于是经常私下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还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怀给予了我巨大的快乐。当我从老奶妈手里接过那三块钱时，感到非常‘难为情’，但我把它当做借款。”然而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归还。那么，为什么至今仍不还呢？在与豪猪的恩情比较之后，哥儿自言自语地说那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句话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不论感情多么错综复杂，只要“恩人”实际上是在自己或者说“我的”等级范围之内的人，或是他做了一些我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做的事情，比如在刮风的日子帮别人拣起帽子等的人，或者是钦佩我的人，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恩情”心安理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恩情”就会成为人们难堪的痛苦。不论这种“恩情”是多么微不足道，人们也应该对此感到难过，这是一种美德。<sup>[19]</sup>

日本人都知道，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过多的恩情都会带来麻烦。这一点可以从近期的杂志的“咨询专栏”中找到明显的例证，它有点像“失恋者信箱”，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专栏。它的答疑毫无弗洛伊德<sup>[20]</sup>精神分析的色彩，完全是日本式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



在征求意见时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我的老伴十六年前去世了。我为了儿女考虑，因此我没有再婚，孩子们也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一种美德。现在，我的孩子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退居到离家几个街区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一件难堪的事情，三年来，我一直和一个夜度娘（被人卖到酒吧当妓女的人）在一起并发生了关系。<sup>[21]</sup>我听了她的身世后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了身，并把她带回家，教她礼仪，让她在我家做用人。她责任心很强，而且生活节俭。但是，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都因此而看不起我，把我当做外人。我并不责备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似乎并不了解这一切。由于那姑娘已到了结婚年龄，所以她父母来信希望她能够早日回家。我同她的父母见过面，并说明了具体情况。她的父母虽很贫穷，但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同意她女儿留下来，就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自己也愿意留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的差异犹如父女一样。<sup>[22]</sup>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都认为她对我的财产有所企图。

我长年生病，也只能活一两年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您能给我提出一些建议，我将不胜感激。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虽然那姑娘以前因为生活所迫而成为了“风尘女子”，但她品行端正，她的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

负责这个病人的医生认为，这个事例明显地说明了这位老人把子女欠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说：

你说的事情非常常见……

在正式解答之前，我必须说明，你似乎希望通过来信获得你所想要的答案，这使我有些反感。当然，对你长期的鳏居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却试图利用这一点来使子女们对你感恩，并使自己目前的行为正当化，我无法同意你这种想法。我并不是说你是个虚伪的人，但你却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如果你必须找一个女人，并且不想让你的子女们为你仍旧独身而对你感恩，那我建议你最好向子女们说清楚你必须和那个女人共同生活。当然，你过分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们自然会反对你。不过，所有的人都有性欲。但是，人应该尝试战胜欲望。你的孩子们也希望如此，因为他们仍旧希望你是一位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父亲。然而，你让他们失望了。我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他们是自私的，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你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子女们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拒绝自己的父亲有这种要求。<sup>[23]</sup>但你的孩子们却有不同想法（像我前面所说的），你们这两种想法发生了冲突。

你说那姑娘和姑娘的父母都很善良，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个人想法罢了。众所周知，人心的善恶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眼下没有追求什么利益，就说他们是“善良”的。如果父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即将过世的人做妾，这是否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他们打算让女儿作为别人的小老婆，那一定是想获得好处。如果你不这样认为，这就是你的幻想。



你的子女担心那姑娘的父母是对你的财产有所企图，我也这样认为。那姑娘年轻，也许不会有这种念头，但她的父母则一定会有。

现在你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1) 做一个“完人”（毫无私欲、无所不能），与那姑娘彻底断绝关系。你也许不会这样做，因为你的感情不允许你这么做。

(2) 重新做一个“凡人”（抛弃所有的虚伪），彻底打破你在子女们心目中作为理想父亲的形象。

关于财产，你应尽快另立一份遗嘱，规定子女们和那姑娘的份额各是多少。

最后，请你不要忘记你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从你的笔迹可以看出来，但是你已经变得相当幼稚了。你的想法与其说是理性的，还不如说是感情用事。你说自己想让那姑娘摆脱下层生活，但我觉得你实际上想用她来代替母亲。我们都知道婴儿没有母亲是不能生存的。因此，我建议你选择第二条道路。<sup>[24]</sup>

在这封信中谈到了许多关于恩的观念。一个人要让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感受重恩，那么他只有冒险去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应该懂得他将为此遭受苦难。而且，不管他在给儿女们恩情时做出了多大牺牲，日后他也不应因此而居功自赏。利用自己的美德来“为自己目前的行为开脱”是错误的。<sup>[25]</sup>孩子们对此感到不满是“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坚持自己的初衷，他们有种“被出卖”的感觉。如果父亲认为，自己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已全身心地牺牲了一切，而当子女们成人后就应该加倍关心照顾父亲的话，那他就太不明智了。孩子们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恩情，而“自然地反对你”。

美国人对这种事就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人认为：在丧妻后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父亲是伟大的，他在晚年应当受到孩子们的感激，而不会认为孩子们的反对是“很自然的”。<sup>[26]</sup>为了像日本人那样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财务交易，因为我们两国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果父亲在一项正式的交易中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时还要还本付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那位父亲说：“他们会很自然地反对你。”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香烟后，不是直接说“谢谢”，而是说“不好意思”。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讨厌别人施加恩情。<sup>[27]</sup>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哥儿如此看重一杯冰水了。但是，美国人对有些事情是不习惯用金钱的标准来衡量的。比如，偶尔在冷饮店请一次客，父亲对丧母孩子们长期的悉心照料，以及“哈齐”对主人的忠心耿耿，等等。但日本人却喜欢这么做。我们重视无附加条件的爱、善意、慷慨仁慈，而在日本人对这些情感却要附加种种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

欠下了别人的恩情，正如日本谚语所说：“一个人需要与生俱来的（非凡的）慷慨才能够承受得了恩情。”

---

[1] 萨评：其实作者想说的是，美国以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主流而自居。换句话说，认为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代表了“普世真理”，这和今天西方社会的思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作者清醒地提出了一个反省——普世真理并不是美国人天然的情人。其实，每次美国历史出现挫折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反思，无论是大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还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信心的重建，都使美国人认识到自己之前自豪的“普世真理”并不完善。每次这种反思，都让美国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修正，并且将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然而，美国在世界春风得意的时候，又往往忘掉这种反思的必要，于是，一战后出现孤立主义，二战后出兵越南，苏联解体后出现新保守主义，实际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损伤，就不足为奇了。

[2] 萨评：这里作者并非说东方人忘恩负义，而是强调东方道德中对于国家、家庭的责任比西方要高。

[3] 萨评：这就是培根“人是人自己的上帝”概念的体现。在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国家、政府都是服务于人，而不是管理人的机构，因此有天赋人权的概念。东方则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地方官称为“牧”，意思是像牧羊人一样管理治下的百姓，和老百姓是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这是东方的“天赋国权”概念。

[4] 萨评：这句话恐怕是作者自己的理解了。日本人的确有“易怒”的性格。不过这个性格并不是说他们经常会发脾气，而是说他们上一秒钟可能笑容可掬，下一秒钟就会怒火万丈。实际上这是由日本民族性格中独特的隐晦性所决定的。在决裂的前一秒钟，日本人都被要求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风度，虽然看上去笑容可掬，实际上他的愤怒和不满可能已经积蓄起来，这种积蓄一旦到达一个临界点，日本人就会突然爆发。这让习惯于将感情流于表面的西方人自然很不适应，这与是不是“负恩”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5] 萨评：之所以这个概念弄得作者晕头转向，是因为它骨子里带出了东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理解起来很不容易。西方社会是一个强调契约精神的社会，重视的是公平，所以，作者在这里对于“恩”的讨论集中在账目的平衡上，不过，东方这种账目往往是不平衡的，所以作者觉得费解。比如父母没有尽哺育子女的义务，子女却依然义无反顾地照顾父母，这明显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是却为东方社会视作正常。东方传统社会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理学，重视的是感情。所以，同样受到别人的帮助，西方人欠的是债，东方人欠的是情。从这个角度说，东方人的契约也公平得很。

[6] 萨评：有一种说法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意大利，哈齐的主人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们可能会奇怪作者怎么会选了一个意大利的故事来诠释日本的哲学，其实这很正常。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女性对狗的感情之深厚，几乎达到我们认为失去理智的程度。如果做一个受欢迎率的调查，大多数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是自家宠物狗的对手。作者虽然是作家，也是美国人，是美国女性，看到这样一则关于狗的感人故事，不脑筋短路才叫奇怪。如果哈齐是一头驴那恐怕就没有机会被写进本书了。

[7]萨评：还是那句话，美国人考虑的是欠下的债务，而东方人此时考虑的是欠下的情谊。

[8]这种“恩”并不受到条文的约束，而是道德的准则。也就是说，一件事做不做，应该看道义上是否该去做，而不看是否有契约的约束。而道义本身，又对上位者颇为有利。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其中一个国家的商人却正好在这之前和对方签了个合同——卖粮食给敌国。那么，西方的商人只要自己的政府不禁止，去履行合同可以为大家理解，东方的商人去履行合同就会被视为卖国贼——这不是东方认为契约不应该遵守，而是认为国家利益是大义，遵守合同是小义，小义应该服从于大义。在日本人看来，报效天皇，就是最大的道义。所以，当天皇的战争需要他们去屠杀无辜、去做出种种与人类准则不相符合的事情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只是满足小的道义，却违背了大的道义。道义，多少罪恶假你之手而行！

[9]萨评：儒家一度崇尚高尚的道德乃至苛刻，让正常人无法遵守。而道德一旦成为窠臼，就会畸形。纪晓岚记录过一则笔记，说某官员对某夫妇有大恩却不图报，有一天出门恰好投宿在那夫妇家里。这夫妇俩人惊喜而又不安，于是商议怎样报答官员。在美食、陪寝等几个方案都因为感觉报恩的程度不够而被否决后，那家的男人无奈地说：“那，只好杀了他吧。”——看吧，一个在道德压力下崩溃的典型。

[10]萨评：这恐怕是西方人看到的表面现象，因为东方的史书中充满了“臣世受国恩”一类的句子。实际上，这只是一句套话，表达对皇帝的忠诚，真正这个系统是否运转，要看每个人是否把自己看做一个对社会国家负有责任的人。如果是，那就会“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不是，那就会“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明代朝臣茹太素向朱元璋上书，陈述财务，洋洋洒洒，长达万言。朱元璋看了四分之三依然不知所云，于是把茹大人拉来痛打屁股，回去后才发现剩下的四分之一很有用，第二天又重赏茹大人。如果作者知道这个关于套话的典故，也许就不会有此处的观点了。

[11]萨评：今天的日本，“爱”的含义已经与Love没什么区别，这说明日语是一种活着的语言，也有自己的发展。但是，“爱”只用于上对下的传统用法还留了一个尾巴——日语中“爱情”一词，指的不是男欢女爱，而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12]萨评：这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事情。日本“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插手”的法令，和中国传统“莫谈国事”、“侠以武犯禁”一样，都是严格把平民限制在行政权力以外来维护官府特权的做法，与负恩与否没什么关系。日本人生活中不愿意欠人好处倒是真的，因为他们的礼节繁琐，欠了人家好处再见面时需要反复提起，经常露骨地表示感谢，即便是日本人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情。所以，你送给日本人什么东西，他都会第一时间给你回礼。比如你端一盘饺子给邻居，五分钟后她可能就带着一筒茶叶来看望了。同时，日本即便最好的朋友之间，彼此也不借钱，结果一个副作用就是放高利贷的在日本很有市场。

[13]萨评：其实这是“菊与刀”矛盾的又一个体现。日本人以讲究含蓄著称，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也不在众人面前哭泣，但在表达情绪上又偏偏爱好夸张，比如日本电影中演员的表情普遍超出必要、对顾客无论买不买东西都满口感激之词、和人说话动不动就鞠躬。其实这一对矛盾能够在日本人身上统一并不难理解，因为日本人的讲究含蓄，本质上是强调“控制”二

字，即自己的表情、情绪应该总是在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演员的表情夸张，表达感谢的情绪激烈，但都是在演员和店员的控制之下表达出来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并非真情流露——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符合日本人的观念。

[14] 萨评：千万不要把这种口头的感激当回事，日本人的性格中对这种惠而不费的东西是很大方的，如果你提出请这位店主借你几千块钱，那他刚刚表达的“无法偿还的恩情”转眼就没影儿了。个人的看法，日本人的民族性其实有一点斤斤计较。古代日本是个贫瘠的国家，不习惯通过实物表达感谢，不要说郭靖那种解衣赠马，就是中国古代常见大排宴筵的做法，也没有几个日本人承受得起。于是这种心理暗示之下，种种华丽的感激之词、看了充满美感却不能吃了带走的餐具、极尽高雅却连茶叶都看不到的茶道，在日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在中国，我们管这种做法叫做“不管饭送出二里地”。

[15] 萨评：这类词现在只用于书面语了，作为中国人，看日文常常可以望文生义，因为毕竟都是汉字。如我第一次和日本的供货商打交道，他们发来的信函还是让我晕头转向，“诚”也就罢了，满篇的“畏”、“恐缩”、“辱”等等写得骈四俪六，让我读得胆战心惊，想我的前任不会是个恶霸吧？让人家写封信都这样畏首畏尾的。后来，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不过是表示对客户尊重而已。

[16] 萨评：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的小说家，翻译家，也是评论家，有日本第一才子之称，相貌似鲁迅，文风似沈从文，代表作为《我们是猫》、《伦敦塔》等。夏目曾经留学英国，是日本当时的英文名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但带有日本传统的风格，写法也易为英语世界所接受。可叹的是夏目的文风虽然潇洒，自己的一生却并不潇洒。他是家中幼子，因为是高龄产子，其母对他的出生感到更多的是“丢人”，如果不是他的姐姐怜悯，差点儿被扔掉。此后，夏目一生饱受神经衰弱、胃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写小说就是他为了对付神经衰弱才开始的，却不料无心插柳。本书中提到的《哥儿》是他1906年的作品。夏目漱石姿容秀美闻名于世，现在日本一千日元钞票的图案就是他的头像。





【图1】夏目漱石

[17] 萨评：这种思想，在西方显然找不到任何相似的线索，但如果到中国哲学中去找，就会发现其根源。中国古代的“士”对于接受恩惠有着同样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君子接受某人的恩惠，是看得起对方的表示——或者说是对方应该感到受宠若惊的事情。这种思想在西方看来简直不合逻辑，而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吃嗟来之食”的影子——当然，然后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了。

[18] 萨评：在美国人看来，得到对方的帮助，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给对方等量的回报——假如对方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你的，则可以采取加权算法，就可以完成报恩的事情了，此后两不相欠。而东方的看法虽然物质上可以回报，但受过恩的人和施恩的人，是很难回复到“两不相欠”的相处状态的。



日本人敲锣打鼓感谢美军送来了粮食——麦克阿瑟为解决日本的饥荒问题从美国调运了大批食品，虽然其中不乏过期物资，但这一手明显比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的行动高明。

[19] 萨评：如果刻薄地讨论日本人对于恩的看法，也许可以写出一部《丑陋的日本人》来。对于自己需要的东西，日本人认为从下位的人那里夺来，比从上位的人那里获得恩赐更有面子。因为上位的人是用来尊崇和进贡的，而下位的人天经地义就是来臣服和纳贡的。在日本人传统习俗里，人要么比自己高，需要百分之百的尊敬，要么比自己低，可以百分之百地欺压，就是很难找到平等的概念。

[20] 萨评：读到这里我曾经感到一愣，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刚刚逝世四年，想不到他的影响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都对这位犹太大夫的学说朗朗上口。要知道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只印了600册，却卖了8年，我曾下意识认为他也是一个生前不太得志的大师。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将无意识行为与心理活动联系了起来，因为对人的潜意识研究有着深湛的造诣而闻名。他认为，人格缺陷或者精神疾患，往往与人被压抑的欲望或曾经遭受的伤害有关，其中，性欲在人类的欲望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对权力的追求都发源于原始性欲的不满。

[21] 萨评：日语中称这种卖笑女子为“游女”，这种职业在今天的日本属于非法。日本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性服务，但法律禁止公开卖淫。

[22] 萨评：这里体现了中国和日本的微妙区别。在中国，也不乏“老少配”的婚姻，但娶了年轻太太的老人绝对忌讳“如父女一样”这类说法，因为这隐含着讽刺二人的举止类似乱伦。而日本人则不怎么在乎。因为日本虽然大量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伦理方面却没有接受中国严格的观念。至今，“乱伦”依然是日本黄色影像制品的一大重要分类，而这里的中文报纸

也报道过通过国际婚姻介绍嫁到日本来的中国新娘因为丈夫与其母有暧昧关系而震惊的新闻。抗战时期，中国方面曾经用日本伦理方面的松懈而指日本人是野蛮未开化民族。

[23] 萨评：在日本社会，如果作为一个正经话题来谈，性欲问题是可以公开谈论的。相对来说，日本社会对“性”的话题并不排斥，也不愿意为其设定各种限制。但是在中国，如果给人这样写信，对方大约只能火冒三丈。

[24] 萨评：这个医生并不是纸上谈兵，开始看到“理想的父亲”一说我曾经怀疑这不是西方刊物上的所谓发生在日本的事情。但是看下去，医生提到关键在于财产，就很“日本”了。日本的观念对于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尤其是单身的人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很看重，比如离了婚的日本前首相小泉就自嘲地说过：“我只要不搞上有夫之妇就没有问题了。”可见舆论对此的宽容。而子女与继父继母因财产而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日本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这个对话中的老者如果不是娶那个女子为妻，子女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一旦看到他可能把这个女子变成将来争夺财产的一分子，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即便父子关系为此破裂，也要力争把这个女子赶出门去。这时候，日本的子女是不会顾及老人的感受的，因为他已经是“过去时”的人物了。对于“养育之恩”，日本不是看得很重。

[25] 萨评：日本人有个有趣的习惯，就是拒绝解释，至少是对于出现问题时进行解释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基本都视为“为自己开脱”。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当事人的做法就是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律闭紧嘴巴，作为上位者，则坚决不能认错，作为下位者，哪怕切腹自杀也不能辩解。如果切腹自杀后被发现是冤枉的，那是极大的光荣。但是，这套在封建时代和战争时代有效的做法，到了今天显然和时代不合拍。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以后终于也摸索出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集体承担责任”。有了问题，无论是不是某人造成的，都由集体承担罪责，也成了今天日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26] 萨评：在西方的观念中，子女没有干涉父母婚姻和私生活方面的权利，同样，子女成年以后，也不会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左右。在中国和日本，最底层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每个成员都有义务为这个最低的单位牺牲和服务，就像手臂之于身体的关系。而西方社会最底层的社会单位则是个人。

[27] 萨评：其实日本人也谈不上讨厌别人施加恩情，毕竟对于善意谁也不会“讨厌”。不过，日本人的习惯是对于“恩情”立刻回报，所以如果你送给一个感冒的日本人一片阿司匹林，他可能会在一分钟以后还给你一个精美的书签。对于这种“斤斤计较”式的报答，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容易得出和本尼迪克特一样的结论。



巢鸭监狱中，日本战犯美军监督下打扫卫生。其中有武藤章和佐藤贤了，昔日的战争狂人落到这个地步，大约自己也没有想到。



## 第六章

###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想起旧上海的舞场。实际上，这是在日本，而且，那些看来长得像亚洲人的，也是美军。他们是美军中的日裔官兵，日本的慰安机构专门为他们举办舞会，欢迎他们回到祖先生长的地方。





为了打击日本的传统势力，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日本天皇下令取消直系亲属以外各宫家的皇族身份，这是这些末日皇族在天皇宫殿前最后合影留念。

恩情就代表欠了别人的债，因而必须还债。但日本人却将“报恩”视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概念。在我们的道德观中，人们经常会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而形成中性词，如obligation（义务）与duty（责任）。对此，日本人感到非常奇怪。这就好像我们对某一部落在进行金钱交易时，其语言对“债主”和“债务人”不加区分时感到奇怪一样。对日本人来讲，给人恩惠实际上相当于一笔长期的债务；而报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须是积极地而且是刻不容缓地偿还。人们欠恩不是美德，而报恩却是美德。人们为了报恩而致力于感激就是一种美德。

对美国人来说，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这种美德，可以参照一下美国人如何看待金融交易，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措施。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如实地履行合同。要是有谁想巧取豪夺，我们对他决不宽容。个人如果对银行有债务，就必须偿还，不仅要归还本钱，还要支付利息。在金钱问题上，美国人认为是与爱国、爱家的感情完全不同的。对美国人来讲，爱是一种感情，能够自由给予才是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除非在这个国家受到外敌的武装侵略时，否则它就是一种幻想，并且和人类易犯错误的本性不相符。在日本人看来，只要人一出生，就肩负着巨大的恩情。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并帮助贫穷的父母，认为丈夫不应该殴打妻子，认为父母应该抚养子女。然而，这些不可能像金钱债务那样进行量化计算，也不可能像生意上的成功那样获得应有的回报。日本人的报恩思想就像在美国要进行债务清偿一样，在美国，一个人可能是用他的抵押品来付清所有的本息，其背后的约束力也是非常强大。对日本人来说，报恩不是在紧要关头才应当注意的事情——如宣战或父母病危——而是一种时刻笼罩的阴影。这就如同一位弱小的纽约农民时刻担心着自己的抵押品、华尔街上股票刚刚脱手的资本家眼睁睁地看着股市上涨一样。

日本人把“恩”这种行为分成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一种在数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穷的；而另一种在数量上不会增值，并在特定的需要时刻进行偿还。<sup>[1]</sup>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一个人的“义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情，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情，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所有人的

宿命。<sup>[2]</sup>日本的初级教育之所以被称为“义务教育”，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词能够更贴切地表达“必须”这个词的意思。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可能会使人们对“义务”的某些细节问题有所调整改变，但这种义务还是对每个人都有强制作用，并超出一切偶然的情况。

###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关事物一览表：

一、恩情：恩情是指被动发生的义务。我们往往说一个人“受恩”、“身受恩宠”，这些都是从被动角度而产生的义务。<sup>[3]</sup>

皇恩——从天皇那得到的恩情。

亲恩——从父母那得到的恩情。

主恩——从上司那得到的恩情。

师恩——从师长那得到的恩情。

在人的一生当中，会在各种人际交往过程中得到恩情（注：所有对自己施恩的人都是“恩人”）。

二、恩情的相应义务：每个人都必须“偿还”这些债务，每个人都必须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从主动偿还的角度而言的。

1. 义务：无论如何努力，无论经过多久，都无法偿还这些义务。

忠——对天皇、对法律、对日本国的义务。<sup>[4]</sup>

孝——对双亲、对祖先（包括子孙后代）的义务。<sup>[5]</sup>

敬业——对自己工作的责任。<sup>[6]</sup>

2. 情义：以下的债务必须根据所接受的利益数量偿还，并且有时间限制。<sup>[7]</sup>

（1）对社会的情义：

对君主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那些施与自己恩惠的人的义务——他们与自己没有亲戚关系。比如接受了他的金钱、善意，以及工作上的帮助（如工作互助）等。

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并不指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恩情，只是大家共有一个祖先。

（2）对自己名誉的情义，相当于德语中“die Ehre”（名声）：

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时，有为自己“洗刷”污名的义务，例如，报复或复仇（注：这里的反击、报复行动不应被看做是对他人的侵犯）。

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

都有遵守日本礼节的义务，即遵守一切礼仪规范、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不如意的時候克制自己的感情，等等。

以上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就使这些美德成为绝对的东西，从而就和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对国家的义务和对父母的

孝道的思想区分开来。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不断吸取中国伦理道德体系，所谓的“忠”、“孝”都是来自于汉语中。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中国人还要求“仁”，<sup>[8]</sup>也就是英文中的“benevolence”，它是“忠”、“孝”的先决条件，是比这两个概念更高的美德，它代表了西方人所指的人们交往中所有的美好事物。父母必须具有“仁慈”。同样，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理所当然地可以起来反抗。帝王皇位的巩固、人们对文武百官的服从，全在于统治者实行“仁政”。中国的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也讲究这一美德。

日本人并不接受中国的这种伦理要求。杰出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谈及中世纪中日两国对此的认识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是与天皇的绝对权威不相容的。因此，即使仅作为理论，我们也从未全盘接受过这些观点。”事实上，在日本，“仁”不属于一种美德，没有中国伦理体系中那样崇高的地位。在日语中，“仁”的发音是“jin”（但字形还是与中文中的“仁”一样）。即使是对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行仁义”或“施仁”也不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美德。由于“仁”完全被排斥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外，使它具有不属于法律范畴之内的含义，它或许是值得赞扬的行为，比如从事慈善事业以使名声远扬，以及赦免犯人，等等。这些都是职责以外的事情，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如此。<sup>[9]</sup>

“行仁义”的另外一种意思是“做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事情”，这种行为经常被强盗们视为美德。比如在德川时代，武士们是佩带双刀的，显得十分威武，而那些无赖则只佩单刀，他们所谓的“行仁义”就是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如果歹徒要求另一个帮派进行庇护，那这个帮派为了使这个歹徒免受同伙的报复，就把他保护起来，这就是“行仁义”。在现代社会中，“行仁义”具有了更多的贬义，它只有在人们谈论处罚违法犯罪行为时才会使用这个词。正像日本媒体所披露的那样：“现在，在日本国内，地下劳工到处‘行仁义’，应该予以严惩。警方也应对此不法行为监管，打击那些在日本各地猖獗的‘仁义行为’。”这里的“行仁义”当然就是那些流氓地痞们所称为的“盗贼的荣誉”。尤其是在现代日本中，经常有一些小包工头也在“行仁义”，就像二十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劳工潘德恩那样，自己和一些无技能的工人订立非法劳动合同，从他们身上获得高额的利润。中国的“仁”的概念在这里已经完全走样了。<sup>[10]</sup>日本人完全篡改并且贬低了中国价值体系中有关道德的核心内容，但是又没有增加其他内容来使“义务”成为有条件的道德规范，因而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对父母的不道德和不公正行为也要宽

恕。只有当“孝”与对天皇的“忠”发生冲突时，人们才可以放弃孝道；但是当父母道德败坏或者他们破坏了儿女的幸福时，作为儿女也必须履行孝道的义务。<sup>[11]</sup>

有这样一部日本近代的电影：在农村饥荒时，一家父母将自己的女儿卖到了妓院。一位乡村教师为了把自己的学生赎出来，就向村民借了一些钱。没想到这笔钱被这位乡村教师的母亲偷走了。其实，这位老师的母亲并不穷，她自己经营着一家收入可观的餐馆。这位老师在知道这件事后，只能自己来接受惩罚。他的妻子后来发现了真相，于是写了一封遗书，对此事承担了全部责任，然后自己带小孩投河自尽了。事情最后被传开了，但大家对这位在这场悲剧中应负责任的母亲却不去责问。在尽完孝后，那位教师独自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的人格，以便使自己能够坚强地应付今后类似的考验。当然，这位老师是一位品德高尚的英雄。但在美国人看来，那个偷钱的母亲应该为整个悲剧负责。然而，我的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的观点。他说，孝道常常会与其他道德观发生冲突。如果片中的主人公足够聪明，他能找到一条无损面子的折中办法。但是，如果为此而谴责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这对那位教师的自尊心来讲也是不可能的。<sup>[12]</sup>

不论是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故事讲述青年人在完婚后都必须履行沉重的孝道义务。除了少数特别现代的家庭之外，人们对于父母通过媒人来为儿子选择妻子这种现象，仍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件事情，家里而不是儿子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程度最高。这不仅涉及到金钱交易，更是因为那媳妇也将被记入家谱，生育男孩，为这个家族传递香火。通常情况下，媒人安排一次看似偶然的见面，双方的家长也都参加，但男女双方并不交谈。有时父母会为儿子安排一桩有利益关系的婚姻，女方的家庭可以获得经济收益，或者男方可以与富贵人家结亲。有时父母给自己的儿子挑一个人品好的姑娘。孝顺的儿子出于感激父母的恩情，是不会对父母的决定提出疑问的。即使是结婚之后，也要继续报答父母恩情的。特别是长子，他以后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因而对家长们来说挑选儿媳妇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婆婆通常都不喜欢儿媳妇，总要挑媳妇的毛病。纵然是儿子和媳妇非常恩爱，非常愿意共同生活，婆婆也可以把媳妇赶出家们，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日本的小说和个人自传都倾向于描写丈夫和妻子的苦难。当然，丈夫是为了“尽孝”而被迫结束婚姻的。

一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现住在美国，她在东京时曾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她被迫离开了伤心的丈夫。当时，她疾病缠身，悲痛异常，却从未责怪自己的丈夫，她逐渐把希望都倾注



到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可谁知孩子刚一出生，婆婆就带着自己顺从的儿子来要小孩。当然，这小孩是属于男方家庭的，可婆婆把小孩带走后，随后就送进了孤儿院。<sup>[13]</sup>

上述的这些例子涉及到了孝道，都必须偿还父母的恩情。而在美国，这些都会被看做是外界对个人合法幸福的干涉。日本人之所以不把这看做是“外界”的干扰，是因为他们把欠恩看做是一个前提。就如同美国的故事中都是描写一个特别正直诚实的人，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也要还清欠债一样，上面的这些故事实际反映了真正品德高尚的日本人，叙述他们赢得了自尊，并证明他们是如何坚强地来忍受种种挫折。<sup>[14]</sup>无论这种挫折表面上显得是如何的崇高，其结果都是令人怨恨的。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就是亚洲关于“令人憎恨之事”的谚语：在缅甸是“火灾、洪水、小偷、官吏和坏人”；而在日本却是“地震、打雷、老人（如一家之长、父亲等等）”。

与中国所说的孝道不同，日本人在“尽孝”时，不会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也不会包括同一祖先繁衍的庞大家族。日本人概念中的祖先只包括当代的前辈先人。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更新以保持清晰，对于后人无法记得的祖先，他也就不再是后辈“尽孝”的对象了，家里的神龛上也不保留他们的灵位了。日本人重视的那些“尽孝”的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很注重现世。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的能力和构想非现时情景的能力，<sup>[15]</sup>日本人的孝道观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们这种观点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把“尽孝”的义务仅限于活着的人之间。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孝道不仅仅指对父母和先人的尊重和服从。对于子女的照料，西方人认为这主要源于母亲的本能和父母的责任感，而东方人则认为这是在给祖先“尽孝”。日本人对这一点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对祖先“尽孝”，就是像父母照顾自己一样照顾自己的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而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对父母及对祖父母“尽孝”之内。孝道规定了名目繁多的义务：如让一家之长抚养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监督财产的管理；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日常责任。日本家庭的制度化产生了种种规定，严格限制了具有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的规定，儿子死后，要由父母来收养遗孀及其子女。同样，万一女儿丧夫，父母也要收养自己的女儿及其子女。但是，要收养丧偶的外甥女或侄女就不在“义务”之内了。如果收养，那也是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义务。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而若想教育自己的侄子和外甥，习惯上是把他们收养为合法的养子，否则，就不是“义务”了。

对贫困的直系亲属所给予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是出于尊重和仁慈。被收留的年轻寡妇经常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都是冷饭；而且，家庭中的所有人员谁都可以对她呼来唤去，她必须对关于她的一切决定绝对服从。她和她的子女们只不过是穷亲戚而已。<sup>[16]</sup>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她们会得到较好的待遇，但这并不是家长有“义务”这样做。同样，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热情地履行义务。当兄弟两人水火不相容时，如果哥哥履行对弟弟的义务，就仍旧能够获得别人的赞赏。

婆媳之间矛盾最多。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必须熟悉婆婆做事的习惯，并以此来办事。<sup>[17]</sup>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明确地表示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测，这是因为婆婆的妒忌心非常大。但是，正如日本谚语所说：“可恶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此，孝道总是存在的。媳妇在表面上总是百依百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温顺可爱的媳妇都会变得苛刻、爱挑剔，正如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媳妇们年轻时是不敢对婆婆进行挑衅的，但她们并不会真正变成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把多年积压的怨气都发泄到自己的媳妇头上。今天，日本姑娘们都公开认为不嫁给一家中的长子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她们不必和专横跋扈的婆婆生活在一起。<sup>[18]</sup>

“尽孝”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家人的好感。在有些文化中，这种好感是庞大家族中的道德基石。<sup>[19]</sup>而在日本情况却有所不同。正如一位日本作家认为的那样：“日本人高度重视家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太尊重个体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家庭纽带。”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这番言语却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里的关键在于承担义务和还债。长辈们自身负有重大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监督晚辈做出必要的牺牲。即使晚辈们痛恨，也必须服从，他们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没有履行“义务”。<sup>[20]</sup>

日本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庭成员间会存在明显的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类似的重大义务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例如对天皇“尽忠”。日本的政治家们精心安排，使天皇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将其奉为神圣。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团结全国民众，一致为国家服务。说天皇是民众之父是不够的，虽然父亲在家庭中承担所有的义务，但却“很可能是个不太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表现，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未受尘世沾染的圣父的崇拜。<sup>[21]</sup>在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冲突，而这对于日本精神来说是不足取的。回国后，他们在宪

法中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只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对国家负责的元首。天皇已有近七百年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了。因此，很容易让他继续充当后台的角色。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国民对天皇绝对忠诚，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最高道德。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尽忠”主要针对世俗首领——将军。<sup>[22]</sup>这一漫长的历史警告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在新的规定下要想完成他们的目标，需要做什么工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大元帅又是最高行政首领，其属下虽然也对他“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谋杀他们的东西仍是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会与对封建君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有紧迫性。因为对君主的忠诚是建立在直接的联系之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推翻将军的统治，然后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明治维新的先驱和领导者们打着“忠于天皇”的口号与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斗争。而天皇则常年深居皇宫，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sup>[23]</sup>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保皇派的胜利，也就是从1868年起，“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也证明了“复辟”是正确的。天皇继续与世俗隔绝，他仍是将权力授予自己的“阁员”，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由一批经过更加认真挑选的顾问来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剧变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天皇身上，他是神圣首领——地位最高的神职人员，是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

当然，“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对于这个传说中涉及的一些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提出过任何疑问。而至于那些接受天皇神圣血统观点的一般老百姓，他们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象的不同。“神”也就是英文的“god”，字面意思是“首领”，即位于等级制度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认为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还认为人死后都将变成神。<sup>[24]</sup>在封建时代，“尽忠”就是要对等级制度中没有神性的首领表示忠诚。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转移到“天皇”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尽管西方人一再说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认为它这种皇室的延续只是一个骗局，但这种指责是毫无用处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继承也“永久保



留了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其基本模式没有变化。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理论，而不是天皇神圣血统的理论。他们说，既然“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整个国家最高神职人员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带有神学色彩，这要比简单的神裔理论重要得多。<sup>[25]</sup>

近代的日本作了种种努力，将“忠”进行人格化，并特别指向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一位显赫、威严的人物，<sup>[26]</sup>在其长期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日本国民的象征。他仅有几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并且都举行了隆重的崇拜仪式。当民众向天皇鞠躬的时候全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俯视天皇。他接见高级顾问也具有类似的等级制度的色彩，据说天皇不会召集行政官员，只有少数“阁下”们具有“面见”天皇的特权。天皇通常不针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一般诏书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方面的内容，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再次安抚民心。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就变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民众都为他虔诚祈祷。<sup>[27]</sup>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纷争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了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因此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对国旗有严格的仪式，这种仪式不能针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实施。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天皇作为最高象征的价值。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做出回应。民众听说天皇“关心他们”时会欣喜若狂。“为了使天皇放心”，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们之间的联系，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如果一个正在受训的教师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那么他将受到指责，因为必须说是要报答天皇。

“忠”建立了一种臣民一天皇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没有任何媒介，用自己的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民众又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天皇的各种命令。“天皇御旨”就可以唤起人们的忠，它的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产生的。<sup>[28]</sup>罗里曾描述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常规的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在极困难条件下，能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倒下，五人死亡。最后检查水壶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sup>[29]</sup>



“忠”影响着民事管理中的所有事务，从丧葬到税收。臣民通过税务官员、警察、地方征兵官员向天皇尽忠。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最高恩情——“皇恩”的最好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社会习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街道的信号灯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处理自身事务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怨恨。由于联邦法律对各州立法权的干涉，它受到了双重怀疑，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因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人们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sup>[30]</sup>日本人觉得美国人都不遵守法律，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唯唯诺诺，毫无民主观念。更切实际的说法是，两国民众对自尊心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事情有关；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回报施恩者相关联。这两种风俗各有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颁布对整个国家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负恩的阴影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会找到平衡法律和它所引发的要求的方法。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甚至还能赞赏一些暴力行为、直接行动和私人的复仇行动。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例子，“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量还是毋庸置疑的。<sup>[31]</sup>

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许多对日本深有体会并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散落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毫无反抗地放下武器，那简直是天真的想法。日军的许多武装部队还从未在局部性的战役中失败过，并确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sup>[32]</sup>在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抵抗的顽固分子。占领军先头部队的力量如果不是足够强大，只要一进日本舰炮的射程范围之内，时刻都有被屠杀的危险。“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人无所畏惧，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然而，得出这样结论的美国分析家却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只要天皇说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还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天皇宣布停战声明。<sup>[33]</sup>但一旦宣布了，所有的日本人都服从天皇的旨意。不论是满洲、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上的“东条”们，都立即接受了停战要求。我们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自己还是手不离枪，中午时他们就把枪收起来了，傍晚就采购小商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和平的办法来使“陛下安心”，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要奋不顾身地用竹枪击退蛮夷。

只要西方人能理解影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变化多端的，那么就能明白日本人的这种性格并不神秘。一些人声称，日本民族除了灭亡将

别无他路；<sup>[34]</sup>而另一些人声称，只有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夺取政权，推翻现任政府，他们才能挽救自己。这两种分析，对于全力以赴、获得全民支持进行全面战争的西方国家而言，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以西方人的行动方针和习惯来理解日本，那么他们就错了。甚至在和平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预言家还在认为，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因为在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因为“日本人不懂得已经战败了”。这是西方的社会哲学，它建立在西方的善恶标准之上。但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不同，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的那种最后的手段——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的方法来反抗占领军。日本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在仍旧保有战斗力的时候，人们就要求自己将无条件投降看做是为了“忠”而必须付出的巨额代价。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但即使是战败，对天皇“忠”仍是最高法律。<sup>[35]</sup>

---

<sup>[1]</sup>萨评：充分显示了西方人对于量化的爱好，典型的用西方方法研究东方问题。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可能都没有想过把“情义”这样分类一下。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样分类逻辑清晰。

<sup>[2]</sup>萨评：日本的“忠孝”思想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所以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的哲学有共同点。

<sup>[3]</sup>萨评：下面所描述的四种恩情不需要施与，类似于基督教中的原罪。比如皇恩，解释是既然世间一切都属于天皇，那么你能享受这些，就是受了恩。



“用民主的一票来报答世界”。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日本的投票是十分热门的，完全不需要拉票，人人都有向胜利者学习、参与选举的热情。同时，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的心声是世界打败日本是一件引导日本走向民主而需要进行报答的恩情。

[4]萨评：这个观念在今天日本已经被西方的权利义务所代替。对天皇的忠只剩形式了，对法律的义务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而对于国家则复杂得多，因为日本对于国家的定义还没有充分的权威说法。

[5]萨评：在日本，孝的概念今天也受到西方思想的极大冲击，加上日本自古以来观念中对父母的爱恨交织，现在日本的“孝”已不容易找到例子了。相反，虽然有子女但是住入老人公寓，接受国家提供的看护服务的老人，在日本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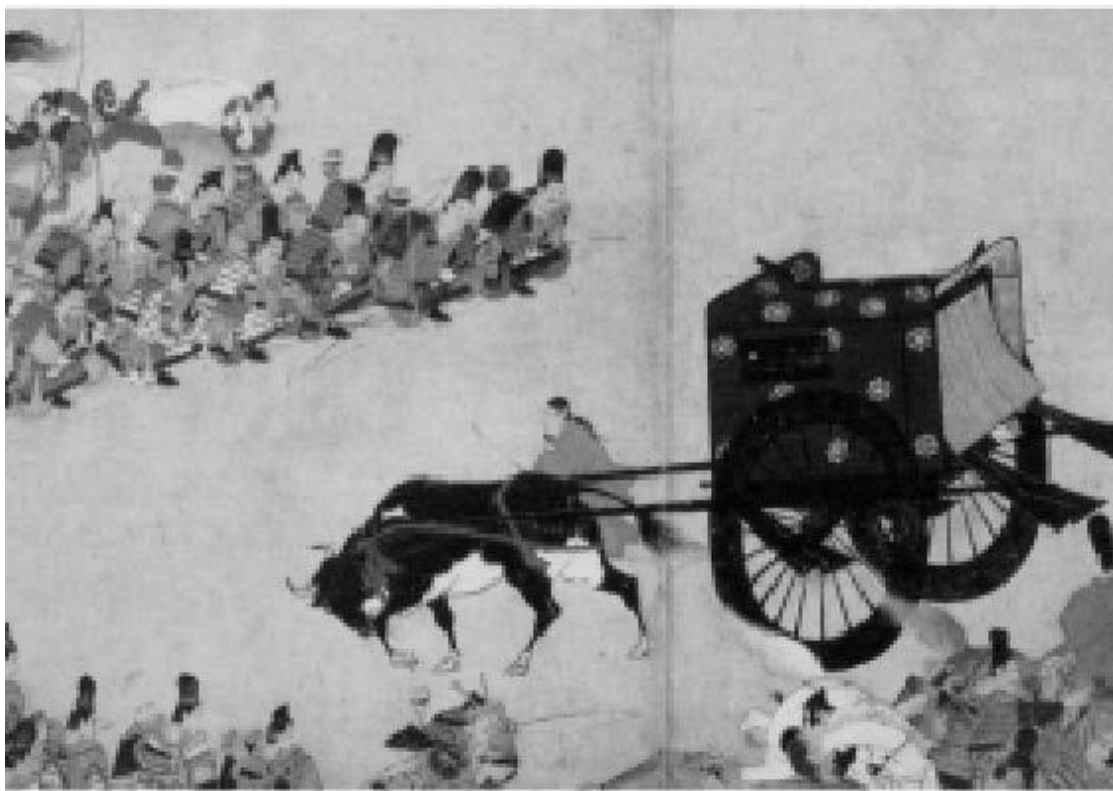
[6]萨评：这一点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丢弃，而且发挥到极致，是值得学习的。

[7]萨评：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还情义的时间越快越好。

[8] 萨评：孔子曾经解释过“仁”的概念——“仁者爱人”，认为君主行仁政是他的责任。这也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状况，因为古代中国更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是否“仁”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危了。这个观念被后世儒家发展为君主必须是道德典范，生生在大明朝就曾逼疯了好几个道德上不那么理想的皇上。美国人对这几个倒霉的皇帝一定十分同情，因为换到美国社会，美国总统的个人品质如何，对美国是否发展得好根本不重要。根据这个观念，如果君主不仁，则臣下另选仁君辅佐是可以原谅的。这一信条被后来许多造反者所扩展利用，以“不仁”的理由推翻君主，甚至干脆杀掉暴君。虽然，孔子实际上没有说过君主不仁就可以推翻和杀掉……但是他也没说君主不仁也要效忠到底——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也很矛盾，所以干脆不说话了。

[9] 萨评：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官方并没有排斥“仁”的观念。实际上，日本历代天皇的名字都带有“仁”字，比如现任天皇的名字是明仁，其父为裕仁，其子为德仁。这都表明了日本天皇家族对这个观念的重视，只是日本社会并没有以这个标准约束天皇的理论而已。理由呢？日本人的观念是天皇本身就是完美的化身，“仁”如果是美德，那么天皇一定已经具有了，没有必要再提出要求。至于天皇也可能做出不仁的事情，那么怎么解释呢？也很好解释——你把天皇的行为看做不仁，肯定是你错了或者别有用心……





【图1】日本天皇出行图，可以看到当时天皇是乘牛车的——这很有象征意义，牛是日本可以用来驾车的最大动物。

[10] 萨评：其实，这更像中国古代“侠”的概念。只是两国文化中对同一概念使用了不同汉字的区别而已。中国古代也强调“侠以武犯禁”，因此历代都加以沉重打击。日本的浪人就以“侠”著称，不过，从对他们的记录来看，他们的道德实在和金庸小说中的“侠”相去甚远。

[11] 萨评：日本的观念对“孝”远没有和“忠”同样的地位。相反，日本的老人一旦因为健康、年龄等原因离开对家庭的主导地位，子女对其的尊敬十分有限。相反，在中国，“孝”受到甚至高于“忠”的推崇。在封建社会，即便是父母已经死了，在守孝期间如果还去为皇帝工作也会惹出大麻烦。明朝张居正就因此发生了“夺情”案。忠于一个暴君虽然可以被接受，但不会被提倡，而在父母做了坏事的时候“包容礼让父母的行为”，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今天，如果孩子犯罪父母去告发，可以有“大义灭亲”的美名，而如果父母犯罪孩子去告发，即便父母对社会而言罪有应得，孩子的这种行为也很难为大众接受。

[12]萨评：没有找到这个电影的出处。应该说这种儿子为母亲担负责任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更常见。在日本，这种事倒也是有的，不过，其间有着微妙的差别。中国的儿子这样做，是因为道德的要求，因为中国的道德中，即便父母错了，子女也当勇于替父母承担责任，比如在父母要被杀头的时候申请以自己代替。而日本的道德并不要求儿子对母亲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在日本为何还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个电影所说的教师在日本堪称“圣人”，而下面那个例子显示了一种更加世俗的理由，不过美国人没有理解，而把它简单地归之于“孝”。这不怪她，东方的东西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能分析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假如她还能分清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微妙区别，那她就是神仙了。

[13]萨评：这里，标示了日本不良家庭中一种典型的矛盾状态。日本的母子关系颇有些特别，由于日本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其实大多数日本母亲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中地位远不如丈夫，也远不如儿子。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经济独立的儿子多半不和母亲住在一起，即便住在一起，母亲也更像是保姆而不是家长。这方面相对于中国，日本对长辈的感情是比较淡薄的，正常的日本男人在家中多唯我独尊，“孝”到如此地步难以想象。说起来也许是长期处于家庭底层的原因，日本的婆婆对儿媳妇一向比较苛刻。上面这位婆婆对儿媳的欺压甚至逼儿子休妻如果还能用发婆婆威风解释，把婴儿索回再送进孤儿院，其含义就无法这样解释了。由于日本母亲全心放在丈夫和儿子身上，一些性格软弱的日本男孩儿“恋母情节”就会特别严重。说起来日本学习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庸”的概念却完全放弃了。日本的文化传统非死即荣之类极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恋母情节”严重的结果就是日本社会乱伦案件中母子之间的占了很大比例，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无法想象的。说的婆婆将孙子遗弃，实在是让常人不理解，因为这毕竟是她儿子的骨肉。然而，如果换一下理解的方法，设想这个母亲和儿子还有另一种微妙的感情的话，一切的解释就顺理成章了！这在日本是一个完全可以解释通的理由。这，和“孝”可就没有半点关系了。

[14]萨评：这种挫折还包括人为的种种侮辱和攻击——日本人对自尊和面子如此看重，如何能够承受这些侮辱和攻击呢？道理简单，来自于平级或者下级的侮辱或者攻击都应该遭到迎头痛击，宁可死也不能接受；然而，如果侮辱和攻击来自上级，那就是对你人生的善意考验，顶多是一种挫折，你必须用加倍的忠顺来赢得考验，提高自己的修养，否则就是“不懂情义”。

[15] 萨评：这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日本传统上为何缺乏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小泽征尔是不是艺术家？他当然是，但是如果他生在明治维新以前，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小泽征尔了。



日本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机构RAA所管辖的银座俱乐部内场景。

[16] 萨评：假如是离婚的女子，其处境只比寡妇更糟。因为日本古代离婚并不意味着女子可以自由，只是意味着男方不再有“义务”，可是女方对男方依然有“义务”。如果前夫落魄或者找茬儿寻来，需要资助，女方则要尽力而为，要照顾前夫的生活，若还没有嫁人还需要侍寝。直到今天这种义务依然保留了一些残存的痕迹，比如离婚后男方可以立即去结婚，女方必须保持六个月的单身“反省”和考虑与男方重归于好的可能。这种规定，同样属于东方礼教的中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纸休书，双方就从此陌路。

[17] 萨评：日本的习惯是女子嫁人就要完全遵循丈夫家的习惯，她们出嫁的时候穿白色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红色嫁衣，含义是“等待用丈夫家的颜色染涤自己”。

[18]萨评：这种现象只限于日本传统家庭，现在很多日本人已经很西方化了，这种生活于他们也不再典型。但是，传统的日本家庭还是不少的，即便在今天，嫁给这样的家庭有继承权的男子，儿媳妇依然要吃不少苦头，遭受婆婆的挑剔和压迫。不过不要忘了，日本的文化中只有胜者和负者、强者和弱者，所以，作为弱者的媳妇，一旦丈夫继承了家业，就往往会反过来把婆婆打回保姆状。每当我看到日本家庭中劳碌而在狭隘的小房间里栖身的白发母亲时，总是不禁产生同情，而看到被恶婆婆欺压的儿媳妇，也会产生同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同情心太滥，她们不过是胜者为王罢了，已经这样过了上千年。

[19]萨评：这里说的“有些文化”主要指中国，中国不但家族中强调孝行，即便是国家的治理，也有“以孝治天下”的理论。这时候，忠与孝就结合而为一了。

[20]萨评：所以，在日本的企业里“前辈”对于“后辈”态度粗暴，把沉重不合理的工作交给他们，都是合理而符合日本的传统道德的，这意味着“监督晚辈做出必要的牺牲”。日本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前辈”是在牺牲自己的形象来帮助“后辈”成长，所以，他们这样做是值得敬仰的。而中国人慈祥宽厚的长辈形象，于日本人看来缺乏对后辈的锻炼而并不完全可取。

[21]萨评：所以今天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很是传统，极少有要推翻天皇或更改目前这种关系的声音。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远离真正世务，仅仅具有象征性国家意义的天皇，才是他们历史上习惯的天皇形象。他们很明白怎样和这样的天皇相处。从地位来看，世界各国的皇室很少有如日本这样稳固的了。

[22]萨评：将军，指的是日本幕府时代架空天皇后真正的执政者“征夷大将军”，他们的地位类似今天的日本首相。有些“将军”也颇有着“朕即国家”的观念，如室町幕府的足立义满将军就接受过明朝“日本国王”的封号，而根本没在意还有一个天皇。

[23]萨评：更可怕的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天皇才首次被承认是一个“人”，这之前，天皇在日本始终是生物学的禁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虽然他的御医肯定知道天皇属于人类，但这个观点如果传播给老百姓，基本上他的命运就是被乱石砸死或一刀砍掉脑袋。





【图2】“非人”的天皇一家

[24]萨评：这里面多少有一点误解。比如普通的士兵，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如果战死也会变成“神”。但这个“神”和天皇家的“神”不是一个概念，至少不是一个等级。这种普通人变成的“神”只不过享受祭祀而已，但天皇家的“神”，其含义在于天上人间都归他统治。所以，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活着天皇是领袖，死了变成神，天皇还是领袖。

[25]萨评：日本是一个岛国，因为大海阻隔，自古以来，日本人无法理解国家间需要像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天才梅特涅伯爵那样多彩的外交活动，而敌国也极少入侵——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尝试过登陆日本，但以失败告终。因此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之封闭无与伦比，甚至比中国这样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更为封闭。因为中国虽然传统上认为邻国都是蛮夷，但总是需要打交道的，而日本人则普遍认为邻国与其他民族完全可以从日本人的世界上忽视。而剩下的日本人的世界上，有一个不变的最高领袖——天皇。由此，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关于天皇的血统，西方的怀疑确有道理。一方面，天皇家族有过不得不从其他皇族家庭过继的事情，比如后花园天

皇，就是从伏见宫家过继而来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室町幕府时期，曾有将军强迫天皇娶自己的侍女为皇后、生子继位的经历，而这个侍女当时很可能已经怀孕了。不过，无论伏见宫家还是室町幕府的足立将军家，也都是早期天皇的后代。

[26]萨评：指的是明治天皇睦仁，是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尽管当时日本实施立宪政治，但天皇的地位在宪法之上，并且是实质的统治者。对中国人来说，明治时期最让人难忘的事情，就是进行了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同光中兴”毁于一旦，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此战，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白银两亿七千万两，从未见到如此巨款的日本上下欣喜若狂，而明治天皇对于这笔款项的使用是这样要求的——要在每个乡村建一所小学校。

[27]萨评：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死时，日本陆军的老将乃木希典夫妇竟然自杀殉葬，大约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的殉葬事件了。

[28]萨评：这既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也给天皇犯错误时诱过于下创造了条件。这两种事情虽然都曾在日本的历史上发生过，但对天皇来说，这种情况显然还是利多弊少。

[29]萨评：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日本军队的，是说一队兵士在悬崖上训练齐步走，快要走到断崖的时候，军官因为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分神，没有发出立定的口令，结果等他转过头来，发现自己的士兵已经一个一个地走向断崖并摔死在下面。这个例子在日军中被作为服从命令的正面典型而表彰。然而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了日本人的独特性格。他们遵守命令和规范的坚决，常常在命令和规范正确时造成极好的效果；但是他们不由分说，不假思索地遵守命令和规范，又不可避免地会在命令或规范有问题时造成自己或他人的悲剧。中国人遇到这种命令，恐怕是不会执行的，固然，有些中国人是心眼过于灵活了，碰到对自己不利的命令就不去执行，这不是好事，但也有些中国人只是自己会思索命令是否合理，因此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上级和自己的同伴。比如这个断崖行军的事例，如果齐步走的是中国人，大概会想——第一，这是和平时期，普通训练，让我们跳崖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如果按照命令行进，我的战友会受到伤害，而军官也难逃处罚。结果呢？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某个头脑比较清醒的老兵就会自动大喊一声“立定”……至于以后是否承认是自己喊的，就要看是赏是罚了。

[30]萨评：但是，这些爱抱怨的美国人，一旦有需要，同样会为了美国而战。比如二战中德国人曾试图与和罗斯福积怨甚深的美国黑手党合作。德国人的理由很简单，对双方来说，罗斯福都是“狗娘养

的”，难道不是合作的基础吗？美国的黑手党回答：不错，罗斯福是“狗娘养的”，不过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于是，合作泡汤。无他，当时罗斯福手握着星条旗呢。

[31]萨评：因为日本人这种特殊的顺从精神，颇有人认为日本人脑子里少根弦。实际上日本人虽然确实在这方面显得特别固执甚至幼稚，但他们并不是傻子，所以也就自然会有怀疑。比如，日本人信奉神道教的很多，他们在战争中可以为天皇而死，并且因此“成神”，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然而，能不能真的成神，日本人自己也是颇有疑惑的，所以大多数日本人在信奉神道教的同时，又是佛教徒，或者，至少在死后买一个佛教徒的法号。这样，死后万一“成神”不牢靠，还可以作为佛门弟子往生西天。看，日本人小心谨慎的性格也和他们习惯服从的精神一样无所不在。

[32]萨评：日军战败时各地投降者共计五百五十万。当时，在中国南方战线国民党军和日军正在对峙，国民党军取得了雪峰山和桂柳追击作战的胜利，日寇刚刚失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老河口，日军尚未露出败象。但是一封诏书以后，再有能力的日军将领也无法率领这支军队继续作战了。

[33]萨评：指的是1945年8月14日晚，日本陆相阿南惟己的一些亲信军官发动的政变，指挥官是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和东条英机的女婿畑中健二，他们杀死了近卫师团长森猛中将，试图接管皇宫的警卫，并截夺天皇的停战诏书。政变最终在深夜被粉碎。阿南惟己本人并未参加政变，但却是知情人，因此第二天早上，在停战诏书播发之前切腹自杀。阿南曾经是日军在华指挥官，第三次长沙战役中败于中国名将薛岳的“天炉战”。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儿子阿南惟茂则是战后日本外务省一位亲华的外交官，2004年曾担任驻华大使。

[34]萨评：这是因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度的顽强，即便在完全没有胜利希望的时候，也绝不投降。甚至在塞班岛，日本的平民也集体跳崖自杀不肯投降。盟军对此除了不能理解之外，就是认为日本人学不会投降，结果却发现随着天皇的诏书，日本人却做了世界上最模范的投降者。

[35]萨评：从这个角度说，日本人有点儿像阿Q，最后一个圈也要画圆的。现在，又有很多日本人强调1945年8月15日只是“终战”而不是“投降”，于是乎日本的形象也从被打得俯首帖耳的战争罪犯变成了和平的缔造者。看来，这又是新一轮画圆圈运动。



【图3】日本投降仪式，舰舷侧第一列为中国代表，着陆军便服的是徐永昌上将，  
身后为陈绍宽上将。



## 第七章

### 情义“最难承受”



日本投降周年纪念日，盟军在日本东京进行盛大阅兵。从周围热情的人群看，实在无法分清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

日本人说，情义“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要像履行义务那样履行情义。但是，情义和义务所要求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在英文里没有一个词与情义对等。人类学家发现世界上每种文化的道德义务都是很奇特的，但日本文化中的情义显然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与“孝”为日本和中国所共有，尽管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一些修改，但仍旧与东方其他国家的道德责任有某些同类的相似性。而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与东方的佛教无关，它属于日本范畴，不考虑情义就不能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动机、名誉以及个人所面临的进退两难情况时，时常要谈及情义。<sup>[1]</sup>

对西方人而言，情义包含了许多纷繁复杂的义务（参阅本书第六章）：从报答之前的善意到复仇的责任。难怪日本人不愿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字典也几乎没有对这个词进行解释。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我的翻译）：“正道；人做事应该遵循的规则；为了免遭非议而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理解这个词的主要意思，但“不愿意”这个词语却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不论义务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是如何的艰巨，但至少是个人对他的最亲密家庭成员或者对代表他的祖国、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爱国精神的统治者的一系列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如此牢固，是因为它们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是必须履行的。不论人们在履行义务时有多少“不愿意”的行为，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人们在履行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不快。在情义中，需要进行偿还的人面临着最大的困难。<sup>[2]</sup>

可以将情义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我把一种称为“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说报答自己同辈人的恩情；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这与德语中“名誉”类似。就如同义务是人们生而具之的责任一样，也可将“对社会的情义”大致描述为类似于履行契约。而与之相比，义务指人们对自己所出生的家庭应履行亲属责任。这样，情义就包括了一个人对姻亲家庭所承担的所有责任。而义务是对自己家里所应承担的责任。岳父、公公称做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做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也被称做情义上的兄弟、姐妹。<sup>[3]</sup>不论是对自己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都使用这样的称呼。当然，在日本，婚姻也是家庭

之间的契约。终生为配偶的家庭履行这些契约性质的责任就是在“履行情义”。在履行这种契约性质的责任时，最沉重的恐怕是报答安排婚姻的父母双亲的情义。尤其是年轻的儿媳妇对婆婆的情义是最为沉重的，因为恰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儿媳妇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岳母的责任可能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为当岳父母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sup>[4]</sup>同时还要履行其他一些契约性的责任。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照顾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不能称为情义，因为这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爱。”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然而，人们都是认真履行那种由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情义，不论代价多大，否则他将遭受可怕的谴责——“不懂情义的人”。

如果丈夫是入赘到妻子家庭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对这种由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的看法。当一个家里只有女儿时，家长们就会为其中的一个女儿挑选一名女婿，以延续“家族”。女婿要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户籍中消掉，然后采用岳父的姓氏。他就到妻子的家里生活，从情义上要听从岳父母的，死后也要葬入他们的墓地。这些做法都和一般妇女出嫁一样。<sup>[5]</sup>之所以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也许不仅仅只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更多情况是双方家庭出于利益考虑，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很穷，但“门第”很高，男方就带着钱入赘，作为回报，男方则可以提高自己在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或者说女方家庭富裕，有能力让男方接受教育，为了获得好处，男方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妻子家里去。还有时是女方父亲希望通过此举获得理想的公司合作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的丈夫所承受的情义都是很沉重的。因为在日本，将自己的名字改入别人家的户口簿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样的女婿在战争中必须为岳父竭力而战，为了向这个新家庭证明自己，即使是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sup>[6]</sup>在当代日本，“政治联姻”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情义约束力，使女婿和岳父的事业以及这个家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是非常沉重的约束。尤其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日本社会对入赘非常反感。日本的老古言常说：“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的这种反感情绪主要还是由于情义的缘故。他们决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这不是男子汉所为。”履行情义很难，是“不情愿”的，因而“为了情义”最能表达日本人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家庭责任是情义，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侄女个人的义务也属于这一范畴。在日本，对这些近亲的责任不属于孝道，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这些



亲属，甚至比这还远的亲属也能分享所有的资源。而在日本，这是情义关系或者是“契约”性质的关系。日本人指出，一般而言，帮助这类近亲并非是出于个人“恩情”，而主要是为了报答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小孩当然也是有责任所迫——当然，这是一种义务；而帮助远房亲戚，虽然也是出于同样的道德要求，但却是情义；在不得不帮时，人们就会说自己是“被情义所牵”，就像帮助自己的姻亲一样。<sup>[7]</sup>

与姻亲的情义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重大的传统情义关系，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的是一个具有荣誉感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人的忠诚。在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情义中包含的责任都深为人们肯定，并将其作为武士的美德。<sup>[8]</sup>在德川氏还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的日本，人们甚至认为这是比“忠”还要高尚的美德，而“忠”在那时只是将军的义务。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要求自己的一位大名交出他所庇护的一名藩主。那位大名写了一封信，并保留至今。他非常痛恨对他情义的诋毁，因此拒绝以“忠”的名义而背叛情义。他在信中写道：“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之间的情义却是永恒的真理，它超越了将军的权威。”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的朋友失信”。<sup>[9]</sup>很多历史故事都描写了武士崇高的道德品行，至今仍为人所熟知。现在，通过润色和加工，这些故事渐渐地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弁庆的浪人<sup>[10]</sup>的故事。他力大无敌，但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他曾寄住于一家僧院，但所有的僧侣都对他感到恐惧。为了搜集一名封建武士所需的行装，他杀害所有过往的武士，收缴他们的刀剑。最后，他向一位年轻人挑战——一位瘦弱、具有纨绔气的领主。没想到却遇到了对手。后来，他发现这位青年原来是源氏<sup>[11]</sup>的后代，正筹划恢复他们家族的将军地位。这位青年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所喜爱的英雄源义经。弁庆立即向源义经表示了热忱的情义，并在战场上为源氏家族杀敌立功。但是，在有一次战斗中，敌众我寡，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将自己化装成建立寺院而在日本全国化缘的僧人。为了免生怀疑，弁庆装扮成首领模样，而源义经打扮成普通僧人。沿途如果遇到敌方的检查，弁庆就拿出编造好的一卷寺院募捐者的名单，通过诵读来欺骗敌人。然而，在最后时刻，尽管源义经装扮成下人，却无法掩饰他的贵族气质，由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立即召唤大部队。这时，弁庆立即略施小计，消除了敌方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打了源义经一耳光，敌人立即消除了对源义经的怀疑。因为，如果这位化缘的和尚真是源义经的话，家臣是绝不敢对他动手的。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违背了情义。弁庆

的不敬行为挽救他们的性命。在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弁庆立即跪倒在源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这位领主慷慨地赦免了他。[\[12\]](#)



【图3】源义经

这些历史故事中所描述的情义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不满的痕迹。这些故事对现代日本人而言就像是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情愿”的意思。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体面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人们珍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而表面又具有封建制度的特点。“懂情义”意味着一个人要终身忠诚于君主，而君主也要关心自己的家臣。“报答情义”，就是甚至要把生命献给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君主。

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日本的封建历史说明，有很多的例子都表明在战争中，敌对大名可以用金钱来收买武士的忠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君主诋毁了自己的家臣，从传统上讲，家臣可以离开君主，甚至加入敌方阵营。我们在下一章中讲述这一点。如同日本人赞颂捐躯尽忠一样，在谈到复仇时，日本人同样是兴致勃勃，因为两者都是情义。对君主的忠诚是情义，而对侮辱进行报仇是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13\]](#)

不过，那些描述忠诚的古老故事，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只是令人高兴的白日梦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履行情义，已经不再指的是对自己合法君主的忠诚，而是要履行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义务。今天当人们常常谈到情义时，往往充满了不满的情绪，强调说是个人迫于舆论压力而违背自己本意来履行情义。人们常说“完全是出于情义才安排这

桩婚姻”、“仅仅出于情义，我才被迫为那个人提供工作”、“我必须见他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情义”，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的困扰”。辞典把这句话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人们还说“他用情义来强迫我”、“他用情义来困扰我”。上述的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用语意思都是出于对某些人以往所施恩情的考虑，讲这类话的人被迫做他们不想或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大财阀的上流社会中，甚至在日本内阁，人们都“被情义所迫”、“为情义所困扰”。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之前的关系或交往来给自己未来的岳父施加压力；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答应。他说：“如果我不帮助我的恩人，世人就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都含有“不情愿”、“只是为了面子”的含义，正如日语辞典进行的解释。

[14]

情义是严格的规定，必须进行报答，它们不像摩西十诫规定的那样是一些道德准则。当一个人迫于情义时，往往会无视正义。人们会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不包括像“对待自己的邻居就像对待自己一样”这样的内容，它也没有规定一个人要主动地宽以待人。它只是说，一个人必须履行情义的义务，否则，人们就认为他是无情无义，他将在世人面前感到羞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必须遵守情义。实际上，在英语中，“对社会的情义”常常被译为“服从公众的舆论”。在辞典中的翻译是“我只好这样，因为这是对世界的‘情义’。”这句话可理解为“因为世界不接受其他的方法”。[15]

日本人情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定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对于美国人而言，如果接到一封信、接受了礼物或者适时的话语，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像支付利息或者偿还银行借款那样紧迫。在金钱交易中，对没有进行偿还的人的惩罚就是让他破产，这是非常重的惩罚。然而，日本人却把未能报答情义当做破产，生活中所有的交往都有可能涉及到某种情义。这就是说，美国人对于一些毫不重要的言行不会考虑过多，认为不会引起义务；而日本人都会慎重地对待它们，这意味着他们在复杂的世界当中也会谨慎行事。[16]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的还钱的思想之间还有另一个相似点。“报答情义”意味着等量的感谢，这一点与恩情完全不同。后者是永无满足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报答，而情义是有限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恩情的态度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感到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很特别。譬如，每个家庭



每年都会有两次用精心包装的礼物来感谢六个月前收到的礼物；<sup>[17]</sup>女用人的家庭每年都要送来礼物来感谢对自己孩子的雇用。但是，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收到比自己原来所送礼物要贵重许多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有损自己的名誉，说得难听一点，似乎是想“用小虾钓大鱼”似的。<sup>[18]</sup>而在报答情义时也是如此。

人们都尽可能对彼此之间的往来进行记录，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工作组<sup>[19]</sup>的一个人进行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人们在葬礼时习惯带“丧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带来彩色的布来制作送葬用的条幅。近邻们都来帮忙，女人下厨，男的挖坟墓，制作棺材。在须惠村，村长准备了一个册子来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邻居们的礼物和帮助。这样，当其他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这户人家也可以根据名册上的名单来相应地还礼。这些都是长期的礼尚往来。此外，村庄里还有一些短期的交往活动，就像所有的宴会一样。那些制作棺材的人会受到款待，而他们也会带一些大米作为对款待的部分补偿。村长也会对这些大米做上记录。在多数宴会上，客人们也要自带一些米酒，作为宴会的饮料。无论是生还是死，或是插秧、盖房、聚会，情义的交往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作为以后回报的依据。<sup>[20]</sup>

日本的情义习俗还有一点与西方的还钱理论相类似。如果归还延期的话，利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增长。埃克斯坦博士讲述了自己与一位日本制造商交往的故事。这位商人资助埃克斯坦博士去日本旅游，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sup>[21]</sup>自传的资料。博士回到美国后着手撰写传记，并把手稿寄给了那位商人。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博士自然担心起来，害怕书中的某些内容冒犯了这位日本人。他于是又寄了几封信，但仍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电话，说他现在正在美国。不久，他就来拜坊博士了，并给他带了几十棵日本的樱花树。这份礼物太厚重了。正是因为耽误了这么久，所以只能送贵重的礼物才合适。于是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

“当然，您也不想让我那么早就回报您吧！”

“关注情义”的人往往被迫回报因时间而增加的恩情。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助，而这人恰好就是这个小商贩启蒙老师的侄子。这位商人由于在年轻时没能报答老师的情义，而这种情义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现在，这位商人别无选择，只好伸出援助之手，以报答老师在当年对商人的恩情，“以免遭人非议”。

---



[1] 萨评：读《菊与刀》我们不得不时刻注意，作者对东方哲学的了解有自己的局限，所以她讲的并不是“真理”，而是一个美国人对东方的看法。比如情义，其实正是来自于中国的儒学。情，指的是恩情友谊；义，指的是社会道德。儒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义利之辨”，义和利的权衡结果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人在做事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是否有利，而只应该考虑它是否符合真理。如果这件事符合真理，即便为此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真正的儒者也应该“虽千万人吾往矣”。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一直为了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奔走，只因为他认定这是符合真理的。这种精神大概可以比较好地诠释情义的含义。“义利之学”在中国还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就叫做“道学”。

[2] 萨评：其实这个“不情愿”应该是来自于中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前提是“即使”、“假设”。那么，理学为何要强调这种假设呢？因为理学本身就将道德与人的欲望对立起来，结果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中国人善于变通，因此面对这样无法企及的标准产生了无数假道学，而日本人的拗劲儿使他们为了“大义”，在二战中理直气壮地为天皇入侵邻国杀人放火，也为天皇轻易舍弃自己的性命，而从不去想这样做完全违反了基本的人性。

[3] 萨评：因此，在日本报纸上经常见到“义父”、“义兄”这样的词语，千万不要认为日本人有吕布董卓情结或者喜欢结拜，日本拜养父的事情倒是不少，多半是为了政治原因，比如提高养子的社会地位，但结拜是绝对不流行的。日本人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孤独的动物之一。

[4] 萨评：这大概也是日本私人人际关系中唯一的可以讨论金钱借贷的关系了。

[5] 萨评：中国也有倒插门女婿一说，但最多是后代姓女方的姓，却没有自己也改对方姓氏的道理。日本这种情况显然也不是大多数男子喜欢的，所以被招赘的男性往往有点儿惧内。然而，这也未必全是坏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婿田中直纪就属于这样的上门女婿，于是当他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对手就攻击他窝囊，而他的太太田中真纪子（日本前外相，以词锋锐利、大刀阔斧著称）就站出来为他辩护——“这年头，如此老实巴交的男人在政治家里面难道不是凤毛麟角吗？”一时大为舆论所接受，田中直纪的当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图1】田中真纪子

[6] 萨评：这种事儿日本人硬着头皮也会干下来的，因为情义要求他这样做。换了中国人，在历史上更多的是在双方之间充当缓冲与和平鸽的角色，没有一个岳父敢这样信任一个连自己亲爹都杀的女婿。

[7] 萨评：很多日本人本身是不喜欢这种义务的，所以“穷亲戚”的日子通常都很难过。只是他们不能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否则自己的名誉就会受到损伤。不过，一旦有机会，日本人还是愿意想办法推托这样的情义。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政府达成协议，一些在战争中流落中国的日本孤儿被接回日本。很遗憾，很多这种“归国者”惊讶地发现，他们在日本的亲戚不是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甚至是冷面相对，根本不认他们这些亲戚，哪怕是亲生兄弟姐妹也不例外。反倒是一般社会志愿者给了他们大量的帮助。在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归来让小心谨慎的日本亲戚已经在考虑会不会造成财产分割的问题，或者给自己找来“情义缠身”这样的麻烦了。

[8] 萨评：这种忠诚并不需要他的上级真正有恩于他，只要双方有这个上下级关系就可以了。在日本传统中，当等级和私恩冲突时，要求有道德的人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对等级的忠诚。等级是日本传统社会得以运作的基础。

[9] 萨评：这段文字引自朝河贯一《入来院文书》中对镰仓幕府时代历史的记述，当然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萨摩藩本身就是和幕府不大和睦的地方政权，

对将军的“忠”也不那么重视。

[\[10\]](#) 萨评：浪人，指的是没有所依附的主君，自谋生路的武士。

[\[11\]](#) 萨评：源氏，指的是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的源氏家族。源氏家族的首领源赖朝在平安时代末期击败强大的平氏家族控制日本，以后有九代将军都是这个家族产生的。下面说到的源义经就是源赖朝的弟弟，后为兄长猜忌所攻杀，是日本著名的悲剧英雄。

[\[12\]](#) 萨评：源义经，乳名牛若丸，身材瘦小，他战胜强大的对手弁庆，被视为日本式的大卫对歌利亚之战。因此，日本对以弱敌强的战例经常被冠以“仿佛牛若丸对弁庆”的形容。在日文资料中，形容中国海军逸仙号战舰在长江中与蜂拥而至的日军轰炸机恶战，就不无钦佩地使用了这个说法。源义经是日本著名的悲剧历史人物，他幼年随母亲逃亡，长大后发动复仇之战，以英勇善战击破当时篡夺权力的平氏政权而著称。平氏家族灭亡后，源义经的哥哥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对这个弟弟却是防范又嫉妒，终于发动了对源义经一派的清洗。弁庆打源义经耳光的事情，就发生在源义经逃亡中。源义经的妾，日本著名的三大美人之一静御前也在这次逃亡中被源赖朝掠去。源义经最终战败自杀。源义经在日本深受爱戴，其中一个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悲惨的命运。日本民族，对于悲剧有着特别敏感的情结。



【图2】牛若丸和弁庆之战

[13] 萨评：这两种理由对于实心眼的人来说都是很可以接受的理由，可是偏偏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这一条，在过去和今天的世界里，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汪精卫在武汉提倡焦土抗战，到南京“艳电救国”，如此矛盾怎样自圆其说？据汪氏解释，在武汉是“为国”，到南京是“为民”。那么，在武汉怎么就不考虑为民，在南京怎么就不考虑为国了呢？今天美国对一些不那么“民主”的国家，忽而因为“普世真理”打过去，忽而因为“友谊”大加援手，又是一个例子了。

[14] 萨评：看到作者对于情义的研究，隐约感到了美国人对于纳税的看法——税，是不能不纳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纳税这件事又没有谁会喜欢，所以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减税（当然能不能兑现再说）。一边交税，一边不情愿地抱怨，美国人的表情此时和日本人讨论情义的时候没什么区别。



美军第十一空降师进驻日本，如临大敌的美军面对潜在敌人——曾经用自杀飞机攻击过美军的日本人的时候，发现对方的表情竟然是一一善意的好奇！

[15] 萨评：这一点日本受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中国的传统社会，法律的作用是次要的，而各种约定俗成的民间规范才是维系大多数人行为的准绳。儒家的最终理想，就是依靠道德或者说舆论监督来完成对国家的治理。

[16] 萨评：这又是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更接近的地方。中国人接到礼物也不会马上回礼，而是记住这份情谊，在今后适当的机会报还。日本人收到礼物后，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礼，通常是当场就想法还给你，包括吊丧的时候致送丧仪也会立刻收到回礼。浑不知这是让中国人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恼怒的做法。



[17] 萨评：六个月前，礼物已经还清了，但是上一次是对方首先送来的礼物，所以这个“首先”的情没有还，于是这一次，要先送给对方。这其实不是回礼，而是新一轮交换礼物的开始。日本的民间社交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18] 萨评：我曾在学习日语的时候问过教师，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还礼太贵重是失礼的表示呢？作为中国人，如果朋友的还礼很重，我会感到过意不去，可是也会因为朋友重视和我的友谊而感到欣喜。教师的回答是：日本人考虑事情往往过细（但不妨碍他们一根筋，又是一个“菊与刀”的典型例子），比如送礼这回事，如果你回礼太重，就容易让对方猜测你认为给你送的礼物是根本不必要的，从而降低了对对方给你送礼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伤害对方感情的事情。

[19] 萨评：最初相当于我国的农会、商会和行业自治会，现在发展成工会性质的组织。抗日战争中，也曾在中国占领区普遍建立各种“组合”，这就不是工会或农会了，而是进行经济掠夺和配给的机关。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就有武工队队员装扮去“组合”领取煤炭的伪工作人员进行活动的场面。

[20] 萨评：这种日本传统习俗与中国云南地区若干少数民族的习惯相似，也是日本人认为自己的一部分血统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论据之一。

[21] 萨评：野口英世（1876~1928），日本医学家，耶鲁大学博士，在梅毒、小儿麻痹和狂犬病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曾担任厄瓜多尔陆军医务总监，后因研究黄热病被感染而殉职。日本银行的一千日元纸币上采用的就是他的头像。



【图4】野口英世

# 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下

〔插图评注版〕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 著  
刘 锋 / 译  
萨 苏 / 评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插图评注版．下册 / （美）本尼迪克特著；刘锋译；萨苏评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5090-0284-1

I. 菊… II. ①本…②刘…③萨…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G131.32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1822号

### 菊与刀：插图评注版（下册）

---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8400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5.87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284-1/G·014  
定 价：38.00元（上下册）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第八章

### 维护名誉



銀座の特殊慰安施設協会(RAA)事務所  
に「ダンサー2000名、女給300  
名、社交舞踊教師数名募集」の看板が  
された。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为美军提供“特殊慰安服务”流传下来的照片很少。这是其中一张，显示了“特殊慰安”机构的大门、排队等候服务的美军人员和征集女性服务员的广告。尽管内容包括艺伎，服务员和舞伴等等，她们真实的工作，无非都是慰安妇。

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誉的情义。这种情义包含了许多美德，在西方人看来，它们中有些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而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因为这些责任不是要对别人施恩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sup>[1]</sup>因此，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照“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痛苦中表现出忍耐、在专业和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的名誉，因而必须消除。也许还需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还有很多方法。但唯独不能淡然处之。

对于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日本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他们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东西，而这一点只是分类的基础。也就是说，并不是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而产生的“对社会的情义”，而“对名誉的情义”是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将上述这两种表达感激和报复的情义区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而日本人则说：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嘲笑或恶意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的观点就是如此。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的，都要进行回报。<sup>[2]</sup>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我们那样把他们区别成“侵犯”和“非侵犯”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被称作侵犯。只要是维护情义、洗刷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清算旧账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诽谤、侮辱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铲除，“世界就会倾覆”。一个高尚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平衡状态。这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sup>[3]</sup>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就像日语中把感谢与忠诚结合在一起进行表达一样。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志的“名誉”颇有相通之处，有些方面甚至导致了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的其他各国，只要重视洗刷污名的道德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道德观的核心就是更加



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中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就越是品德高尚的人。这本身就是道德定义的一部分，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这种做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很难从利益一损失的角度来衡量。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人们的这种荣誉观与美国人生活中的激烈竞争和公开敌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易中，对占有并不进行限制，人们会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利益而拼死争斗。<sup>[4]</sup>至于肯塔基山中居民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那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那里的名誉习俗属于“对名誉的情义”范畴。

不过，“对名誉的情义”以及伴随它而来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观的特点。这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对侮辱和诽谤感到敏感都看做是“小人”的特点，是道德水准低下的人的行为。不像在日本那样，把“对名誉的情义”看做是理想的高尚品行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开始使用暴力手段来报复，这将是错误的行为。中国人会对这种如此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他们也不会费心地用一切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证明这些中伤是毫无根据的。<sup>[5]</sup>暹罗人也不会对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当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们会让诽谤者处于可笑的境地，但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说：“揭露对方无耻行径的最好办法就是退让。”

只有将“对名誉的情义”置于日本的非侵犯性道德这一背景下，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复仇只是特定场合下这种情义所要求的道德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对一个自重的日本人而言，忍耐和自我克制是对自身名誉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呼小叫，<sup>[6]</sup>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要泰然处之。当洪水席卷整个村庄时，每个自重的日本人应当赶快收拾必需品，然后寻找高地避难，而不能大呼小叫，四处乱跑。秋分前后当狂风暴雨席卷日本本土，每个日本人也必须要有类似的自我克制。这样的行为已成为了每个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也许不能够完全做到。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对自尊不太要求自我克制。因而，对日本人而言，他们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了贵族式的“自我强制”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就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是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要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必须能够极端地容忍持刀武士的侵犯。<sup>[7]</sup>

武士忍耐力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都不值得在这里进行专门讲述。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即使他们都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吃过饭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鸟长鸣就知道它们需要食物了，而武士们则口含牙签。”在过去的战争中，这句话成了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对此的态度恰如那个士兵回答拿破仑：“受伤了？不，我被杀死了！”<sup>[8]</sup>即使死亡之前，武士也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他们要毫不畏缩地承受痛苦。据传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sup>[9]</sup>也出身于武士家庭，但从小家境破败，一贫如洗。有一次他的睾丸被狗咬伤了，被送去医院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用刀指着他的鼻子说：“一声都不许哭，否则你就会以一种可耻的方式去死。”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地位来生活。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对名誉的情义”，那他也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在德川时代，这意味着一个自重的人要将“取缔奢侈令”作为自尊的一部分来对待，这个法令详细规定了人们的衣着、财产以及用品等等。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规定人们生活的法律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取缔奢侈令”则否定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孩子买另外一种布娃娃时，美国人感到特别震惊。然而，在美国，我们使用一种不同的规定而取得了相同的结果。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下面的事实：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自尊心的一方面就是获得好的收入。布娃娃由薪金收入来决定，这并不违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有钱的人当然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有钱会使人产生怀疑，而安分守己则让人放心。<sup>[10]</sup>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只有遵守现有的等级制度规定才能建立自己的自尊。美国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就在自己书的引著中指出了这点。托克维尔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他高度评价了美国的平等制，他了解并热爱贵族的生活方式。他说：“虽然美国的这种制度有很多优点，但却缺乏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就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王子和农夫都应如此。”托克维尔能够理解日本人的这个观点，那就是阶级差别本身并不让人感到羞耻。

在对各种文化进行了客观研究的今天，人们发现不同的民族对“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人们对屈辱的定义一样。有些美国人叫嚷道：“只有我们强制推行这种平等主义原则，日本人才可能

获得真正的自尊。”他们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确实希望日本成为一个自尊的国家，那么他们就必须懂得日本人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认识到以前的那种贵族制度的“真正的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而另外一种更加优越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今天，日本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自尊，而不是依赖于别人。而且，她将以自己的方式来改进这个尊严。[\[11\]](#)

除了要求每个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外，“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履行其他各种责任。借款人或许要抵押“对名誉的情义”。几十年之前，借款人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没还清债，他也不会成为笑柄，因为日本没有当众嘲笑人的习惯。但是，在新年来临之际，所有债务必须被清偿；否则，破产的债务人只能以自杀来“洗刷污名”。至今，仍有一些人会选择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名誉。[\[12\]](#)



【图2】日本的无家可归者



在工作职责方面，也都涉及到有关人员“对名誉的情义”。在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批评的特殊情况下，日本人的要求往往是奇异的。比如，如果一个学校里失了大火，然后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其实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有烧毁的危险。<sup>[13]</sup>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地烧死。<sup>[14]</sup>他们的死，证明了他们如此看重“对名誉的情义”以及对天皇的“忠诚”。还有一些著名的故事，讲述的是有些人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如在公开场合宣读天皇诏书、《教育敕谕》或《军人敕谕》时，因为偶尔失言，竟要以自杀的方式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而误把自己的小孩也起名为“裕仁”。由于这是当今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因而他只能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儿子。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其“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苛刻的，但对它的保持却不一定是依赖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高度专业水平。教师会说：“出于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我不能说自己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何种类型的动物，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一个英语老师自己也只学了几年的英语，他也不允许别人来纠正他的错误。<sup>[15]</sup>“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指的正是这种防御性心理。对商人也是如此。“对商人名誉的情义”意味着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资金已经严重短缺，也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为公司制订的某项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出于“情义”的考虑也不能承认自己政策的失败。有关“情义”的上述内容，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任何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地转变为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这种对别人指责自己失败和无能的反应，在美国也时有发生。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会恼羞成怒。但是我们却很少会有像日本人那样的防御心理。<sup>[16]</sup>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种动物，他会觉得承认自己的无知要比自己装作知道好得多，虽然他也很想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商人们对自己的计划不满意，他会再制订新的计划。他不会认为，要保持自尊就必须坚持自己从不出错；而且也不会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防御心理却是根深蒂固的。不能当面过多地指责别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公认的礼节。<sup>[17]</sup>

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竞争失败，他对这件事就会特别敏感。比如，就业的机会被别人获得，或者自己在激烈的考试中失败，这时失败者就会觉得自己因此而“蒙受了羞辱”。虽然这种羞辱有时能够激励人发奋图强，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非常沮丧，甚至达到了危险的



程度。他丧失了信心、变得忧郁、生气或者兼而有之。他的努力失败了。因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不会发挥像在美国那样的社会作用。在美国，人们都把竞争当做是一件好事，并对它深信不疑。心理测验的结果也证明，竞争可以督促人们更出色地完成工作。<sup>[18]</sup>竞争的激励可以使工作效率提高。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一件工作，其效果不如竞争的状态下产生的结果。然而在日本，这种心理测验的结果却正好相反，特别是进入成年时，这种结果就更加明显，因为日本儿童通常并不严肃地对待竞争。对于成年人而言，一有竞争，他们工作效率就会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工作的进展就快，很少犯错误，速度也就提高了；而一旦有了竞争对手，就容易犯错误，工作效率也就下降了。如果用日本人自身的工作业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那么日本人一定会尽力发挥他的最佳状态；而如果与其他的竞争对手进行比照，那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日本研究者对这种竞争状态下不尽人意的表现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在一个项目上使用竞争的方法，那么做事的人就会注重失败，因而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竞争状态下，人们往往对对手异常敏感，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被侵犯的状态，而将精力放在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因而不能专心地工作。

接受测验的学生担心失败而蒙羞，所以受到的影响最大。正如教师、商人们实践自己“对名誉的情义”一样，学生们也十分重视“对名誉的情义”。在竞赛中失利的学生会竭尽全力来摆脱这种耻辱感。赛艇运动员会一下子扑在船上号啕大哭；输了的垒球队员也会聚在一起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人实在是输不起。美国人的礼节是，失败的一方会认为是对手更加优秀才取得了胜利，并向胜利者伸手致意。虽然人们都不愿意自己输掉比赛，但我们更看不起那种因失败而情绪失控的人。<sup>[19]</sup>

日本人擅长利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的小学尽量减少竞争，超出美国人的想象。教师的天职只是教育每一个小孩提高学习成绩，而不能提供机会让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做比较。日本小学不会让儿童重读，同年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共同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的操行，而不是学习成绩。如果竞争无法避免，例如在小学升中学时，这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每个老师都会得知自己的学生中有一些没通过考试的人试图自杀。<sup>[20]</sup>

日本人在整个生活当中都尽量减少直接竞争。在日本，建立在“恩”基础上的伦理道德限制出现太多的竞争，而美国人的最高信念就是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表现出自己的出类拔萃。日本纷繁复杂的等级

制度规定把直接的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外，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因为从日本的习俗角度看，父亲与儿子就不能像美国那样进行竞争。他们可能互相不接受对方，但绝不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在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经常会为汽车的使用、照顾母亲或妻子而发生争论，日本人是用惊奇的口吻进行评论的。[\[21\]](#)

日本人还习惯使用一个明显的方法，来防止有冲突关系的两个人发生直接的冲突，那就是利用中间人。当一个人怕做事失败而感到羞辱时，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间人。比如，在提亲、找工作、辞职以及其他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到一定作用。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间人进行详细的沟通，然后再相互通报对方的意见。如果是双方进行直接交流，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听到一些别人对自己的要求与责难，从而使自己的名誉受辱。而中间人也以他的能力获得了威望，并因为成功的斡旋而获得了社会尊重。由于中间人的努力，事情进展顺利，并且取得成功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另外，中间人还以同样的手段来帮助委托人了解雇主的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给雇主。[\[22\]](#)

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引起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问题，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制定了各种礼节，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低限度，范围不仅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日本人认为，主人在迎接客人时必须穿戴整齐，并按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因此，如果一个人去拜访农民时，发现他还穿着劳动服装，那他就得先在外边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以前，那个农民是不会接见客人的。甚至有时候，主人就在客人所等待的那一间屋子里更换衣服，他也并不和客人说话，仿佛对客人视而不见。[\[23\]](#)根据农村的习俗，男青年要在夜晚姑娘及其家人都已就寝的时候再去拜访她。姑娘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男青年的追求。但男青年都是头蒙毛巾去的，这样即使遭到拒绝，第二天也不会感到羞耻。这种遮掩并不是防止姑娘们认出了他，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他因此就不必承认自己曾受到羞辱。另外，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就是：对于任何计划，除非有足够的把握取得成功，否则尽可能不参与。就结婚而言，媒人重要的职责之一是要在双方没有确定婚约之前，尽其所能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会面。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表明了介绍的目的，那么万一后来双方谈不妥，就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相亲时年轻的男女都要分别由自己的双亲陪同，这时媒人就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安排男、女双方去参观每年一次的菊花展或樱花展，或者去著名的公园或游乐园等等，这样双方就可以是“偶然相遇”到一起的。[\[24\]](#)

通过以上及其他更多的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羞辱。虽然人们强调在受到侮辱时有义务洗刷自己的污名，但在实际当中，人们往往适当地做一些安排，尽量减少受到侮辱的可能性。这点与太平洋诸岛上其他部落在洗刷污名时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sup>[25]</sup>等地从事园艺的原始部落中，<sup>[26]</sup>人们对受到的侮辱非常憎恶，这成为部落和个人行动的主要原因。他们在举行盛大的部落宴会时，必定会让这个村子的人议论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太穷了，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还特别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了起来；那个村子的首领们也都是很愚蠢，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因而，为了洗刷自己的污名，受到挑战的村庄就极尽奢华地款待到访者。在婚姻安排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在双方交战时，敌我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定会互相谩骂一番。不管是多么琐细的事情，他们也会认为要决一死战。这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他们采取行动，并且这些部落又是深具活力的。另外，这些部落也不讲文明礼貌。<sup>[27]</sup>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遵守礼仪的模范。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礼仪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判定他们如何对必须进行洗刷名声的事情极力限制。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自己获取成功的最好动力，但日本人总是会限制这种侮辱他人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者传统的手段不能奏效时，人们才会利用侮辱。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并在十年间推行了它对英美战争的政策。然而，西方人有关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对复仇的热衷度的谈论，其实更加适用于喜欢利用侮辱手段的新几内亚部落，而不是日本人。西方人对日本战败后的举动的预测太离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对名誉的情义”上面所加的特殊限制。<sup>[28]</sup>

美国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崇尚礼仪，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随便议论别人，将之视同游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对随意的批评也小题大做。<sup>[29]</sup>日本画家牧野义雄<sup>[30]</sup>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是如何对他所受到的“嘲笑”作出反应的。在写这部传记时，牧野义雄的成年生活大多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但他却感到自己好像仍然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排行老小，自幼就受到家中无比的宠爱。在他的童年即将结束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了偿还欠债，他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牧野义雄家从此败落了下来。他的一个梦想是学习英语，可父亲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了。于是牧野就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去看门，目的是



为了学习英语。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到美国去。虽然除了附近的几个乡镇以外，他还未出过远门。

我拜访了一个自己最信赖的传教士，告诉他自己想去美国的想法，希望他能给自己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可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竟然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他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于是他们就一起在房间里嘲笑我！霎时间，我觉得天旋地转。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我在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下其中的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不够真诚，而嘲笑他人就是最大的不真诚。

我常常原谅别人的发怒，因为脾气坏是人的本性。我一般也能原谅谎言。因为人性是脆弱的，在面对困难时常常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于那些无根无据的流言飞语，我也能够原谅。因为对于别人的闲话，人难免会陷进去。

我甚至对杀人犯都可以酌情体谅。但我却无法原谅别人的嘲笑。因为人只有不真诚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在这里，我想讲讲自己对两个词语的认识。杀人犯，就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是杀害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sup>[31]</sup>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而，嘲笑别人是最恶劣的罪行。事实上，那对传教士夫妇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哭泣：“你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收拾起全部东西，背着包袱就走了。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成为一名艺术家，没想到传教士对此却不信任，他感到自己“被残害了”。因而，现在的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并证明自己有能力和美国。只有这样，他才能洗刷污名。少年牧野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是“insincerity”

（不真诚）。<sup>[32]</sup> 美国人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那位传教士的“惊讶”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标准的。但是，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意思来使用这个词语的。日本人认为那种轻视别人甚至不希望和别人争吵的人是不真诚的。这种嘲笑是荒唐的，这是这个人不诚恳的最好证明。

牧野曾说过“我甚至对杀人犯都可以酌情体谅。但我却无法原谅别人的嘲笑”。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报仇就是唯一可行的办法。<sup>[33]</sup> 现在牧野来到了美国，那么也算是洗刷了污名。但在日本传统中，如果遭到了别人的侮辱，报仇就变成了一件崇高的事情，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为西方人著书的日本作家，往往使用生动的语言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富有博爱思想的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在他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当中有可以满足



人们某种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只有报仇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sup>[34]</sup>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风俗作了比较后写道：



【图4】日本钞票上的新渡户稻造

“一些所谓的日本人的心理特性，主要是由于日本人喜爱洁净、讨厌污秽的东西。同样，日本人会受到如此的教育，那就是如果他的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了侮蔑，都要将它当做是污秽的东西和伤害，只有通过彻底洗刷申辩才能恢复洁净和愈合。不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报仇事例，人们都将其视为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正在进行的一场晨浴。”<sup>[35]</sup>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静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安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身上还沾有一点污泥，你就不再是纯洁的了。日本人不认为只要自己不觉得受辱，就不能算受辱；也不认为别人的言行不能污辱到自己。

在日本有一个传统，经常公开倡导“晨浴”式的复仇理想。<sup>[36]</sup>对此有许多事例和英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恐怕要数《四十七浪人》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编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印成了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当今日本现有文化的一部分。<sup>[37]</sup>

这类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去猜他的名刀是谁打造的。他们就此没有形成共识，等到邀请专家进行鉴别之后，只有名古屋山三郎一人准确地说出

了这把刀出自“村正”之手。另外两位家臣觉得受到了侮辱，准备杀掉山三郎。其中一个人趁山三郎熟睡之际用山三郎自己的刀刺杀了他，但山三郎并未死。此后，那个人专注于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郎杀了，实现了他所谓的“情义”。<sup>[38]</sup>

还有一些讲述了必须要向君主复仇的故事。在日本的伦理观当中，“情义”就意味着家臣至死也要对君主“尽忠”；同时，如果家臣受到了君主的侮辱，他们也会变成仇敌。第一位德川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个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意思是说他会以不体面的方式死掉，这对一个武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也不能忘记这等羞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主要忙于统一全国，消灭残余的对手。于是，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对诸侯，自己作为内应，纵火烧毁了江户，他认为这样就向德川报了仇，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义。<sup>[39]</sup>很多西方人对于日本人忠诚的讨论都不符合实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情义”对日本人而言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则变成了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反抗者”，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永远有两个主题：一种是犯了错误的人向没有犯错的人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对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君主。这两个报复的主题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中很常见，题材也是多种多样。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代日本人的传记、小说及一些事件，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但今天日本人在现实生活的复仇行为并不比西欧的多，甚至比西欧的还要少。<sup>[40]</sup>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珍视自身的名誉，而是人们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逐渐由进攻型转变为自卫型。人们仍然十分重视羞耻，但人们现在更多的是以自我麻痹来代替争斗。明治维新以前，以直接攻击复仇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当时法律还不够健全。到了近代，由于法律、秩序以及处理问题时越来越倚重经济，使人们将复仇的矛头指向地下，或者将它针对自己。人们使用一些技巧对敌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种方法类似于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主人将粪便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进行报复，使客人毫无觉察。可是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应用了，更多情况下则是把羞辱针对自己。今天，人们只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这种侮辱当做一种激励，鼓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就是使羞辱吞噬自己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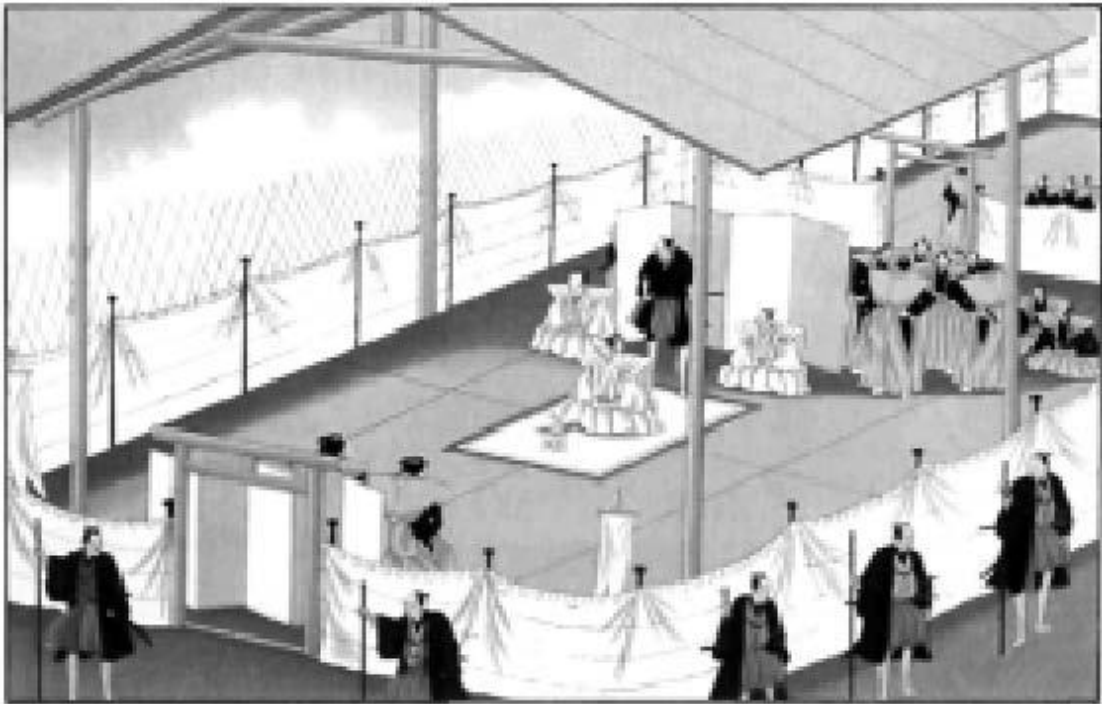
由于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等都很敏感，因而很容易恼恨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近几十年以来，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

养的日本人是如何在愤怒与抑郁之间迷失自己的。<sup>[41]</sup>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感到厌倦：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并不厌倦为命运努力奋斗，并不是说与理想的宏伟目标相比，所有的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同时，这种厌倦感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因为一旦日本人有了崇高的使命感，就不会产生厌倦感。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日本人这种特有的厌倦的原因是自身过于脆弱。他们害怕遭人拒绝，并把这种恐惧引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最后迷失了自己。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中的这种心理状态不同。在俄国小说中，主人公一切厌倦的根源在于现实与理想世界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士曾经说过，日本人没有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日本人厌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这种哲学和人生态度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日本人的这些观点与西方人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并远远超出了特定的事例，但却与日本人动辄就抑郁具有特殊的关联性。与美国的小说对照鲜明，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这样的题材。我们的小说把书中人物的悲惨命运归结于性格缺陷或残酷世界的打击，但很少单纯描写这种厌烦。<sup>[42]</sup>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作者总是让读者对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罪恶进行道德的谴责。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恐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日本的小说所揭露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在那里，人们情绪的爆发就像有毒的气体到处飘散。不论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对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以了解阴云的来龙去脉。这种忧郁的情绪来去不定，因而人们也都很容易受其影响。古代英雄通常对敌人进行攻击，而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因解释这种消沉。虽然人们有时从某些事件中找原因，但更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留下奇怪的印象，只是一种表象罢了。

现代日本人攻击自己的最极端方式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觉得用得体的方法来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并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好形象。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是彻底绝望而自我毁灭的表现。日本人认为自杀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是光荣并且有意义的行为。<sup>[43]</sup>在特定情况下，自杀是“对名誉的情义”的最体面的方式。就像在考试中失利的学生以及那些为避免被俘的士兵们一样，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那些在年末还无法还债的人<sup>[44]</sup>、那些因不幸事件而引咎自杀的官员、那些无法结合而同归于尽的恋人，<sup>[45]</sup>以及那些抗议政府推迟对中



国的战争的“爱国者”，等等，最后都将自杀这种最终的暴力行为对准了自己。有些日本权威人士声称，这种自杀倾向是日本最近出现的新事物。这很难判断。统计数字表明，观察家们过分渲染了自杀的频率。按自杀比率来说，其实十九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德国的自杀率要比日本任何时代都高。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日本人喜爱自杀这个主题，这就如同美国人对犯罪进行大肆渲染一样。与杀害别人相比，日本人更愿意自杀。[\[46\]](#)用培根的话来说，日本人就是把自杀当成某种最喜欢的“丑恶可耻的事件”，从中他们可以得到其他行为中不能获得的某种满足。



【图5】日本的切腹自杀仪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某种庆典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社会中的自杀事件似乎更富自虐性。在这些故事当中，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很大程度上是想避免朝廷不光彩的刑罚。这就像西方士兵为了不受绞刑，或者在被俘后不受虐待而宁愿被枪杀一样。[\[47\]](#)允许武士切腹自尽与普鲁士军官被允许秘密自杀是一样的。当他知道别无他法挽回他的名誉的时候，他的上级往往就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对日本武士而言，此种情况下死是必然的，只是要选择死亡方式罢了。而当代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亡。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而不是伤害别人。在封建时代，自杀表明一个人的勇气和决心；而今



天，人们选择自杀则意味着他们选择了自我毁灭。在日本过去的两代人的时间当中，每当人们感到“世界的动荡不安”、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需要用“晨浴”洗去污垢的时候，人们就越来越多地选择自杀的手段来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近代，自杀都是人们为赢得胜利而最后使用的论证手段。但在近代，这种手段也在向上述方向转变。德川时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sup>[48]</sup>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袒腹抽刀，威胁说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就要切腹。最后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顺利地继承了将军职位。这位将军监护人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不用再自杀了。用西方语言来说，这位监护人是正在用“切腹”来要挟反对派。而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再是一种谈判手段而是烈士的行为。如果他失败，或者自己反对的某些条约已经签字生效了（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选择真的自杀，而不是仅仅威胁就能奏效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是，如果自己“对名誉的情义”受到威胁，人们更倾向于攻击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要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或许仅仅产生沮丧、倦怠，及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典型的厌倦情绪。社会学能够充分解释这种情绪在这个阶层中广泛蔓延的原因。现在知识分子普遍过剩，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并不稳固，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当局觉得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很危险”，对这个阶层产生了怀疑。<sup>[49]</sup>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认为：他们的抑郁归结于西化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迷惑。但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全面。日本人通常在情绪上是摇摆不定的，都会经历一种从强烈的献身感、贡献感到极度厌倦的过程，很多知识分子就遭受了这种心理磨难的过程，日本传统的风俗中就有这样的情绪。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很多日本人也是用这种传统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厌倦的情绪。他们热衷于民族主义的旗号，把攻击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了外面的世界。通过对其他国家发动极权主义侵略战争，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情绪，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日本人坚信，虽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能摆脱厌倦的情绪，但是通过征服别的民族则可以做到这一点。

<sup>[50]</sup>

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日本人上述信念是错误的，日本人面对情绪消沉的巨大威胁。不论他们当时的意愿如何，日本人很难应对目前的现实。对外侵略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位东京的日本人说：“我们再不用担心炸弹了，这真是一个解脱！但没有战争了，我们也

好像失去了目标。每个人都茫然失措，对工作漠不关心。我和老婆也都像病人一样，一片茫然。人们都抱怨政府在战后的清理及救济工作中行动缓慢。我想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无精打采的危险程度与解放后的法国是相同的。<sup>[51]</sup>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至八个月里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日本却成了问题。美国人可以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反应；但日本人却又对战胜国如此友好，这让美国人感到难以置信。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极其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和微笑招手来欢迎美国人。这些人既不悲哀也不生气。用天皇在宣读投降令时的话来说，日本人已经接受了“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开始重建家园呢？<sup>[52]</sup>根据占领的条件，日本人有机会这样做。占领军并没有对每个村庄都进行占领，日本人掌管行政事务。但当时日本全国都在欢笑致意，都在欢迎占领军的到来，却没有人关心自己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的种种奇迹。并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全力准备军事征服，它的军队如此狂热，在太平洋上逐岛进行作战。



【图6】日本的将军们配合起盟军的占领工作来令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日本这个民族依然如故，他们是按自己的性格做出反应的。他们可能有时特别努力，而有时却又极度消沉，消磨时光，在这两种情绪中不断摇摆，对日本人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前，日本人主要关注在战败后要保全荣誉，<sup>[53]</sup>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图。对此有一种推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最安全的办法。很努力反而会招人猜疑，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成风。<sup>[54]</sup>

但是，日本人并不喜欢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日本政府经常用这些口号来鼓励人民改善生活，也是战争期间广播的宣传内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情绪进行着斗争。1946年春天，一方面是日本报纸仍在不断地宣扬“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我们”，而另一方面狂轰乱炸后遗留的废墟却还未清理，某些公共事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这对日本的荣誉是何等玷污！他们还指责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聚集起来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到他们的悲惨状况。日本人理解这些呼吁都是为了保全日本人的名誉。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都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日本在联合国赢得尊重。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却改变了。如果未来大国间能够保持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永恒的目标是名誉，这是获得他人尊重的必要条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日本人就采取新的方式，选择新的路线。对日本人而言，这不是道德问题。<sup>[55]</sup>而我们却追求“原则”，相信意识形态上的东西。<sup>[56]</sup>即使失败了，我们的观点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活动。而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外，日本人根本不需要组织抵抗运动或地下组织与美军的占领部队较量。从道德的角度讲，日本人觉得没必要坚持以往的原则。<sup>[57]</sup>从占领后的头几个月起，美国人就能够只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并无安全之忧。到达目的地后，曾经是国家主义者的地方官员还会礼貌地迎接他，并未发生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过村子时，孩子们会站在路旁高喊“Hello”、“Good-bye”。幼小的婴儿不会招手，母亲摇动他的小手，向美国士兵致意。<sup>[58]</sup>

对于日本战后态度的根本转变，美国人从表面上非常难以理解。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比了解战俘营中日本军人态度的变化还要难。因为这些日本人认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国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这些“死人”能够做什么。至于这种表面性格的变化会出现在战后日本的民众之中，这对于了解日本的西方人而言是出乎预料的。多数这样的西方人认为，日本人“只知道胜利和失败”，在



他们眼中，失败就是侮辱，需要用暴力进行拼死报复。有些人认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会使他们不愿意接受和平条件。这只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情义。他们认为，在各种保全名誉的手段中，日本人只使用复仇和侵略这两种传统的方法。他们没有想到日本还会采取另外的手段。

[59]他们把日本人进行侵略的行为准则与欧洲的侵略形式混为一谈。欧洲人的观点是，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要进行战争，首先必须相信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并从憎恨和道德义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则为他们的侵略活动寻找另外的理由：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日本看到，军事实力为大国赢得了尊重，于是日本努力和这些国家平起平坐。由于日本资源缺乏、技术落后，它必须采用比希律王 [60] 更加毒辣的手段。当日本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失败的时候，这只能说明侵略根本不是赢得荣耀的方法。情义通常包括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侵略，另一种就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时，日本人便从第一种方法转到了第二种方法，而且很明显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因为他们的目标仍旧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日本也有过类似的举动，这同样使西方人感到迷惑。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刚刚有所松动，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萨摩惨遭杀害。[61]萨摩是日本的一个藩，也是排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整个日本都是闻名的。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都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炮，[62]因而鹿儿岛的日军当然不是英国战舰的对手。[63]然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寻求报复英国人，反而是希望能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他们看到了敌人的强大，并希望能够向敌人学习。随即，他们就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一所大学。[64]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描述，“这所大学教授西方科学和知识的奥秘……两国的友谊也因生麦事件而持续发展”。所谓生麦事件就是指英国派远征军惩罚萨摩，并且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这并不是唯一的事件。在日本，另外一个好战并且有恶意排外情绪的藩是长州藩，它可以与萨摩藩相媲美。这两个藩都是煽动“复辟”势力的领导者。当时已经没有实权的天皇曾发布一道敕令，命令将军在1863年5月11日前把日本国内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无视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决定依天皇的命令行事。它从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弹药太落后，那些船只并未受损失。西方国家为了惩罚长州藩，迅速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



并摧毁了要塞。<sup>[65]</sup>这次炮击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尽管这些西方国家还向日本索取三百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诺曼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曾这样写道：“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些曾经是排夷急先锋的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根本转变。无论如何，这种决定证明了他们处事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敬意。”

这种识实务的现实主义正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光明的一面。像月亮一样，“对名誉的情义”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它的黑暗面是日本人将“美国限制移民法”<sup>[66]</sup>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sup>[67]</sup>视为对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驱使它发动了这场具有灾难性的战争。它的光明面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方式来接受1945年的投降后果。日本仍旧是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

近代日本的作家及政治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的义务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最后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更精确来讲是“武士之道”。<sup>[68]</sup>有事实能够证明这种介绍起到了误导的作用。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只是近代才出现的术语。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义的具体内容那样复杂，并且充满了矛盾。它是政治评论家们的灵感。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个概念也像名誉扫地的这些领导人一样，再也不具有什么声望了。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日本人以后就不再“懂情义”了。而是说，现在对西方人来说，是理解情义在日本的真正内涵的最关键时期。把武士道和武士阶级等同起来也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情义是针对所有阶级的美德。在日本，与其他的义务和修养一样，人的身份越高，他所承担的情义就越重。比如，日本人认为情义对武士的要求就要比对平民的要求高。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受到尊重，就获得了足够的回报。“不懂情义”的人是“可怜的”，只能得到同伴的嘲笑和排斥。<sup>[69]</sup>

---

<sup>[1]</sup> 萨评：作者反复强调“恩”在日本生活中的作用，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人，不能真正理解“恩”的真实含义。比如说到“皇恩”，中国人也讲“皇恩浩荡”，但此处的“皇恩”是和对于父母的感觉并列的。中国的文化把“天地君亲师”放在一起谈，皇帝也喜欢说“以孝治天下”。中国传统中，理想的皇帝形象是一个仁慈的白胡子老头，类似众生之父，虽然实际上很多皇帝根本没有活到成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对于君权的尊崇，但与日本不同，这种尊崇是受到约束的。西方的君主从来没有被放在最高位置，契约高于君权，“我的小屋，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的千军万马不可以进来”就是集中的体现。中国对君权

也有同样的限制，只不过这个隐隐高于君权的不是契约，而是“孝”。中国有很多历史记录，讲述某个臣子的父母亲被对方控制的时候，君主应该怎样做。比如刘备的部下徐庶因其母被曹操掳去而要求“跳槽”，刘备大度地放行被认为是真正君主应该做的事情，而徐庶的请求也被认为正当，并没有道德问题。假如刘备逼迫徐庶继续留在自己阵营，就会留下恶劣的名声。这一切，在日本则不被认同，武士碰到这种情况最多自杀，绝无可以因此投到天皇敌人阵营的道理。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和西方有一样相同的东西——凡事有清晰的界限。而中国人则比较模糊，“发乎情，止乎理”，都是没有特别量化的标准。

[2] 萨评：西方人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赎罪的，日本人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守规矩的。

[3] 萨评：在和日本人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往往会诧异于他们的“小心眼儿”，日本人往往把一件微不足道的怨恨长期记在心中，而中国人觉得“相逢一笑泯恩仇”才是人生正道。以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的入侵而言，日本人总是觉得中国人过于拘泥于历史，应该“忘记”，着眼未来，等等。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如果换到日本人身上，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了。日本人现在还在唱一首叫做《元寇》的歌，那是纪念日本人在八百年前抵抗蒙古人入侵的。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只是在日本海边上泡了几夭蘑菇就被一阵大风刮跑，大多数日本人连蒙古人的长相都没见到，就把这事儿记了八百年呢！

[4] 萨评：这种复仇和决斗的浪漫，的确应该让作者感到激动，因为这都是不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美国的西部片长盛不衰，就是因为那里面无拘无束、快意恩仇的牛仔让美国人感到痛快，和我们看武打片的感觉一样。但是正如大侠只是存在于古代，牛仔到了十九世纪末也日渐式微。相对于虚无缥缈的东西，美国人看重的更多是实惠。美西战争开始前，“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爆炸沉没（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只是一场事故）成了战争绝妙的导火索。美国一位编辑在报纸上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西班牙驻古巴的桑切斯上校策划这一阴谋的全过程。桑切斯为此怒火万丈，整理行装去美国找这位编辑决斗，却不得其门而入——在美国决斗是非法的，美国拒绝这个疯狂的家伙入境。桑切斯只好在美国国境外大骂，呼吁对方为了荣誉前来决一死战。骂了两个星期，战争爆发了。结果，视荣誉如粪土的美国人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古巴和菲律宾，光荣的西班牙人成了欧洲破落户……

[5] 萨评：中国人的习惯是如果被狗咬了可以因为它是畜生而责怪自己不小心，也可能作出抽刀把狗杀掉的激烈举动，但是，绝不会赞同像狗一样咬回去。和诽谤者过分纠缠，被认为是一种将自己降到与诽谤者同一高度的不智之举。这一点，美国人倒是有些与中国人相似的地方。记得有个篮球名星挑战飞人乔丹，战败之后不服，一路咆哮试图挑动乔丹再来一场。乔丹开始不想搭理，后来看他闹得太厉害，终于回头对他说道：再来一场？你要是赢了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说你赢了飞人乔丹，我要是赢了呢——谁知道你是谁？

[6] 萨评：至今，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麻醉辅助分娩的同时，日本的医院依然对此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担心这样做有什么副作用，而是认为女人生孩子承担痛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她们减轻痛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7] 萨评：比较典型的情况还有葬礼。在葬礼上，无论与死者的感情多么亲厚，日本人都坚决反对在外人面前哭泣。说起来，正常状态下，日本人能够放纵地流露感情的机会太少。

哭，是因为这时候该哭；笑，是因为这时候该笑。能够在自己想哭的时候哭，想笑的时候笑，于日本人是一种奢望，也许，这就是日本人喜欢喝醉的一个原因吧——在日本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喝醉了的人不受这种种约束，人们原谅他们这时候一切不合常理的举动。

[8] 萨评：据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马伦哥战役中。有个士兵浴血催马给拿破仑带来前线最新的消息，拿破仑读报告的同时问道：“你受伤了？”战士回答道：“受伤了？不！我被杀死了。”随即落马身亡。这名战士表现的精神，为各国军队所推崇。

[9] 萨评：即胜海舟（1813~1899），日本海军的缔造者，在日本近代史上堪称日本人“典范”的人物。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保守派幕府一方的重要将领——先做海军总司令，后做陆军总司令，是倒幕军最可怕对手之一，在为幕府做事的时候表现了他的忠诚和才华。但是，他又热衷维新，是幕府中的开明派，曾力促还政于天皇，明治维新的灵魂人物阪本龙马就是他的弟子，而且两人的政见毫无不同！可以说胜海舟又是倒幕的精神领袖之一。在这样的矛盾中，胜海舟在江户坦然面对来攻的倒幕军队，并成功地劝说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摄影家、体育明星、老师哥）和平交出政权，去过逍遥的生活。明治维新后胜海舟历任海军卿、枢密顾问官等职，以寿考终。这样一个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两面派，第二个印象是精神分裂。但是仔细看他的所为，又颇为合理——为天皇也效忠了，为主公也尽义了，为和平也出力了，为进步也用心了，还为日本建立了后来称霸一时的海军，虽然做事看似矛盾，又处处符合情义。胜海舟这辈子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



【图1】胜海舟，是今天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最崇拜的政治家。

[\[10\]](#)萨评：我们通常为因为财富产生的不平等而感到愤恨，但是在历史上，以财富的不平等代替出身的不平等却是人类的一个进步。因为，人无法选择出身，却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富；虽然依然是不平等，却为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打下了基础。为了争取到这样的不平等，法国付出了几十年不断的革命，英国经历了王位的反复兴废，从欧洲到亚洲染满了血腥……历史的发展中，五十步和一百步差别就是这样大。

[\[11\]](#)萨评：这段议论，很容易让人想起今天的中国。其实，今天的中国，信心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说来令人悲哀，对于自己的信心，虽然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而且被认为应该拥有的，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于天朝、原子弹爆炸前日本人对于“皇军”的盲目信心，在那个时代却多少阻碍了进步的到来。这种病态的自信阻碍了世人的目光，使他们看不到真正的世界。中国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战后重建，都可称作一种涅槃。正是因为人家的炮弹打开了门，我们的自信心遭到一次次挫折，才让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



从祖宗的荣光中清醒过来，开始学习外国的先进之处。这给一些人带来了错觉，认为只有毁灭自信，才可以接受他人的长处。这种想法其实没有看到今天中国人的自信是和那个年代不同的。一种新的信心，越来越可以在中国人的身上看到，这是一种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自信，这种信心的基石不再是对祖先的信任，而是对自己双手的信任。我们很幸运地目睹了一个中国用自己的成就重新赢得自信和自尊的时代。

[12] 萨评：日本对于债务至今实施的依然是“罪及妻孥”的处罚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他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责，比如他的配偶的财产也会被强行剥夺用于还债，工资只能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部分；他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费以外的娱乐，比如不经批准不可以出门去旅游——既然你能够省出钱来去旅游，就应该用这个钱还债。如果说这种处罚是对于借债人本人的，那么也算合理，但累及家人，不免让人想起古代的株连九族。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了这样的破产者。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法律，颇有些本来恩爱的日本家庭立即做出离婚的决定，为妻儿保住了房子和正常生活的男人只能就此流落街头，变成了日本不时可见的Homeless。当然，这样的男人是不可以再回那个过去叫做家的地方，否则全家都可能被警方以诈骗罪起诉。上一次世界杯前夕，电视上就播放过某个恋家难舍的Homeless夜里悄悄回来和妻子共度良宵，第二天被警察发现带走的新闻。我一向对日本的男性好感不多，但这一次看着那个须发邈邈的被捕者被警察挟持而去，心中却有一分难得的同情。

[13] 萨评：日本的火灾频繁，而且因传统的日本房子大量使用木头、竹子和纸作为建筑材料，死亡事故也较多。所以火灾是日本的一大灾害。可能是因为被烧怕了，在日本租房子，购买火灾保险永远是一条不能忽略的要求。

[14] 萨评：这种被称作“御影”的天皇肖像，是当时日本视作灵魂的东西。日本军舰被击沉的时候，排在抢救序列中第一位的不是伤员，而是抢救这个“御影”。当捧着“御影”的军官经过时，哪怕是正在用抽水机抢救军舰的抢险队员，都要立即停止工作敬礼，直到“御影”远去才可以重新开始。

[15] 萨评：日本人的英语是他们永远的痛。因为日语自身发音没有“R”音，所以二战前日本人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学英语的时候发音很少有正确的，却又一本正经地以讹传讹，以至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对美军进行宣传战或者情报战时因为发音而一败涂地。即便到今天，日本初级学校中英语发音正确的教师也并不多。中国的初级学校中也有很多教师英语发音不好，但是他们不在乎承认这一点，我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明确地说——我的发音不好，注意听录音。日本就不一样了，即便教师自己发音是典型的Janglish，也会“尽心尽力”地把学生教成同样的Janglish。

[16] 萨评：这是因为美国人对待成败的观念与日本人不同。美国人的观念是成败不过是事情做得好或者不好，大不了重来一次。所以美国人总是说：“Let's try!”这种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他有多少把握，不妨委婉地认为美国人在说：“我对这个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失败了，美国人也很少会承认失败，而是说：“Let's try again!”他们不屑承认失败，且认为逼人家承认失败是一种不礼貌的事情。日本人完全相反，在他们看来，成功与失败简直是可以和切腹自杀相连的严肃事情。因为在日本，成功与失败决定着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是处于上

位还是下位，其后果十分严重。于是，日本人很少肯在有把握之前去做一件事，如果说：“Let's try!”你不妨可以信任他，至少他有80%的把握。既然把成败看得如此之重，日本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强烈些也就可以理解了。

[17] 萨评：但是以我的经验，日本人又是最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一类人群，大有人人都是“小广播”的潜质。

[18] 萨评：在美国IBM公司里，很多人每天上班的时候是没有固定座位的，要自己去找一个座位，同时和总机确定自己的电话分机。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要到客户那里去，他们的座位就不会因为没有人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员工也因此总是处于亢奋的工作状态。美国人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和有益身心的。但当这一套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立即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不过后来中国雇员还是认识到了它的好处并接受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而在日本的IBM，则只有公司的牌子显示这是个美国公司了——美国人最终承认日本人的适应能力和中国人不大一样，日本人还是用日本的方式工作比较有效——奇怪，当初怎么是他们那样狂热地搞起了明治维新？答案是：日本人实在是个矛盾的民族。

[19] 萨评：日本的戏剧中充满悲剧英雄，但是在生活中，失败者被认为低人一等。当然美国人的闪光灯也追着成功者闪动，但是美国人并不觉得失败者因此低人一等，最多是觉得成功者高人一等而已。中国人与两者都不同，一般来说成功者在闪光灯闪过之后，受到的更多是苛刻的审视，这有点儿像古希腊人对于智者的嫉妒。当然中国人不会因此像希腊人那样把智者放逐或者干掉，他们只是对失败的悲剧英雄赋予更多的同情——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也可能会有失败的时候呢。将心比心而已。

[20] 萨评：这可能是作者的偏颇结论。事实上日本的小学竞争十分激烈，只不过并非表现在学习上，而是孩子们之间争夺强者地位的竞争。在日本的小学，很多时候教师放纵较为强大的孩子欺负较为弱小的孩子，因为日本的观念中强者应该受到尊敬，弱者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同情，他们受到欺压理所当然。他们应该做的是加倍努力超越强者，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教师的作用不是维护公平，而是维护这种孩子们自己建立的等级体制。这与现代文明中的人人平等和中国人的公平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日本古代耕地稀少，赋税高昂，残酷的环境迫使他们青睐于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图3】日军在战斗中被俘的人员，可以看到他们的感觉仿佛是行尸走肉，因为他们完全无法预测自己被俘后的命运，而且完全不指望得到敌人的善待。

[21] 萨评：日本的父子不可能竞争，因为他们根本不属于同一等级。就像微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职员，他说在和同事竞争是正常的，如果他说在和比尔·盖茨竞争，那就是和风车作战了。

[22] 萨评：这种做事方法使外国人与他们打交道时常常如坠五里雾中，弄不明白他们真实的态度。在与平等的或者上位的人打交道时，日本人拒绝用鲜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被责备为暧昧和模棱两可。其实这是日本人的民族习惯之一，用这种方法给双方造成更大的缓冲而已。我们翻译日文的时候，“哈伊”这个词被翻译成“是”，这在有些场合是对的，比如士兵回答军官的命令；在另外一些场合，就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和日本人谈判，当你说出一串苛刻的条件时，通常日本人的回应是微笑着说“哈伊”，“哈伊”。如果这个时候你认为他们是在赞同你的看法而认定自己的谈判手段有了突飞猛进，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人不过是表示“我听着呢，我听见了”而已，漫长艰苦的讨价还价还在后面呢。不过，如果认为日本人都是这样好脾气，那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对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日本人会很不吝啬地用激烈的语气说明自己的要求和看法。在工作中，我曾不止一次看到某位和善的搭档刚刚客气地讨论完一个问题，马上转过头去用生硬的语气责问女秘书为何还不把茶端上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面对外国人，特别是初次见面的外国人，日本人决不会态度生硬，说话的语气即便不是自甘于下，也是平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日本人对外国人有自卑感？显然不是，那是日本人在表示——“我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呢。

[23] 萨评：前面讲了，日本人总是希望和别人交往时创造最大的缓冲空间。遗憾的是日本又是个狭小的地方。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有了一个奇妙的发现——我家所住的胡同变宽敞了。事实上不过是看惯了日本狭窄的街道有了反差而已。地方狭窄又需要缓冲空间，这显然是个矛盾，只好在精神层面想办法了。于是，种种“视而不见”便应运而生。

[24]萨评：我的看法是这种时候见面对女方来说比较有利。这种场合，日本的女子习惯着和服参加活动。衣服大约也是有民族性的，大仲马就说过土耳其人穿着宽袍大袖飘飘欲仙，学了欧洲人穿制服，其形象就变成了盖好盖子的一瓶红酒。对日本女子来说，可能最能体现其美感的服装还是和服。所以相亲的时候眼前一亮，过后老觉得有被骗婚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日本男人中颇不少——毕竟生活中谁也不能老穿着和服过日子。

[25]萨评：新几内亚在太平洋伊里安岛东部，当地人以凶悍好斗著称。美拉尼西亚是太平洋三大岛链中最靠近亚洲的一条。这三大岛链分别为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仿佛是以南洋群岛为圆心扩散的水波。美拉尼西亚的主要岛屿为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斐济等。其中，美日两军曾在所罗门群岛的主岛瓜达尔卡纳尔上展开殊死战斗，是盟军在太平洋战略反攻的开始。大多数美国人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26]萨评：这是一个误会。美拉尼西亚人是岛屿渔猎文化，之所以说他们“从事园艺”，大概是因为早期澳大利亚殖民者曾大量捕捉美拉尼西亚人（称为“捉黑鸟”）在种植园充当劳动力。

[27]萨评：美拉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地区满布极其强调“骄傲”、不惜为此战争的部落。然而当地有食人风俗，直到二战后，还有酋长评论来采访的记者，说他的手烤熟了会像最好吃的香蕉——记者马上说：我的手，还是长在自己身上比较好。

[28]萨评：因此，日本人有的时候会采取“鸵鸟”的方式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事情心知肚明，就不要挑明来说。在二战中，日军在南洋的部队断粮，发生过吃人的事件，而当事人相互之间都说是“猴子肉”。日本人用这种回避的方法，避免或者至少在心理和理论层面避免事情完全脱离轨道。一切事情都在按照一定轨道运转，对日本人的“感觉”很重要。

[29]萨评：这其实并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东方民族都对嘲笑非常敏感，因为这事关“面子”，遭到嘲笑，在东方意味着失去面子，也因此无法在公众面前保持尊严和地位。而美国对此较为宽容，普遍的观念是被人嘲笑一下并不是重要的事情。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中心里面，经常有类似“杰克是个老混蛋”的话题被讨论——而这时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克·维尔奇往往就在下面听！引申一下，我们今天常常讨论言论自由这类话题，而很少有人注意“舆论”对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不同意义。而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言论自由在东方进行贯彻时，它的副作用就可能远远严重于在西方，而使它失去相当的支持。

[30]萨评：牧野义雄（1869~1956），爱知县丰田市人，以善于画以雾为主题的油画而著称。18岁时立志到欧美留学，21岁成行，就读于美国霍普金斯美术学院。在美国生活四年后，又到法国、英国学画，不但在油画方面，而且在水粉画、铅笔画方面颇有造诣。牧野在欧美生活了将近五十年，是西方较为熟悉的日本人。

[31]萨评：我的感觉，日本人对于嘲笑的确十分敏感，但是，在日本嘲笑别人并不是少见的事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前辈”训斥“后辈”，或者在公司里面男职员训斥女职员，上司训斥下级，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而日本人无一不是安之若素。这里面究竟是怎样的心态呢？我曾听一名日本工程师讲解过这个问题，他说在日本的企业里面，每个人的角色如同在家庭中一样，经理就是家长，前辈就是哥哥，男职员就是丈夫，所以，他们对于属下、后辈、女



职员的训斥和嘲笑实际上是一种爱护，后者应该欣然接受并且感谢前者的教导。难道在家中家长教训你，你还要怀恨在心吗？这道理不是讲不通，但我总是感到这道理怎么总在强者一边呢——和讨论日本的其他社会问题时一样。这里的传教士先生在牧野眼里显然没有被视为一家人，牧野也没有以高于自己的身份对待过他吧。

[32] 萨评：他的意思应该并非“不真诚”，而是“不诚恳”。

[33] 萨评：作为一个佐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日本历史学家儿岛襄的作品《日中战争》。这位博学的作者也免不了日本人的独特思维，在描述日本与中国交恶的原因时说：“同样是在中国开辟租界的侨民，中国人却因为日本人很少有汽车和付费认真而加以嘲笑。”一方面反映出日本人对“嘲笑”是很看重的；另一方面夸大了这种意识的作用，把日中交恶归罪于中方，为日本侵华找借口，以掩盖其侵华的实质。

[34] 萨评：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盛冈人，外交家和教育家，曾经担任国联事务助理并殉于任上。因为“我愿作桥梁架于太平洋上”的豪言而闻名。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的形象不佳。且不提他称伪满洲国问题为“民族自决”，单说他1900年写作的《武士道，日本的灵魂》一书，为日军在旅顺大屠杀辩解就难以让人原谅。在这本英文书中，他介绍日本的武士道，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残忍行为，称这是武士道的合理做法。此处引用的这段话就是出自此书。这位博士在日本算是倾向和平交往的典范，因此虽然功勋卓著，在军国主义期间却很少被日本人所知。今天，日本的5000日元钞票以及各种钞票上的水印，用的就是他的头像，表明了对他的业绩的一种承认。有意思的是他的头像是经过矫形的，因为这位博士习惯于向右偏头，放在钞票上不太雅观，只好进行技术处理了。

[35] 萨评：冈仓由三郎，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近代学者，长期在欧美生活，生卒年不详。1913年在伦敦发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此处的文字，就是引自此书。

[36] 萨评：日本人喜欢洗澡是有名的。一方面大多数日本人对洁净很为看重，另一方面在东亚各国人中，日本人也是体毛汗腺最为发达的民族之一，在日本湿热的气候条件下，不洗澡体味明显。有了解日本的朋友评价：“日本人爱洗澡，爱得有点邪乎，就像一日三餐必不可少。不过，假如上帝来一番恶作剧，要他们两者择一的话，我想不少人一定会舍饭而取浴。”也有的说：“在日本，你骂人家是傻瓜，人家未必生气，你若骂人家脏，那人一定与你玩儿命。这说明，洁癖成了衡量人格品质的一种价值标准，神圣不可侵犯。”在日本不洗澡被看做很可怕的事情，电影《黄昏清兵卫》里面就有一个镜头——上司在查账时闻到怪味，发现电影的主角井口没有洗澡，于是大为惊讶——身为武士，怎么可以不天天洗澡呢？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把一种卫生习惯上升到人生观的创举和灵敏的鼻子。

[37] 萨评：所谓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指的是三百年前元禄年间的事情，当时日本赤穗藩藩主浅野因为刺伤了权臣吉良侯，被将军德川纲吉训斥后自杀，赤穗藩被取消。其家臣四散，成为没有主家的“浪人”，其中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结盟为主公报仇，经过详细侦察后突袭了吉良，将其杀死并携首到井泉寺浅野墓前祭奠。不过这些武士并未当场自杀，而是随后按照商定的由大石良雄出面顶罪。最终将军还是以“这样会给以后无视律法提供先例”为由，赐这些武士切腹自尽的光荣。最后切腹的共四十六人，唯一活下来的是吉右卫门，他是这些人中

唯一不具备正式武士身份的，自然也不需要如此光荣了。在复仇完毕后即离去，寿八十四。赤穗武士复仇的事情，是日本武士道的重要题材，后来被编为《忠臣藏》广为流传。

[38] 萨评：这段史实似是而非。名古屋山三郎是日本幕府时期津山藩主森忠政的家臣，因为姿容俊美，善于用长枪，以“将军的狡狐”著称。他死于另一名森忠政的家臣井户宇右卫门之手，但双方的争执与情义没有什么关系。二人是长期的对头，矛盾深重，两个人更多的纠纷在于相互藐视，经常彼此羞辱。山三郎的死，是因为他担任建筑津山城的监督时抽刀砍井户，结果反而为刚猛的井户还击被杀。井户兄弟也被周围兵丁乱刀杀死。

[39] 萨评：这个故事在日本的文献中没有找到，但是武士们对死亡的方式极为注重是有名的。作为有荣誉的武士，最光荣的死法就是切腹，至于砍头、绞刑之类，则是下等人的死法。日本的战争中经常有武士为了谋取切腹的光荣、为避免被砍头而作出匪夷所思的让步。其实，切腹由于当时不能快速死亡，是一种很残忍的死法，而日本对于切腹还有很多讲究，比如在腹部切出的刀口、死时双腿是否并拢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日本人后来可能也被这种残忍的死法吓怕了，于是增加了“介错”这个帮忙的职务，介错的任务是在某人切腹的时候，刚一动手就一刀砍掉其头颅，以减少其痛苦。不过，还是有些日本武士选择更为古典的传统死法，比如二战中首倡自杀飞机战术的大西泷治郎，就是在没有介错的情况下切腹自杀的，历时几个小时，据说是向自杀队员的亲属谢罪的含义。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江湖好汉被俘时，表示悍不畏死大多喜欢高喊“给爷爷来个痛快的”，好像更正常一些。

[40] 萨评：也颇有日本人认为是麦克阿瑟的西化统治使日本人被异化了。中国的学者宋宜昌先生则认为，日本每次在扩张上遭到惨败，都会进入崇尚文化、柔和和顺的阶段，这并不是第一次了。

[41] 萨评：日本人是天生有悲剧情结的民族，近些年来大量出现的漫画应该说是这种情结的一个反动。然而，崇尚生命应当同樱花一样倏然开放、倏然消逝的感情和悲观厌世的思维方式，至今是日本人认为有魅力的人格。我的理解是，这和日本古代生活条件艰险、土地贫瘠、生命既缺少趣味又容易轻易失去有关系。也许就因为这种情结，日本人对死不大当回事，不论涉及的生命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42] 萨评：美国好莱坞强调一定要大团圆的结局，小团圆都不行。倒可以说，美国人天性乐观。记得有一则趣闻，说是在美国演出《浮士德》，到了结尾浮士德又要出卖良心，把甘丽诗丢在监狱里和魔鬼跑掉，观众都不干了，纷纷起立抗议。剧团只好出来解释，说剧本就是这样的。美国人回答得很简单——我们不满意，剧本不能改吗？原则问题，剧组不想让步。结果当地差点儿发生暴乱。没办法，在市长的请求下，只好大幕重新拉开，让浮士德良心发现，去救甘丽诗，然后好事成双，就差当场生俩孩子了。大孩子似的美国人才满意地散去。

[43] 萨评：实际上在世界各地，因为各种原因自杀的人都不在少数，并不以民族为限，但把自杀上升为一种艺术的，那就只有日本一家了。在日本，得到切腹自杀的机会，有时更像是一种荣誉。日本人记述切腹自杀的时候，总是着笔于切腹前庄严的沐浴，飘动的如雪白布，多半还有盛开的樱花树和秀丽的风景。在这种铺垫下武士从容不迫地完成对自己的最后一刀。在明治时代，还有武士因为外国人不相信日本人有这种近乎艺术的自杀方式而当场表演的。不过，这种艺术，在一些其他民族看来则近乎变态。

[44]萨评：我所在的公司，现在的业务有一部分是个人贷款，每到新年前后，催账部门都不敢造次。因为这个时候欠债的日本人如果还不上，情绪会很不稳定。为了避免逼出人命，只好暂停这部分业务。

[45]萨评：不过有些日本人的习惯是如果单相思不成，也会将理想中的爱人拉上一起死，比如溥杰的女儿爱新觉罗·慧生，五十年代死于日本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过问，日方的报告是两个恋人自杀。而后来的资料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单相思后杀人自杀案件，慧生是被所谓的恋人大久保武道用手枪打死的，然后大久保武道又开枪打死了自己。尽管案件早已真相大白，从科学上证实了是他杀，但日本方面一直称其为“殉情”。其原因很耐人寻味。第一，他们认为“殉情”是比杀人自杀远为完美的结局，所以宁可鸵鸟式地接受与科学相反的结论（和很多普通日本人拒绝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接受思路如出一辙）。第二，他们认为人死一切罪过都可以被原谅，所以即便是大久保杀人，他已经用自杀赎清了罪，所以不应该再“损害他的形象”了。

[46]萨评：其实很多其他民族也讨论自杀的光荣，特别是军事方面，往往推崇将士宁死不屈。在中国，于家国之战中宁死不屈的军人的确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但内战中投降也没有人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远到杨再兴，近到吴化文，无一不是降将，也不妨碍他们此后在军中做出一番事业。而日本武士即便在内战中也不可接受被俘的屈辱。要求任何战场都要准备自杀的军事准则不是没有，比如越南古时的“大叻武德”，就要求战士无论什么战场都不得被俘，在最后时刻要自尽以满足武德的要求。然而，尽管理论上毫无问题，实践中却很少有人去做。只有日本人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这种看来生硬的道德要求，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日本人拗起来，可以做出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47]萨评：与中国的习惯相反，中国认为绞刑无疑比砍头要仁慈一点，好歹留下了全尸，而砍头也胜过类似腰斩的切腹。这件事上，与其说是日本人更加刚烈，倒不如说中国人更现实和尊重生命一些。

[48]萨评：即“将军传育役”，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托孤大臣兼太傅的角色，是负责教育下一代将军的官员。

[49]萨评：这是作者把日本对于人生观的传统思维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危机合在一起谈了，容易引起误会。日本传统的人生观是蔑视生命的，生命的存在是为了“大义”，一旦失去“大义”，生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时候其他民族的人可能会萎靡不振，而日本人选择自杀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们觉得生命犹如樱花，或灿烂，或凋谢，而不认为苟活有吸引力。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有影子——很多日本人的生命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以外就会茫然。所以失业对日本人的打击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人失去职业以后，还有家庭的生活可为慰藉，而若干日本人工作以外是没有生活概念的，对他们而言失去了工作等于整个天都塌了，只好自杀了事。

[50]萨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膨胀的野心作用于爱走极端的日本民族之上，就产生了不自杀就杀人的两极现象。

[51] 萨评：确切地说，二战结束时其实英国更接近日本。英国虽然是战争的胜利国，但是战略上却从全球的霸主日不落帝国之一沦为了美苏之间的缓冲，成为二等强国；日本则战败后失去了所有侵略所得，成为被占领国。两个国家的人在战后初期的萎靡不振、无所适从是相同的。不过日本人的萎靡不振还有另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一个压在头顶的军国主义政府以后，普遍在等待新的主人给自己下达指令——正是迎合了这种心理，麦克阿瑟在日本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大约是世界占领军历史上最轻松的太上皇了。

[52] 萨评：日本人没有重新开始建设家园，一方面因为他们对于失败具有和所有人类共同的感受——颓唐、失望、萎靡不振，日本著名的“红白歌会”和“成人节”就是这个时代被建立起来以鼓励日本人重新振作的；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战败建立了和占领军的等级关系，既然日本败给了盟军，那就说明盟军比自己高明，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充满信心地等待占领军提供指示，来开始新的生活——那无疑是比自己摸索着干更为可靠的。



麦克阿瑟是击败日本的盟军重要将领，但因此获得了崇拜强者的日本人的最大敬意。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在官邸前挤满了自愿前来祝贺和一观将军风采的日本人。



[53] 萨评：显然日本人是想赢得“最好的战败国”称号。

[54] 萨评：他们无所事事，是因为没了上面发令的，日本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无所事事怎么办？他们也始终没有很好地学会享受生活。

[55] 萨评：我曾惊讶于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中僵硬呆板的日本人为何又能够产生“遣唐使”，明治维新和战败后干脆利落地倒向亲美。只有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理解。以日本人的本性，他们的确是很难变通的，然而，他们的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从心底对强者的崇拜。“遣唐使”、明治维新和战败后干脆利落地倒向亲美都有这种对强者折服的心态在里面。二战后，美军在日本可谓横行，各种犯罪事件比比皆是，而日本做得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可要顺从得太多了，并且以此为美德。盖因为战败之后，日本认可了美国是高于日本一等的国家。当初与美国打仗则是因为认为美国人不过是“白鬼”，日本不弱于美国。按说，这种情况下双方可以平等相处。不幸的是，二战后的日本，在传统等级制的作祟下只能承认自己不如人，或者自己压倒别人，却完全不会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日本对于驻日美军和美国统治日本出现反抗思维，要到“草帽歌”被传唱的时代，其主体则是在战后接受西方观念的新一代日本人。他们对于强者的崇拜已经不如先辈，而有了更多的个性。

[56] 萨评：其实这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比较接近，都认为万事大不过“理”字。即便小布什打伊拉克，他也要找一个理由才能去做，否则在美国国内不容易得到支持。而日本并非如此，打弱者，日本认为是强者的权利。

[57] 萨评：地下抵抗组织中，最精彩的是挪威的“米罗格”，曾经和英国特种兵合作发动了对德国重水工厂的奇袭，使纳粹德国失去了制造原子弹的机会。说起来，地下抵抗最弱的反倒是纳粹德国，然而他们也有“秘密铁路”，将很多纳粹余孽送出国外，逍遥余生。而日本没有这样的组织，大部分的顽固分子在抵抗和自杀之间，都选择了后者。因为抵抗是违背他们与天皇的等级关系的，投降又接受不了，于是只好自杀。

[58] 萨评：如果看当时的照片，甚至那些得以受到美军任用的警察和宪兵也意气风发，那种发自内心的愉快，显示他们真正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59] 萨评：确切地说是有以臣服于强者为荣的习惯。

[60] 萨评：圣经中以暴虐著称的犹太王，统治时间为公元前后，大约是中国王莽篡汉和西方凯撒进行权力战争的时代。东西方的历史，这一段都充满战乱和暴虐的记录，若换作今天只怕有人要宣传“千年世纪末大灾难”了。希律王曾杀妻杀子，并试图杀死耶稣。

[61] 萨评：这一事件发生在横滨鹤见区的生麦村，因此被称为“生麦事件”。这是一个很有日本特色的事件。当时，萨摩藩主岛津茂久的父亲岛津久光的队列从此地经过，因路上四个骑马的英国人横穿队列，其护卫武士奈良原喜左卫门和海江田信义与之口角，当即砍死其中1人，伤2人。经过调查，实际上英国人当时已经在极力向路的一边避让，只是因为道路太狭窄，马匹失控才发生了这个事件。而发生这个事件的直接理由有些不可思议。原因是这之前岛津的队伍与美国领事馆的官员班立德相遇，班立德驻马并在路边脱帽致敬，使武士们产生了西洋人见到日本“贵人”就应当如此行礼的概念。假如没有班立德行礼在先，萨摩的武士也不会

认为理查森的横穿队列为“失礼”而引发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向幕府及萨摩藩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于次年派舰队炮轰了萨摩藩。

[62] 萨评：今天在日本靖国神社还保留有葡萄牙提供的“佛朗机炮”，就是当时使用的武器。

[63] 萨评：事实上这次事件中，萨摩方面唯一的亮点是曾经派武士化装成卖西瓜的登上英国军舰寻机放火。这个被派去的武士就是后来日本陆军名将大山岩，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日军陆军总指挥，后担任日本陆军大臣达十年之久。

[64] 萨评：即开成所学校，1863年由幕府的原有机构扩建而成，后来成为日本幕府的留洋预备学校。今天的东京大学就是由它发展而来。

[65] 萨评：在这个事件中，又一个日本名人登场了——伊藤博文，他从正在留学的英国赶回来试图调停战争（他在一年前留学前夕还在策划火烧英国领事馆）。但是双方已经无法避免一战，结果日军大败。

[66] 萨评：指美国1924年通过的《排日法案》，日本人对美国人这个法案的愤怒在于美国显然还是没有把日本当做和欧美一样“穿燕尾服的绅士”。

[67] 萨评：伦敦和华盛顿两个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实际上是列强因为被军备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相互妥协而已，并不是有意针对日本。但是日本却认为这是对它的压制。原因是其他国家看来，日本每年把国民收入的30%用于制造军舰，经济上显然苦不堪言，会引发人民起义的，而日本人却安之若素，并没有觉得这不正常，所以，日本自己并没有裁减海军支出的压力。

[68] 萨评：日本的武士制度实际上在长州炮击外国舰船时代开始崩溃，因为当时的维新人士高杉晋作组织了不论出身的奇兵队来作战，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军队的雏形，传统的武士军团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这支不论出身的近代军队，其教育宗旨却与武士并无多少区别。平民士兵因为获得了和“武士”同样的军人身份，提升了自己的社会等级而倍受鼓舞，因此自觉地按照“武士道”来要求自己，反而成为比武士更加严格的武士道徒。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被压迫阶级的理想一定是推翻压迫阶级，现实中，很多被压迫阶级的想法却是改变身份进入压迫阶级，日本的武士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69] 萨评：“自己的世界”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在很多日本人眼里，外国人犹如外星类人生物，所以做事做人只要于日本人之中被理解就足够了。

## 第九章

### 人情世故





美国对于日本感到吃惊的一点是其男女地位的极不平等，为了改变这一不符合“普世真理”的现象，美国方面也作了很多努力，比如培训女警察就是从战后开始的。

像日本人的这种强调义务的极端回报和自我克制、始终将个人欲望视为罪恶并希望从人类内心深处根除的道德观，与古典佛教的教义是相同的。但令人惊异的是，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却给予了特别的宽容。虽然日本是世界上佛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一点上，日本的道德伦理显然与释迦及佛典是对立的。日本人对自我满足并不谴责，他们不是清教徒。<sup>[1]</sup>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件好事，并且值得培养。他们追求并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有分寸，不能影响人生的重要事务。

这样的道德准则使生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印度人比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日本人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认为享乐不需要学习，拒绝感官上的享乐实际上是抵制已知的诱惑。但是，感官与责任义务一样，也是需要学习的。世界上的很多文化都没有教过人们如何去享乐，因而人们很容易专心于自我牺牲的义务。在有些国家，两性之间的肉体关系也被减少到不会影响家庭圆满的最低程度，这些国家对家庭圆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在日本，一方面人们培养肉体上的享乐，而另一方面又设立道德准则，不允许把享乐当做严肃的生活方式而沉溺于这种生活。因此，日本人的生活就变得复杂了。日本人只是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当品尝完其中的滋味以后，人们必须全力献身到义务的履行之中。<sup>[2]</sup>

洗热水澡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简单的肉体享乐之一。从最贫穷的农民、最卑贱的仆人，到富有的贵族，每天傍晚都会到滚烫的热水中去泡泡，这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sup>[3]</sup>最常见的浴盆是一个木桶，下面用炭火把水温加热到110华氏度或更高的温度，人们在入浴以前首先将自己的身体洗净，然后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放松。他们在桶中抱膝而坐，就像胎儿在母体中的姿势一样，让水漫过下颚。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每天洗澡也是为了保持清洁。但有一点世界上其他国家洗澡习惯无法比拟的是，日本人在洗澡的过程中添加了另一番被动放纵的艺术情调。他们说，年龄越大，情调越浓。<sup>[4]</sup>

有各种办法来降低洗浴的成本和不便，但洗澡是必不可少的。在城镇，有的公共浴池大概有游泳池那么大，人们可以去那里洗澡，浸泡在那里，偶尔还能遇到自己的邻居。在农村，妇女们轮流在一家院子里烧洗澡水，然后每家人再轮流洗澡，即使洗澡时被人看见人们也

不在意。几乎所有的家庭，即使是大户人家，洗澡也讲究严格的次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用人。洗完澡后，身体的颜色像龙虾一样红。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共享每日晚餐前最轻松的时光。<sup>[5]</sup>

日本人不仅把洗热水澡视为人生的一大享乐，传统意义上的“锤炼自己”就包括极端的冷水浴。这种习惯通常被称为“冬炼”、“冷水洗身锻炼”，现在的人们仍旧使用这样的方法，但形式上已与传统大不相同。从前，人们必须在黎明前动身，然后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下开始洗浴活动。在冬天的夜晚，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即使往身上泼些凉水也是一种相当的苦行。<sup>[6]</sup>帕西瓦尔·洛厄尔记述了这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习俗。那些渴望获得治疗疾病或预言的能力而又不想去当神官的人们，往往会在就寝前进行冰冷的苦行。凌晨二时是“众神洗浴”的时刻，因而这些人会在这个时候再洗一次冷水浴。早晨起床、中午及日落时分都必须重复做一次冷水浴的锻炼。那些热衷于学习一门乐器或其他为某种职业做准备的人，也对这种洗冷水澡更加钟爱。还有，人们为了锤炼自己，会把身体暴露于严寒之中。对于那些练习书法的孩子们来说，这种锻炼方法更有效果，哪怕手指会冻僵、长冻疮。现代的小学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日本人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意志，使他们能够忍受未来人生的各种苦难。西方人可能都对日本孩子们经常感冒和流着鼻涕印象深刻，那是习俗使然。<sup>[7]</sup>

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大嗜好，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不论是任何姿势，也不论是在任何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入睡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完全放松地睡觉。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人看来，失眠是精神紧张的一种症状，而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但他们居然也能轻易地就熟睡过去。他们睡觉很早，这在其他东方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日本村民们日落不久就睡觉，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是为了明天积蓄精力，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一位对日本深入了解的西方学者写道：“到了日本，你就不能再认为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这不是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必须把睡眠与恢复体力、休息、消遣等问题区别开来。”睡觉就如同建议去工作一样，是“独立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已知的生死之事无关”。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睡眠是为了保持体力，我们早晨起来就计算昨晚的睡眠时间。计算的结果将告诉我们白天有多少精力和多大的效率。日本人睡觉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喜欢睡觉，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就会选择高高兴兴地去睡觉。<sup>[8]</sup>

类似地，日本人又能毫无保留地牺牲睡眠的时间。准备应考的学生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根本不去想睡眠使他们取得好成绩。军训时，睡眠只能完全服务于训练任务。曾于1934年至1935年在日本陆军部队工作的杜德大尉在谈及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在平日的演习中，部队往往都是“连续三天两夜地行军，只会有十分钟小憩和短暂的休息时间。有时士兵们是边走边睡觉。有一次一个少尉走路的时候熟睡了过去，撞到了路边的木堆上，把其余的人都逗笑了。”即使最终回到兵营，士兵们还是不能去睡觉，他们还会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睡觉呢？’上尉回答说：‘噢，不行，这没有必要。所有的士兵都知道如何去睡觉，我们需要训练他们如何保持清醒。’”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在睡觉上的观点。

如同取暖、睡觉一样，吃饭既是一种享乐式的放松，又是可以当做一项需要严格训练的项目。作为一种休闲的方法，日本人热衷于烹调各种菜肴，而每道菜只取一羹匙大小的菜量，并对菜品的外观和味道进行品评。<sup>[9]</sup>但有时又强调训练。就像埃克斯坦引用的一位日本农民的话那样，“日本人的美德之一就是快吃和快拉”。“人们不认为吃饭是件重要的事情……它只用来维持生命而已。因此，吃饭应当尽量快。对小孩，尤其是男孩，人们总是催他们快吃。这点与欧洲人不同，在那里人们总是叫小孩慢慢地吃。”<sup>[10]</sup>在佛教寺院中僧侣们学习佛教教义，并受到训练。他们将食物看做是药物，对于正在修行的人来说，吃饭只是一种必需，并不是一种享乐。

日本人认为，强行禁食是检验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法。像放弃温暖和睡眠一样，绝食也能够说明一个人能够“经受苦难”，就像武士们“口含牙签”那样。<sup>[11]</sup>如果能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人们不会因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体力下降，反而会因精神上的胜利而获得提高。美国人认为营养与体力是一对一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正因为如此，东京广播电台才会对战时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体操可使饥饿的人变得强壮，并且精力充沛。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尽管它与日本人对婚姻、家庭所负的义务截然相反，但这种现象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和法国的文学作品一样，这类书的主角往往都是已婚者。恋人同归于尽也是日本人最喜欢阅读和谈论的主题。<sup>[12]</sup>十世纪的《源氏物语》就是这样一部描写爱情的杰出小说，它与同时代世界上的其他类似著作相比毫不逊色。<sup>[13]</sup>封建时代的大名及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具有同样的浪漫色彩，这还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在这一



点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对浪漫的爱情和性爱的愉悦的低调处理，为他们省却了不少麻烦，也让他们的家庭生活平稳。<sup>[14]</sup>

在对待爱情和性方面，美国人要比中国人更加理解日本人，但理解却不深刻。我们在性的享乐方面有很多禁忌，日本人则没有。日本人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道德约束，但我们却相反。日本人认为，“性”和其他的“人类本性”一样，在次要的角度来讲就是好的。

“人类本性”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确立伦理道德。而英美人则认为一些日本人珍藏的画册是淫秽的，<sup>[15]</sup>也认为艺伎与妓女集中地的吉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甚至在最初接触西方人之时，日本人就对国外的批评非常敏感，因而通过了一些法律，使本国的这些风俗更接近西方的标准。<sup>[16]</sup>但是，任何法规也无法消除这种文化差异。

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清楚，一些被英美人看来不道德和淫秽的事情，对日本人而言却无所谓。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传统观念和他们的某种认为“人情”不能影响“人生大事”的信条<sup>[17]</sup>之间有巨大差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很难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的态度，这是个主要原因。日本人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爱的享乐划分得清清楚楚，两个范围都是公开和坦率的。在美国生活中，只有夫妻生活可以公开，而另一种生活则只能避人耳目。他们对两者之所以进行划分，是因为前者属于一个人的主要义务范围，而后者则处于次要的消遣位置。这样一来，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就可以“各安其位”了，对家庭中的理想父亲和寻花问柳之徒都合适。日本人与美国人不同，前者的理想并不是将恋爱与婚姻等同起来。我们认同恋爱，是因为它是选择配偶的基础，“相爱”才是最被认可的结婚理由。结婚以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关系，那就是对自己妻子的羞辱，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予了别人。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在配偶的选择上，他们大多服从家长的意见，盲目地结婚。夫妻二人也要遵守一些繁琐的礼节。即使是很融洽的家庭，孩子们也很少看到父母间比较亲密的行为。正如一位当代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中所说：“在这个国家中，结婚的真正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除此以外，其他任何目的都歪曲了婚姻的真正意义。”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日本男人就将自己局限在这样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之中。如果他有钱就可以包养情妇。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男人不能把令自己着迷的女人带到家里。<sup>[18]</sup>如果那样，他将把两种本应分开的生活范围混为一谈。当然，情妇可能是艺伎，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娱乐技艺的女子，或者就是妓女。不管是哪一种女人，如果想找情妇，日本男人都必须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



约，以保证那个女人不遭遗弃，并且能得到相应的报酬。日本男人要为他的情妇另觅新居。只有当那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为了让这个小孩与自己原来的孩子一起接受抚养，可以破例地把那个女人接回家来。但进门后，这个女人不能做妾，而只能当用人。她生的小孩称原配夫人为“母亲”，与这个情妇的母子关系并不能够得到这个家庭的承认。<sup>[19]</sup>中国传统的东方式一夫多妻制在日本显然是不存在的。<sup>[20]</sup>日本人将家庭义务与“人情世故”在空间上也进行区分。

只有上流阶级才有能力包养情妇。多数日本男人只能有时找艺伎或妓女玩乐。而且，这种玩乐是完全公开的。日本的妻子还要为夜晚出去逍遥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也可以将账单送给妻子，而妻子也理所当然地照单付款。当然，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是自我烦恼罢了。一般情况下，找艺伎的花费要比找妓女更昂贵。而与艺伎玩乐一晚的费用并不包括与艺伎们发生性行为的支出，<sup>[21]</sup>而只包括享受身着华丽服装、举止得体、训练有素<sup>[22]</sup>的美女热情款待的服务费。如果想获得某一艺伎，男的就必须成为她的保护人，并签订契约，规定这位艺伎是他的情妇；或者是男性的魅力敲开了艺伎的芳心，从而自愿献身。当然，与艺伎共度良宵并不排除色情的事情。因为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具有传统的暗示性，并且有意表现上层妇人们所不具有的风情。这些都是“人情”的事情，是对“孝道”的一种解脱。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于其中，但这两个领域必须区分开来。

妓女都住在政府许可的妓院。有的人在与艺伎玩乐之后，如果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去找妓女。<sup>[23]</sup>由于找妓女的费用少，没有多少钱的人都宁愿放弃艺伎，而到妓院去放松、享乐。妓女的照片都挂在妓院的门口，男人们通常长时间地公开对每张照片进行品评，再做挑选。和艺伎比起来，妓女们地位低下，身份卑微，大都是因家庭贫穷而被迫卖给妓院，她们不像艺伎那样受娱乐训练。在日本未意识到西方人批评自己的风俗并废除旧习俗之前，妓女往往要亲自坐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情冷漠地由客人挑选他们的。而之后才改作照片的形式。

男人可以挑定一位妓女并与妓院签订契约，成为她唯一的客人，并且使这个妓女成为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妇女受合约条款的保护。然而，有的男人或许会在不签订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变为自己的“情妇”，而这样的“自愿情妇”是不受保护的。<sup>[24]</sup>她们很可能认为是与自己的伴侣恋爱，可是她们不能被纳入“义务”的范围之内。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认为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具有一样的性质。

同性恋也是日本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日本古代，同性恋是上层人物像武士、僧侣所容忍的一种享乐方式。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赞许，日本政府宣布许多旧习俗为非法，同性恋也属于应该被法律惩罚的风俗。然而，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用道德标准来约束它是不适当的。只要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不妨碍家庭关系就行了。<sup>[25]</sup>因此，不要认为会出现西方人所说的那种男、女“变成”同性恋的危险，虽然日本男人也可以选择成为职业男性艺伎。在美国有些成年人被迫成为同性恋者，日本人感到特别震惊。在日本，成年男人通常选择男孩作为同性恋伙伴，<sup>[26]</sup>因为他们认为成人扮演被动的角色是非常有损尊严的。日本人有自己的界线，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而不失自尊，只不过这种界线与美国人的不同。

日本人也并不认为自淫性质的享乐是什么道德问题。没有其他民族像日本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对于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谴责，日本人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但他们自己从来不认为这些工具是罪恶的。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反对态度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烈。我们在成年之前就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男孩听到别人悄悄说手淫使人发疯、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们从孩提时代就对小孩严加看管，如果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地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她或许会说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幼儿和少年没有这种经历，因而他们长大后也不会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态度。日本人从来不觉得自淫是一件罪恶的事情，<sup>[27]</sup>而是当做一种享乐。日本人认为只要在高雅的生活中将其置于次要的位置，就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充分的控制。<sup>[28]</sup>

酗酒是日本所允许的另一种“人情”。当听到美国人发誓要禁酒时，日本人觉得这是西方国家的奇特行为之一。对于我们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享乐，只要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而且它只是一种次要的放松方式，因此正常的人都不会沉溺于它。按照日本人的想法，不必担心变成酒鬼，<sup>[29]</sup>就如同不必担心人们会“变成”同性恋一样。采取强制措施防止醉酒也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公众都并不厌恶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行为粗鲁，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打自己的孩子。通常的表现就是狂饮，不拘于日本严格礼节规范。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膝盖上。<sup>[30]</sup>

传统的日本人还严格区分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一旦某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了。<sup>[31]</sup>他已进入另一个“圈子”

了，对饮酒和吃饭进行区分。在家中，人们有时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边饮酒边吃饭，而是按次序享受这两件事情。

上述日本人关于“人情”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西方的哲学认为身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当中不断地决一雌雄，而日本的上述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哲学中的这个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的，尽可能进行肉体享受不是罪孽，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个力量。日本人遵守这个信条，并得出一个逻辑结论：世界不是善恶的战场。<sup>[32]</sup>正如乔治·桑塞姆爵士写的那样：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辨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意解决这些恶的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对把恶看做是人生观进行批判。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顺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之间的斗争。每个人、每个民族一生当中都应当有“温顺”和“粗暴”的时候。哪个灵魂进地狱，哪个灵魂上天堂，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很明显，甚至日本的神也表现出善恶的两面性。在日本最著名的神是素盞鸣尊，<sup>[33]</sup>他是天照大神（女神）<sup>[34]</sup>之弟，是“敏捷而冲动的男神”。如果在西方神话中，他一定会被视为魔鬼，因为他对自己的姐姐行为极其粗暴。天照大神对素盞鸣尊到自己房间的动机表示怀疑，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在房间里行为放荡，在天照大神的饭厅里四处泼洒大粪，而当时天照大神与她的信徒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甚至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个滔天大罪。更可怕的是，他居然在他姐姐的卧室屋顶挖了个窟窿，把剥了皮的斑驹从这里扔了进去，这是最严重的罪过，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由于素盞鸣尊罪不可赦，受到了众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了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在日本的众神当中，他仍然是一位特别招人喜欢的的神，人们还是对他表示了应有的崇拜。虽然在世界神话中这样的神并不少见，<sup>[35]</sup>但是比较高级的伦理性宗教却排斥这种神。因为将超自然的东西划分成黑白两个集团，更适合善和恶的宇宙斗争。

日本人始终没有明确地承认，美德也包括同恶行进行斗争。正如日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一直所说的，这种道德规范与日本的道德规范是背道而驰的，并宣称这就是日本民族的道德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确立一种道德规范，将“仁”提升到一定程度，即公正和慈爱的行为，并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凡是有缺点的人或行为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sup>[36]</sup>十八世纪的神道家本居宣长<sup>[37]</sup>曾说，“这种道德规范适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近代的佛教家及民族主义者们也就这个同样



的话题著书立说。他们说，日本人天生善良，值得信赖，没有必要再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战斗。人们只需要擦净心灵的窗口，并在各种场合举止得体。如果允许自身受到“污秽”的影响，日本人也会尽快地将其清理干净，这样人性中的善会再放光芒。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相比，日本的佛教哲学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当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受到启示和单纯的心灵。那么，何必怀疑自我的发现呢？心灵中的恶不是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看哪！我在邪恶里成长，母亲怀胎时我就有了罪。”日本人则没有这种神学，他们也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是上天的祝福，不应遭到谴责。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该对它进行谴责。<sup>[38]</sup>

当美国人听到这些后会认为，这些学说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将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追求幸福是人生的重大目标，这样的思想使日本人感到惊讶，并认为是不道德的。<sup>[39]</sup>当能够沉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放松；如果提高它的地位，用幸福来判断国家和家庭，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早已预料到，人们在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时，要常常经受磨难。这样虽然会使人生艰苦，但日本人对此已有所准备。他们经常放弃一些自己觉得并不是罪恶的享乐，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立场相一致，日本小说和戏剧中也很少见到“幸福的结局”。美国的观众渴望看到一种圆满的结局。他们希望并相信剧中人以后生活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如果美国人不得不在戏剧结束后哭泣，一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陷，或者是他成了邪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喜欢看到主角一切幸福如意。<sup>[40]</sup>日本的观众则含泪看着命运导致了男主角的悲惨结局，以及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当晚欣赏的高潮。人们去看戏就是为了欣赏这种故事。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深爱对方，却又不得不放弃所爱的人；或者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适当的义务；或者是，妻子专心于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鼓励丈夫磨砺才艺以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于城市当中，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日本的电影不需要有一个欢乐的结局，而只希望能够让人们对于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表示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裁判，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为履



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代价，任何事情——遗弃、疾病或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确的道路。[\[41\]](#)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了这种传统。凡是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都会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片。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电影全部的内容都是关于牺牲与战争的苦难，没有强调阅兵式、军乐队，没有傲慢地展示舰队演习和巨炮等等。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七七事变”，都是单调的内容：泥泞的道路和行军，鏖战的困苦和胜负未卜之类。[\[42\]](#) 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场景，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夜宿中国平淡无奇的小镇，深陷泥泞。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后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瘸子、盲人等残废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中人集聚在一起哀悼丈夫、父亲这些生活的支柱，并团结起来，继续生活。日本电影中看不到英美“骑兵队伍”电影中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有关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的故事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战争的目的也不涉及。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在竭尽全力报恩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拍电影的人知道，这些电影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俺は、  
君のため  
にこそ  
死にいく

【图4】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导的电影《我为君死》海报，片尾自杀飞机驾驶员全部撞美国军舰死光，算是这种审美观的充分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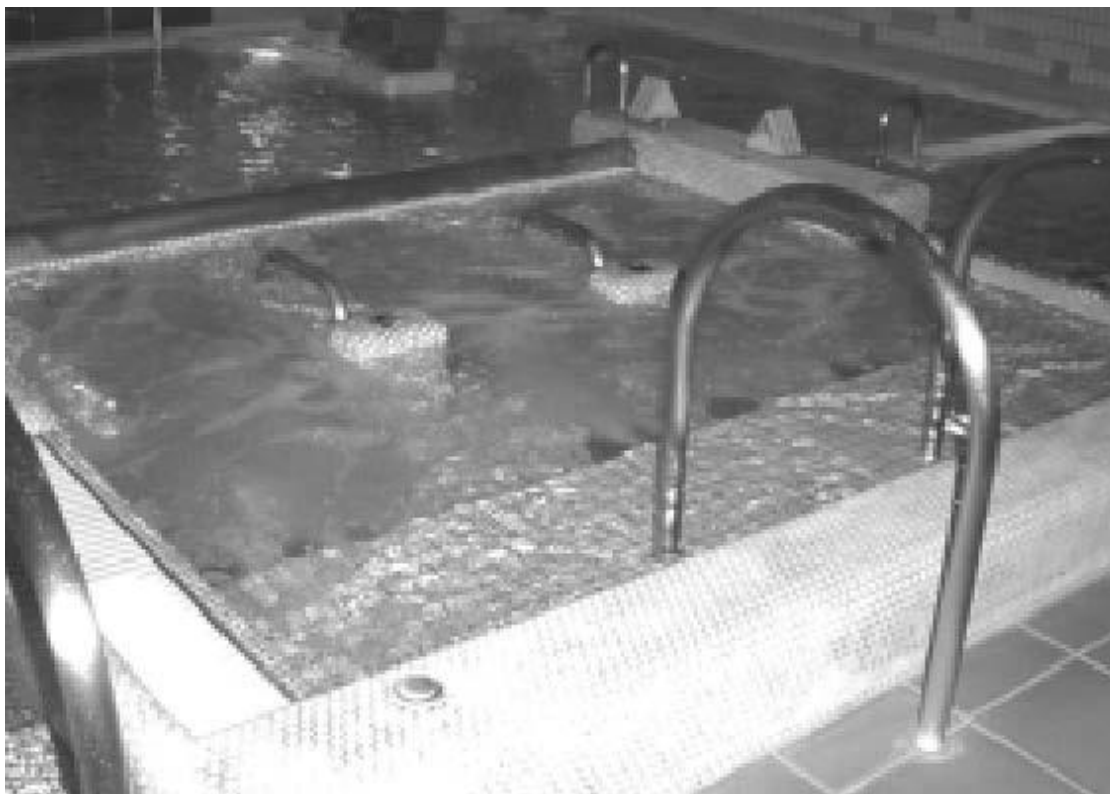
---

[1] 萨评：清教徒是欧洲基督教的分支，因为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和禁欲而著称。在欧洲，他们曾经遭到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出逃美洲大陆，成为早期美国移民的祖先。在我们的

印象中，美国人应该是“纸醉金迷”而没有信仰的民族；而到美国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看法与此迥然不同，从下层来说，美国长期是一个清教徒国家。这也是美国社会若干道德准则的最初出处。清教徒的原则，至今对美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 萨评：以我对日本的了解而言，日本人对于感官享受的追求是毫不掩饰的，而且十分强烈。比如对好酒，日本人很少有节制的概念，对于性的欲望，则发展出各种令人咋舌的变态行为。然而，这种对于感官的享受，日本人认为只能限于满足感官的原始需要。谈到“享受生活”，日本人是没有也不主动支持这个概念的。

[3] 萨评：日本人称为“风吕”，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享受。



【图1】日本的风吕温泉，很容易让人想起五星级宾馆的游泳池。

[4] 萨评：日本人喜欢洗澡，这和日本国家的地理情况有些关系。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却有大量的温泉——这是日本的大量火山给日本人带来的好处。于是，洗温泉就成为日本一项极为普遍的奢侈活动。不过，温泉虽然多，毕竟不能达到每家都有，于是在自己家弄个大木桶当做温泉，坐进去浮想联翩，仿佛在山间温泉中享受一样，就成为日本普通人的一种休闲方式了。

[5] 萨评：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这种在院子里公开沐浴的情况了，据说是麦克阿瑟最终以“文明”的名义戒除了日本人的这个习惯。面对这个征服者，日本人也就乖乖顺从了。有趣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也有在院子里洗澡的习惯，就是芬兰。带客人去洗澡是芬兰人的一种

待客方式。然而，芬兰人洗澡的源头却不是日本人那种享受的思想，而是要用冷热交替的方式锻炼体格，抵抗寒冷。

[6] 萨评：二战中的日本士兵就有这样的训练，正常情况下日军不提供热水给士兵洗浴，更因此教育日兵说美军的精锐部队海军陆战队都是用钢丝刷子擦身的——日本兵深信不疑，及至被俘后在美军兵营洗热水澡，还感到十分奇怪。看了日军如此训练影片，中国人的反映毫无钦佩之意，而是——“日本的男人，就这样被训练成了野兽……”

[7] 萨评：刚到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小学生冬天依然短裤短裙深感震惊，问他们：这是为了锻炼意志吗？答曰：不全是，民族习惯。日本古代很贫困，布帛粮食都缺乏，所以养成了节俭的习惯。问：今天的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吧？答：现在是没有了，可是这样穿着已经成为习惯了……我没有再接着问。不过，每当看到日本老年人中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关节炎患者，就忍不住想起他们的这个习惯来。因为棉花缺乏不得不穿得少，中国人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美国人眼里，就要脑筋急转弯了。

[8] 萨评：恐怕这又是一个可怕的误解。日本人的确善于以各种姿势入睡，即便在电车里，也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睡法，但那是因为工作太疲劳造成的。如果美国人也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再花上两个小时上下班，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和日本人没多大差别的。不过，说日本人喜欢睡觉的另一面，倒是和美国人相似。日本人的业余生活实际上堪称乏味，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人的私人友谊十分有限，如中国人那样几个朋友聚一聚这种事，到日本就变化成了公司为了工作中更好地配合进行的社交活动。到一块儿打扑克更会被认为是精神有问题。街头带有赌博性质的电子游戏厅“扒金库”可以吸引大队白领排队等候。日本是个为了工作运转的国家。从大众娱乐角度看，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国家，连马路边都有借着路灯下象棋的。无独有偶，美国比较传统的中部地区，除了缺少工作狂，人的生活方式也和日本差不多。笔者在内布拉斯加州工作的时候，曾对当时的顶头上司每天都去泡吧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那个酒吧只有一个奔六十的女招待，实在没有多少魅力可言。问到这件事，美国佬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除了看看Show，去去酒吧，你说，我还能去干吗？”想想也是，他能去干吗呢？

[9] 萨评：在日本要买便当，经常可以见到十个菜的套餐，不过如果你抱着饱餐一顿的念头买一盒来吃，那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其中三个豆子可能就是其中一道菜，一个梅子也是。所以，在日本吃请，最好作回家后再补充一点点的准备。

[10] 萨评：这不是日本的传统，事实上，这是日本向欧美学习的产物。要论慢，两个钟头喝一杯茶的茶道无人能敌。在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吃饭是一种艺术。欧洲劝孩子吃得慢一些是有的，但像德国这种国家，吃饭的确不过是补充营养的一个过程罢了，和填鸭有相似之处。日本学习欧美的先进经验时，吃饭这一套，也就囫囵吞枣地学过来了。





【图2】日本的茶道常常被作为向外国人展示文化的窗口。

[\[11\]](#)萨评：今天日本最高档的“料理”叫做怀石料理，其得名，就是因为当时的和尚过午不食，为了忍耐饥饿，被迫将烧热的石头放在怀里聊胜于无。

[\[12\]](#)萨评：这一点不敢苟同，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缺乏浪漫的情调。笔者这个看法或许比作者要客观些。因为日本自古出了不少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唯独没有一两个数得上的诗人。作者只注意到了日本反映婚姻以外爱恋的小说多，大概觉得这种事情类似美国的牛仔抢亲或者欧洲的私奔，其实日本的所谓浪漫小说的主题，更多的是在反映“畸恋”，也就是带有病态的爱情，并在最后走向毁灭。而这种欣赏的着眼点，是与所谓浪漫不同的。

[\[13\]](#)萨评：基本可以肯定作者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如果看小说简介，的确可以得出此处的结论，但是，如果真正阅读这部用日本式语言写就的大厚书，至少我所见的外国人无一不告诉我会因此改善睡眠状况。《源氏物语》的价值在于它对日本文化真实的记录与体现，但是如果说文学价值，那就要掉几个档次了。

[14] 萨评：看来作者也没有读过《红楼梦》和《金瓶梅》。有趣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完全抱不同的看法。日本曾有所谓的汉学家称中国人是“唯性欲者”，说中国人喜欢吃竹笋，就是因为看了它挺立上翘的姿势有所联想而然。

[15] 萨评：日本著名的艺术作品“浮世绘”，就有大量性方面的内容，日本人仅仅将其视作艺术而已，根本不觉得出格。总的来说，日本对于“性”的确是没有那么多禁忌的。

[16] 萨评：有一条有趣的轶事或可说明这种霸王式的“革新”——二战后美军进驻日本，发现很多日本的浴池男女混浴。美国人认为这有违文明，要日本人限期整改。好的，第二天日本人就坚决地改好了，并请美方视察。于是，美国人看到浴池的中间拉了条绳子，左边是男，右边是女……

[17] 萨评：这里，所谓“人情”，就是我们其他民族所说的“个人生活”，“人生大事”就是“事业”。在中国，即便再暴虐的皇帝，也不会认为臣子除了对国家的忠诚以外不应该有对家族的孝悌。而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他们的人生，只有“人生大事”一项，至于其他的内容，比如性这类归属于“人情”的东西，都是摆不上台面的，所以也就不值得重视。比较典型的是日前报道有个日本公司职员因为过劳发病，脑组织受损，完全无法认得妻子儿女，但却能记得公司的名字。

[18] 萨评：在中文和日文中，“爱人”这个词含义完全不同，中文是配偶的意思，而日文，指的就是这种非婚的情夫情妇。如果把含义用反了，在两国都会引发争端。

[19] 萨评：这种现象在日本现在还是不公开地存在着，而中国的“包二奶”现象，也与此颇有类似。

[20] 萨评：这也是日本皇室子嗣不旺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即便皇室也是一夫一妻制，而没有三宫六院。另一个日本皇室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没有太监的概念。

[21] 萨评：实际上，日本的艺伎更像高级的女公关和心理师，把她们当做妓女是一种误会。虽然，有些艺伎的确身兼二职。



【图3】日本传统的艺伎

[22] 萨评：通常这个培训期是十年。只有完成了培训的艺伎才可以梳这个职业专门的发式。

[23] 萨评：在今天，由于法律禁止，日本已没有正式妓女了，对法律非常尊重的日本人于是采取了变通的方法——在日本五花八门变态的性行为交易泛滥，而由于其变态，又绕过了法律的要求。

[24] 萨评：但是这种现象却很普遍。主要原因是，在日本，一个没有男人的成年女子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应对起来要艰难得多，所以她们总是趋向于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不管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25] 萨评：日本的室町幕府，几代将军都有同性恋癖好，不过不影响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严格地说，他们只是把这种同性恋当做一种风雅事而已。这要是被希特勒知道，或许就不会在二战中和“劣等民族”日本结盟了。不过，当时的明朝也盛行变童习惯，室町幕府的将军足立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的将军）等都是明朝的狂热崇拜者，似乎这个习惯也受到明朝风俗的影响。

[26] 萨评：这一点也与中国古代相似，而欧美虽然能够接受同性恋，却基本是同龄人之间的事情。由此可见，东西方同性恋的传统定义存在一定的区别。而今天东方的同性恋者，基本已经是西方同性恋的翻版了——传统东方同性恋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27]萨评：确切地说，在日本的风俗中，男性的性生活只受到极其微不足道的限制，因为他们认为性对男人来说是一种雅事，甚至有把性生活发展成某种艺术的倾向。在外国人看来，日本影片在性方面一些显得变态的情节，日本人自己并不感到过分，相反认为这里面蕴涵有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意义和美感。甚至一些色情影片中承受性虐待的女演员会因为具备超出常人的“忍耐力”而受到一些日本人正面的敬仰。

[28]萨评：说到底，这还是因为日本人并不把“性”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这方面，中国和西方倒是比较一致的，要严格得多。

[29]萨评：虽然日本人酒量不够好，而且周末的电车里经常装满醉鬼，但的确没有多少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本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在案犯清醒的情况下发生的。

[30]萨评：也许社会规则太过严格，日本人对于喝醉后可以无拘无束、放纵自己一下，是很感激的。

[31]萨评：这一点上中日习惯差不多，而西餐的酒，是整餐中都摆在桌子上的一一大多数时候西餐都是简单的套餐。美国人没机会说“我喝好了，给我盛点儿饭”。

[32]萨评：日本的确有这样的理论，但并不占主流地位。在小事情上，比如喝酒携妓方面，日本人的确如此认为。但涉及到人生观这样的“人生大事”，日本人的原则恰恰与此处描述的相反。日本人的教育基本就是：人要和自己过不去，舒适、散漫、快乐这些东西，都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大敌，苛待自己的肉体，让它发挥最大潜能才是王道。中国人的道德中不拒绝吃苦，认为吃苦是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而日本人的看法是吃苦乃道德高尚者与生俱来的品格。比如冬天出门，有一件羽绒服一件西服，虽然西服也可勉强御寒，但毕竟不如羽绒服舒适，那么中国人多半会选羽绒服，为什么不呢？而日本人多半会选择西服。

[33]萨评：日本《古事记》记载天照大神有两个兄弟，月读尊和素盞鸣尊。素盞鸣尊是个问题儿童，经常惹祸，还曾经挑战天照大神，被天照大神将其“十握之剑”折成三截。直到今天，大阪还有供奉素盞鸣尊的神社。

[34]萨评：关于天照大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至今是日本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日本书记》中记载素盞鸣尊谈到天照大神时经常提姐姐如何如何，但伊势神社供奉的天照大神明显是男装，而且史书中还有天照大神有十二妃的记载，所以，又应该是男的。日本历史学家的解释是素盞鸣尊所说的“姐姐”另有其人，也是天照大神的姐姐，如果是这样，以下的故事，就和作者所理解的不一样了。

[35]萨评：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教，其发展阶段与希腊宙斯神时代比较类似。

[36]萨评：指的是朱熹的理学，试图将儒家道德具体化，却造成了儒家思想的僵死化。

[37]萨评：本居宣长（1730~1801），三重县人，江户中期的国学者，号称十八世纪日本最大的国学家。善于考据，曾对《古事记》进行考证，著《古事记传》，并研究《源氏物语》。其思想特点是反儒反孔，认为儒家思想违背自然，并对从中国引进的“中华思想”多有批判。

[38]萨评：实际上原罪之说只有基督教才有。要说“普世真理”，从人口、文化等角度说，反而是非原罪说更“普世”一些呢。



[39] 萨评：这句话的理解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过幸福的生活”应该是人生目标，也不认为人天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神恩赐给人的种种快乐，只是为了让人来更好地工作。

[40] 萨评：这一点常常被欧洲人嘲笑美国人浅薄，但是，看美国电影的确是不太需要担心的，美国电影的结局都完美，可以让观众愉快地离开剧场。因为美国人不会欣赏悲剧。而东方的悲剧意识就强烈些，日本可说是达到了极致。即便中国，也有很多人欣赏可以引发自己共鸣的悲剧，那大体是因为富有同情心所致。中国第一代导演张石川就曾谈到他拍电影的秘诀——要有让看电影的太太小姐哭湿几条手帕的情节才行，但是又不能一直地哭，最后要给她们期望和快乐，不然下次她们就不买票了。日本的思维不同，日本女性对这样的悲剧，就像作者下面写的一样，和中国人一样同情怜悯；而日本男人看到悲剧，更多的不是同情，而是给悲剧中的主角鼓掌喝彩。

[41] 萨评：日本人的观念是苦难越多，越说明主角的伟大，但总是拍这样的片子，就会让人怀疑在日本的神是不是有些偏心眼，把所有的灾难都给了好人。

[42] 萨评：如果粗粗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与现在日本对于战争反思的电影几乎没有区别，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日本人对战争没有反思的地方。但是仔细看来，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题材基本一样，表现手法也基本一样，但是日本的反思电影中，比较积极的影片（当然，比如《尊严》这样的顽固军国主义影片就不用提了）更多地体现了“人”而不是“大义”的主题，以人来体验战争的苦难，从而能够认识战争消极的一面，而不是通过战争的苦难衬托主人公为了“大义”献身的意义。这样说，多少是有一点进步的。



战后日本的人权、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从中甚至可以看到要求惩办天皇的口号。可惜，这种反思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仅仅是昙花一现。

# 第十章

## 道德的困境



美军进驻日本后，日本的各阶层以能够结识美军为荣耀。这是1945年10月，当时号称日本“第一美男子”的演员长古川一郎一家宴请美军骑一师师长切斯少将的留影，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日本人个个满面荣光，而切斯少将却对这种热情显得如在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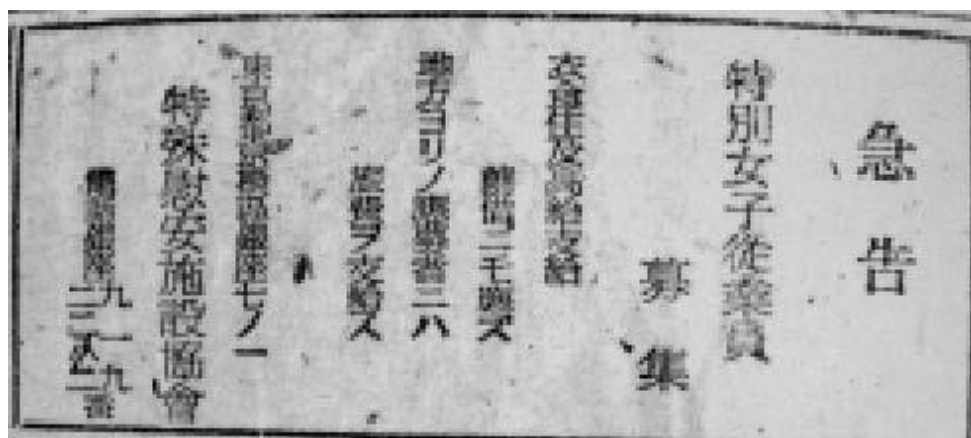
美国记者拉莫斯·塔特在这张照片下面的评注是：“由于这种有些错位的热情招待，骑一师的很多官兵对于亚洲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且带着这种错误的认识登上了朝鲜半岛的崇山峻岭，直到在中国人面前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才醒悟过来。”

日本人的的人生观是通过对忠、孝、情义、仁和人情等道德规定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在地图上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一样。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包括“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世界所组成，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而又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判其同伴时，不是通过判断他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以他“懂不懂孝”或“懂不懂情义”作为标准。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指责某人“不公正”，而是明确地指出这个人没有履行哪些行为；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一类的词来指责别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了规则。<sup>[1]</sup>他们不用依靠绝对命令或金箴。行为的恰当与否是与它所处的领域相关的。一个人在尽“孝”时采用一种行为方式，而“仅仅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领域内”又会采取另一种方式，在西方人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这些规则（甚至每个“领域”的规则）都以这种方式确立。如果每个领域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要求采取适当的而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没有受到主君侮辱以前，家臣要对主君尽最大的忠诚，以示“情义”；受到主君侮辱之后，背叛就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在1945年8月以前，“忠”一直要求日本国民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后来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就改变了“忠”的要求，日本人对外来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合作态度。<sup>[2]</sup>

西方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我们根据经验得知人是“随其本性”而行事的。我们按照忠诚还是背信弃义、合作还是顽固来区分绵羊与山羊。<sup>[3]</sup>我们把人加以分类，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如一。不管他们慷慨，还是吝啬；乐于助人，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并且始终如一地反对与其相左的意识形态。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那里有法西斯的合作者，也有抵抗者。但是，我们怀疑合作者会在胜利日之



后改变其立场，而这种怀疑是正确的。例如，在美国国内的斗争中，我们也承认有亲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判断，如果出现了新情况，这两个阵营依然会随其本性而行事。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由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或者由“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称为“皈依”，将会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图1】日本投降后由政府出面为美军征集劳军妓女的公开广告。这样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此一家。由于罗斯福夫人的干预而在几年后取消。有从业经历的日本女性，称当时所做是为普通日本女性提供了“防波堤”。

当然，西方人这种关于“完整行为”的信念并不总能得到验证，但这种信念绝对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在行事。如果他们醉心于追逐权力，就会以他人服从其意志作为衡量其成败的标准；如果他们希望受人喜爱，受到冷遇会使他感到挫折。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严厉而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家庭至上主义者。他们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风格”，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秩序。<sup>[4]</sup>

如果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那么他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矛盾似乎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一致性植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西方人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的“领域”是不包括“邪恶领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恶行，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与恶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生活看做是一场戏。<sup>[5]</sup>在这场戏中，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一种过程与另一种过程，相互之间都要谨慎地保持平衡。至于每个世界过程的本身都是好的。如果

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好人。如上所述，他们甚至将中国的道德规范看做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说它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不需要那种包含一切的伦理戒律。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乔治·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解决恶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确认坏行为是不需要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的。尽管每个心灵原本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刀，但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正如他们所说，这种“身上的锈”与刀上的锈一样都是坏东西。因此，人必须对刀和本性都给予同样的关注，时常磨砺。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闪亮，只需重新打磨。<sup>[6]</sup>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剧。除非将其加以改写，以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致及善恶相争的要求，正如像我们常做的那样。但是，日本人却不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些情节。他们的评论则是关于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过多考虑人情而模糊了情义，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履行正义（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有相互关联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两者之间的选择犹如欠了大量债的债务人还债时面对选择一样，他必须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忽略其他债务。但事实上，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使其免除其他的债务。

<sup>[7]</sup>

日本人对故事主人公命运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好人，恰恰是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道德必胜”，必须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正是善有善报。日本人则欣赏那种“可耻事件”主人公的故事——他欠社会太多恩情却无法报答，为了还恩情债并维护自己的名誉，只好选择死亡作为解决的办法。在许多文化中，这类故事教导人们听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却不是这样，他们讨论的却是进取心和坚定决心这样的主题。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但却忽略了其他义务。但最终他们还是要和所轻视的“世界”进行和解。

《四十七浪人》<sup>[8]</sup>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可匹敌。每个日本儿童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人们不断对其传播、印刷并被拍成一系列的现代电影。长久以来，四十七士的墓地成为著名的朝圣之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拜帖使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浪人》的主题围绕着对主君的“情义”。日本人认为，它描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之间（当然是“情义”在这类冲突中取胜），以及“单纯情义”<sup>[9]</sup>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这个历史故事发生在1703年，这是个封建制度繁荣的时期。按照现代日本人的幻想，那时的男子都是大丈夫，对“情义”是“心甘情愿”。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献出了一切——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义），最终为“忠”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以自杀的方式殉“忠”。<sup>[10]</sup>

按照当时的习俗，所有的大名要定期谒见将军。幕府将军任命了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sup>[11]</sup>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上的主君，所以不得不向在幕府中的首要大名吉良侯请教有关仪式的礼仪。不幸的是，当时浅野侯家最聪明的家臣大石<sup>[12]</sup>仍在其封地，无法帮助他的主君进行周密安排。浅野侯不谙世事，没有向吉良侯赠送厚礼。而另一位大名则在其通晓世事的家臣的指导下，向吉良侯赠送了厚礼以获得其指导。于是，吉良侯就故意误导浅野侯，让他穿上与仪式完全不符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根据吉良侯的指示进行了穿戴。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时，他就拔刀砍伤了吉良侯的前额。后来他被其他的家臣拉开了。从他“对名誉的情义”来说，他对吉良侯的侮辱进行报复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美德；但在幕府将军殿上拔刀则是不“忠”的行为。浅野侯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履行了“对名誉的情义”，但却必须“切腹”自杀以尽“忠”。他回到官邸换好衣服，准备切腹自尽，只等那位最聪明和最忠实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对视了许久互道告别。早已按照仪式要求坐好的浅野侯，于是就用刀切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浅野侯死后，没有一位亲戚愿意继承这位已故大名的家业，因为他违反了“忠”的义务而引起了将军的不快。浅野侯的封地后来被征收，他的家臣也成了无主的浪人。<sup>[13]</sup>

根据“情义”的义务要求，浅野侯的武士家臣有义务随其主君一起切腹。主君切腹是为了“对名誉的情义”。如果他们也切腹，则是对主君的情义，这也是对吉良侯对他们主君侮辱的一种抗议。但是，大石心中盘算，切腹并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情义，他应当完成主君未能完成的报复行为。<sup>[14]</sup>由于被其他家臣拉开，主君才未能实施报复的。他们应当杀死吉良侯，但这样做则违反了“忠”的要求。吉良侯与将军关系密切，幕府不可能批准浪人们的复仇行动。在通常情况下，策划复仇的人必须事先向将军说明，确定最后期限，如果在规定期限以前不能完成复仇，实施者就必须放弃。这种安排曾使一些幸运者能够调和“忠”与“情义”的矛盾。大石明白，他和他的同伙们不能采用这个方法。<sup>[15]</sup>于是，他把那些曾经是浅野侯武士家臣的浪人召集在一



起，却只字不提刺杀吉良侯的计划。这些浪人总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所讲授的这个故事，他们一致同意切腹自杀。但大石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无限情义”，即日语中所说的“情义加诚”，[\[16\]](#)不能信赖所有的人去实施报复吉良侯这样危险的计划。为了将那些单纯情义和情义加诚的人进行区别，他设计了一个方法，让大家确定如何分配主君的财产，这可以考验这些浪人的忠心。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考验，如果他们的家庭将获得好处，那么他们是不会同意切腹自杀的。浪人们对财产分配标准意见不一。家老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他领导的那些人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对财产进行分配；[\[17\]](#)而大石领导的一派则主张平均分配。于是大石很快就确定了哪些浪人只有“单纯情义”。大石同意了家老的分配方案，并且允许那些获胜的家臣离开。于是，家老带领那派人离开了，他们因而获得“卑鄙的武士”、“不懂情义的人”、“无耻的人”等恶名。大石断定，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足以密谋复仇计划。这些人与大石联合，保证不论良心、爱情或义务，都不能妨碍他们完成誓言。情义是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于是，四十七士歃血为盟。[\[18\]](#)

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吉良侯丧失警惕性。他们四散离去，装作不追求任何名誉的样子。大石经常光顾烟花之地，不顾体面地与人争吵。利用放荡的生活作为借口，他与妻子离了婚。这是打算违法犯罪的日本人惯用的正当手段，这能保证其妻儿在最后行动时不受牵连。[\[19\]](#)大石的妻子悲痛万分地与他分了手，但他的儿子却加入了浪人的队伍。

东京的居民都在猜测他们要复仇。对浪人表示尊敬的人都深信他们必将策划刺杀吉良侯。可是，四十七士矢口否认有此类意图。他们佯装成“不懂情义”的人。他们的岳父们对他们的可耻行为十分愤慨，将他们驱逐出家门，解除了婚姻；他们的朋友也在取笑他们。一天，大石的一个密友碰到他喝得烂醉如泥，并和女人们在调情。甚至对这位密友，大石也否认他对主君的“情义”。他说：“复仇？太可笑了，人应当及时享乐，什么事也比不上饮酒做乐。”那位朋友不相信，就把大石的刀抽出来看。他以为它一定会闪闪发光，那样就可以证明大石在撒谎。可是，大石的刀已经生锈了。[\[20\]](#)于是朋友不得已只好相信大石，他在大街上公开用脚踢他，并向这个醉汉吐唾沫。

有个浪人为了获得复仇所需资金，竟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这位妻子的哥哥也是浪人之一，当他得知其妹已知道复仇的计划，竟准备亲手杀死妹妹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以便让大石同意他加入复仇者的行列。有一位浪人杀死了自己的岳父。另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吉良侯家做仆人和小妾，以便从内部得到消息，确定动手时间。但



在复仇之后，她却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她是装作为吉良侯服务，但她也必须以死来洗刷自己的罪过。[\[21\]](#)

在12月14日这个下雪的夜晚，吉良侯大宴宾客，卫士们也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突袭了吉良侯的官邸，制服了警卫，径直冲进了他的卧室。吉良侯并不在卧室里，但被褥还有热气。浪人们知道他躲藏在某个角落里。终于，他们发现有一个蜷伏在存储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用长矛刺穿了墙壁，然而等到将长矛拔出来时，却没有发现上面有血迹。长矛的确刺中了吉良侯，但在拔出长矛时，吉良侯却用和服的袖子拭去了血迹。他这种伎俩无济于事，浪士们把他揪了出来。他声称自己不是吉良侯，只是吉良侯的家老。这时，四十七士中的一个人想起浅野侯曾在幕府将军的殿堂上砍伤过吉良侯，额头上肯定会留有伤疤。根据这个伤疤，浪人们确定他就是吉良侯，并要他立刻切腹自杀。他拒绝了切腹，这恰好证明他是个胆小鬼。于是，浪人们用浅野侯切腹时使用的刀砍下了吉良侯的首级，郑重地把它洗净，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侯的首级，列队走向浅野侯的墓地。[\[22\]](#)

整个东京都被浪人们的行为所感染。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庭及岳父们前呼后拥地过来和浪人们拥抱，并向他们鞠躬；大藩的主君们在沿路对他们热情款待。[\[23\]](#)他们来到浅野侯的墓地，不但把首级和刀供在墓前，而且有一份书面祷文。该祷文保存至今，其内容如下：

四十七士在主君灵前表示敬意……在主君复仇事业未完成之前，我们实在不敢替主君扫墓。我们苦苦等待，一日三秋……现将吉良侯首级献上。这把刀是主君去年的珍爱，曾委托我们妥善保管。希望主君能用此刀再次砍断仇敌头颅以永远雪恨。四十七士谨祷。

他们报答了“情义”，但仍需尽“忠”。由于他们违反了未提前请求就进行复仇的法令，因此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但他们并没有违反“忠”的义务，因为对于所有以“忠”的名义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必须履行。将军命令四十七士切腹自杀。[\[24\]](#)关于此事，日本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有如下内容：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始终不渝，应为后世之典范……于是，幕府经过深思熟虑，命令他们切腹自杀，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25\]](#)

这也就是说，浪人们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情义”和“义务”都作了最高的偿还。[\[26\]](#)

这首日本史诗由于版本不同，内容略有差异。在现代电影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主题被改为色情主题。吉良侯由于对浅野侯的妻子心存不良，他才故意误导浅野侯，使之受辱。贿赂的情节被删去，而对有关“情义”的一切义务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为了情义，他们抛妻弃子，甚至杀害亲生父亲。”<sup>[27]</sup>

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也以“义务”和“情义”冲突的主题为基础。最为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就是关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的事。<sup>[28]</sup>这位将军年纪轻轻就继位了，没有半点经验。当时，众臣对于继位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一些人想支持一位与他年纪相同的近亲。其中有一位大名因为意图没有达到，而将失败之“辱”牢记于心。虽然将军治国有方，这位大名却图谋刺杀他。一日，将军及其亲信准备巡查几个藩国，就通知了这位大名，这位大名负责接待将军及亲信们，他妄图利用这个机会报仇雪恨，实现他“对名誉的情义”。他的官邸本来就很坚固，他还是将其进行了改造，封锁了一切出口，并层层包围。他甚至还意图制造墙壁和天花板倒塌，把将军极其随从砸死。<sup>[29]</sup>当然，他的阴谋都掩盖在冠冕堂皇的安排之下。对将军一行接待细致入微，一位家臣还奉命舞剑为将军助兴。大名还指示这位家臣在舞剑的最高潮时刺死将军。对于大名的“情义”，这位武士不能违命；但是，“忠”的义务又禁止他行刺将军。银幕之上，武士的舞姿充分描绘了他内心的矛盾：他必须但又不能行刺；他几乎就要行动，但又不想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义务要求更为强大。他的舞姿渐渐起了变化，引起了将军一行人的怀疑。他们离开自己的座位，于是铤而走险的大名下令毁坏房屋。将军刚刚逃过舞剑者的行刺，却又面临房屋倒塌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舞剑家臣走上前去，引导将军一行通过地道来到安全空旷之地。“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表向舞剑者表示万分谢意，并再三邀请他与他们一道荣归东京。那位武士回头看了眼即将倒塌的房屋说：“不，我要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和情义。”他离开了将军一行，步入废墟中死去。“通过死，他兼顾了‘忠’和‘情义’的义务，二者合二为一”。<sup>[30]</sup>

古代的故事并没有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主题，到了近代，这一冲突变成了一个主要的题材。近代小说讲述了人物为了“义务”和“情义”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类的美好感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大肆宣传。西方人容易将日本的战争影片当做是绝妙的反战宣传，与此类似，这些小说也常使我们感觉到它在追求一种更大的自由——一种按照自己内心的指示而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就是这类冲动的最好证明。但是日本人在讨论小说或电影情节时，他们的看法通常不同于我们。我们之所以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拥有爱

情，或者胸怀壮志。而日本人却认为这样的人是软弱的，因为他过于重视感情，而不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方人很可能认为，反对传统，并且克服障碍获得幸福是强者的标志。但是日本人则认为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sup>[31]</sup>性格的力量不应表现为反抗，而是服从。因此，西方人在以自己的眼光看过日本小说和电影以后，他们的理解与日本人的截然不同。

在评价自身生活或周围所认识人的时候，日本人也使用同样的标准。他们认定，在欲望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一个人关注自身的欲望，那么他就是弱者。他们对于任何事情都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判断。不过，与西方伦理根本相对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孝的世界”中，他的妻子处于边缘地位，父母才是中心。<sup>[32]</sup>因此他的义务很明确：道德优秀的人必须服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接受母亲的决定；即使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已经为他生子，那离婚也只能让他“更加坚强”。日本人有句成语：“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子儿女视为陌路人。”因此，对待妻子最多不过是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变成了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人。即使婚姻很美满，也不能将妻子置于义务中心的位置。<sup>[33]</sup>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与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父母或祖国感情相同的位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丑闻：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公开声称他非常高兴回到日本，并提到与妻子团圆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为此他备受指责。其实，他应该是因为见到了父母、见到了富士山，以及能为日本的使命献身而高兴。而他的妻子是不属于这个层次的。<sup>[34]</sup>

进入现代以来，日本人自己也表示，对如此强调道德准则的不同层次和“范围”也表示不满意。日本对民众的教导中有很大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至高无上的信条。正如日本政治家为了简化等级制度，将天皇置于顶端，废除了将军及封建诸侯。在道德领域，他们通过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的范畴之中，来努力简化道德体系。通过这种办法，他们不仅寻求把全国统一在“天皇崇拜”之下，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日本道德集中起来。他们试图教育人们，履行了“忠”，也就履行了其他一切义务。他们力图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楔石。<sup>[35]</sup>

明治天皇于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就是这种计划的最权威声明。这份敕谕连同《教育敕谕》都是日本真正的圣谕。<sup>[36]</sup>日本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圣典：神道教没经典；日本的佛教各派有的以文字手稿为教义，有的则以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这样的佛经来代替圣典。<sup>[37]</sup>而明治天皇的敕谕才是真正的圣典。宣读之



时，仿佛神圣的仪式，听众们鞠躬安静。其虔诚程度犹如犹太教对待“摩西十诫”。需要诵读之时就从龕中庄严地请出，如同对待旧约五经一般。在听众散去前再恭恭敬敬地送入龕中。指派宣读的人如果念错一句，就得自杀。军人敕谕主要针对现役军人。他们必须逐字逐句学习，并且每天清晨都要默念十分钟。重要的国家节日、新兵入营、训练结束以及其他类似场合，都要依照惯例在军人面前宣读敕谕。中学和深造班的男生也都要学习《军人敕谕》。

《军人敕谕》是一份包括数页内容的文件，它条理分明，结构清晰，而且文字严谨。但西方人对其仍感到迷惑，因为内容似乎互相矛盾。善与德被尊奉为真正的目标，并且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说明。敕谕告诫民众不要效法古代那些以耻辱的方式死去的英雄豪杰，因为他们“不知公众责任，徒守私人情义”。这是正式译文，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却也很好地表达了原意。敕谕接下来讲：

“这种古代英雄的事例，你们应当严肃对待，引以为戒。”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各种义务的“范围”，很难理解“引以为戒”所传达的意思。整个敕谕表明，官方在尽量削弱“情义”而提高“忠”的地位。在敕谕的全文中，“情义”一词所具有的家庭含义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它不提“情义”，而强调有一个“更高级的法则”，这就是“忠”。另外，还有一个“次要的法则”，就是“信赖私人关系”。敕谕极力证明，“较高级的法则”完全能够证明一切道德。它说所谓“义”，就是“‘义务’的履行”。内心充满“忠”的军人必然有“真正的勇气”——就是“日常交往必以温和为先，旨在赢得他人爱戴和尊敬”。敕谕还暗示，只要遵从这些训令，就不必求助于“情义”。<sup>[38]</sup>“义务”之外的责任属于“次要法则”，人们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才能承认它。

如果你既想信守承诺（在私人关系上）又想履行“义务”……从起始阶段你就必须仔细考虑是否能够完成它。如果让自己接受了不明智的义务，就会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你确信不能既信守承诺，而又坚持义（敕谕把“义”规定为“义务的履行”），那么就最好放弃（私人的）诺言。自古以来，无数英雄豪杰惨遭不幸，遗臭万年，这些英雄豪杰都是因为信守小节，而不能根据公理辨明是非真相，或者是忽略了公共责任之道而坚持私情。<sup>[39]</sup>

在这段关于“忠”高于“情义”的教导中，通篇并未提到“情义”一词，但是对于所有日本人都熟悉的这个谚语——“我不能因为情义而行义”，敕谕则演义成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确信不能既信守承诺（个人义务），而又坚持义……”敕谕带着天皇的权威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抛弃“情义”，要记住情义是“次要的法则”。如



果他听从敕谕的训令，维护“更高级的法则”，就仍然是道德高尚的人。<sup>[40]</sup>

在日本，这份颂扬“忠”的圣典是一份基本文献。但是，仍然很难说敕谕对“情义”的间接毁谤削弱了大众对“情义”的坚持。日本人常常引用敕谕的其他部分来解释以及为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辩护——如“义就是义务的履行”，“心诚则万事皆可成”。尽管这些引用都很恰当，但却似乎很少引用关于告诫信守私人承诺的条文。时至今日，“情义”仍是一种很有权威的道德。在日本，如果说“此人不懂情义”仍是最严厉的谴责之一。<sup>[41]</sup>

仅仅引进一个“更高级的法则”，是不能轻而易举简化日本的伦理体系的。<sup>[42]</sup>正如他们时常夸耀的那样，日本人手中没有一个普遍的道德作为一切善行的试金石。在大多数文化中，个人是根据获得的某种道德的程度来评判自尊——如善意、节俭以及事业上的成功。他们将生活中的一些客观事实作为追求目标，例如幸福、对他人的权威、自由和社会活动能力等。日本人则遵守着更为特殊的准则。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军人敕谕》中，甚至他们在谈及“更高级法则”时，也只是意味着对等级制度低层者的义务要服从对高层者的义务。他们仍然是专政制度。对于西方人而言，所谓“更高级法则”，是对忠诚的忠诚，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或特定事业的忠诚，而对于日本人则相反。

近代以来，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能够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他们常常选择“诚”。在论及日本的伦理时，大隈伯爵<sup>[43]</sup>说：“‘诚’在各种规则中是最重要的，一切道德说教的基础都蕴涵在这个字当中。在我国古代语汇中，除了‘诚’这个词以外，没有其他表达伦理概念的词汇。”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近代小说家曾赞美新出现的西方个人主义；但是，他们现在也对西方的规则表示不满，转而试图去赞美诚（诚心）是唯一的真正的“教义”。

《军人敕谕》支持从道德的角度强调“诚”。敕谕以一段历史性的介绍作为前言，这等同于美国同类序言，它列举华盛顿、杰斐逊等“建国之父”的名字。在日本，这段话通过引用“恩”和“忠”来达到一个顶点。

我是国君，你们是国家的支柱，你们把我作为一国的国君。我们能否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并且报答祖先的恩情，这一切都依赖于你们履行自身的义务。<sup>[44]</sup>

后面又接着阐述了五条训令。第一，最高的德行就是履行“忠”的义务。一名军人不论其才能如何，如果不能极力尽“忠”，也仅仅

是一个傀儡。一支缺少“忠”的军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所以不能被当前的观点引入歧途，也不能干预政治，务必保持‘忠’，谨记‘义’重于泰山，而死却轻于鸿毛”。<sup>[45]</sup>第二，要按照军衔遵守礼仪。例如“下级应把上级的命令视为天皇的命令，上级也必须善待部下”。第三，是勇气。真正的勇气与“匹夫之勇”相反，应该定义为“从不轻视弱小者，从不惧怕强大者”。“真正崇尚勇气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应首先温和待人，以赢得他人的爱戴和尊敬”。第四，告诫人们“勿空守私情”。第五，劝人勤俭，“如果不把简朴作为目标，一定会很文弱，而且因为崇尚骄奢最终会导致卑鄙自私，贪得无厌。即使有忠诚与勇气，也难免遭世人谴责……我对此十分厌恶，所以再三告诫你们。”<sup>[46]</sup>

敕谕的最后一段把以上五条称作“天地之正道，人伦之纲常”，是“我们军人的精神”。而且，这五条训令之核心“精神”就是“诚”。“如果心不诚，那么再好的言行都是表面文章，毫无用处；心诚才能万事成功。”这五条训令就是这样“易守易行”。典型的日本特色就是：在列举一切德行和义务之后，最终还要添加“诚”。中国人将一切道德都建立在唤起仁爱之心上。日本人则不同，他们先建立义务准则，最后才要求人们全心全意履行义务，并且不断倾注全部精力。<sup>[47]</sup>

在禅宗——一个佛教主要教派的教义中，“诚”也具有同样的含义。铃木大拙论禅的著述中有一段师徒之间的对话：

僧问：“我看到狮子袭击敌人的时候，不论是兔还是象，它都全力以赴，请问这是什么力量？”

师答：“那是诚的精神（字面意思就是‘不欺之力’）。也就是‘竭尽所能’。在禅语里就是‘全部发挥作用’，即不留任何东西，毫无矫饰，也没有一点浪费。这样生活的人可称为金毛狮，他是刚强、真诚、全心全意的象征，是神的人。”

我已对日语中“诚”的特殊含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sup>[48]</sup>“诚”与英语sincerity（真诚、坦诚）的用法并不相同，与sincerity相比，其内涵既更广泛，又更狭窄。西方人很快能够发现，这个词的含义比西方语言中的用法要少。如果日本人说某人没有诚意，仅指那个人与他意见相左。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事实上，日本人说某人“真诚”时，并不是指他就内心的爱或憎、决心或惊讶而“真正”采取的行动，美国人在表示赞许时说“He was sincerely glad to see me”（他心里很高兴见到我）或“He was sincerely pleased”（他发自内心地高兴），在日本人看来，这种说法非常奇怪。他们有

一系列谚语来嘲笑这种“sincerity”的语言。他们嘲笑道：“看那只青蛙，一张开嘴就把内心世界袒露了出来。”“就像是石榴一张开嘴，我们就知道它的内心世界。”对一个人而言，“袒露感情”是耻辱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sup>[49]</sup>在美国，与sincerity一词有关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日本则完全没有什么地位。当那位日本少年指责美国传教士“insincerity”（不真诚）时，他从没想过那位美国人是否真的对这个穷小子到美国去的计划感到惊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日本政治家经常指责英美两国不真诚——他们时常这样做，他们甚至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西方各国是否按照他们真正的感受在行事。他们并不指责英美两国虚伪，这是最轻微的指责。<sup>[50]</sup>类似的，《军人敕谕》也说“真诚是各项训令的灵魂”，这句话不是说，这种置于所有德行之上的大德要求人们发自内心地说话办事。它当然也不是要求人们必须真实地表现自己，无论信念与其他人多么不同。

尽管如此，“诚”在日本还是有其积极的含义，并且由于日本人非常强调“诚”的伦理作用，西方人必须理解日本人使用这个词时的真正含义。日本人关于“诚”的基本含义在《四十七浪人》中有充分的说明。在那个故事里，“诚”是附加于“情义”之上的。“情义加诚”与“单纯情义”<sup>[51]</sup>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是“情义是存留万世的榜样”。在当代日语中，“诚使它坚持下去”。根据上下文，这个“它”是指日本道德中的任何一条训令，或者是“日本精神”所要求的任何一种态度。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在美国本土内日本移民的隔离所中对“诚”这个词的使用与《四十七浪人》的用法完全一致。它清楚地说明“诚”的逻辑可以延伸多远，而其用法又如何地与美国的相左。亲日的“第一代移民”（Issei，生在日本而移居美国者）对亲美的“第二代移民”（Nisei，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的指责是说“第二代移民”缺乏“诚”。“第一代移民”说这话的意思是，“第二代移民”没有那种形成“日本精神”的心理素质——日本在战争中将其定义为“坚持”。<sup>[52]</sup>这并不是说他们孩子的亲美态度是虚伪的。恰恰相反的是，“第二代移民”自愿参加美国军队，由真正的热情驱使支持美国，“第一代移民”反而指责“第二代移民”不够真诚。<sup>[53]</sup>

日本人使用的“诚”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满腔热情地遵循着日本道德诫律和日本精神所标示的道路前进。在特定条件下，不管“诚”有什么特殊含义，它总是可以解读为对日本精神中一些公认的方面的赞扬，或者是对日本道德中所接受的标准赞美。“诚”这个词不具有美国人的那种含义，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应当注意这个在日本所有的文献中都是最有用的词。因为它几乎完全相当于



日本人强调的各种善德。“诚”这个词经常用来赞扬那些大公无私的人。<sup>[54]</sup>这反映了日本人的伦理观中对谋利行为的谴责。如果不是等级制度的自然结果，人们就会断定“利”来自于剥削。从中牟利的中介人会成为人们所憎恨的放贷者，这种人常被指责为“缺乏诚意”。也经常使用“诚”这个词来颂扬不感情用事的人，这正反映了日本人的自律观。一个称得上“诚”的日本人，是决不会冒险去侮辱一个无意寻衅滋事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一个原则——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重要后果负责，而且还要对行为本身负责。<sup>[55]</sup>最后，只有“诚”者“才能领导众人”，有效地运用各种技巧，免于内心的冲突。这三点以及其他更多的含义，十分简明地说明了日本人伦理的同质性。它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日本，只有履行既定准则才能产生效果，不会产生冲突。

虽然日本人的“诚”有很多意义，尽管敕谕及大隈伯爵对其都赞赏有加，但是“诚”却没有简化日本人的道德规范。<sup>[56]</sup>它既没有奠定日本伦理道德的“基础”，又没有赋予它“灵魂”。如同给一个数加了平方，如果给任意数字加上平方，都可以将其大大增加。比如A的平方( $A^2$ )可以是9的平方，也可以是159或b或x的平方。<sup>[57]</sup>“诚”的作用亦如此，它可以把任何一条道德规范提升得更高。它似乎不是单独的道德，而是其信徒对教义的狂热的追求。

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地改进，它的道德体系仍处于分散状态。道德的原则仍然在不同的行动之间保持平衡，但这些行动本身都是善的。他们如同桥牌游戏那样建立了伦理道德，优秀的选手接受了规则，并在规则范围内竞赛。由于精于计算，使自己与水平低的选手区别开来，并能够根据竞赛规程以及足够的知识判断其他选手的出牌的意图，并相应出牌。用我们的话来说，他按“霍伊尔<sup>[58]</sup>规则”比赛，而打出每一张牌都必须考虑到无数细节。如果比赛和记分办法规则已经事先确定，那么可能出现的偶然性也包括于其中。美国人说的良好意愿反而无关紧要了。

在任何一种语言当中，人们表达失去或者获得自尊的语句都非常有助于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在日本，如果说“尊重自己”，这往往是指他本人是一个严谨的选手；而不像英语的用法中那样，是指有意识地遵循公认的行为标准——不谄媚别人，不撒谎，不作伪证等等。日本人说“自重”，字面意思是“有影响力的自我”，其反意是“一个易变而又轻浮的自我”。当一个人说“你应该尊重自己”，其实是指“你应该认真考虑情形中的一切因素，决不可招致别人批评，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sup>[59]</sup>“尊重自己”的行为往往与在美国所意味的行为截然相反。如果一个雇员<sup>[60]</sup>说“我必须自重”，其含意并不是指他必



须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是绝不要对雇主讲任何可以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话。在政治用法当中，“你应该自重”也具有同样的意思。它意味着，一个“有影响的人”如果沉溺于“危险的思想”，那么他就是不“自重”了。而在美国，“自重”却没有类似的意思——即使有危险的思想，一个人的自重也要求他按照自己的觉悟和良心来思考。<sup>[61]</sup>

作为一句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用来警告青少年子女的话，“你应该自重”指的是要遵守礼节，不要辜负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告诫女孩子要端坐，适当摆好双腿；男孩子则要训练自己，学会察颜观色，“因为现在将决定你的未来”。如果父母对孩子说：“一个自重的人没有你这样的行为。”这是责备孩子行为不妥，而不是孩子因缺乏勇气而不能坚持己见。<sup>[62]</sup>

如果农民还不起债，他会向债主说“我本应当自重”。他并不是责备自己懒惰，或责备自己对债主阿谀奉承，而是说他应该预见到紧急情况并且考虑周全。社会地位高的人说“这是我自尊的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遵循诚实和正直等原则办事，而是说明他在处理事情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家庭的地位以及自己身份的重要性。

公司总裁谈到他的公司时说“我们必须自重”，意思是说必须加倍谨慎和小心。谋划复仇的人说“自重地复仇”。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在敌人头上堆放燃烧的木炭”，<sup>[63]</sup>或者他打算遵守任何道德原则；而是相当于说“我一定要彻底复仇”。例如周密地计划，将一切因素都考虑进来。在日语中最强烈的语气是“双倍自重”，意思是万分慎重，从不轻易下结论。它还意味着，考虑各种方法和手段，用恰到好处努力达到目的。

所有这些“自重”的含义都符合日本人的的人生观，按照“霍伊尔规则”，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应该小心谨慎地行事。这种定义自重的方式不允许以良好意愿为理由来为其失败辩解。每一次行动都会产生后果，人们必须三思而后行。<sup>[64]</sup>做人慷慨是好事，但你必须预见到接受你恩惠的人将感到“背负了恩情”。对此，必须谨慎。批评人也是正常的，但你得愿意接受他的厌恶所产生的后果。当那位年轻画家指责美国传教士嘲笑他时，尽管传教士并无恶意，那也没有用。传教士没有完全了解他在棋盘上的一步棋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日本人看来，那就是他毫无修养。

因此，把谨慎与自重完全等同，需要能留心他人行为中的所有暗示，并且能强烈地觉察别人正在进行判断。<sup>[65]</sup>他们说“一个人培养自重（一个人必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如果没有社会，就不用自重了”。这些极端的说法说明了自重的外部约束，未考虑到对正确行为的内部约束要求。就像许多国家的俗语一样，这些话是有些

夸张，因为日本人有时也像清教徒一样，对自己深重罪孽的反应也很强烈。但是上述这些极端的说法正指出了日本人注重什么。与罪相比，他们更重视耻。<sup>[66]</sup>

在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区分以耻为主的文化和以罪为主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一个社会，制定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且依赖于人们良心的培育，这种社会文化是“罪感文化”。不过这种社会里的人，例如美国人，在做了根本算不上罪恶的事情之后，也会感到羞耻。或者因为穿着不得体，或者因为口误，都会感到万分懊悔。<sup>[67]</sup>在以耻为主要约束力的文化中，人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消除罪恶感那样，通过忏悔和赎罪而得到解脱。通过忏悔，犯罪之人能够减轻自己的负担。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和许多宗教团体都在使用忏悔这种手段，尽管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带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约束力的文化中，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人也不会感到解脱。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他就不会感到任何烦恼，因为忏悔对他来说似乎是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甚至对上帝也没有。他们有企求好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sup>[68]</sup>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于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借助于从内心确认罪恶。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如果一个人被当众取笑或遭到拒绝，或者自己感觉被嘲笑了，就会感到羞耻。<sup>[69]</sup>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力量。但这要求有旁观者，或者至少当事人幻想有旁观者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当中，荣誉就是根据心目中的自我形象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感到有负罪感，尽管可以通过忏悔来解脱这种罪恶感。<sup>[70]</sup>

早期定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将一切道德建立在罪恶感的基础之上，并且所有的精神病学者都知道困扰现代美国人的事情与他们的良心有关。但在美国，与前代相比，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的影响则减轻了许多。美国人将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虽然这种解释有许多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羞耻感能担当起道德的重任。对于伴随耻辱的强烈的个人懊恼，我们不能将其纳入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sup>[71]</sup>

而日本人却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未能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性都是耻辱。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只有对耻辱敏感的人才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A man who knows shame）就译成“有德之人”

(Virtuous man)，有时也译成“名誉之人”(Man of honour)。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罪恶”等在西方伦理道德中的地位一样，耻感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因此，根据这个逻辑进行推论，人死后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日本人对那种依赖于今生美德的轮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和惩罚、天堂和地狱。

如同其他一切重视耻辱的部落或民族，在日本人生活中也能深深体会到羞耻感的重要性。任何日本人都十分关注公众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他只需要想象别人的判断，并于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个人都遵守同一规则并彼此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感到轻松。当他们感到这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有些国家并不支持日本的善行标准，日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这些国家时，他们最易受到攻击。他们“善意”的“大东亚共荣圈”使命失败了，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日本人感到愤慨。<sup>[72]</sup>

对于那些为了求学或经商而到美国的日本人，或者并不是受国家主义情绪所驱使的日本人，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深感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入微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日本的美德没能很好地输出。改变文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这个普遍的道理，他们想说的要更多。要适应美国式的生活，日本人要比所熟悉的中国人和暹罗人更加困难。日本人面临的特殊问题是，在他们看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信一种安全感，它取决于别人承认他们遵守规则的微妙意义。<sup>[73]</sup>如果外国对这类礼节视而不见，日本人就会茫然若失。他们极力寻找西方人生活中与日本人类似的礼节，如果找不到，有些人就感到非常愤慨，有些人则感到震惊。

三岛女士<sup>[74]</sup>在其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成功地描写了她在不很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其他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她是如此渴望进入美国的大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人们“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了美国奖学金，她进入了卫斯理学院学习。她说，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友善，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日本人对自己守规矩而感到骄傲，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我的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对自己十分生气，我不知道在这里如何恰当行事；还有周围的环境，它似乎在嘲笑我过去的训练。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深蒂固的愤怒情绪之外，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的感情。”<sup>[75]</sup>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人，原有的感觉和情感在这个世界毫无用处。日本的教育要求任何动作都要优雅，每一句话都要礼貌，它使我在当前的环境中十分敏感，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以至于在社交活动中不知所措。”



过了二三年，她才感觉到了放松，并且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她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她所称的“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在我三岁时，亲密感就被当做不礼貌而被抹杀掉了”。

三岛女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国女孩子进行了比较，她认为美国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大多数日本姑娘并不具备中国姑娘所具有的那种沉稳和社交能力。在我看来，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她们人人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sup>[76]</sup>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她们的无畏沉稳的性格也与日本姑娘的胆怯和过度敏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三岛女士感到自己是好像网球好手而参加了槌球游戏，她的技艺无用武之地。她感到自己的过去所学无法带入新环境当中。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训练是无用的，美国人用不着它们。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国那种不那么繁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是一些，他们就很难想象自己如何再过日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有时，他们把过去的生活当做“失乐园”；有时又说成是“羁绊”；有时则说成是“监狱”；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只要将这棵小松树的根局限于花盆当中，这就是一件为迷人花园增添魅力的艺术品；一旦移植到空旷之地，就不再是盆栽了。他们感到自己再也不是日本花园的点缀了，再也不能满足以前的要求了。他们剧烈地经历了日本的道德困境。<sup>[77]</sup>

---

<sup>[1]</sup>萨评：就是这个“明确指出”令人恐怖。因为日本人至今依然把这些圈子具体成一条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并且放在生活中作为人每天的准则。对美国人来说，这简直是把自己层层束缚起来，但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全无好处。比如某卡车司机可能在“孝”的圈子里是个混蛋，却不妨碍他在“情义”的圈子里是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司机，这是可以分开的。放到中国人中，虽然也承认好人坏人并不固定，但对于一个打爹骂娘的不孝子同时又是国家忠良这种事，总觉得不大正常。

<sup>[2]</sup>萨评：也就是说，投降后趴在地上迎接盟军的人，依然可以鄙视投降前因为重伤成为战俘的人。因为前者符合忠的要求，而后者违反了“情义”。这也就是为何日本战败后一些战俘回乡依然感到抬不起头来，而小野田宽郎这样的“恐怖分子”却大受推崇的原因。1974年在菲律宾放下武器的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始终不相信日本的战败，直到战时的顶头上司亲自到丛林中下达要他投降的命令。小野田在战后的将近三十年不断袭击当地的和平百姓，造成多人死伤，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歉意，认为是奉命行事而已。由此，当年日军的心态可见一斑。

<sup>[3]</sup>萨评：这是基督教教义的内容，耶稣把聚集在他面前的人类分成义人和该诅咒的人。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比较接近，认为人发展的轨迹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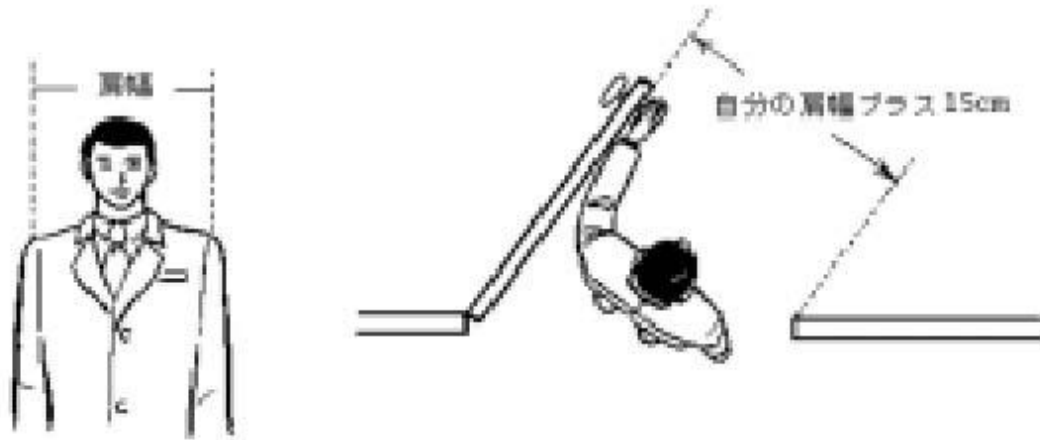
天下”，“不能治家焉能治国”。我们认为人的各种品格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好人在各方面都可以信任，而坏人只能利用不能相信。

[4] 萨评：中国传统上也信奉这种思维，事实上尽管中国盛产一流的数学家，但在管理上却不知道为何自古不喜欢量化的概念。比如选拔一个财政部（户部）的负责人，可能最重要的指标不是他怎样熟悉各种记账模式，有怎样的知识结构，而是他是否为人正派，并在过去的其他职务上是成功者。假如候选人少年时就有闻鸡起舞、司马光砸缸一类的事迹，则对他的当选其作用远胜于MBA的学历。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种思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乃至认为能写好八股文甚至只要能写一笔好字的，就可以做好官。不过，这种模式倒也不可一概否定，比如岳飞，就是出色的军事家，同时又是出色的文学家，这种通用型人才在中国并不罕见。然而，也许这只是在环境才会产生这种现象。



表面上看，是日本天皇在战后承勘自己是人——我们觉得是废话，在日本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是，这张照片有以往新闻照片没有的内容，那就是左边的美国宪兵。这个宪兵，算是充分地体现了日本天皇和占领军的关系。

[5] 萨评：这个评价入木三分。看惯日本人的生活，的确有在一个大戏院的感觉。每个人都根据环境和规则的要求来哭，来笑，来问候他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宛若预先写好的剧本，外人觉得繁琐束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日本人觉得省心省力，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实在是入戏很深，不能自拔。



【图2】日本的礼仪教程之详细超乎想象，这是告诉你开门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姿势，开多大角度才不失礼。

[6] 萨评：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日本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这个完美的意思是平衡，也就是说日本社会不存在丑恶的东西。说得好是日本“社会和谐”，说得不好就是有些自欺欺人。比如街上的流浪汉，如果你对日本人谈起这个问题，他们会告诉你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自愿流浪的，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比如满天蜘蛛网一样的电线，他们会告诉你这是因为日本地震多，不能把线路埋到地下（加利福尼亚也多地震，但电线照样埋了下去。其实，这是一个费用问题）。

[7] 萨评：西方看来，日本的小说充满了自寻烦恼，最后大多还要让主角无所适从而不得不悲剧收场，如果好莱坞拍这样的片子多半是没人看的。

[8] 萨评：即前文提到的赤穗武士报仇事件。

[9] 萨评：作者的原文为“merely giri”，日本译本为“一遍情义”，意思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

[10] 萨评：历史上的四十七浪人事件与日本人心目中的事件有些区别。浪人们报仇以后并没有立即自杀，而是去将军那里等待宣判，而当时的舆论也是争论极大。最后将军决定“为了律法不被破坏”，勒令这些浪人自杀。所以，即便在日本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其实人们也还是热爱生命的，只不过后来被传走了样。



【图3】赤穗武士的墓地

[\[11\]](#)萨评：浅野侯，即浅野长矩，赤穗藩的藩主。在日本，“藩”，就是诸侯国。所谓“大名”，就是诸侯国的国君。事实上浅野侯当时担任的是内匠头，负责迎接的是天皇的敕使，这对一个地方诸侯来说是件光荣的事情。整件事情发生在十八世纪初期。

[\[12\]](#)萨评：大石，即大石良雄，浅野手下的重臣，他的俸禄是一千零五十石大米，而赤穗全国收入为五万三千石，可谓受到了浅野的知遇之恩。

[\[13\]](#)萨评：其实，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日本的中央，即将军试图加强中央权力时，与地方，即大名发生的权力斗争。将军无时无刻不试图吞并地方诸侯的势力，而诸侯则同样无时无刻不对将军小心翼翼。浅野被调到中央担任荣耀的职务，表面上看风光一时，已经埋下了让他离开自己领地而受处置的伏笔。偏偏浅野又暴躁而不知收敛，在“礼仪”上给了将军很好的借口。事实上后来的评价多说将军判案不公是复仇事件的导火索。像赤穗这样的藩，势力较小（相对于大阪这样的“百万石大名”，收入只有约二十分之一），领导者又缺乏经验，正是将军实施吞并的理想目标。而礼仪方面的苛求，恰恰是历来东方中央政权处置诸侯的重要借口。刘备的祖上丢掉贵族地位，就是因为所献祭礼的金子被评为成色不够，那也正是汉武帝削除诸侯势力的一个手段。赤穗此后无人敢于担任藩主不是其灭国的原因，这与名誉也没有太大关系，将军吞并赤穗的决心才是最致命的因素。

[14] 萨评：史称浅野是在松之廊遇到吉良，当即挥刀砍去，但只是砍伤了对方就被品川和富山二大臣拉开，未能杀死对方。

[15] 萨评：这也是将军后来命令他们切腹的借口，由此造成这些复仇者死亡的就不再是将军，而是“规则”了。所以，同情这些武士的人们也没有理由对将军不满和怀恨，他只是履行自己维护规则的职责罢了。

[16] 萨评：所谓情义加诚与单纯情义有什么区别呢？单纯情义指的是按照规则所做的事，比如此处要切腹自杀的武士们，有些就只是因为存在“主辱臣死”这样的规则而决定自杀的。这在其他国家会被看做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在日本却不算希奇，仅仅是一种从众。今天日本公路上经常可以见到大队超速行驶的汽车，原因就是前面的车超速了，后面的车宁可违章也要跟上，以避免和别人不一样。这还不能满足“情义加诚”的要求，“情义加诚”的要求是不但要懂得规则，还要有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抛开情义，仍能有足够的理由继续去做决定了的事情。在日本到处是规矩的社会里，要找这样头脑清醒有信念的人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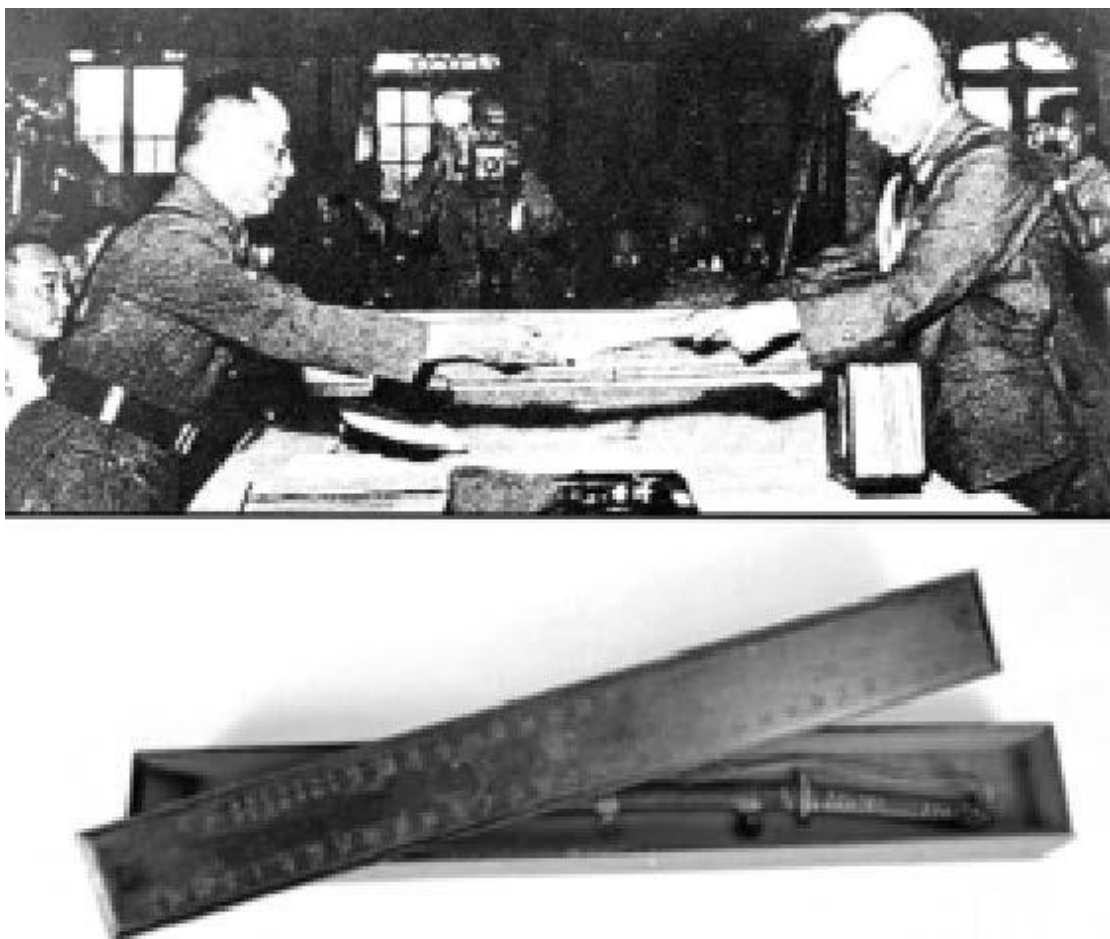
[17] 萨评：“家老”是日本古代诸侯（大名）部下的高级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成员，在诸侯的领地内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18] 萨评：这个誓约叫做《神文誓约》，实际上第一批筛选是选出了97人，不过有一半以上没有坚持下来。由此可见，所谓全体切腹的决心，恐怕就更难信任了。

[19] 萨评：就如前面所说，日本至今的法律依然带有连坐的影子，一个商人破产，往往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离婚，以免家庭受累。

[20] 萨评：日本刀的材料是高碳钢，所以非常容易生锈，每天用白布擦拭刀锋是一个合格武士的家庭作业。





【图4】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仪式上。下方是他呈缴的佩刀。本书的名字是《菊与刀》，冈村这口造型精致的杀人之刀恰好充分表现了这种矛盾。

[21] 萨评：按照美国人的看法，这种行为第一侵犯人权——你可以自己去复仇，但杀自己的妹妹绝对是犯罪；第二违反男女平等的原则。不过，这样的话对那时的日本人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22] 萨评：日本的史书这样记载本次复仇：复仇者在拂晓4点开始行动。分为两队，一队由大石率领，从正门攻入；另一队由吉田忠左卫门率领，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是大石的儿子大石良金。年纪最大的是间喜光延，他带同三个儿子参加。吉良来不及组织抵抗，但他的房子有2500坪大，很不好搜索。可是复仇者耐心寻找，最终，躲藏在厨房旁边堆放柴火的杂物间中的吉良侯，被间十次郎用枪突刺后，首级由武林唯七斩去，讨伐成功。复仇者无一人死亡。这大概也说明战斗并不激烈。

[23] 萨评：也就是这一条四十六个武士非死不可，因为他们在报仇中与五十多个大名有盟约，如果不杀他们，将军就可能面对一个可怕的联合势力。据福本日南《元禄快举录》，墓前稟告文是后人伪造的。

[24] 萨评：如第八章译注，最后切腹的实际是四十六人。因为其中的吉右卫门在刺杀成功后随即引退——因为他的身份本来就不是武士，而是民兵（足轻），所以，他就是想自杀殉难，也被认为没有这个资格。在日本，切腹不是谁想切就可以切的。

[25] 萨评：实际上是一箭三雕，因为为了表彰这些人的忠义，吉良家的家产也被没收，家属被流放——表面上看给武士们出气更彻底了，实际上得利的只有将军。

[26] 萨评：恐怕不死也是不行了，将军由不得你不死。

[27] 萨评：悲剧，武士，复仇，情义，一切吸引日本人的因素都包括了。这段叫做《忠臣藏》的故事，在日本被搬上银幕达八十多次，当然其中会有多少的差异，成了日本版的哈姆雷特。

[28] 萨评：德川幕府，即德川家康1603年建立的日本末代幕府，也是日本幕府政治最完善的时代。不过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并不是少年当政，他担任将军时已经28岁，而且其父德川秀忠曾经以“太上皇”的方式辅导，所以，文中的电影故事应该只是传说。



【图5】德川家康

[29] 萨评：为何要用这样复杂的方式进行谋杀呢？改造这样一个城堡总要很长时间，很容易败露的。实际上成功的暗杀多半很简单，多是一刀一枪解决问题的。这大约是电影虚构

的。

[30] 萨评：要是在中国，估计一个“割发代首”之类的小智慧就可以解开死结。

[31] 萨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次我们好像和日本人站在了一条线上。我们也说天人欲而存天理。不过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理大于天，所以如果君主和天理冲突，那大臣们站在天理一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就是奸臣。所以历代大臣都以和皇上对着干为获取名誉的方法之一。看起来我们的思维好像比日本人围绕主君的方式民主先进，可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国式的思维曾经给当时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内耗，又是始料不及的。

[32] 萨评：不知道作者为何总是强调日本人对孝的重视，这始终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日本家长有家长的威严，但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似乎并不深厚，这已经被视为日本社会人情冷漠的一个象征。或许是日本人繁琐的礼节使西方人产生了这个印象吧。

[33] 萨评：不幸的是中国古代在这一方面的道德水准也差不多。刘邦和刘备都可称明君，但是在打了败仗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抛掉妻子自己逃命。这里面刘邦做得更彻底些，连老父也让项羽抓了去。不过，后代颇有因为刘邦不在乎父亲老命称其为流氓无赖的，却没有人指责他们抛弃妻子。

[34] 萨评：美国曾经进行过全民调查，看看生活中什么最重要，结果是“家庭”，如果日本人这样填写，就会被认为是窝囊废了。从这个角度看，二战时美国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也不一样。在美国看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很强烈，其原因在于美国人首先是爱家护家。爱国，是爱家的延长线上的概念。所以美国人爱国而不爱政府。日本则不同，认为国家是最高的，家只是培养为国效力的人的银行。因此政府可以号召日本人为了国家利益赔上全家。

[35] 萨评：可以理解日本人这种做法。日本的礼节和文化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繁琐。正如穷人愈穷富人愈富一样，这种条条框框的繁琐也是繁琐者愈繁琐，常让初到日本的人很难适应。想来，日本人自己也是吃不消了，所以才有进行简化的心理要求。

[36] 萨评：日本的“军国主义圣经”产生有一个过程：最早是1878年发表的《军人训诫》，随后是1882年的《军人敕谕》，要求士兵们“义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其登峰造极则是1941年东条英机推出的《战阵训》，狂热一时。

[37] 萨评：严格地说，神道教虽然没有经典，佛教是有的，佛经就是。只不过佛教没有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那样有唯一权威的经典。佛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是每一本只有一部分内容。所以，基督教是不需要“藏经阁”的，而基督教的教士传教也容易得多，一个十字架一本圣经就够了，最多加一个耶稣受难像。看看唐僧取经，就会明白佛教在这方面的困难了。

[38] 萨评：从后来日军的表现看，日本人对此的理解是只要忠于天皇，就可以杀人放火，不必讲良心了。



【图6】1937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南京中央医院

[39] 萨评：据日本译本称，作者对《军人敕谕》的理解有误，过分地拘泥于“情义”和“忠”之间的对立。那只是此文的一小部分。

[40] 萨评：这段比较晦涩，解释一下就是为天皇尽忠是大义，所以如果天皇的命令和你平时需要遵守的社会准则即情义有冲突，要按照天皇的命令去做——当然更毋论如果和自己的良知或者利益有冲突了。其实这里面没有太多的玄妙，只是东方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并不是日本人独有的。汉武帝以“侠以武犯禁”的原因杀大侠郭解，只允许忠，不允许侠，就是这一手段的鼻祖。作者将其与日本人的民族性联系起来，或有偏颇。

[41] 萨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于“忠”、“大义”的强调，适用于公务方面，“情义”依然适用于私务方面，因此还是很有权威的。这是因为情义的遵守是日本的传统，他们对于传统的维护十分重视。因此，日本统治阶层很想把天皇的命令也变成“情义”，但是天皇的命令是根据形势不断变化的，没法预先描述，于是只好要求国民无条件服从了——可以说这种“忠”和“大义”是日本情义的一个变型。以教育小孩子为例，情义就是要孩子“守规矩”，而“忠”就是要孩子“听话”。

[42] 萨评：通常日本人不会把事情变简单，而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是他们的天性。这一点中国人正相反，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您看，普世真理一共才俩字，世界能复杂得了吗？

[43] 萨评：大隈伯爵即大隈重信伯爵（1838~1922），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最初是佐贺藩武士，明治维新后担任大藏卿——财政部长。后来担任过两次首相。他推崇美国独立



宣言，促进日本宪法的产生，也反对过“征韩论”的扩张思想，但晚年曾主持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中国人所厌恶。1922年死后获国葬，其时送葬的平民很多，被认为是获得日本人心的政治家。著有《开国五十年史》。

[44] 萨评：作为日本走向制宪社会的第一位君主，明治天皇的所作所为给此后天皇与世俗权力的关系树立了固定的模式。以这个敕谕为代表，这个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军队首先忠于天皇，其次才忠于政府，天皇超越一切权力。因此，在日本出现了世俗的权力（国会和内阁）无条件服从于皇室的奇怪事情。而日本的军人对于政府缺少尊重，也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背叛政府是各国军队教育中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却不是军人的底线——只要不背叛天皇，日本的军人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国家。在日本军人看来，政府和自己，不过都是天皇的奴仆而已，因此，政府对军队并没有绝对的权威。

[45] 萨评：这也是战后许多日本旧军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称自己只是政治的牺牲品。这个时候他们忘掉了，“军人不问政治的原则”早在“九一八”的时候就被日本军人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46] 萨评：事实上日本当时对于贪污打击非常强烈，大多数日本官员也能保持廉洁。不过，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也正是这些廉洁的军政官员发动的。另外，反贪在日本一度发展到失控的边缘。几乎每一笔从国外购买军火的买卖都能引发一连串的贪污案件，比如从英国订购第一批战列金刚型战舰的时候，多数日本海军的高层人物都遭到受贿的指控，大有“洪洞县内无好人”之势。若按“民愤极大”处理，这些官员都该处决。后来证明这些指控都不过是捕风捉影——这充分显示了日本民族“小心眼儿”的特点。这种因为严格要求引发扩大化的情况，倒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并非日本独家了。



【图7】金刚型战舰，二战中证明是很好用的军舰。

[47] 萨评：这里面提到了中日之间对德行的具体要求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更加模糊，而日本不知道是吸取了西方的规则精神，还是民族性使然，对每一项德行都是精确到量化的水平。

[48] 萨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狮子其实是很懒惰的动物，僧侣的描述根本没有现实依据。我对日文中“诚”的理解也大致如此，并曾经向日本人求证过，所以，索性将其列在此处作为一种辅助说明吧。日本的“诚”，真诚的含意在其次，其主要含义是“全力以赴”、“全心全意”。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里面，美国传教士嘲笑牧野义雄要到美国留学的想法，牧野义雄指责他不够真诚，是指责他没有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

[49]萨评：在日本的风俗中，暴露自己的感情，无论它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都被视为耻辱。例如，在日本的葬礼上，亲属的悲戚必须控制在一个符合礼节的范围之内，至少不能在众人面前落泪哭泣，假如在众人面前不能自制，就会被认为缺乏修养，而无论其内心的痛苦。

[50]萨评：这里日本指责英美的“不真诚”，其实本质上说的是英美“看不起”日本，不肯认真对待日本的声音。其时日本已经认为自己应该与英美处于一个等级，而英美却没有相应的表示，日本对这种无视等级的做法深感痛恨，却不理解这种等级的判断仅仅是日本在自说自话。

[51]萨评：这个概念大概是说，一般日本人对于情义的态度是“既然道理要求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吧”。是被动的，就像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家臣们一样。而四十七个被视为楷模的浪人则是把情义融入了灵魂，主动为了情义献出生命。他们因为是全心全意地去实现情义而受到推崇。

[52]萨评：实际上如果把“诚”换成“全心全意”，这种指责就很容易理解。第一代说的并不是忠诚，而是第二代的生活态度。日本人告别的时候常常毫无目的地说一句“顽张”（努力啊）作为赠言，虽然有时完全看不出对方此时有什么需要努力的。这是一种日本传统的生活态度而已。第一代显然认为第二代缺乏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他们学会了像美国人一样地享受生活，所以被他们的父辈认为懒散而没有继承日本人的传统。

[53]萨评：美国人曾经担心日本移民帮助母国，把他们大批囚禁。事实上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美军中的日本第二代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错，第一个日本俘虏酒卷直男就是被一个日本第二代美军阿比留士官抓获的。

[54]萨评：作者无法克制地把这个“诚”和“诚实”混为一谈，显然是把日文和中文的意思搞混了。这里，如果把日本人的“诚”改翻译为“全心全意为某某服务”，意思就顺畅得多，不过，这里的“某某”，对日本人来说，或是天皇，或是情义，唯独无法填“人民”二字。

[55]萨评：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他们似乎很少表现出这种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行为负责的信条。究其原因，是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于“上位”或至少“平位”的人，对于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日本人的看法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

[56]萨评：由于日本人强调细节的民族性作祟，他们的伦理只有不断地复杂化，直到二战盟国的占领带给它一种全新的文化，而旧有的复杂伦理至今犹存，影响深重。

[57]萨评：这里的意思是原有的情义，如果用日本人独特的“诚”的心情对待，也就是全心全意去做，其作用会远比其他民族巨大。这里也可以看到二战中日本与德国结盟背后的文化认同。在日本人看来，德国人办事的一丝不苟，无疑也是一种“诚”，这一点上双方很容易相互理解。而德国人的“诚”放在迫害犹太人上面，就成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同样的国策在散漫的拉丁国家，造成的危害就比干什么都一丝不苟的德国人小多了。

[58]萨评：霍伊尔（Hoyle Edmond, 1672~1769），是第一个制定惠斯特牌戏规则的人。惠斯特是一种扑克牌游戏——桥牌的前身，流行于西方有闲阶层。霍伊尔写于1742年那本有名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其书名倒是不长，称为《关于惠斯特牌戏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牌戏的

规则以及一些打牌原则，初学者只要仔细遵守这些原则，就能打好惠斯特。所以，在惠斯特游戏中，把那些定式打法就叫做霍伊尔。

[59] 萨评：隐含的意思是你必须认清自己的等级和地位，不要错把上位的人当成自己的平级做出失礼的举动来。

[60] 萨评：这里指的是日本雇员。

[61] 萨评：这句话放在西方世界，解释起来就是培根的那句话了——人是人自己的上帝。日本人的思维在这里正好相反——人要明白自己不是上帝。这种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南辕北辙的情况在两种文化对比中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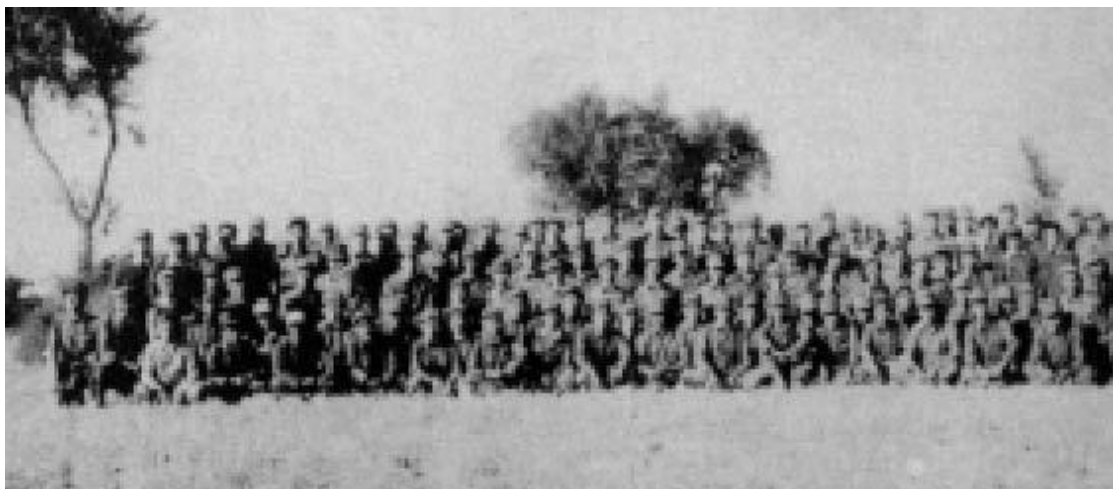
[62] 萨评：这可以归为日本教育中关于等级观念的一部分，当然也可说是教育孩子注重维护自己的自尊。然而，维护自尊的先决条件是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就不免带来一些问题，使一些接受这种教育的日本人在自尊与自卑的角色转换中无所适从，而对待他人的时候，也欠缺博爱和平等精神。

[63] 萨评：“在敌人头上堆放燃烧的木炭”表示以德报怨，从道义上战胜敌人。其语出自《新约全书》中圣保罗致罗马人书，“若你的敌人饿了，就请给他吃，若渴了就请给他喝，这样你就在他的头上堆起了燃烧的木炭。”这种做法，倒是和中国古代的一些做法类似，那时候中国总是想“以德服人”，但蛮夷们往往缺乏自觉性。这种观点在日本倒是从来没有取得过主导地位。

[64] 萨评：日本人对于未知世界是充满谨慎的。所以，投资时往往因为观望而错失良机，可是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把所有的谨慎丢在脑后。

[65] 萨评：所以，日本人之间的谈判，外国人是插不上手的，强行介入只会因为难以理解日本人暧昧的表态方法把自己逼疯。好在他们自己人甘之如饴，满不在乎，毕竟他们从小就习惯了。

[66] 萨评：所以很多日本老兵对于战争进行反省时，更多的是强调自己心灵的不安难以得到拯救，而不多提到对他国人犯下的罪恶应该忏悔。



【图8】也有一个团体比较特殊，那就是照片中拍摄的“日本八路”，被八路军俘虏后教育过的日本官兵，普遍认为自己经历了脱胎换骨。不幸的是，他们回到日本后，却多少因为思维方式与众不同而无法成为社会主流。

[67] 萨评：这里似乎需要分一下段，否则美国也许会被认为是典型的“以耻为主”的例子了。其实作者只是想说美国虽然是以罪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但也不乏知耻。实际上，所谓“耻”可以归纳为面子问题，和美国人相处，就会发现他们极不愿意认错，他们宁可说“你对了”，也不愿意说“我错了”。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国人对面子也是非常看重的。

[68] 萨评：日本的神道教就是没有忏悔仪式的宗教。但是，正如美国的文化中也有“耻”的概念，日本人也会有需要忏悔和赎罪的需要，这时佛教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不过，日本人对这方面的要求的确不高，所以，即便在佛前，也是祈福的更多。

[69] 萨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外人面前蒙羞是可以令人自杀的要命事情，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预先做好准备，尽量避免蒙羞的场面出现。因此，日本人在生活中从众、不越雷池一步就成了习惯。有的说法认为日本人绝不在红灯的时候过马路，显示了非常高的素质。个人以为这种认识也失之片面。日本人的确很少在红灯的时候穿越马路，不过在三种情况下例外。第一，在国外，如果当地人不在乎；第二，在大阪日本桥这种传统上交通规则就不被重视的地方；第三，有人带头（最好是两个人）在红灯时候过马路的情况。原因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想了。

[70] 萨评：日本人对这种罪恶感的意识显然不如耻辱那样强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本老兵在回忆中，对战争中亲身经历的罪恶表示“万死难恕”，然而，这只是嘴上说说罢了，每个这样说的老兵都以事情发生在战争年代轻易地原谅自己，不要说万死赎罪，一死的都没有。

[71] 萨评：以我和美国人相处的经验来看，美国人对于羞耻的敏感有他更深层的文化原因。美国人不愿意认错，其原因在于鼓励自信是美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从幼年时代，美国人就不认为教育孩子不犯错是重要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犯错不是失败而是创造的先驱，“失败是成功之母”，美国人最喜欢说的就是“Try”。这种文化保持了美国社会的活力，也为美国人所珍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要求别人认错被视为一种不符合社会习俗的举动，即便他可能的确是错了。日本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苛待别人也苛待自己，认错并为此做出极端的举动，如以自杀来负责就是典型反应。不过日本人也认识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慢慢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来对付这种局面——更多地采用“集体负责”来避免个人的蒙羞。所以，在日本现代社会，尽管日本人表现通常都很谦恭，但如果工作中出了问题，却很少有人出来负责，而由部门或集体承担，也自然就没有人蒙羞了。中国人的情况比较特别，它是有着明确的羞耻观和道德观的，从百家争鸣开始就擅长哲理思辨的中国人多半可以把道理阐述得比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更清楚。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文化的成熟程度更高。然而，中国人却多半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因为蒙羞而自杀，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固执不认错。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暂时的退让不算重要的事情，中国的社会非常复杂，因此，平衡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这种时候，中国人更多地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现实精神，这也是中国人的韧性在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地方。



当然，这种善于自我心理治疗的思维方式发展到负面也会带来危害——变成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了。

[72] 萨评：可能有人会对作者使用“愤慨”这个词感到偏激。中国人碰到对方拒绝自己的看法，常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了，怎么会愤慨呢？实际上“愤慨”是很多日本人正常的想法。这是因为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社会，对多种文化并存既不容易理解，也难以习惯。所以，日本人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的人——至少是亚洲的人（欧美的人在日本人看来有点儿不像同类，二战中称他们是“英美鬼畜”）想法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你和日本人的想法不同，日本人肯定认为你有问题。

[73] 萨评：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日本社会那样繁琐的规矩。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

[74] 萨评：三岛女士，应该是美国卫斯理学院毕业的三岛澄江女士，此后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并在纽约出版《我的狭岛祖国》即*My Narrow Isle*一书，成为美国人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窗口。作者写《菊与刀》时，多半参考在英美日本人的英文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对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她的日语不好，无法流利阅读日文原版著作，而已经欧美化的日本人的英文作品，又使人想起了鸠摩罗什对自己翻译的佛经的看法——读翻译过的佛经，有如吃嚼过的馍。

[75] 萨评：除了早期的维新志士，作为在亚洲自居上位的日本人，二战前到了欧美学习的日本人常有不适应的感觉。因此，这部分人发生了两极分化，或者成为崇美者、反对对美开战，或者反而成了二战中对美作战最为凶狠猛烈的军官。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决定改变自己对于上下位的考虑。



【图9】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属于日本极端的亲美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差点被反美派暗杀，但开战之后却是美军最难缠的对手之一，这种矛盾表现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并不奇怪。

[\[76\]](#)萨评：事实上当时能够到国外的中国姑娘，都出身于中国传统的士族，代表了中国文明的传承一面，自然表现出文雅高贵的特征。但中国的长期愚民政治，又破坏了中国下层人民的教育，从而使当时的中国表现出一种高度文明与高度愚昧并存独特现象。至今，中国人依然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人群。

[\[77\]](#)萨评：还有一点让日本人这种体会异常痛苦的就是他们很少有思想准备去经历这种变化——明治维新是一种变化，但那是日本人自己要求的变化，并由日本人自己来执行和完成，所以他们只觉得这是传统的一种异变，但还是按照日本传统架构进行的变化。而出国留学，就是被迫被动地接受改变了。相对来说，地处大陆的中国人这方面要容易适应得多。他们几千年来就不得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 第十一章

### 自我修炼





日本战败后物资极为匮乏，甚至在国会大厦旁边，都开始种植蔬菜。

一种文化中的自我修炼似乎对于外国观察者没有任何相关意义。修炼技巧本身非常明确，但为什么还要如此不辞辛苦？为什么自愿将自己吊在钩子上？<sup>[1]</sup>为什么全神贯注于丹田？<sup>[2]</sup>为什么从来都不铺张浪费？<sup>[3]</sup>为什么只注重一种苦行，而对那些外人认为的确重要、需要修炼的东西，比如某些冲动却不进行控制呢？<sup>[4]</sup>如果有些观察家来自从不教授修炼方法的国家，当他们来到极度依赖修炼方法的民族当中时，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

在美国，自我修炼的技巧和传统方法相对来说不很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中抓住了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有必要，他就会修炼自己，以求实现这个目标。是否进行修炼取决于他的雄心、良心或者是魏伯伦<sup>[5]</sup>所说的“职业本能”。为了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可以忍受严厉的管理；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活动，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他可以凭借良心避免一切罪恶和轻浮。但是在美国，自我修炼是一种技术训练，它不像学习代数一样，可以不考虑将其应用于特定的事例当中。如果美国也有这种修行的话，那一定是欧洲某些教派的领袖或者是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瑜伽修行者所教授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特雷莎<sup>[6]</sup>或圣约翰所传授及实践的冥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在美国也很难存在。

日本人却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孩子，还是参加剑道比赛的人，或者过着贵族般生活的人，除了学习应对考验所必需的特定技能之外，都要进行自我修炼。不管你如何为考试拼命扩充自己的知识，剑术多么高超，也不管你的礼仪上多么细心周到，你都必须放下书本、剑或公共形象，进行特殊的训练。<sup>[7]</sup>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这种深奥的训练，即使对于那些不参与修炼的日本人，他们也都承认这个词和它的实际用途，认可它在生活中有一定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用一整套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这些概念取决于他们对普遍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的观念。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的，另一类则可以给予更多的东西。我将这些东西称之为“纯熟”。<sup>[8]</sup>这两个概念在日本有所区别，其目的在于区分所产生的不同的心理、不同的原则，并能够根据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本书已介绍了很多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炼。如同那位陆军军官介绍的那样，他的士兵在平时的演习过程中可以进行长达六十小时的训练，而中间只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他们知道如何睡觉，我们需要训练他们如

何保持清醒”。在我们看来，这类要求过于极端，但目的仅在于培养一种有能力的行为。<sup>[9]</sup>他讲的是日本精神控制术，这是公认的原理，也就是认为意志应当绝对控制可以进行无限训练的身体，而且身体并没有保持健康的规则，人们往往不计代价地忽略了它。日本人整套“人情”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只要是人生大事，不论身体是否允许，是否能经受得住考验，肉体都必须服从它。不论自我修炼的代价有多大，一个人应当表现出“日本精神”。<sup>[10]</sup>

但是，如此表达日本人这方面的观点，有曲解之意。因为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自我修炼”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自我牺牲”，而且有“不惜任何代价的个人挫折”之意。美国人对于修炼的理论是，男女自儿童时期都要经过训练才能够社会化，不论这种训练是外部强加的，还是意识所形成的；也不论是自由接受的，还是由权威强加的。这都是一种挫折，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剥夺感到愤慨。他必须作出牺牲，并且反抗情绪不可避免地会油然而生。不仅许多美国心理学家持这种观点，父母在家庭中也借助于这个哲学教育每一代人。因此，对于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的分析有很多真理。孩子们到一定时间都“必须去睡觉”，他们从双亲的态度上得知，睡觉是一种自我压抑。在无数的家庭里，孩子们每个晚上都要与父母激烈争论一番，借此表示自己的不满。他已是一个经过教导的美国儿童，将睡觉视为“必须”，却仍然要坚持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橙汁等，但美国孩子却学会反抗那些“必须”吃的食物。他总结出，凡是“对他好”的食品味道一定不好。这种美国习俗在日本是没有的，<sup>[11]</sup>并且在某些欧洲国家也看不到，例如希腊。在美国，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摆脱了食物的压抑。成年人可以吃美味的食物，而不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了。

与西方人自我牺牲的整体概念相比，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是不足为道的。西方人的标准原则是：父母要为孩子作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自己的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来养家糊口。美国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不承认自我牺牲的必要性，但这个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在那种社会里，人们都认为父母亲会自然而然地喜欢自己的孩子，妇女们最重视婚姻生活，<sup>[12]</sup>养家糊口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人或花工。<sup>[13]</sup>这样怎么能说是自我牺牲呢？当社会强调了这些解释并且允许人们根据这些解释而生活时，自我牺牲的概念很难被认可。

在其他文化中，凡是以如此“牺牲”的代价为别人做事，美国人都认为是相互交换。它们或者是以后将会得到回报的投资，或者是对

以前受之于人的回报。在这类国度里，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父子关系。父亲对儿子幼年时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死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sup>[14]</sup>每一件事的关系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确保双方对等，通常是要求一方承担保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彼此都认为有利，任何一方也不认为自己的义务是一种牺牲。<sup>[15]</sup>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之后的约束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不仅对种类有要求，还要求承担等级间的互补责任。因此，在日本，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总是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sup>[16]</sup>他们坚持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做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是出于自愿，或者认为给予是好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放弃了多少，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行为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我们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如果一个民族如日本人那样围绕着如此精密的相互义务来组织生活，自然会认为与“自我牺牲”是不相关的。他们竭尽全力促使自己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则使他们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sup>[17]</sup>而这类情感极易在个人主义和盛行竞争的国家中出现。



【图1】撞向盟军舰只的日本神风自杀飞机



美国人如果想要理解日本人通常的自我修炼方法，就必须对我们“自我训练”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必须把自身文化中“自我牺牲”和“压抑”这些概念周围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一个人就必须进行自我修炼。日本人的态度是，这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在训练时意识不到这是“牺牲”。训练当然是严格的，但这是事物固有的特性。新生婴儿感到“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炼”），他（她）才有充实生活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自我修炼能修炼丹田之气（控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sup>[18]</sup>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炼的原理是——它能改善一个人管理自身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开始修炼时可能感到不耐烦，但这种感觉会消失，最终他将享受修炼，否则就会放弃它。学徒要学会商业经营，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初期，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说：“你的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你放弃修炼，不进行训练，你今后自然不会感到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保护你免受社会舆论批评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炼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明亮而锋利的剑，这当然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炼对个人的好处，并不意味着他们道德规范所要求的那些极端行为不算是真正的严重的自我压抑，<sup>[19]</sup>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不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成为出色的选手而必须作出的自我牺牲，他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投入的时间当做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这会引发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观念中相互义务的约束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炼对个人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重行动，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如此多的借口。<sup>[20]</sup>他们不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不会因为获得了美国人所称的平均幸福而沉湎于自怜当中。<sup>[21]</sup>通过训练，他们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图3】幕府时代的日本人。日本人似乎很少提及追求“平均幸福”而更重视在等级制度下恪守位置。贫瘠的土地、恶劣的生活条件迫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想”。

“纯熟”超越了培养“能力”的自我修炼，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日本作家撰写了日本人关于能力修炼的技巧，但西方人却不容易理解，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又往往忽略了它。有时候，他们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写道：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炼的教派——禅宗是“严肃废话的集成者”。但是，日本人的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可以理解的，探讨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在日语中，有许多词语表达自我修炼能够达到的“纯熟”境界。<sup>[22]</sup>这些词语有的适用于演员，有的适用于宗教信徒，有的适用于击剑者，有的适用于演说家，有的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大师。它们大致的含义都相同。我仅列举“无我”一词为例，这是在禅宗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它所描述的“纯熟”状态表示的是世俗或宗教的经验，是指在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sup>[23]</sup>没有达到“纯熟”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障。日本人把这个称作“观我”、“妨我”。<sup>[24]</sup>在经过特殊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纯熟”者对“我正在做什么”毫无意识。<sup>[25]</sup>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一点不需用力。

这种境界就是“心守一点”。<sup>[26]</sup>这时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图像完全一致。



【图4】铃木大拙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纯熟”境界。查尔斯·艾利奥特<sup>[27]</sup>爵士，英国研究佛教的伟大权威，他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去找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说希望成为基督徒。当问及原因时，她回答说非常渴望乘坐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解释坐飞机与入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她说，有人告诉她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sup>[28]</sup>

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家的职业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专门培养“心守一点”的能力，几乎对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的目标与技巧却有自身的特点。这非常有趣，因为日本的很多技巧都来自印度，在那里都被称为瑜伽。<sup>[29]</sup>日本的自我催眠、专心及控制感觉的技巧仍与印度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体静”，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或专心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

日本也是认可的。除了这些基本内容之外，日本与印度的修炼术之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的苦行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人只能利用这种解脱（“涅槃”）来获得解救，而这个过程障碍是人的欲望。只有通过饥饿、侮辱自己、折磨自我才能消除人的欲望。人可以通过这些成为圣徒，获得灵性，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肉体世界、逃脱无意义人生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sup>[30]</sup>苦行越是极端，目标就能越快实现。

这种哲学对于日本人是陌生的。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少数僧侣接受了这些教义，但从未对社会习俗和大众思想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做是人的灵魂的转世，因此也没有禁止杀生，<sup>[31]</sup>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一般民众更不懂得何为涅槃，僧侣们也对它进行修改，以至使其绝迹。有僧侣学者声称，“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涅槃随处可见，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看到“涅槃”。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世界的空想有任何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述逝者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有不同报应和惩罚的观念。不管什么人，甚至最卑微的农民，死时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龕中的家属灵位就称做“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如此大胆地称呼一般死者时，它当然不会去描述追求涅槃这样困难的目标了。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为了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而让肉体终生禁欲了。<sup>[32]</sup>

同样，在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这种教义。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则寄生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享受感官乐趣是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这一信条在日本人对待瑜伽教派方面，已经从逻辑上达到了极端：不仅去除了一切自我虐待，而且这个教派甚至不禁欲。“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在迷人的乡间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他们的圣洁完全相容。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建立家庭。日本并不接受精神和肉体不相容这样的理论。<sup>[33]</sup>“顿悟”者的神圣在于自我修行的冥想和简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躲避声色犬马的诱惑。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它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种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落的民众、伊斯兰教的信徒、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无论各自的宗教信仰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了“人世所没有的”喜悦之情。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可以。但他们是把这种境界看做修炼“心守一点”技能的方法。他们不将其描述成狂喜之情。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第六官位于心中，训练它可以使其控制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到无声的足音，并准确地跟踪；或者辨别故意放入的食物的诱人美味，而不会破坏入定。味、触、视、嗅、听都“帮助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状态下学会使“各感官都异常灵敏”。

在任何超感经验的教派当中，这都是非常特殊的训练。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之外，用尼采<sup>[34]</sup>描述古代希腊人的语言就是“保持原状，保留市民的名分”。在日本许多佛教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形象地描写了这个观点。最精彩的描述是由高僧道元所作的，他于十三世纪创立了曹洞宗，至今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教派。<sup>[35]</sup>谈到自己顿悟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水平位于鼻子之上……（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禅学著作中，也并不认为“入定”体验除了能培养自我修炼的能力之外，还能够给人以何种力量。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瑜伽声称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却不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

印度瑜伽派教派所基于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勾销了。日本人极其喜欢界定，这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完善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训练方法；还理解为使人获得“纯熟”的一种方法，在此种境界当中，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间隙可言。这是对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付出恰如其分的努力而能够应付任何局面，不多不少，能够使他控制反复无常的心，<sup>[36]</sup>所以无论是外在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动摇。

这种训练对武士和僧侣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而正是日本的武士阶级把禅宗当做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进行徒手格斗，而不



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早期禅宗产生影响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与天台和临济二宗都有深刻关系的荣西<sup>[37]</sup>和尚就写了巨著《兴禅护国论》，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大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毫无迹象能表明，后来传到日本的禅宗会用于军事训练。“如同茶道<sup>[38]</sup>、能乐一样，禅宗完全成为了典型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冥想式的神秘教义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神圣的书籍当中寻找真理，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灾难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规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教）都特别注重沉思、自我催眠和入定<sup>[39]</sup>这类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恩惠的体现，并将其哲学建立在“他助”基础上，即依赖别人——仁慈的上帝的帮助。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重要的例子，则强调“自助”。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与他们的性格非常相似，无论作为僧侣，还是作为政治家或教育者——他们都承担这样的任务——即通过禅宗修行来支持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光明，要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对任何阻挠都不可忍受。扫清所有的障碍……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屠圣，这是获得拯救的唯一之路。”

探索真理的人，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不论是佛教的教义、神圣的著作，还是神学。“佛经篇篇皆废纸”，研究它或许能够获益，却不能产生心灵的火花。一本禅话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人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头头是道，那个新手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佛经、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只是相信求知在一切经典、文献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sup>[40]</sup>

禅师们使用传统的训练方法来教授弟子如何“求知”。训练可能是肉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但任何一种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学习并经常练习正确的刺剑动作，虽然在这些方面达到精通只属于“能力”范围。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初，要求他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像置身庭院之中那样，站立在四英尺高的

柱子上。当他在柱子上感到非常安全后，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眩晕和摔落的恐惧而背叛自身了。<sup>[41]</sup>

人们都熟悉西方中世纪圣西蒙派的立柱苦行术，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炼，它实际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日本所有的身体锻炼方式，无论是禅宗还是农村中的许多普通的方法，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上的瀑布之下，都是典型的苦行修炼，它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抑制身体，有的为了获得上帝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寒冷苦行方法是，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冷的瀑布之下，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目的是训练人的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皈依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持续进行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不会感到水的冰冷，身体在寒冷的清晨也不颤抖时，他就“纯熟”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回报。<sup>[42]</sup>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自己体味。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能以西方式方法对你进行“教导”，因为新手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东西都是无用的。老师或许会和弟子进行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领域。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绊倒，或者用铜棒敲打弟子的指关节，这种冲击会使弟子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sup>[43]</sup>在佛教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最爱使用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为了弟子不顾一切地开悟，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这样的问题。轶事书籍中介绍，有人费时七年之久去解决一个问题，这并不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如何独鸣”、“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背负尸体行者谁”、“从面而入者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在十二三世纪以前，中国曾经使用过这些禅的问题。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些方法。但公案在中国没有延续，而在日本却成为训练“纯熟”的最重要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进入了绝境，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喉咙卡住热铁砣之人”或“想叮铁砣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倒塌，犹如一道闪电般迅速，“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精神努力后，再在这些书中寻找花费如此代价所获得的真理后，你会感到虎头蛇尾。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思索“从面而入者谁”，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sup>[44]</sup>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种大致的模式，以

下对话中了解：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谚语就是“骑牛找牛”。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要用这些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他们认识到，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二难推理中两个命题是不相干的。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天目打开，利用现有方法即可达到目标。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sup>[45]</sup>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考虑探索真理的方法，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相同。

公案被称做“敲门砖”。“门”就装在未受启发的人性周围的墙上，这种人性不仅担心已有手段是否能够满足需要，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将对自己进行赞扬或谴责的旁观者。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感触的“耻感”。一旦砖把门敲开，人就获得了自由，就把砖弃置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公案了。功课已经学完，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获得了解答。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叮铁砣的蚊子”。直到最后他们才懂得，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没有绝境。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能够第一次充分“体味”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sup>[46]</sup>他们的成功实现了修炼“纯熟”的目标。

禅宗的权威铃木把“无我”描述成“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观我”被根除了；一个人“失去了自我”，指他不再是自身行为的目击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识一分为二：行动者和观察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行动者（自我）要求摆脱观察者（自我）的种种限制”。<sup>[47]</sup>因此，在“顿悟”之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只有目标及完成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可以重新表述一下这个观点，就更能具体地涉及到日本文化。一个人如孩童般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并根据别人的评论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非常脆弱。一旦使自己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脆弱的自我。他已经感觉不到“他正在做”。<sup>[48]</sup>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性已经修炼到家，如同练习剑术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面对坠落毫无恐惧之心。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类似的方法来训练达到“无我”的境界。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不受干扰和清晰的感受；<sup>[49]</sup>或者学会通过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达到目标。

即使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也可能体会到“无我”的感觉。在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一个人陶醉于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察者——自我。<sup>[50]</sup>他手上满是汗水，他感觉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在投弹之前也会渗出“无我的汗”。“他没有在做”，他的意识当中已经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于敌机时，他消失在旁边的世界里，同样会渗出“无我的汗”，并消除了观我。所有在这些场合身处此种状态的人，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这些概念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如果取消这些限制，他们就会感到自由和富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等同，并以临危不惧、头脑清醒而感到骄傲。而当日本人让自己进入灵魂三昧境界，忘掉了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感觉到除去了千斤重担。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将谨小慎微的思想灌输于心灵，而日本人则反驳说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达到更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西方语言，就是“活死尸”。在任何西方语言中，这句话都是贬义。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只留一具躯体，没有任何活力。日本人用“就像死了一样而活着”这句话形容人已达到了“纯熟”的境界。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担忧的学生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在鼓励正在进行重要商业交易时，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sup>[51]</sup>当一个人经历着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有任何希望时，也常以“权且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sup>[52]</sup>在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像被邪恶灵魂缠身的人一样，每天他都躲在房间里哭泣。他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他的痛苦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生命赢得了胜利……他要像已死之人一样……他就当已经死了一样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心像死人那样生活，以报答皇恩。”这包含了一些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sup>[53]</sup>上的一捧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零”<sup>[54]</sup>等。

以“无我”为基础的哲学也蕴涵着“像死人一样活着”这样的思想。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谨小慎微。



他已如同死人一样，不需再考虑恰当的行为了。他们不用再报“恩”了，自由了。因此，“我就如同死人般活着”，这句话意味着彻底摆脱了冲突，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前去实现目标。我的‘观我’以及一切恐惧的负担曾经阻隔我和我的目标。在我过去努力奋斗时，紧张和消沉一直困扰着我，现在也随之消失了。现在，对我来说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如同死人一般活着”的状态中已经消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一种监督，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这就生动地表明了东西方人之间的心理差异<sup>[55]</sup>。如果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是指他在作恶时感觉不到罪恶。而日本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受干扰。这个词在美国指坏人，而在日本则指好人，有教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的工作，而又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最大动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无情无义、良心泯灭，那他就不会再有罪恶感，而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性本善，如果他的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在行动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行善。于是，他想努力修炼“纯熟”，消灭对“羞耻感”的自我监督。只有这样，“第六官”才能免受干扰，才能从自我意识和冲突中彻底解脱出来。<sup>[56]</sup>

在理解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时，如果你没有考虑日本人文化中的个人训练，就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人那种属于“观我”的羞耻感使日本人感受到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进行介绍，就很难了解他们精神控制术的真正哲学意义。在任何文化中，其传统的道德约束是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老一辈人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旁观者如果不研究儿童培养方式，就很难理解一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从成人的角度描述日本民族的人生观，因此研究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

---

<sup>[1]</sup>萨评：看来是受了日本忍者电影的影响，这种火器时代已经不大有用的技术日本人却一直视若珍宝。然而，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否则就不会用绞刑处死东条英机了。

<sup>[2]</sup>萨评：这一点日本与中国都能理解是怎么回事，“气凝丹田”无疑是人体调节“小宇宙”的良好方法。但是美国人对中医和气功体系不明所以，要从西医角度将其科学地解释清楚可不容易。

<sup>[3]</sup>萨评：也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美德。

[4] 萨评：日本注重对吃苦的有意训练，因此日本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控制力是很强的。然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又完全无所适从，反应过激。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培训。

[5] 萨评：魏伯伦（Veblen Thorstein, 1857~1929），美国俄勒冈州人，著名经济学家。

[6] 萨评：圣特雷莎（Santa Teresade Jesus, 1515~1582），基督教的著名导师。不过后世使用这个名字的有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名，就是竭尽一生为穷人服务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

[7] 萨评：这一点来自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治理天下最需要的首先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自身的修养，更不要论击剑或者考试了。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理论。不过，能够真正按顺序做到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无疑是近似的，他们都是先找到理论，然后用理论来指导行动，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高瞻远瞩，坏处是不免形而上学。而欧美则更注重实用主义，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从行动中总结理论。这样的好处是见效显著，针对性强，缺点是不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至于两种理论谁更高明一些，就不是我们所能轻易判断的了。

[8] 萨评：原文为expertness，意思是专家级、大师级的水平，这里指的是融会贯通的意思，若是我翻译，更愿意翻译成“道”。儒家的看法，复杂的世界最终都统一于简单的真理，即“道”。因此半本《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一旦人对于真理的理解，或者说这方面的修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他就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而无所不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宋代大儒陆象山在街上看到别人下棋，有人问他为何不下场较技，陆答曰：不懂。但是他很有兴趣，于是约期三日来比赛。三天里，陆每日对着棋盘冥思，忽然悟道——此河图之数也！就此出门下棋，国手不能敌。国手的棋艺就是上面说的能力，是循序渐进培养练习出来的。陆象山下棋，则是先悟了道，而后从道的角度看天下各门技艺就大同小异，出手即可惊人。这是儒家的理想境界。

[9] 萨评：日本人苛刻的训练并非毫无用处。远在战争时期，其夜战部队曾在萨沃岛海战中靠训练有素的眼睛克服了与美国军舰相比的技术差距（美军有雷达，日军没有），结果一举击沉美军四艘重型巡洋舰。近在大松博文训练中国女排，“魔鬼大松”的残酷训练是中国女排最终走向世界冠军的基石。但是，日本人传统上将这种作用过分夸大，就走向了反面。萨沃岛海战之后，日军始终迷信于自己的“猫眼”，无视美军逐步完善雷达性能的工作，结果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再严格的训练也无法使人肉体的能力赶上电子机械的发展。

[10] 萨评：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观念中，人自己的肉体，生来不是为了享乐的，而是为了来受苦和遭受责罚的。

[11] 萨评：这句话不容易理解。我想这是指在日本家长不会强调这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而是让你吃你就要吃。或者以我的观察，当年的日本其实很是贫穷，能有食物已经是一件幸事，孩子也不会有美国那样挑拣的习惯。事实上在中国，这种逼迫孩子吃“对他好”的食

物，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今天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依然经常回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家中的孩子们怎样“如狼似虎”地把饭菜吃光。

[12] 萨评：有趣的是尽管西方的离婚率比东方更高，西方人却坚持自己比东方人更加重视婚姻——正是因为重视婚姻的质量，所以才不能够“凑合”，别别扭扭地过一辈子。而日本人的观点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婚姻都未必稳定，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太过对等，这样就不免发生矛盾，日本则不一样，因为丈夫的地位远远高于妻子，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矛盾自然就少多了。

[13] 萨评：这是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基于等价交换，因此，看不到回报的付出便视为牺牲，而东方文化基于平衡，因此，人们更愿意把这种付出视做一种道德要求下的主动行为，这肯定比等价交换看来高尚多了。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的传统价值观比较相似。

[14] 萨评：中国人的传统哲学中将这种回报提高了一步，除了父慈子孝之外，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照顾自己的孩子，包含有回报父母幼年时照顾自己的含义，所以，照顾子女，也是对父母的孝敬。如果不要孩子呢？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在美国和日本的哲学中都无法找到。

[15] 萨评：这还是以西方的观念看待东方的哲学。实际上，东方的哲学中对这种“等价交换”，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个人的角度看的。这不是某个子女对于其父母的补偿，而是整个社会对于子女的要求。若是把孝精确到补偿的地步，按照等价实施，东方人的反应是——“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时候，一切的数字计算都显得文不对题。子女的孝和父母的养，都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责任。

[16] 萨评：因此，有些西方人说日本人自欺欺人，这多少是因为对他们的哲学不了解的缘故。日本人这些说法即便真的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也是自欺居多。因为从接触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以此为生活的信条。

[17] 萨评：所以大多数日本的神风自杀队员也认为自己是尽义务而已，而不会去想国家有无权利要求自己开着飞机去撞军舰——这一点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在理论上和日本人的思维比较一致，至少是能够相互理解，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中国人会比较理智。中国的哲学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奉乱命”，即便乱命确实是上级下达的。“不奉乱命”也不会被认为不忠，如李鸿章、张之洞等在义和团期间组织东南互保而不奉与列国开战的诏书就是一例。这种开着飞机撞军舰的要求，多半会被认为是“乱命”的。

[18] 萨评：中国人也有“玉不琢，不成器”的说法。最近和日本教育界人士谈起，他们讲到日本教育正遇到一个危机。因为日本目前在引进美国的教育模式，也就是尽量鼓励学生的个性，而避免传统的严格管理，以便学生能够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力。但是，这也是对日本传统“修炼”式教育的反动，所以日本教育界人士很担心搞成邯郸学步，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图2】桀骜不驯的日本少年，也是日本社会的问题之一。

[19] 萨评：就是说不管你主观上怎样想，这种事情是一种压抑，客观上是没法回避的。吃苹果如果咬到一条虫子，日本人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认为吐掉它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好的方法是心中默念——它是红烧肉，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当做红烧肉咽下去了。不过，如果这虫子是有毒的，日本人也一样会中毒，虽然，他的确可以把它从心里视做红烧肉。

[20] 萨评：这倒是一个很客观的说法，也许因为从小受到的自信教育，也许因为百年来国家兴盛罕逢挫折，美国人个个都有“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精神。即便真的犯了错误，他们也更愿意认为自己走上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较绕远的一条。认错？那实在是没有必要的，除了损伤自己的自尊心，对他人有多少益处吗？

[21] 萨评：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实际上是一种很让人羡慕的东西。什么是“平均幸福”呢？解释起来就是不必去争取做“人上人”，也可以不用依附于谁，有求于谁，只作普通老百姓也可以过美满生活。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和日本人，如果处在同样情况下，与美国人的想法不会有太多不同。他们在哲学上表现得不一样，更多的原因是很少国家有美国那样的好条件。中国和日本是不断遭到饥荒、兵乱袭击的社会，如果随波逐流，那根本无法得到美国人的“平均幸福”，而很可能成为乱世中的白骨。事实上，二战中很多日军士兵留下的文献表明，他们对美国人那样轻易地就可以获得幸福生活，既羡慕妒，并且带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心甘情愿地与美国兵同归于尽。

[22] 萨评：换成中国话说，就是“得道”。



[23] 萨评：作者这种写法会被语文老师认为滥用成语，不过她的意思倒不难理解，就是说掌握了“道”的人，做事会自然选择正确的方法而不是慑于外界的监督，无论他所选择的是牺牲还是放纵。说起来“道”似乎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至少以日本人来说有很多具体的标准。但是中国人看来，这并没有多少神秘，一句“这哥儿们把什么都看透了”就是说他悟了道。

[24] 萨评：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王国的境界。

[25] 萨评：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境界。

[26] 萨评：“心守一点”原文是“one-pointed”，是铃木大拙在《佛教禅宗随笔》中使用的。铃木大拙（1869~1966），京都大谷大学佛教哲学教授，禅学专家。和作者参考的其他学者一样，他也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这里面，我以为可以看出美国学者的局限，他们总是信任外国人用英文写的东西而不太肯去啃原文著作。中国人要是研究美国文化而不懂英文那就太奇怪了。关于佛学，铃木用英文发表的主要著作约有十二部，“one-pointed”，来自梵文“ekagra”，表述物我两忘，心集中于一点的状态。通常佛教将此译为“一缘”、“一心”等。

[27] 萨评：查尔斯·艾利奥特（Sir Charles Eliot），哈佛教育之父，十九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他根据自己的大学实践，对十九世纪美国大学改革提出了真知灼见。他的办学思想和主张，如坚持大学改革本土化，提倡选课制，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等，为把哈佛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学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28] 萨评：我对基督教的教义一向颇为尊重，不过一直没起过皈依的念头。但是有一年我跑到北京东堂申请入教，让当地的赵神父（其实是美国人）十分高兴，问我怎么想通了？我说结婚的时候想搞一个教会式的婚礼，不是教徒你们不给办。赵神父的表情精彩得很，手划十字，说：“My God!”当然最后这事儿没成。我和日本女士的入教想法，还有赵神父的“My God”，个人觉得，颇能体现三个国家的不同思维方式。

[29] 萨评：瑜伽调节精神的能力十分出色，但今天也普遍被用于塑造形体，美女们去练瑜伽倒和修行的关系不太大了。不过，瑜伽的一些理论被还珠楼主大加改造之后，成了今天武侠小说的理论基础，这恐怕是印度人难以想象的了。

[30] 萨评：这也是佛教早期思想，认为只有不断地苦行才可以成佛。这种思想在禅宗到来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竞争。禅宗不认为苦行对修行最为重要，而认为“悟”更加重要，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观音座前的善财和龙女就是通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修炼成功的。这个观点受到了东方世界的极大欢迎。禅宗在中国的佛教中占了极大优势，但是到了日本，日本佛徒的接受却是特别的，他们接受禅宗的思想，可是，又不放弃苦行，同时又不放弃世俗的生活……的确是很有日本把什么事儿都搞得越来越复杂的特色。

[31] 萨评：这一点可能是作者对佛教的理解问题。日本佛教脱胎于小乘，不禁肉食、婚姻，所以对于宰杀牲畜等等并不认为是罪恶。作者理解的佛教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的理论中，杀生是违反戒律的。

[32]萨评：所谓什么人都“能”成佛与什么人都“会”成佛是两个概念，日本人认为每个佛教徒都会成佛，也就是说，做和尚是成佛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这个观念其实是结合了日本神道教的传统思想，神道教认为人死就成神，所以日本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这条思想——这也是与神道教争夺信徒的必要条件，如果成佛的门槛太高，无疑信仰的人就不会多了。

[33]萨评：日本佛教的这种现象涉及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日本佛教来自于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的宗旨就是自己修行自己成佛，与他人无关，目的在于度己。每日念“阿弥陀佛”不止的净土宗就是典型的小乘佛教。而吃肉、娶妻与念佛无关。大乘佛教则脱胎于观音的“地狱不空，我不成佛”，以度人来度己，于是，杀生就无法成佛了——这种行为给其他生灵带来了痛苦。当然，这种思想很高尚，可是太难实现，让人望而生畏（观音至今也只是菩萨，不是佛）。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增加了一个观念，叫做“一念之仁”，就是说你只要有“地狱不空，我不成佛”的思想，你就成佛了。这种悖论是中国哲学的拿手好戏。而日本人则干脆地把中国人这种思想“拿来主义”，这样可以避开小乘佛教对于成佛所要求的苦修。不过，日本人更喜欢具体的规则，而不是中国哲学里那些难以量化的东西，所以，把这个观念发扬为——只要做了和尚就可以成佛。有没有一念之仁因为难以衡量，被忽略了。甚至这个做和尚的过程，也可以先上车后补票，就是死后取法名，以和尚的名义成佛。其实，日本是最不怕苦修的民族，为何要给成佛设立如此低的标准呢？我认为是海岛民族的不安感，使他们做任何尝试时，都力求风险最低吧。今天日本的投资者也是这样的。

[34]萨评：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后来走向疯狂。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大体可以形容此人特点。不过，尼采在哲学上的感觉敏锐，造诣出色，他师承叔本华，开创存在主义的先河，说起来，萨特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在中国名声不大好——确切地说在世界上名声也负面的评价甚多。前者大概因为中国近代多崇尚唯物主义，而尼采是唯心主义者，官方对他评价自然不高。后者大概因为他的超人哲学被纳粹借用，结果使他成了和楠木正成一样的替罪羊——楠木正成本来是一个忠诚而多智的武将，二战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借为偶像，结果常被看做罪恶的象征。不过尼采的确是哲学家，他对此早有预料，说过“任何伟大都会被误解”。

[35]萨评：禅宗是日本佛教五大宗派之一。宋代，日本僧人道元至中国拜如镜祖师为师，悟禅。返回日本后广收弟子，与当时受到迫害的达摩宗合流，共立日本曹洞宗，其宗旨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切皆苦”。讲究坐默禅（只管坐禅），并通过公案悟禅。从后面的文字可以看出，道元是个很洒脱的人，他立派的时候，也不肯给宗派起个名字，直到该派四世祖莹山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曹洞宗的名称。在日本古代，曹洞和临济是日本禅宗最大的两个流派，临济多为上层社会和中央所推崇，曹洞多为下层社会和地方所信仰。现在，曹洞宗在日本依然影响很大，但其主要宗旨已经改得很世俗了，是“人权”、“和平”与“环境”。

[36]萨评：日本人极为重视“控制”二字，喜欢把什么都装在条条框框里——从送礼的包装就可以看出这个倾向。所以他们对瑜伽的看法不免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感受——瑜伽可以把

人折成各种形状，显然有些超出控制，所以不好接受；可是瑜伽能把身体控制成那样不可思议的形状，又说明它的控制力之强大，实在让人羡慕。

[37] 萨评：荣西（1141~1215），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初祖，曾经两次赴宋朝学法（想去印度，大宋的官儿不给通行证），回日本后促进了禅宗的发展，使临济宗成为日本佛教的泰山北斗。这个人的一生传奇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有人笑他身矮貌丑，他回答说“虞舜王于赤县，晏婴相于齐国，未闻身長也”，他人因此惭愧。要是中国人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这个故事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这故事还要有一个尾巴——于是荣西努力修炼，百日后身高长了四寸。总的来说，荣西的佛教观比较世俗一些，他的著作、他的富有，乃至他的擅长辩论，都显示这是一个善于入世的和尚。

[38] 萨评：荣西也是把茶带到日本的第一人。

[39] 萨评：日本的神道教是一种本土的多神教，与中国的道教毫无关系。但是，神道教没有入定形式的修行方式，这倒是和中国道教一样。



【图5】神道教与道教截然不同，比如供奉的神仙就很独特，如图中的天狗神像中国人只怕很难和神仙联系起来。

[40] 萨评：曾经和国内的僧侣探讨过这个问题——既然禅意可以顿悟，为何还要读那么多的佛经呢？和尚说，禅意就像鸟，飞来飞去，可能你一挥手就正好撞上，佛理则像网子，你懂得越多，捉到鸟儿的机会也就越多。

[41] 萨评：东方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认为在物理的人体之外，还存在一个具备极深潜能的自我，只要能够发现和唤醒这个自我，就可以具备超人的能力。这种理论未免不够科学，但是却使东方人在开拓人体潜能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例如气功、瑜伽，都是东方在开拓人体潜能方面为全人类提供的瑰宝。

[42] 萨评：从人体生物学角度，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人“纯熟”不容易达到，倒是感冒和肺炎很容易达到的。



战败后的日本出现了粮食恐慌，这是日本人在详细研究政府部门提供的代用食品做法。

[43] 萨评：曾经真的和日本的僧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借着电视剧《姿三四郎》中有此风格的“榔头和尚”的话题谈的，倒是得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解释，那就是人在痛楚的时候往往知觉和思维更加敏锐，所以平时悟不到的事情，在他脑袋上来一榔头（木头的），可能就会醒悟了。

[44] 萨评：仔细思索南岳的回答，可以认为这是在三维立体坐标以外又发现了时间轴，把世界变成了四维空间，极大的哲学进步。





美军占领日本后，冻结财阀的财产。不过由于他们的影响太大，最终美方还是采取了和他们合作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三菱、三井等商标。

[45] 萨评：其实这种观点在哲学上起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也就是说世界有大宇宙、小宇宙之分。眼睛外面的一切，是大宇宙；眼睛里面的一切，是小宇宙。而大小宇宙并无谁可主导的区别，所以，人在眼睛后面可以发现的和眼睛前面可以发现的，可以是一样的多。

[46] 萨评：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说重要性很高。美国这样的民族可能很难感觉到自己“观察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本质是为己的，遵守社会的法律、道德，原因是为了有利于自己，也让别人能更好地为己。于是，我为什么吃饭？我饿了，所以要吃。我为什么买这本书？我喜欢，所以我买了。这里面对自己的观察——或者干脆说监视的成分很弱。但是日本人不同，他们同道学统治时代的中国人，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孝文一样，首先是为了“社会中的我”而活着的。我为什么吃饭？到吃饭时间了，所以要吃。我为什么买这本书？每个书香门第都要有这本书的，所以我买了。这种思维下要说人人都能甘之如饴未免要求太高。于是，摆脱掉这个自我的监视者，就成为潜意识中一件非常重要和愉快的事情了。不过，贸然去掉这个自我的监视者，必然会造成自己不容于世，这个顾虑就是他们的所谓“墙”，能突破这道墙，是日本人极大的成就。虽然，很多其他民族中，这道墙根本就不存在。

[47] 萨评：很多日本人表示他们最终悟到了怎样自由地驰骋于这些复杂的关系之间，而中国人的看法，这不过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庄周的门徒和大多数美国人会问：谁把你绑在轮回上？如果形容日本式的自由，就是带着锁链跳舞还能跳得神采飞扬。日本人的确可以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而充分享受这种自由自在，但其他民族就像无法像印第安人吃烤蠕虫一般，无法“享受”这种自由。

[48] 萨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看到小孩落入湖中的时候，不假思索地去救，就是“无我”。如果是自己提醒自己——你不去救人的话就是狗屎、虫豸……那你就还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

[49] 萨评：这里说到的“无我”似乎是一种哲学的境界，一旦达到，人就接近于白日飞升。实际上，有的人或可以在一方面达到无我的境界，但在其他方面就很难说。比如沈括，在科学方面他是热情的实验学者、狂热的“赛先生”的信徒，在其他方面，却是一个市侩的官迷。所以，认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成就高，就应该是道德圣人，那肯定是错误的看法。

[50] 萨评：对外国人来说，被能剧或者歌舞伎的情节感动的概率极低，这里说的应该是日本人。这就是文化积淀的影响，比如中国人看《四郎探母》就会被感动，一个唱腔也会想到后面的欢愉或伤痛，而外国人再精通汉语，也难以达到同样的境界。



【图6】日本的民族剧目——“能”，很多日本人看能剧会进入“无我”，但外国人只会感到不知所云，即便他精通日语！这是因为他很难理解其中的各种暗示。

[51] 萨评：中国人也在紧急的时候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或者“除死无大事”，但绝不会认为“活死人”是生命的最高境界——虽然金庸小说里面的确有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活死人”王重阳。中国人认为真正最高境界的人，一定是具有非常正常的人类感情的人，所谓“圣人不泯赤子之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哲学比日本的哲学要亲民一些。

[52] 萨评：贺川丰彦（1888~1960），是日本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作家，著有“超越死亡线”丛书，与罗素等名人为友，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曾多次来华访问，对中国教会有很大影响。1920年曾在上海与孙中山有深入的会谈。

[53] 萨评：位于东京以南一千公里的小笠原群岛，1945年2月至3月间美军攻打此地以作为B-29轰炸机轰炸东京的中转站，日军在守将栗林忠道率领下顽强死守，最后以日军除1000人被俘外22000人全军覆没、美军伤亡26000人告终。此战，日军采取了深挖工事，不主动出

击，以让美军流血为唯一目的的战术，令双方损失惨重。近来热门的电影《硫磺岛书信》说的就是这次战役的一个侧面。

[54] 萨评：日军1942年1月从泰国入侵缅甸，遭到以中国远征军为主的部队顽强抵抗，但由于盟军内部矛盾重重，日军最终攻占缅甸。1943年10月，在印度进行整顿的中国远征军经过整训，与云南方面的第二路远征军同时发动进攻，开始收复缅甸之战。到1945年1月27日，双方在芒友会师，在缅甸的日军损失惨重，中将水上源藏自杀。

[55] 萨评：实际上中国的所谓道学先生，也是有意无意扮演着类似“观我”、“妨我”的角色。并且在他们消失以后，人们依然在心中难以将他们消除。不过，中国人并不认为排除了这种监督，人就可以自动走上正途。与日本人人性本善的观点不同，中国人既有孟子的人性善论，也有荀子的人性恶说，所以中国哲学的悟，不是回到原点，而是一次升华，是一定要达到一定的修炼程度，才可以实现的。

[56] 萨评：作者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二战中的日军士兵是因为秉承了日本式的“无我”修炼，所以抛弃了平常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像死人一样”同盟军顽强作战。如果是这样，那多少有些偏离了事实。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这种“悟”都是对道德修炼很高的人的要求，而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并没有多少这种对悟道的追求。日军在二战中不顾现实地顽强战斗精神，有很多复杂的成因，如它的军事训练思想其实来自西方，但比西方贯彻得更加彻底，以利用精神力量代替缺乏的物质基础，同时其民族性中的服从性与忍耐力，又使其更加极端。不过，更应该说日本兵的这种精神是训练的结果，而与哲学拉不上太大关系。西方人研究东方，总有一种“东方人很神秘”的心理暗示，而西方的研究方法又追求逻辑的紧凑，对东方“道”一类朦胧的东西束手无策，所以难免会钻一点牛角尖吧。

## 第十二章

### 儿童教育





日本报刊的新闻照片，感谢美国人为日本儿童送来了食物。

日本人并不像那些勤于思考的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教育子女。美国父母培养孩子将来所要面对的生活远不及日本的那种生活那么谨小慎微和克制欲望，但也会从一开始就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愿望并非世界的最高准则。我们严格地遵守婴儿哺乳和睡觉的时间安排。在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无济于事。稍大一些的时候，母亲们会敲打婴儿的小手来制止婴儿吮吸自己的手指或者触摸自己身体上的某个部位。而且，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当母亲外出时，那婴儿就必须待在家里。当婴儿愿意吃其他食物之前，父母也要让他断奶，如果小孩还习惯用奶瓶进食，那就不让他用奶瓶。对于有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孩子们都必须吃。当孩子做错事时，就要受到惩罚。因而，美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象，日本的小孩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训练。因为他们长大后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并非常小心谨慎地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

然而，日本人并非这样教育孩子的。与美国的人生曲线相比，日本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那条曲线就像一个很大、非常浅的U字，婴儿和老人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宽容。<sup>[1]</sup>幼儿时期之后，父母对孩子的限制会逐渐增加，当他在结婚前和结婚后，并且能够独立生活时，曲线达到了最低点。这个曲线在壮年期将持续几年，之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不论男女就又像幼儿那样不受羞耻的影响。在美国，这种曲线是颠倒过来的。人们对幼童进行严格的训练，但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日益放松，直到他长大成人，独立生活，找到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建立自己的家庭，就不再受到严格的约束了。在美国，人生的壮年是自由和主动性的最高点。当人的能力或精力都日益减退，或者依赖于他人之时，就又会受到约束。美国人很难想象要用日本人的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因为这对美国人而言，是违背现实的，是不可思议的。<sup>[2]</sup>

但是，美国和日本的人生曲线安排，都要确保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壮年期积极地参与到该国的文化当中。在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给年轻人在壮年期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而日本却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尽管青壮年时期是体力最充沛、谋生能力最强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就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日本人确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方法，能产生自由取得不了的效果。<sup>[3]</sup>虽然日本人在人生最鼎盛的时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但这并

并不意味着这些约束要影响到日本人的一生。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

那些对小孩很纵容的民族都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与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觉得对孩子的爱能够带来快乐。但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喜欢孩子的原因却沉重得多。他们要孩子却不仅仅只是为了情感上的满足，更主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小孩而使家族不能延续，他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每个日本男人必须有一个儿子，以便自己死后有人能在厅堂供上自己的灵牌，每天祭拜，使家族能够延续，来维护家族的名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儿子需要父亲一样。<sup>[4]</sup>在将来，儿子也要成为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取代父亲，而是为了使父亲放心。在一段时间内，父亲仍然是“家里”的主人，之后儿子将要承担这样的角色。如果父亲不把“一家之长”的权利转给儿子，世人就会说父亲的角色没有意义。正是这种深深的延续感才使成年的儿子对父亲的依赖时间即使比美国的长得多，却不会像西方国家的人那样感到羞耻和耻辱。<sup>[5]</sup>

对日本妇女而言，想生个儿子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同时也是因为只有当了母亲后才有地位。没有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没有稳定的地位。即使没有被抛弃，也不会有希望成为婆婆，能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自己的权威。为了延续家族，她的丈夫可能会收养一个儿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sup>[6]</sup>日本的妇女都希望能多生孩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日本人口的年平均出生率是千分之三十一.7，甚至高于东欧那些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国家，而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七.6。日本女人生孩子的年龄一般都很早，多数女性会在十九岁就生育。<sup>[7]</sup>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是私密的事情。妇女在分娩时不能大声尖叫，以免让外人知道。需要给婴儿准备新床垫和床单，因为新生儿睡上新床才会吉利。如果没有钱做新的，也可以把被单和棉絮整理干净，重新做成“新”被。小孩的被褥不像大人的那样硬，也更轻。所以，据说小孩只有在自己的小床上才会更舒服。但婴儿与大人分床睡觉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基于某种“感应说法”——一个新的生命应该有自己的新床。婴儿的睡床一般都靠近母亲的床，但婴儿并不和母亲同睡，只有在小孩长大一点想要和母亲同床睡之后才可以同睡。日本人说，小孩到了一岁大小的时候，就知道伸出双手，让大人知道他需要人抱了，这时母亲才会搂着婴儿慢慢入睡。

在日本，母亲在婴儿出生后的前三天是不会哺乳的，直到出现他们所认为的真正乳汁。三天后，婴儿就可以随时含着乳头了，可能是吃奶，也可能只是因为喜欢。日本女人也喜欢哺乳，并将其视为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而婴儿也最容易学会感受母亲的这种快乐。乳汁不仅是一种营养品，同时也能带来喜悦和快乐。出生后的头一个月，婴儿要躺在小床上，或是由母亲抱着。当婴儿出生三十天左右，母亲才能抱着婴儿去当地神社，参拜过后，小孩的生命才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身体当中。这时带着他在外边自由活动才是安全的。<sup>[8]</sup>一个月之后，母亲就会背着他。她们通常是用两根带子绑于孩子的腋下和臀部，然后再绕过自己的双肩，在腰前打个结。天冷时，母亲就给孩子裹上自己的外衣。家里年长的小孩，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带着婴儿，甚至是在玩垒球或踢石子的时候。农民和贫困家庭更是依靠这种小孩来照顾小孩的方式。<sup>[9]</sup>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生活在公共环境当中，所以很快就显得非常聪明、有趣，似乎也能享受那些大孩子们的游戏”。日本婴儿都是四肢伸开被绑在母亲背上的，这种方式与太平洋上各个岛屿及其他地方常见的用披肩携带婴儿的方式非常相似。这主要是为了培养一种被动性，认为用这种方法包裹的婴儿，长大后能够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睡觉。但是，日本人包裹婴儿的方式并不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是为了培养完全的被动性。婴儿“学会像小猫一样紧贴着背他的那个人的后背……绑他的带子也足够安全，但婴儿……自己可以通过伸展来获得使自己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非常熟练地伏在别人的背上，而不只是仅仅被绑在别人肩上。”<sup>[10]</sup>

母亲工作的时候就把婴儿放在他自己的床上，外出上街时就带着婴儿。母亲会跟婴儿说话，给他哼着歌曲，让他做出礼貌性的动作。当母亲给别人还礼时，她也会让婴儿的头和肩膀向前，以示敬意。总之，养小孩是要费很多心思的。每天下午，母亲都带着婴儿一起洗热水澡，并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逗弄着玩儿。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就要使用尿布，而且尿布是用非常厚的布制作的，由此日本人将他们的罗圈腿归咎于这种尿布。<sup>[11]</sup>过了三四个月，母亲就会教小孩自己大小便。当觉得小孩要便溺的时候，母亲就把小孩抱出门去，嘴里吹着低沉单调的口哨，等着孩子大小便。<sup>[12]</sup>而小孩也知道这种口哨刺激的含义。人们都认为，日本的孩子和中国的一样，很早就被培养学会如何撒尿。如果尿床了，有些母亲就会轻轻地拧小孩的屁股，但通常是将小孩训斥一番，并且更加频繁地教这样调皮的小孩到户外大小便。当婴儿拉不出大便的时候，母亲就要给他清洗肠子。母亲们说这样会使婴儿舒服些。当学会大小便后，婴儿就可以不用带粗厚而且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尿布了。<sup>[13]</sup>日本的儿童的确很讨



厌这种尿布，不仅仅是因为它太厚了，而且是因为儿童每次将尿布尿湿后，日本人是不习惯换尿布的。而婴儿还太小，还不了解学会撒尿与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关系。他们不能逃避这样每天强加的不适。而且，在小孩撒尿的时候，母亲让婴儿远离自己的身体，把他抱得紧点。这种令人不适的训练使日本人长大后易于接受日本文化中各种微妙的强制性规定。<sup>[14]</sup>

日本的婴儿通常都是走路之前先学会了讲话。人们不鼓励婴儿爬行。根据传统的习惯，婴儿不满周岁不应该站立或走路。所有的母亲都不允许孩子有这样的尝试。<sup>[15]</sup>近一二十年以来，一份名为《母亲杂志》的政府刊物向母亲宣传，让她们鼓励婴儿走路，由于这份廉价、发行量广的杂志的宣传，这种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所接受。母亲们会在小孩的胳膊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但是婴儿学说话的愿望还是会更早些的。当婴儿开始讲单词的时候，大人们逗他们的语言则变得更有目的性。人们并不是让婴儿在偶尔的模仿中学习语言，而是教他们单词、语法和敬语，小孩和大人们都喜欢这样的方式。

在日本的家庭当中，当小孩在学会走路之后，就会干出很多恶作剧。例如他们会用手指捅破窗户纸，或者掉到地板中间的地灶当中。<sup>[16]</sup>为了遏制这些事情，大人就夸大房间的危险。在日本，人们认为踩门槛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他们的禁忌。日本的房子没有地下室，是靠柱子把房子架在地面的。如果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就会认为整个房屋都会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决不能脚踩或坐在两张榻榻米的结合处。榻榻米具有标准的尺寸，人们通常将房间称为“三帖室”<sup>[17]</sup>或“十二帖室”。大人经常告诉孩子们：在这些榻榻米的连接处，古代的武士会用刀剑从房间底下把坐在这些地方的人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榻榻米是安全的，连接处的缝隙则是危险的。母亲在警告自己的孩子说“危险”或“不行”时，即表达了这种意思。另一个经常使用的警告词语是“脏”。日本人家里的整洁和干净是尽人皆知的，所以婴儿要学会重视它。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日本小孩都一直是不断奶的。近些年以来，政府的《母亲杂志》倡导婴儿在八个月之后断奶。中等阶级的女性已经使用了这个方法，但在日本还未成为普遍的风俗。日本人认为，哺乳是母亲的快乐，<sup>[18]</sup>即便是那些逐渐采用了新习惯的母亲也认为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们为了孩子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她们接受新的理论，认为“长期吃奶的孩子身体不好”，并指责那些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她们批评道“那些母亲们说没法断奶，那是因为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奶”，“是为了使自己高兴”。正是母亲们不愿断奶的这种态度，使新做法未能普及。另

一个长时间哺乳的实际原因是：日本传统上还没有一种专门针对刚断奶幼儿的特殊食品。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断奶，他应该吃些粥状的食品，但通常日本儿童都是从母乳直接过渡到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很少喝牛奶，<sup>[19]</sup>也没有针对婴儿的特制蔬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政府所提出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的理论。

在婴儿能够理解大人所说的话之后，他就可以断奶了。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把婴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给婴儿喂一点儿食物，这时候的婴儿食量也增加了。在有些儿童身上会出现喂养的问题，如果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断奶，这就非常容易理解。常常暂时让孩子吃一些甜食，让他们不再吃奶。有时母亲们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取笑幼儿说，如果想要吃奶，那就只是个小孩子。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他和你一样小，却不吃奶”，“那小孩在嘲笑你呢。你已经长大了还要吃奶”。两三岁甚至四岁大还恋奶的小孩们，<sup>[20]</sup>如果听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过来，就会马上放开妈妈的乳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用这种嘲笑的办法来鼓励小孩们早点长大，不仅局限于断奶的时候。从孩子能听懂说话时起，在很多场合都使用这种方法。例如当男孩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你是个男子汉”！或者说“你看，那个小孩都不哭”。<sup>[21]</sup>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对那个小孩表示亲近，并且说：

“给我当儿子吧，我想要这样聪明听话的孩子。而你长大了还不听话。”而她自己的孩子则飞快地跑过来，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不，不，我不想要别的孩子，我听你的话。”当一两岁的孩子特别爱闹或者不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你愿意把这个孩子带走吗？我们家实在不想要他了。”客人也会逢场作戏，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于是孩子就哭着喊着要妈妈救他。当母亲看到有效果了，就温柔地把孩子带到自己跟前，并要求还在哭泣的孩子发誓，以后要老实听话。有时对五六岁的孩子也使用这种小伎俩。

大人们还会用其他方式来逗弄小孩。比如，母亲会转向他的父亲说：“我更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个好人。”这时，孩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嫉妒表情，竭力要把父亲和母亲拉开。然后母亲就说：

“你爸爸从来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会立即抗议道：“不，我不是那样的，我是一个好孩子。现在，你喜欢我了吗？”当玩笑达到了预期效果，父母就会彼此相视而笑。不论男孩女孩，他们都用这种办法去嘲弄他们。

这种经历滋生了日本人害怕受嘲笑和遭到别人轻蔑的心理，这在日本成年人当中非常明显。<sup>[22]</sup>不清楚小孩多大后会明白大人的嘲笑

是玩笑，但早晚会懂得的。当他懂得了以后，他就会把这种受人嘲笑的感觉与儿童时期害怕失去安全和亲近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长大成人之后，在受到别人的嘲笑时，幼儿时期的经历仍然会留有阴影。

这种嘲弄会让二至五岁间的小孩产生更大的恐惧，因为家是个安全与放任的天堂。父亲与母亲之间，无论在体力还是情感上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很少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竞争。母亲或祖母往往承担家务，教育小孩。对父亲则是毕恭毕敬、无限崇拜。家庭中等级制度的次序也十分明确。<sup>[23]</sup>孩子们了解了年长者有特权，男人的特权比女人多，兄长的特权比弟弟多。但是，童年时代的孩子是会受到全家人溺爱的，尤其是男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永远可以从母亲那里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一个三岁男孩可以对母亲大发雷霆，但对父亲却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如果受到了父母的嘲弄，或者对要把自己“送给别人”的话感到很生气，他就会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恨都发泄到母亲和祖母身上。<sup>[24]</sup>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会脾气暴躁。从农村到上流社会家庭中，脾气暴躁被看做是三到六岁孩子的通病。小孩往往是用他的小拳头捶打母亲，哭喊着，最后将母亲最珍视的发式弄乱。母亲毕竟只是女人，而他仅三岁的时候就是个男子汉了。他能够满足自己的攻击心理。

而孩子对父亲则只能表现尊敬。对孩子而言，父亲在等级制度上具有较高的地位，是他的样本。用日本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仅仅只是“为了训练”，孩子也必须学习如何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父亲相比较，日本的父亲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都要少一些。教育孩子属于妇女的职责。父亲如果希望孩子去做什么，只需要眼神或者简短的训斥就可以了，而孩子们几乎都会立刻听从。父亲在空闲时间也会给孩子做点玩具。在孩子会走路之后很久，父亲才偶尔如同母亲那样带带孩子。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父亲偶尔会承担育儿的责任，而美国的父亲通常将这个任务全部交给母亲来完成。

<sup>[25]</sup>

虽然孩子也需要对祖父母表示尊敬，但他们在祖父母面前有很大的自由，可以纵情撒娇。祖父母并不教育孩子。如果祖父母觉得对小孩的管教过于松弛，那么就会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但这会导致许多矛盾。祖母通常整天守在孩子身旁。而且，在日本的家庭当中，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情屡见不鲜。孩子们自己认为，双方都宠爱他们。对祖母而言，她可以利用孙子来控制儿媳。而年轻的母亲最大的义务就是要博得婆婆的好感，不管祖父母如何溺爱孙子，媳妇也不能表示任何的不愿意。<sup>[26]</sup>如果妈妈对小孩说不能再吃糖了，而祖母却马上又给他一些糖，还要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的糖没有毒”。在许多家庭当



中，祖母给孩子的礼物都是母亲无法给予的，并且祖母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陪孩子玩。<sup>[27]</sup>

在日本，哥哥和姐姐受到的教育是要宠爱弟妹。在另一个孩子出生后，日本的小孩会强烈地感受到被“忽视”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要把妈妈的乳汁和床铺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新宝宝诞生之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他将会有一个真娃娃了，而不是“假的”了。他被告之要去跟爸爸而不是妈妈睡觉了，而且把这描绘成一种特权。小孩对家里为新宝宝所做的各项准备很好奇。新婴儿出生时，小孩也会由衷地感到激动和喜悦，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并且认为这件事情是意料之中的，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威胁。失宠的孩子经常想把婴儿抱走，并且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母亲回答说：“不行啊，这是我们家的宝宝，我们应该对他好。他喜欢你，我们需要你来帮忙照顾小宝宝。”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反复出现，因而母亲并不是特别担心。<sup>[28]</sup>出现这种情况后，人口多的家庭里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解决的办法：孩子们会间隔结伴。父母喜欢让老大来照顾老三，让老二来照顾老四。年纪小的孩子们也是互相照顾。直到七八岁之前，性别对这种做法并没有很大的影响。<sup>[29]</sup>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亲、亲戚朋友们都给孩子们做或买布娃娃以及其他玩具，穷人们则几乎都是自己做的。小孩们就拿布娃娃和其他的玩具来做游戏，如摆家家、举行婚礼、过节日等等。在玩游戏之前，通常要争论大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正确”步骤是什么，通常要让母亲为此下一个结论。如果出现了争吵，母亲就会说“贵人度量”，要让年长的孩子让着年龄小的孩子。经常还说“以退为进”这样的话。母亲这么讲，三岁大的小孩很快就明白了。那就是说把玩具先让给小小孩玩，小小孩很快就会腻了想要别的东西，大孩子就能拿回曾经放弃的玩具。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也是让年龄大的小孩担当不受欢迎的角色，这样大家都能够获得乐趣，而自己也“不吃亏”。在日本人生活中，即使是成年人也对这种“以退为进”的原则非常尊重。<sup>[30]</sup>

除了训斥与嘲弄之外，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是日本人在教育孩子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甚至给孩子们糖果，也常被作为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当小孩接近上学的年龄时，人们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一个小男孩脾气非常暴躁，不听话，还特别闹的话，母亲就把他带到神社或寺院里去。母亲的态度是：“我们到这里是为了求佛的帮忙。”<sup>[31]</sup>这通常是一次短途旅行，寺庙里的僧侣会认真地和孩子谈话，询问他的出生日期和他的麻烦。然后僧侣就开始祈祷，并说小孩已经治好了。有时僧侣说孩子淘气的原因是虫子在作怪。于是，他就



给小孩清洁身体，然后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甚至对日本小孩进行最严厉的惩罚也被当做一种“良药”。就是把一种盛满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烧。这种方法会在小孩身上留下永久的伤疤。“艾灸”是东亚一带古老的流行疗法，日本也有用它来治疗各种疼痛的传统。它还可以治脾气暴躁和固执，母亲或祖母们经常用这种方法给六七岁的小孩治疗。<sup>[32]</sup>对于十分顽皮的小孩子，可能要灸两次，但很少有那种需要灸三次的特别淘气的孩子。这种方法并不是一种惩罚，没有美国人所说的“你要这么干，我非揍你不可”这句话的意思。但它远远要比挨打更为痛苦，因而孩子们知道，淘气就要受惩罚。<sup>[33]</sup>

除了这些惩罚调皮孩子的方法之外，日本人还有很多教授孩子必要的身体技巧的传统方法。他们非常强调教师亲自教孩子如何做动作，而小孩则是言听计从。两岁之前，父亲就教小孩如何用正确的姿势盘腿端坐，两腿要交叉，脚背要贴着地板。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常常要向后倒。端坐训练的关键在于身子要保持稳定，不能坐立不安或者改变姿势。日本人说，其中的诀窍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的状态。父亲会摆正小孩的腿，而小孩则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sup>[34]</sup>身体姿势的训练不仅仅包括学习坐姿，而且还要学习睡姿。日本妇女对姿势是否端庄非常重视，这就像美国妇女关心自己是否被人看到裸体一样。<sup>[35]</sup>虽然日本人认为裸浴并不羞耻，只是后来日本政府为了赢得外国政府的认可，才宣布此种风俗为陋习。但日本人却对妇女的睡姿十分在乎。对男人的睡姿没有什么限制，而妇女则必须双脚并拢，身体保持正直地睡觉。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最早的规则之一。和其他所有的规则一样，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更加严格地遵守这个规则。杉本夫人（钺子）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她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教养时写道：“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小心地、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身心不乱的，即使在睡觉时也是如此。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四肢随意放置。但是女孩子睡觉姿势必须端庄，表现出自制的精神。”<sup>[36]</sup>日本妇女告诉我，在她们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会亲自把她们的手脚都摆放规矩。

在用传统的方式教授书法时，也是老师亲手教学生练习，来书写这些表意文字。<sup>[37]</sup>在孩子认字之前，小孩就学习着体会那种受约束、有韵律的书写方法，而不是真正地书写。在现代大规模的教育中，这种教授方法已不像从前那么常见，但仍然存在。鞠躬、用筷子、射箭以及在后背系个小枕头代替婴儿等等，也是这样通过摆正孩子们的手和身体姿势而教授的。

除了上等人家的小孩之外，日本的小孩子在上学之前就与邻居的小孩们自由玩耍了。在农村，孩子们在三岁之前就建立了小的游戏团体。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也在车水马龙的拥挤街头玩耍。孩子们拥有特权。他们可以停留在商店旁边听大人们说话，或是踢石子和橡皮球。他们还聚集在村庄的神社里玩耍，在神的庇护之下他们会感到安全的。在上学之前以及之后的两三年当中，男孩和女孩都是在一起玩耍。但更多情况下还是同性小孩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特别是相同年龄的孩子。这种在同年群体中培养起来的友谊能够终生持续下去，超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友谊，在农村更是这样。在须惠村，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夫妻间性吸引的逐渐减退，与同龄人的聚会更能带来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有句俗话叫‘同龄密友比老婆还要亲’。”<sup>[38]</sup>

学龄前的儿童在彼此间是无拘无束的。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的很多游戏就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猥亵的事情。由于大人们谈话时不避讳，也由于日本家庭居室狭窄，孩子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性知识。而且，母亲在给孩子洗澡或者与他玩耍的时候，也常常指着小孩的生殖器来逗他，尤其是男孩子的阴茎。因而，只要能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会对小孩的性游戏进行谴责。也不认为手淫是危险的事情。<sup>[39]</sup>小孩之间可以用成人生活中视为污辱的语言随便相互批评，或是用成人生活中视为羞辱的方式来炫耀。日本人会平静地笑着说，“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并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感到如此幸福”。孩子和成人间有如此巨大的不同，因为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意思是说他丧尽颜面。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相互品评家庭情况和财产状况，他们还特别喜欢夸耀自己的父亲。他们会说“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他们甚至会为自己尊敬的父亲打架，这类行为对美国人而言根本不值一提。<sup>[40]</sup>但在日本，孩子们所说的和他们听到的完全不同。因为大人都会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称自己的家庭为“寒舍”，称邻居家庭为“贵府”。日本人认为，儿童时期的很多年里——从组成游戏小团体到小学三年级，也就是九岁左右的时候，所有的小孩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主张。有时候，他们会这样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而另一个说“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候是夸耀自己，贬低别人，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知道不能这样说话了。于是，他们就变成了不问就不说，而且不再炫耀了。<sup>[41]</sup>

孩子们对超自然事物的态度是在家里学到的。神官和僧侣是不会“教”孩子们的。一般而言，当孩子们和其他人去参加盛大节日时，就接触到了有组织的宗教，他们和其他的参拜者们一起接受神官的洗

礼。有些孩子也去参加佛教活动，但通常都是在节日期间。小孩们最频繁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体验是家庭祭祀活动，主要围绕着佛坛和神龛举行。在所有的灵位中，最显赫的是带有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了，那里供着鲜花、树枝及香火，每天还会供奉食品。家中的年长者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每天鞠躬。夜晚还要点上小小的油灯。<sup>[42]</sup>日本人通常说自己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不进行这些祭拜仪式，他们觉得不踏实。神龛通常仅是一个简单的架子，中间供奉着来自伊势神社的神符，也可摆放其他的供品。厨房当中还有被烟灰熏黑的灶神，门和墙壁上也要贴上护符。<sup>[43]</sup>这些东西能为家庭提供保护，并带来平安。村里的神社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大慈大悲的众神在保护着村庄。母亲们都喜欢孩子在这个安全的地方玩耍，<sup>[44]</sup>孩子们的经历也使他们不怕诸神，而且也没有想要使自己的行为特意取悦众神的意思。神灵们应该受大家参拜，并给人间带来福气，他们不是独裁者。

男孩入学两三年之后，学校才开始认真地教育他们，使他们符合成年人的审慎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小孩子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过于调皮，就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的注意力。人们会和蔼地训诫他，有时会嘲笑他。但他自己仍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甚至可以用武力反抗母亲。他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自小就得到了培养，即使在上学以后，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小学的头三年是男女同班，老师非常喜爱每一个孩子，不论男孩或是女孩，甚至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家长和学校却一再强调不要让小孩们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虽然孩子们还很小，不知道“羞耻”为何物，但老师们必须教育孩子们避免“难堪”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故事里的小男孩喊道“狼来了！狼来了！”但其实没有狼，“如果你愚弄别人，那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你了，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sup>[45]</sup>许多日本人都说，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sup>[46]</sup>在孩子的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将嘲笑和履行对社会的情义这样的道德训诫结合起来，逐渐向他们灌输。当孩子六岁的时候，给他们讲一系列以忠、义为主题的故事可以逐渐地约束他们的行为。比如前文我们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恩的故事。长辈对孩子说“如果你这样做，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矩大多都是因时因事而异，但很多是关于我们所说的礼节问题。而且要求孩子们将自己的意愿服从于逐渐增加的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约束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债务”。他要逐渐过渡成为一个“债务人”，如果他想还清恩情，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种地位的变化，相应的使得人们在教育成长期男孩时，用一种新的、严肃的扩展方式替代了原来对幼儿期的孩子使用的嘲弄方式。当小孩八九岁的时候，家人会对小孩施行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和排斥。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小孩不听话，或者有什么不敬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转而对他冷淡。如果店主批评小孩恶作剧，那家里人就会觉得他“使家庭的名誉受辱”，因而全家都会反感他。我就认识两个不到十岁的日本小孩被父亲逐出家门，他们感觉到丢人，因此也不好意思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也受到了老师的处罚。当时，这两个人只好待在外边的小破屋子里。后来母亲找到了他们，并让他们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进行“悔过”，还必须认真书写悔过日记。<sup>[47]</sup>总之，家里人都会把小孩视为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如果他遭受了批评，家里人都会反对他，因为他没有履行“对社会的情义”，因而也别指望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同龄人的帮助。同学们也会因为他的不端行为而疏远他。如果他想得到他们的重新认可，就必须道歉，并作出承诺。<sup>[48]</sup>

杰弗里·格拉<sup>[49]</sup>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在大多数拥有大家族或类似宗派社会团体的社会中，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批评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保护这个成员。只要能得到本集团的认可，那么在需要帮助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都能得到本集团的全力支持，而能够勇敢地面对本集团之外的世界。然而，日本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有可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谴责或批评他，那本集团也就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停止对他的责难。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社会中‘外部世界’认可的重要性也许是其他任何社会都不能相比的。”<sup>[50]</sup>

直到这个年龄段，女孩子受的教育和男孩子还没有什么不同，但细节上却有一些差异。女孩子在家里受的约束要比兄弟多一些。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虽然男孩子也要看护婴儿，但主要由女孩子来承担。女孩子获得的礼物和关心也比较少。而且，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是，对于一个亚洲女孩而言，日本女孩已经是非常自由了。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在街道上玩耍，甚至和男孩子们打架，并且不承认失败。女孩子们小的时候是“不知道羞耻的”。从六岁到九岁左右，女孩子们就和男孩们一样，开始懂得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九岁以后，日本学校就会进行男女分班。<sup>[51]</sup>而男孩子们往往更注重男性间的团结，他们不愿意接触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与男孩子交往是不妥的。一般来讲，女孩子到这个年龄之后都沉默寡言，



不喜外出，也难教育。日本妇女都说这个时候“童趣”已经结束了。女孩子的童年期在排挤之中结束了。她们只能遵循着“自重再自重”这样的人生道路。这一教导一直会持续下去，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sup>[52]</sup>

如果男孩子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还不能说他已经了解所有日本成年男子的义务。日本人说：“男孩子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誉的情义’。”意思是说，他们要知道憎恨侮辱是一种美德。男孩子还必须学习很多规矩，比如在何时靠近敌手，何时采用间接手段来洗刷污名。我认为，日本人并不是想要小孩在受到侮辱时对人进行攻击。因为男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母亲很粗暴，并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因为一些诽谤和反驳而打架，因而几乎不需要在十岁以后教他们如何攻击对方。然而，“对名誉的情义”却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使用公认的方式攻击对方，并用特定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已经了解，日本人更倾向于攻击自己而不是别人，即使是学童也不例外。<sup>[53]</sup>

对于六年后小学毕业的孩子们来说，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这时，他们要面对“对名誉的情义”，要面临严酷的中学入学考试，并为自己每门学科当中的排名进行激烈的竞争。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逐渐积累经验，因为不论在小学还是在家里，这种竞争都被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sup>[54]</sup>这种突然而至，使竞争更加残酷，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大家都很有意排名的先后，对其中是否有偏袒的因素也深表怀疑。然而，当日本人谈及自己过去的经历时，说的最多的却不是这些竞争，而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侮辱。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呼来唤去，并想出各种办法来侮辱他们，他们让低年级学生做一些愚蠢和丢人的事情。因而，低年级学生对此都普遍感到憎恨，他们不会把这些屈辱仅仅当做玩笑的。<sup>[55]</sup>当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爬行，并奴颜婢膝地跑来跑去时，他会记恨在心，并图谋要报复。由于他们不能立即报复，因而就会更加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事关“对名誉的情义”，把它当做是一种美德。也许在几年之后，他会借助于家庭的帮助把对方从工作职位上赶下来。也许他要刻苦练习柔道或剑术，等到毕业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进行当众羞辱。总之，如果不报此仇，他们就会觉得“心事重重”，这是日本人竞相复仇的关键原因。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参军后也会有类似的体验。和平时期，四分之一的日本青年都要应征入伍，而且老兵侮辱新兵的事件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从不插手此事，而士官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进行干涉。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端由士兵们自行解决。军官们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方法，因而

不会让自己牵连进去。老兵会把自己在前一年积累的怨恨都发泄到新兵身上，并想方设法侮辱新兵，<sup>[56]</sup>以证明他们的“老练”。据说，被征召入伍的人在训练结束后都发生了性格上的变化，都变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忠于天皇的谆谆教诲，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历了各种令他们感到耻辱的体验。那些在家庭生活当中受到日本文化教育的年轻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尊严”，他们在军队那种环境下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如果他们认为这是排斥他们，他们就会更加残酷地折磨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这些情况起源于日本人对待嘲笑和侮辱的传统习俗。而并非是在中学和军队中使人们产生这种对“侮辱”的反应。显而易见，由于传统的“对名誉的情义”，人们对羞辱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依据传统，这些受到嘲弄的人早晚会将他们所受到的惩罚转嫁到另一批人，但那个受到侮辱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曾经虐待过他的人进行报复。在许多西方国家当中，人们都习惯于找替罪羊，但日本人却不这样做。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他不会将怨恨发泄到嘲弄者身上，而是会以后针对自己的徒弟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日本少年也会使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但他们还是会选择进行直接报复。只有在和虐待自己的人了结了恩怨之后，人们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对于这些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现象给予高度重视。政府应该强调学校精神，甚至是“同校关系”，以杜绝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彻底禁止虐待新兵。虽然不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变成侮辱，而嘲弄人的行为是侮辱。<sup>[57]</sup>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上级和老兵都不能让下级或新兵模仿小狗摇尾巴的样子、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能杜绝这些现象，那将能够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教育，这是一种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或是把国家主义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更有效的变化。

女孩们不用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准则，因而她们不曾有过男孩在中学和军队中的受辱经历，也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要比男孩子稳定得多。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人们就教育她们：男孩优先，她们得不到礼物和关怀。她们必须尊重的生活准则是不能公然地发表自我主张。<sup>[58]</sup>尽管如此，她们在小时候还是和男童一样可以享受一种“特权”生活。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们尤其可以穿鲜红

的衣物；而成年之后，就不允许再穿那种颜色的衣服，一直要等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在家里，妈妈和祖母都会像宠爱她的兄弟那样来溺爱她们。她的兄弟姐妹也希望她能够“喜欢”自己，就像喜欢其他家庭成员那样。因此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要求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礼物分给那些两岁左右的婴儿。日本人不喜欢独自睡觉，在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安置到自己喜欢的年长者旁边。证明“你最喜欢我”的特征就是将两个人的床紧紧摆在一起。女孩子在十来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她们也能够获得补偿——别人会赞扬她的新发型。十四到十八岁的日本姑娘的发型是最精美的。<sup>[59]</sup>到了这个年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而不是布料衣服。这时，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装扮她们，使她们更加迷人。通过这些方式，女孩子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子当然也要受到义务的约束，但是这些约束是她们自发承担的，而不需要父母强制。父母不是通过体罚小孩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而是通过他们对孩子平静而又一如既往的期望，希望女儿根据自己的要求来生活。我觉得下面引用的这个事例很有价值，它代表了这种教育方法中的一个极端情况，并很好地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无权威的压力，它的特点是不那么粗暴和专制。从六岁起，稻垣钺子<sup>[60]</sup>随同一位博学的儒者学习，她要背诵汉语经典：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是纹丝不动。我端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纹丝不动。我曾经移动过一次，那是在上课期间。出于某种原因，我想轻轻地移动一下我的身体，使自己盘起的双膝稍微改变了一下角度，老师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温柔而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很明显不适合学习，你回房好好思考一下吧。”我幼小的心灵羞愧万分，但毫无办法。我向孔子的画像<sup>[61]</sup>鞠了一躬，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房间。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面前，向他汇报当天的学习情况。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但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句话犹如丧钟一般。直到今天，这件事仍使我感到伤心。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中，概括了日本父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祖母平和地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她的意愿办事。虽然没有叱责，也没有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却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使整个家庭都能按照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sup>[62]</sup>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如此有效，原因之一就是，每一项技艺和技能的训练都非常有效。女孩子要



学习的是一种习惯，而不仅仅是一些规则。无论是童年时期的正确用筷、进房的正确姿态，还是成年时要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由长辈亲手教授，反复练习，直到养成习惯为止。<sup>[63]</sup>长辈们从不认为小孩子们到时候自己能够“学习”正确的习惯。在书中，杉本夫人描写了在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为丈夫准备用餐的，而她却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她未来丈夫现在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sup>[64]</sup>在母亲和祖母的监厨之下，她自己反复“为松之助做了几个菜，哥哥说是他最爱吃的。他的桌子就在我的旁边，我给他夹菜，让他先品尝。我学习关心我未来的丈夫，让他感到高兴。祖母、母亲也总是说这说那，似乎松之助就在身边。我也很注意自己的装扮和行为，好像丈夫真在房间里一样。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和尊重我作为妻子的角色。”<sup>[65]</sup>

男孩子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来接受细心的习惯教育，虽然这种教育不像女孩子那样严格。在“学了”这些习惯之后，就不允许有任何辩解了。然而，在青春期之后，有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要靠他们自己主动去学习。长辈们不会教他们如何去求爱。在家里不允许有任何公开的性爱活动。如果没有亲戚关系，九岁或十岁以上的男女孩没有机会进行接触。日本人的理想就是，在男孩自己对性感兴趣之前，父母就要为他安排婚姻。因此，大家都希望男孩与女孩接触应该表现出“害羞”。在农村，人们常用这个话题嘲笑男孩子，这常常让他们感到“害羞”。然而，从古至今，即使是在日本最偏僻的农村，有很多女孩子，有时甚至是大多数，都会未婚先孕。<sup>[66]</sup>这种婚前的经历是“自由领域”，不涉及人生大事，而且父母安排婚姻时也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人们教育女孩子们要保持贞洁，甚至女仆也一样。”对中学的男孩也进行严格的约束，不允许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有过分亲密的行为。在日本的电影当中，把那些对年轻妇女显示好感的青年看做是“坏”青年；而那些“好”青年，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对迷人女子粗鲁无礼之人。与女人轻松相处意味着“放荡”，他们是追逐艺伎、妓女、咖啡女郎们的人。艺伎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地方，“男人们可以在这里放松、休息，而只需旁观即可。”他不用为自己的拙劣动作而犯难，因为没指望能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中有能力光顾艺伎馆的人并不多。他们可以到咖啡馆，在那里观察其他男人如何接近女人的，但是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受的训练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孩们都会为自己的笨拙感到担心。性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为数极少的不能得到年长者亲自指导的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会为刚结婚的年轻夫妇



提供《枕草子》<sup>[67]</sup>以及一些绘有许多细节的图画。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就像学习如何布置花园，你的父亲并不教你如何布置一个日本式的庭园，但当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日本青年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学习性行为，但日本人能够把性和园艺联系起来，并认为可以通过书本进行学习。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是依赖成年人的细心指导来学习这两件事情的。这种教育的差异向青年们强调，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之外的一个领域，它不需要长辈教导，也不需要经过艰苦的训练去养成习惯。这是一个自我满足的领域，他可以带着窘迫的恐惧去控制。这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规则。男人结婚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外拈花惹草，但这样的行为并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或者威胁到婚姻的稳定。<sup>[68]</sup>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她们被人引诱，也只能是暗中进行，日本妇女的生活极少有私密性，与别人有染也很容易被发现。<sup>[69]</sup>人们将那些精神紧张或性情多变的妇女说成是“歇斯底里”患者。其实，女人最常见的困难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非常明显，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歇斯底里（神经过敏、性情多变）患者都是由于性生活的不和谐。“妇女只能靠丈夫来得到性满足。”<sup>[70]</sup>一位须惠村的农民说，大多数妇女的病都是“始于子宫”，然后蔓延到了大脑。如果丈夫迷恋其他女人，妻子们就会求助于日本人所接受的手淫这一传统。下至农户上至大户人家，妇女们都珍藏着用于手淫的传统工具。而且，农妇在生育之后，她们在有关性的言行方面就可以相当随便。在做母亲之前，她们不能开任何关于性的玩笑。而在做了母亲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的聚会上就充斥着这样的玩笑。她们还会合着下流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毫无顾忌地跳着色情舞蹈。“这些表演总是会引起哄堂大笑”。<sup>[71]</sup>在须惠村，士兵服役完毕回到家乡时，人们会到村外去迎接他们。妇女们就会女扮男装，开下流玩笑，还假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此可以看出，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的。出身越是卑微，这种自由度就越大。她们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要遵守许多禁忌，但在她们了解性事方面没有任何忌讳。在满足男人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的，在满足男人时，她们也是克制性欲的。到了成熟年龄，她们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卑微，她们会和男人一样淫荡。日本人是根据年龄、场合来确定何为妇女端正的品行，而不同于西方人眼中那种一成不变的“贞女”或“荡妇”形象。<sup>[72]</sup>

男人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有时放荡不驯，而有时却节制谨慎。与一帮男友喝酒（特别是在艺伎的陪伴下）是日本男人最大的乐趣。日本男人喜欢喝醉，他们并不控制饮酒。两三杯米酒<sup>[73]</sup>下肚之

后，就会一反平日刻板的常态，他们喜欢相互倚靠，亲密无间。<sup>[74]</sup>喝醉的人极少会出现粗鲁或暴力的行为，当然也有少数吵吵闹闹“难相处的人”。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内，日本男人决不能干违反常理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重要的生活领域做出了违反常理的事情，那就会被骂作“蠢货”，<sup>[75]</sup>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很难听的骂人话。

对于所有西方人所描绘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儿童的教育进行了解。这种教育产生了日本人人生态度中的两面性，我们对它的每一面都应认真研究。日本人在幼儿期拥有特权，并且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他们在随后的生活中经历了各种训练和考验，但却始终怀念那种“不知耻”的童年时代。<sup>[76]</sup>他们不需要描绘未来的天堂，因为他们曾经有过天堂。他们根据诸如人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为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样的教育来重新描述自己的儿童时期。这样，日本人就非常容易将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对人人身上都有“佛性”、<sup>[77]</sup>人人死后都能成神<sup>[78]</sup>的极端解释上。这既使他们相当自负，而同时也有一定的自信。这就使他们经常愿意承担一些远远超出他们能力的工作，有时为了坚持自己的判断，不惜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政府的反抗情绪，以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有时，这种自信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妄自尊大。

在六七岁之后，日本人就要逐步承担“谨慎”、“知耻”之类的责任，这些责任受到了强大约束力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家人就会反对他。虽然这种压力不如普鲁士的纪律那么强大，但却是无法逃脱的。<sup>[79]</sup>即使在拥有特权的幼儿时代，也有两件事情为个人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坚持训练小孩大小便的习惯，并纠正他的各种姿势；另一件是父母常常戏弄孩子，威胁要抛弃他。这些早期的经历使儿童对之后的各种强大约束有一定的准备，那个时候人们会告诉他“世人”将耻笑他，并排斥他。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他要控制那种在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并不是因为那些冲动是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他必须开始认真地生活。虽然童年时的那种特权已经慢慢消失了，但现在他可以获得更大的成人快乐。同时，幼年时代的经历从来不会真正地消失。他能够利用这些经历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他接纳了“人情世故”后，他又能重温儿时经历。在那些成人的“自由领域”内，他能重新体验到儿童时代的特权。

在日本儿童时代的前期和后期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得到伙伴的认同，这非常重要。它不是什么绝对的美德标准而是深深被灌输于儿童内心深处。在儿童时代的早期，他可以让母亲把他抱到自己的床上睡觉， he 可以和兄弟姐妹们比较得到糖果的多少，以此来判断母亲

喜欢他的程度。如果他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甚至会问姐姐：“你是最疼爱我吗？”在儿童时代的后期，人们要求他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满足，而把从“世人”那里得到的赞许和接纳作为补偿。如果“世人”嘲笑他，那就是一种惩罚。当然，在大多数的文化当中，这种嘲笑在儿童教育中都是一种约束力，而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影响特别大。如果孩子的母亲开玩笑说要抛弃他，那么在孩子心目中，这就意味着要遭“世人”的抛弃。因此，在日本人的整个一生当中，排斥比暴力更可怕。日本人对嘲笑和排斥都非常敏感，尽管有时仅仅是自寻烦恼而已。由于日本社会不存在什么私密性，“世人”对你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了如指掌；如果社会谴责你，它就会排挤你，这决不是一种幻觉。而且日本房屋的墙壁都很薄，不隔音，白天都敞开大门。因此，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来说，私生活就是公开的。[\[80\]](#)

日本人用某种象征物，来区分由于孩子教育中的不连续性所导致的性格中的两面性。幼年期逐渐形成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当很多人在观望镜中的脸庞时，他们是在检查还保留了多少这样的“自我”。他们说，镜子能够“映射出永恒的纯洁”。它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它能反映人灵魂的深处。人们可以从镜子中观察那个“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人们把眼睛看做是心灵之“门”，这样有助于使自己作为“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在镜子里能看到理想中的父母的形象。正是如此，有些人才会随身带着镜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供上一面特别的镜子，来自我沉思，叩问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很特别，但却非常容易做到，因为所有信奉神道教的家庭在神龛上都供有镜子作为神物。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播送过一首赞美歌，赞扬几位女学生自己带着镜子。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是为了保持灵魂深处的平静。照镜子是一种外部观察，可以证明自己的精神是高尚的。

[\[81\]](#)

在对小孩灌输“观我”教育之前，日本人对镜子就有了感情。日本人照镜子并不是为了“观我”。在镜子当中，他的善良毫不做作，仿佛是自己童年的影子，不会让人想起“羞耻”的教导。他们赋予镜子的另一种象征意义是“纯熟”的自律。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坚持不懈地消除那种“观我”，以重新获得儿童时代早期的率真。

日本人在幼儿时期的特权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后来耻变成了道德基础之后，又出现了种种限制，但人们不认为这些限制剥夺了人们的特权。我们知道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概念之一，但日本人却常常质疑这种思想，并批判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即使是在最极端的



情况下，他们也说是“自觉”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这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种自愿死亡才是你心目中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是无任何价值的死亡。而在英语中，“dog's death”意思是因贫困而死的人。一些不是太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属于“自我牺牲”，而在日语中则属于“自重”的范畴。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相同的价值。<sup>[82]</sup>“自制”才能成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取得成就的前提，而日本人却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认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制使人更具有价值，并将其作为道德规范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否则，人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控制危险的自我呢？这个自我充满了冲动，它将冲破正常生活的限制，使其更加混乱。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那样：

经过常年累月的工作，胎上的漆打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值钱。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是这样看俄罗斯人的，“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开日本人的外衣，除掉它的漆层，出现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清漆是有价值的东西，能为手工艺品增添色彩。没有任何虚假成分，也不是为了掩盖瑕疵，这种清漆至少与它装饰的物品一样有价值。<sup>[83]</sup>

西方人非常清楚日本男人性格中的种种矛盾之处，这都是由于他们的教育当中出现了不连续状态，而这种状态留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甚至经历了所有的“上漆”之后，他们对当时的生活仍记忆深刻。那时的他们简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的神，他们可以恣意地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所有的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双重性，使日本的成年男子既可能沉溺于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也可能完全地服从家庭。无论他们承担多么繁琐的极端义务，他们也能沉醉于享乐和安逸。谨小慎微的教育使他们在行动时表现得缩手缩脚，而有时他们却又勇敢得达到卤莽的程度。在等级制度下他们可以表现得极为驯服，但有时他们又是非常难以控制。他们彬彬有礼，但有时又显得傲慢。在军队里，他们可以狂热地接受训练，但又时常违抗命令。他们是激情澎湃的保守主义者，但同时又热衷于新鲜事物，如同他们成功地汲取了中国的风俗和西方的知识。<sup>[84]</sup>

日本人性格中的双重性使日本人处于紧张状态。儿童时代的早期，他们生活得自由自在，受人宽容；长大之后就要面对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来协调这些矛盾。许多人都对此感到困难。有些人像学者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担心自发的行为将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这种放纵的阶段，它并不是一种幻想，因而人们才会对这种恐惧更加担心。他们保



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坚持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他们将自己等同于能发号施令的权威。而有些人则更加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压抑的反抗情绪，于是以表面的温和来加以掩盖。他们让自己忙于应付日常琐事，以使自己远离真实的感情。他们机械地重复那些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而另一些人对儿时的生活如此依赖，在面临成年生活的要求时感到无比焦虑，总是不合时宜地过多依赖别人。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挑衅，从而任何努力都使他们陷入焦虑之中。那些不能用常规方法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85\]](#)

当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人排斥或受人责难的时候，就会面临上述特殊的危险境地。如果没有过多的压力，他们通常既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又能小心地不伤害他人情感，他们已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这方面的培养。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成就。[\[86\]](#)幼儿时期的经历赋予了他们自信心，同时也使他们感觉不到什么罪恶的负担。在后来的生活中为了保持与伙伴的团结，对他们强加了一些限制，但这种义务也是相互的。不管他人在有些事情上如何干涉他们的愿望，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冲动的生活仍可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众所周知，日本人一向喜欢从自然当中获得乐趣，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观赏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赋诗、园艺、插花、茶道，等等。这些活动应当不属于一个满怀烦恼、富有侵略性的民族。[\[87\]](#)他们也不是满心忧愁地追逐享乐。在日本开始灾难性的“使命”之前的幸福年代里，农村的人们在闲暇时也是乐观并充满激情的。[\[88\]](#)而工作时又是勤勤恳恳的。



【图16】典型的日本画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太多。为了避免遭受疏远和诽谤的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开始品尝的个人幸福。面对人生的重大事情，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而极少数违背这个规矩的人甚至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生活路线不是区分“善”与“恶”，而是在于做“符合期望的人”和“不符合期望的人”，他们将个人的需求埋葬在集体的“期望”之中。<sup>[89]</sup>这样的人是“知耻”而谨慎的好人，他们为自己的家族、家乡和国家带来荣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使日本极度渴望成为东方的领导者和世界强国。但对于个体日本人而言，这种紧张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人们小心谨慎，唯恐失败，唯恐自己自我克制换来的只是人们的轻视。有时他们的情绪也会爆发，做出攻击行动。美国人在发现自己的原则或自由受到挑战时会进行攻击，而日本人不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发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sup>[90]</sup>这时，那个危险的自我就被激怒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会进攻诽谤者；否则，就对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简单的自由，这在美国人看来如同呼吸的空气一样。<sup>[91]</sup>我们应该记得，日本人自战败以来一直都在寻求民主。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天真无邪地任意行动，那他们将会多么兴奋！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杉本

夫人的描述更为精彩。她讲述了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的经历，在那儿，她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自己喜爱的花。老师给每个女学生分了一块荒地，并供给她们所需要的任何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花园给了我一种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我非常惊讶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我难以想象，在不违背传统，不玷污家名，不惹父母、老师、他人生气，也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的情况下，我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一些女学生打算种花，而她居然打算种马铃薯。

没有人会理解这种由荒谬行为给予的大胆自由的意义，自由的精神在叩响我的心扉。

[\[92\]](#)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家的花园中，特意保留着一块荒地，但也会有人修剪松枝和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新鲜松针仔细撒在上面。

对杉本夫人来说，这种刻意营造的野趣如同她所受到的教育，那就是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所有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放在用小石块砌成的底面上。对巨石的布置也经过了仔细的考虑，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都是栽在盆里，准备参加每年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非常小、不易看见的线圈支撑，以保持其优美的形态。[\[93\]](#)

当杉本夫人有机会摘掉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心情是喜悦而纯真的。在小花盆里生长的菊花，它的花瓣一直受到人们细心的布置，一旦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就表现出纯粹的喜悦。但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如果“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并怀疑“羞耻”的约束力，那将破坏人们生活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人们必须学习新的约束方式。而变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提出新的观点、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人不能认为日本人能立刻吸收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94\]](#)同时，也不能认为日本不能最终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在美国生活的“二代”日本人已经不甚了解本国道德方面的知识和规范了，他们血统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严格遵守父辈们的国家所拥有的习俗。同样，新时代的日本本国人民也能够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它不需

要对个人进行过多的约束。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

在向更大的精神自由时期过渡时，日本人可以利用古老的传统来保持生活的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也就是要自己对“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这一比喻就是将身体等同于刀，持刀者有责任保持刀的光洁，人们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他必须勇于承认并接受由于自身的弱点、不坚定以及做事无效引发的所有自然后果。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要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彻底。<sup>[95]</sup>从日本人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刀不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美德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经把这种自我负责的品质灌输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已经“放下刀”了。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仍将不断地关注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关心如何使它保持光洁。用日本人的道德语言来讲，刀是一种他们在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里仍能够保留的象征。<sup>[96]</sup>

---

<sup>[1]</sup>萨评：今天的日本依然如此，在日本的中学生中，频频可以听到“不愿意长大”的呼声，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这是因为日本的年轻一代由于教育和时尚的原因，更因为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以不能忍受依然是传统的经营方式的大多数日本企业。而成年就业意味着告别逍遥自在的学生时代，进入在日本年轻人看来已经是老古董方式运作的企业工作，而自己偏偏又因为地位的原因在那里只能俯首帖耳，令颇有些日本年轻人视此为畏途。传统上日本女性结婚前后地位更是天壤之别。她们失去的不仅是工作和自己的生活，甚至是独立的人格。日本婚礼新娘传统服装是白色的和服，含义就是和自己的过去告别，视结婚后的自己如同白色的衣料，“以便染成夫家的颜色”。日本电视剧《阿信》中，龙三在追求阿信的时候百般殷勤，结婚后却随时打骂，并不是龙三变态，而是日本当时婚姻关系的真实写照。今天，日本的女性地位大大提高，婚后就打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但随后就不工作专门相夫教子还是普遍现象。这种“结婚恐惧”还存在于相当多女性的心中。二战后，日本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日益延后，和这个后遗症不无关系。甚至日本的老龄少子化社会，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呢。





【图1】身穿白色婚礼服装的日本新娘

[2] 萨评：美国的看法，青壮年是社会的中坚，自然有权力享受最大的自由，是从人出发的。日本看法呢，青壮年是社会的中坚，不严加管束，那还不是“国将不国”，是从社会出发的。

[3] 萨评：传统日本的社会等级森严而且运作方式固定死板，所以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大体从其出生到死亡基本固定，日本人就是按照这样周而复始的方式使自己的社会保持稳定，每个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利益又不会造成很大问题。日本不是美国西部，在资源贫乏而生活资料也很紧张的地方，一个人成为暴发户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无法创造新的财富，而必须从他人那里夺取，结果显然对社会是不利的。因此，在日本传统社会，“自由”的人远不如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让人放心，他们只会像人体内的自由基一样，到处形成破坏。

[4] 萨评：对继承人的重视，这一点中国比日本奉行更加严格的儒家信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庭，构成了东方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西方对此则略不以为意，多要几个孩子，被认为是善良人、爱孩子的体现。

[5] 萨评：作者如果在这方面投注的精力多一些，就会发现东方的家长制与美国的印第安人部族很有相似之处。

[6] 萨评：在中国不生育在“七出”之列，比日本还要严厉，虽然不生孩子的原因，从生理学上说有一半的可能在当丈夫的身上。

[7] 萨评：这一点是二十世纪前期的情况，当时日本政府鼓励生育，一如苏联的“英雄母亲”时代。如果把它视为日本的民族性，作者可能有点儿看走了眼。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国家，实际多年持续负增长，可见并不是日本女性都喜欢生孩子。这和日本二战后女性走向解放有关。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以工作强度大而著称，父母如何能有时间照顾众多子女呢？传统日本社会女性不工作，自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二战后，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增加了，即便婚后依然希望维持自己事业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时候，抚养子女就显然要艰难多了。



【图2】日本的幼儿园，设施齐全，价格昂贵，但时间只到下午两点半结束，因为日本社会还是习惯了女性不工作的传统——从早上到下午两点多，足够妈妈干家务的了。做完家务如果还要幼儿园来看孩子，这个妈妈就太懒惰。不幸的是，这种时间安排堵死了大多数妈妈想干一份正式工作的可能。

[8] 萨评：日本确实有这样的习惯。似乎是因为古代日本未满月就死亡的婴儿太多，所以不满月还不能算孩子成功地降临人间了。

[9] 萨评：中国这样的事情通常是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来承担的，但在日本，上一代人看孩子的现象是罕见的，主要由妻子来照顾孩子。这或许也是日本婆媳关系普遍较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婆媳往往在共同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产生感情，而美国的婆婆虽然不照顾孩子，却不像日本婆婆那样无孔不入地干涉儿子的家庭生活，所以婆媳关系更像朋友而没有上下之分。这样一来，日本的婆媳关系，就成为三个国家中最糟糕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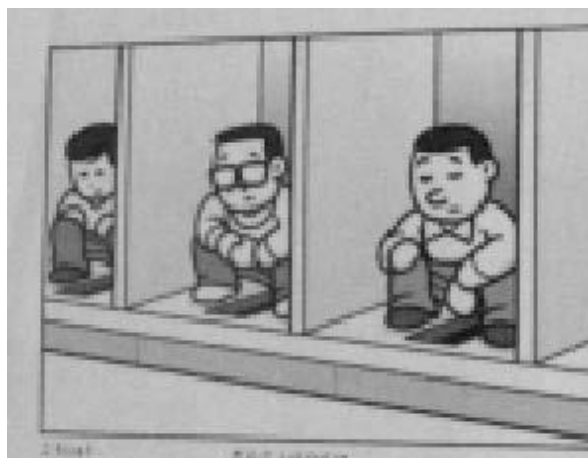
[10] 萨评：这一点我看来或许与训练无关，日本的妈妈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如果不这样把孩子背好，或孩子不能适应，则妈妈就没有办法做家务了。

[11] 萨评：日本人一向以自己的罗圈腿为耻，但是更多的证据认为这应该是自然淘汰的结果。日本是一个海洋民族，但造船技术历史上一直到明治维新成就并不高（例如唐代白村江之战日军失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像唐朝一样用松香弥缝使战舰更加坚固），所以要依靠出色的水手。长罗圈腿的人更适合在海上工作和生活，也是出色水手的一个特征。

[12] 萨评：这更像中国的做法，在日本还没有听到用口哨教婴儿大小便的。

[13] 萨评：日本婴儿不穿开裆裤，因为日本的房屋采用榻榻米作为地面，表面是草席，人也睡在上面，一旦被婴儿便溺弄脏几乎无法有效清理。日本人在中国看到开裆裤，曾画下来放在书中，像看西洋景一样新鲜。

[14] 萨评：今天风靡日本的“巧虎”儿童教育系列动画片中，专门有一节是训练孩子自己大小便的，其结果很好——孩子因为自己学会了一门技巧而沾沾自喜，比父母教育下更为积极主动。这一点，看来日本孩子、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图3】不仅仅是开裆裤，连中国的厕所是男女分开、而且厕坑前面是开放的，日本人也感到惊奇。因为过去日本男女同厕，自然厕坑前面都要有门了。

[15] 萨评：今天日本人已经没有这种习惯了。当初有这种习惯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日本人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孩子一旦能爬，就会给大人增加很多麻烦。日本父母并不是不爱孩子的，但是到作者那个时代为止，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很艰难的。男子要在外超负荷地工作，来换取养家糊口，女子要在家承担一切家务，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随着二十世纪早期日本日益对外扩张和工业化，连田间劳动也多由妇孺承担，自然，作为日本的母亲，出于避免危险的目的，只好选择尽量让孩子晚一点学习爬和走路了。我接触过的日本老太太，常常回忆她们小的时候要做两件事，一是每天辛苦地帮助大人劳作，捆稻谷或者烧火，一是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其中任务之一就是防止他们翻身学爬。

[16] 萨评：当年日本农家在房间中央设置的供取暖和烧饭用的地灶，明治维新后慢慢被淘汰。但是，今天到日本的民家，还可以找到它的一点影子——日本人家常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炕桌，天气寒冷的时候，在桌上覆盖棉被，堆上橘子，然后一家人围坐，把脚伸进桌子底下吃

橘子，是一种其乐融融的习惯。现在这种桌子的下面有加温器，而古代日本人则是把桌子放在熄灭的地灶上，利用其余温来取暖的。

[17] 萨评：帖，即一榻榻米的面积，在日本租房很有意思的是房东不会讲房子有多少平方米，而说有多少“帖”。三帖室，指三块日本榻榻米那么大面积的房间。一帖大概面积1.2平方米。



【图4】日本的传统房间，这种“草席”就是大名鼎鼎的榻榻米。

[18] 萨评：当然，从天性来说，哺乳是任何一个民族母亲都喜欢做的事情。

[19] 萨评：今天到日本，可能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小日本”今天不再“小”了，他们普遍身材较高，至少不是抗战时期普遍比中国人矮20公分的情况。日本人自己说其原因在于二战后日本人开始喝牛奶和吃面包。面食和牛奶的引进使日本人摆脱了单一大米的食谱，让他们的营养结构更加合理。现在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夏天喝冰牛奶，如果不知道他们历史的话，大概还会以为是他们自古传下来的习俗呢。

[20] 萨评：现在这样的孩子在日本也非常罕见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出生就含塑胶奶头——至少，是吃母乳的同时也吃牛奶。

[21] 萨评：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西方人眼里，却是有问题——从小就让孩子陷入了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的境地。并且，这种教育总是要提供一个样板，这个样板是大人认为理想的，却未必是孩子认为理想的。于是，西方人说，这种教育方法不好，会压抑孩子的个性。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考试不能排名，成绩算作隐私，孩子们就会有极好的自信心。东西方的做法，谁是正确的呢？要说东方是错的那很有问题，东方学生基础知识的扎实使他们一生受益无穷；要说西方是错的那也很有问题，西方培养出了很多善于发明创造的人才。相对来说，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因为压抑个性的教育而丧失创造性，在世界各公司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一向以善于解决问题著称。但是，这似乎与教育无关，而是中国复杂、需要很强的适应能力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图5】日本儿童百日照就是穿和服的，要他们从小守规矩，将来成才，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22] 萨评：在日本，嘲笑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但必须是上一级的人对下一级的人。敢于嘲笑某人，就说明了身份的优越感。因此，被嘲笑的人要么会愤怒异常，用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不低于嘲笑者，要么就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即便嘲笑的内容是错误的，他们也很少反抗，因为那不意味着他们要纠正嘲笑的内容，而意味着他们对于级别的挑战。

[23] 萨评：日本的家庭也是其社会的缩影。习惯了家庭中的地位等级差别，孩子到社会上，也就不会对某些人时而谦恭、时而高傲的表现感到奇怪了。

[24] 萨评：日本的男女分工如此明确，以至于母亲承担了家庭中的几乎全部责任，包括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养护。而父亲则游离于家庭之外，在孩子眼里，很难理解这个回到家就睡觉、油瓶子倒了都不去扶的家伙究竟对家庭有什么用处。而超负荷的社会责任，又使做父亲的没有足够精力来和孩子沟通。这样的结果是传统日本家庭中，子女对于父亲畏大于爱，而在日本社会中具有恋母情结的人比例也因此比较高。

[25] 萨评：在中国，父亲有同样的威严，并且更多地承担子女教育的重任，所谓“养不教，父之过”，这一点，责任上比日本的父亲要重一些，而地位上比较相似。在满族人中，更有“抱孙不抱子”的习俗，那是把这种威严发挥到最高的境界了。

[26] 萨评：作为一个东方读者，可能对作者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些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奇怪——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常识吗？其实很多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属于常识的东西，美国的读者的确形如“白痴”。在西方的家庭中，除非特殊情况，没有祖父母协助照顾孩子的习

惯，如果孩子的父母有了什么问题，姨妈或者姑母常常是孩子很好的寄宿目标，祖父母没有什么优先权。结果就是诞生了很多关于姨妈或者姑妈的电影和小说。

[27] 萨评：今天日本的家庭因为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祖父母照顾孩子的现象也很少了，而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即便结婚以后夫妻去过独立的生活，有了孩子也会第一时间请来孩子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来照顾。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女性婚后多不工作，使她们比中国的母亲更有条件独立照顾孩子。当然，即便同样是东方人，中日之间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别。比如日本就没有“坐月子”这种说法，很多妇女生产后即开始如常地工作、生活。几千年了，她们就这样过来的，倒也没有比坐月子的中国人多出什么问题。



【图6】日本近代社会的贵族女性，但是这样的女子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属于凤毛麟角。大部分日本妇女的日子，都没有自己独立登场的机会，而是围着孩子和锅台度过的。

[28] 萨评：大多数日本家庭都有多个孩子。日本高龄少子化的社会原因，更多的不在于夫妻不生孩子，而在于结婚晚或者有些人根本不肯结婚。多个子女的日本家庭外出时，常常可以看到父母背着最小的孩子，而大一点的孩子牵着弟弟妹妹。也许因为作者是女性，所以会对日本家庭中孩子之间怎样相处这样感兴趣，并且肯在描述一种文化的书中用这样多的篇幅来谈育儿的问题吧。

[29] 萨评：曾经和日本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多个孩子，他们更倾向第一个要个女孩儿，因为女孩儿可以更好地照顾下面的弟妹。

[30] 萨评：个人感觉日本人的性格的确受到“以退为进”思维的影响很深。生意场上评价日本人的做法是“高抬腿，轻落脚，拼命干”。日本人对一个新的市场触觉总是很敏感，会

比竞争对手早一点开始研究，但是对于投资却总会慢半拍，不敢为天下先。比如面对开放的中国，日本的机会实际比欧美更大，但下手却晚得多，这就是“以退为进”。可是日本人一旦发现投资果然能够赚钱，其投入程度就会很大——甚至达到疯狂。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所以，日本有历史学家认为，假如不是张学良在“九一八”后那样轻易地放弃东北，让日本人意外地获得巨大的收益，日军此后对中国的历次攻击恐怕不敢那样大胆和贪婪。

[31] 萨评：这一点美国人也可以理解的。在美国，教堂也做同样的工作。和当地牧师打交道的结果是让我认为他们是一些非常出色的思想工作者。而日本的宗教人士除了心理治疗，也确实长期是日本医学的支柱，这是从鉴真和尚携带当时先进的中医技术到日本时养成的习俗。古时中国的贵族家庭如果孩子犯了错，罚他读经或者抄写经卷是一种传统的惩罚方法。

[32] 萨评：艾灸源于中国中医，但是，尚未听说其能够治疗坏脾气的记载。

[33] 萨评：这和中国人常说的“再淘气你就会生病，生病就会去打针”含义相似。在这里，打针虽然是治疗的手段，但也成为带有隐含意味的体罚——至少孩子们理解是这样一回事。

[34] 萨评：这一点美国人是完全做不到的。日本很多餐馆只能盘膝而坐，于是到这里吃饭的美国人往往做出种种稀奇古怪的姿势。而向日本人询问，他们却说这种习惯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人都是盘腿而坐或者跪坐的，椅子是后来引进的，最初被称做“胡床”。但是椅子在进入日本时受到了一定抵制，原因是日本房间使用草编的榻榻米作为地板，压强大的椅子腿很容易缩短榻榻米的使用寿命。于是，日本人端坐的生活习惯比中国人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35] 萨评：这主要是面对异性，在日本的地铁里可以看到，一般的车厢里日本女性即便打盹，也尽量保持优雅的姿态，而在女性专用车厢里，那就全无淑女风范，睡得口水直流也很常见——因为这里没有异性，不需要再作伪装了。

[36] 萨评：日本对于女性的规则较多，即便在坐电车的时候也会发现，男人怎样坐的都有，而且为人所接受。而女子坐的姿势都很规范，仿佛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一样。

[37] 萨评：日本的“书道”和中国的书法一样，也是使用毛笔的。而要想掌握这种软中带硬的书写工具，不手把着教也实在没有其他方法。

天  
道

清  
一  
氣  
之  
理  
也



【图7】日本书道作品

[38] 萨评：选自约翰·恩布里的作品《须惠村》。

[39] 萨评：在西安，曾经发生过日本学生在表演节目时引发强烈抗议的事件，其实日本学生只是在游戏中错误地运用了性的概念，中国的观众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但日本人莫名其妙，因为这是他们认为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件事上，一方面，需要了解到日本的性观念与中国不同，比如日本的女孩直到高中依然自由进出父亲的浴室，丝毫不以其为尴尬；另一方面，日本在其本国非常强调外来人的“入乡随俗”，那么，到中国也应该多少了解一些中国人对性观念的看法，那就不会惹出这样大的麻烦了。

[40] 萨评：还是美国人那种“你和我妈妈发生性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的逻辑。美国人看来，个人的地位只与自己的努力有关，继承遗产当然是可以的，但并非值得炫耀的事情。然而，东方国家，对于家世看得要重得多，一个人的祖上是杨家将还是秦桧，千年之后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图8】东方的传统观念——人自宋后少名桧，我至坟前愧姓秦。

[41] 萨评：这种“自由”的背后，隐含着对于孩子中“小霸王”的放纵，从而让日本的孩子从小就认识到自己作为强者比拥有公理更有价值，同时，也根深蒂固地建立起等级观念。日本的教育界今天对这种现象也颇为头疼，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将其排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2] 萨评：至今祖先牌位所用的神龛依然是日本建筑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祖宗面前供奉的米饭是用很小的盅装的，仅仅一口而已，但是每天更换。日本的父母如果没有了权利往往得不到这样的尊重，祖宗却可以，这是因为在日本，“祖宗”是家族的象征。



【图9】日本的神龛

[43] 萨评：比如各大神社免费赠送的“御守护”符，相当于中国的门神。只不过中国的门神固定为秦琼和尉迟恭，日本则哪个神社的神仙都可以充当。这一点西方人会感到新鲜，他们不会在门后贴一个耶稣的。但是仔细想想，西方人胸前的十字架，其实也是一个含义。

[44] 萨评：这仅仅是祭祀的日子，平时，日本的母亲恐怕没有这样做的，因为日本的神社树丛浓密，平时人迹罕至，正是蚊蚋滋生的地方。

[45] 萨评：一般来说“狼来了”的故事被认为发自中国，但日本民间则认为是日本本州地方的传说，后来传到大陆的。此事，还需要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考证。

[46] 萨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请注意，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日本对舆论的重视。中国人说“人言可畏”，在日本就是舆论可以杀死人，日本人十分重视周围的舆论，以至于养成严重的从众心理，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的道德观中，嘲笑别人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品德，甚至，嘲笑别人是在帮助别人纠正错误，所以是正确的行为。可是，这样的道德观带来一个大问题，就是日本人在尊重别人方面很难做好。

[47] 萨评：日本人的确很喜欢写日记，在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拿出详细得令人惊讶的工作日记来。美国人相当喜欢日本人这个习惯，因为二战时日本兵往往固执而忠实地每天写下详细的日记，让美军从中发现大量情报，包括军队调动、任务、装备水平、部队情绪等

等，应有尽有，比抓俘虏审问出来的还要详尽。二战后期美军专门派出情报人员，每次和日军交战都要搜集日军士兵留下的日记，受益匪浅。

[48] 萨评：这已经是对他在社会中可能碰到的情况进行预演了。

[49] 萨评：杰弗里·格拉，是1943年出版的《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一书的作者。

[50] 萨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在日本，如果一个官员或者一个职员遭到社会的攻击，他所属的部门往往会选择对他的抛弃来维护部门的声誉。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辞职，就是没有按照传统及时抛弃出现问题的高级官员所致。可是，仅仅这样理解日本的集体内部关系是非常不全面的。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非常强大，因此，被集体抛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一个集体总是抛弃它的成员，显然会让它的内部变得非常不稳定。那么，怎样又能维护内部稳定，又不违反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呢？日本人发明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集体负责”，这样就可以维护平衡。而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则需要很大的技巧，考虑很多因素。

[51] 萨评：已经是历史，现在日本小学都是男女合校的。

[52] 萨评：有的日本人说，日本女性的一生就是被社会逼迫着从自由走向不自由，所以，早年和气善解人的女孩子往往熬到当了婆婆时，都会变得性格乖戾，喜怒无常。这是一个玩笑，但并非一点儿道理没有。

[53] 萨评：同时他们也要学习在自己地位低于对方时，即便对方的侮辱是没有道理的，或者干脆是有意欺负自己，也要忍让和服从。等级制度在日本的作用帮助它制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也阻止它内部平等观念的形成。同时，造成了若干日本人对公理的认同低于对权力的认同。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明白道理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日本政府进行疯狂而暴虐的战争——虽然，以他们的道德观，很明显“皇军”在中国等地犯下的无疑是罪行。

[54] 萨评：在日本的家庭中，不存在“竞争”。孩子之间没有必要竞争，因为无论怎样家产都是长子的；家人之间也没有必要竞争，因为无论谁正确最后都是家长一锤定音。日本人其实不喜欢竞争，他们喜欢一切都按部就班。但是，偏巧日本的社会——特别是作者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根本不敷分配，只能通过竞争由优胜者获得。比如战前日本海军飞行员的选拔是非常苛刻的。实际上，能否胜选不在于你是不是合格，而在于有多少架飞机可以供学员使用。今天日本的教育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学校期间，日本教育体制吸收了美国的做法，尽量减少竞争而培养学生的自信，升学的比率也由于少子化的原因高得让人羡慕不已。然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被一下送入残酷竞争的社会环境时，出现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就难免很多。

[55] 萨评：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学校中，也有一些流行这种风尚，用于打掉新生的傲气，并非日本的专利。甚至，中国也不例外，当年北京大学有过低年级同学组织起来抵抗高年级同学羞辱行为的“反拖尸（Toss）运动”，领导人是后来著名的政治家姚依林。但是，对这件事情的热心和认真，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甚。

[56] 萨评：新兵在日语中写作“初年兵”，即便是在日本军队中服役很久，在战争中也竭尽全力的人，如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提起自己的初年兵经历依然怒火中烧。日本军队认为对新兵的侮辱，还有一条好处就是让士兵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和尊严，从而

更好地成为战争的机器。在日本军队自己的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当时“初年兵”被虐待致死的报告。



【图10】坂井三郎

[57] 萨评：这一点作者可以欣慰。在今天，日本的公司、学校等地，“前辈”依然保有着“后辈”不可挑战的权威。甚至在公司里可以毫不客气地支使后辈做一些分外之事。不过，随着日本终身雇用制的瓦解，这种现象在逐渐产生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批跳槽分子的出现，使很多公司在获得有经验的人员之同时，改变了自己公司的内部人事结构。对于进来的跳槽者，公司内部原有人员很难用传统的概念来对待他们——从为公司服务的年头来说，他们绝对是后辈，但从职位来说，他们又是一些“前辈”的上级——日本式的等级观念在这里出现了悖论。其结果是双方都会表现得客气有加，自居下位又虎视眈眈，关系很难稳定。这成为日本公司里面一个有趣的看点。

[58] 萨评：这方面日本社会的道德标准依然如故。如果一个女性过于张扬，尽管她可以被人所接受——她这样做毕竟不违法，但是还是会被认为并非理想的女性，哪怕她很可能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不过，战后日本女性所受教育比以前要高得多，接触的社会圈子也不再封闭，这使她们在争取自己权利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



[59] 萨评：在日本给女性梳头是一个高雅、高收入的职业，很多女孩子要练习多年才能进入这一行。不过，这一行还有一个分支，收入更高——为摔跤的相扑力士梳头，其收入可以抵得上最好的教授。

[60] 萨评：此处应该是作者笔误，应是指杉本钺子（?~1950），父为长冈贵族稻垣平助，反战女作家，1898年嫁给在美国的日本人杉本松之助，此后在西方生活达三十年之久。1925年在美国出版《武士的女儿》一书，这里引用的，就是此书的内容。



【图11】日本最高级相扑手的发型叫做大银杏，每梳一次价值十万日元。



【图12】《武士的女儿》一书日文版封面

[61] 萨评：孔子像？可能有人会感到惊讶，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汉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之深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日本要当警察，考试的时候还有题目要考董仲舒的业绩。

[62] 萨评：在日本，男性对家庭是不负领导以外的其他责任的，他只对社会负责。维系一个家庭的纽带，自然就落在了女性成员身上。

[63] 萨评：这之间的区别是规则需要时时提醒自己才能记得，习惯则要人当做自然的事情，熟极而流。传统的日本女性在和丈夫一同外出时会自动落后一步并赶着小碎步追随在丈夫身后，这不是因为她们认为有一个规矩要求她们这样做，而是习惯成自然。当日本的女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随时随地表现出自己对丈夫的仰视，人们就认为她值得尊敬，是一个“上品”的人——日本人的矛盾之处在此又体现了出来——通过自甘下位的举动，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64] 萨评：越后国，日本废藩置县前的旧国名，主要辖区位于现在的新泻县。

[65] 萨评：看到此处，恐怕不少人要感叹难怪名家认为男人幸福的三大构成——中国厨子、英国花园洋房以外，还要有日本太太了。不过，现在日本女孩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自觉，她们也开始呼唤自我解放的精神，其中的佼佼者，往往选择了到国外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用脚投票，也是一种投票。

[66] 萨评：日本人对这种放纵性行为的做法，一方面是默许，一方面则不肯多谈，显然，不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事情。至少，不是在和日本人以外的人们交往时适于讨论的问题。

[67] 萨评：《枕草子》是十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两大女作家之一的清少纳言所著（另一个是写作《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清少纳言是一个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女子，据说看到一叠白纸就会按捺不住书写的愿望，而且活泼美丽，她的文字自然出格的不少。这部书的书名也有来历，当时天皇的皇后曾问担任女官的清少纳言最近写了些什么，纳言回答说写的是枕边杂记，“枕草子”的名称便由此流传下来了，内容是在宫中的杂记。不过，《枕草子》全文文笔流畅优美，被当做性教学教材未免有些片面。



战后，日本女性也开始寻求自己的解放，这是当时的妇女运动场面。制作精美但文法不通的英文标语充分表明了这种解放的背景。

[68] 萨评：日本家庭对于男性出入花街柳巷并不以为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传统进行一些业务应酬的地方。不过即便和应酬无关，丈夫也可以坦然对妻子讲自己要去某个地方放松一下，而日本的习俗对此是容忍的，妻子如果干预会被认为缺乏对男人的爱护。这在中国或者美国，同属不可思议的事情。

[69] 萨评：日本的环境拥挤，人们的自我空间很小，所以，社交范围较小的女性，也就时刻处于众人的目光之下。而日本人一大兴趣就是背后议论邻居、同事或者朋友的私生活，表达种种好奇。所以，直到今天，要在日本保守什么个人隐私，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0] 萨评：日本对于已婚女子的操守看得很重，如果结了婚还与第三者保持性关系“不伦”，女子和第三者都会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虽然，在丈夫知情的情况下向其他男人调情或

者卖弄风情不在此列。

[71] 萨评：这种行为不会引起对于该女子负面的评价，而被认为她不过做了一个女人正常的事情，因为女人的丈夫此时肯定是知情的，或许就在人群之中，这样的卖弄风情不会危害他的尊严。

[72] 萨评：本尼迪克特在这里显然为西方人打了掩护。西方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是“在厨房是主妇，厅堂是贵妇，床上是荡妇”，虽然很多不幸的男人发现，自家的女人往往把这期望记错顺序，变成“在厨房是贵妇，厅堂是荡妇，床上是主妇”。

[73] 萨评：指的是日本人酿造的清酒，又名日本酒，用大米酿造，无色，度数在10~15度之间。

[74] 萨评：这是比较有自制力的日本人了，按照日本叶隐派武士的习惯，喝多了以后要脱光了当众跳舞，不但不被认为失礼，反而被视作风流。继承山本五十六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古贺峰一大将，很难想象此人就是这样一个“叶隐武士”。

[75] 萨评：这个词的日语发音类似于“ahong”。

[76] 萨评：可见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即便是后天被教育得特别尊重“规则”的日本人，心中也是一样有着对自由的渴望。

[77] 萨评：意思是可以成为佛。

[78] 萨评：神道教的理论。

[79] 萨评：日本的服从文化，基础不是建立在自上对下的压制，而在自下对上的自觉敬畏。这里面颇有一点“敢赌服输”的气质，也就是说我既然无法超过你，就痛痛快快地认输，甘心受你压迫欺负。不过我还是会自强不息，假如有朝一日翻过来，也要心安理得地压迫欺负你——这是强者的乐趣和利息。在日本文化中嘲笑和歧视弱者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以此来刺激和鞭策弱者超越自己的极限变为强者。因为有这种文化传统，在日本即便是弱者自己也多不认为弱者值得同情，而认为这是自作自受。于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维护这一制度，形成日本持续千年的独特的服从文化。在日本看有关抗日战争的史料，会发现“八路”出现的频率比在国内的文献还高，日本人对“八路”十分恼火，因为觉得这些土八路不讲道理——既然正面交手你打不过我，就应该俯首称臣，乖乖地屈服于我才对，哪有不肯认输到处游击的道理？这不是弱者应该做的事情嘛。问题是，八路干吗照日本人的思维行事呢？这一点日本人很少去想。





【图13】日本漫画——在土八路“不讲道理”的打击下，连方便都不能安全的日军讨伐队。

[80] 萨评：如果没有在日本住过，很难想象这个地方的拥挤和对空间利用的充分。在东京，最普通的租房价格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小公寓每月要价十万日元以上（日本大学生刚毕业的月收入平均十八万日元）。日本是一个狭窄的国家，至今如是。如果托马斯·潘恩想在日本过他的隐居生活，他得是大富翁才行。日本传统的房屋是木结构的，如果几家合住一座房子，几乎无法避免相互干扰，所以日本人很重视走路也要轻轻地，说话也要轻轻地，一般认为这是日本人教养的表现，应该说，这也是环境使然。

[81] 萨评：在日本从未见过如此风俗，日本年轻人出席仪式倒是经常在停车场找个奔驰车的后视镜对着梳理头发（日本人说奔驰车的后视镜个儿大）。日本家庭神龛中也有放镜子的，却是因为日本古代镜、剑、玉都是神器，似乎与精神修养无关，不知道作者从何处得到这样的理论，或许来自西方人普遍的“东方人很神秘”的情结吧。

[82] 萨评：所以日本右翼拍摄的、为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就叫做《自尊》，暗喻东条被判处死刑上绞架不过是“求仁得仁”，而不是可耻的战犯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83] 萨评：原文来自日本作家野原1936年在伦敦所写的《日本人的认真》。漆器是日本的著名手工产品，在胎上一次一次上漆、干燥后形成的艺术品。刷漆和干燥是一个需要十分小心又消耗很长时间的过程，而最后的成品晶亮美丽，已经看不到与原胎的相似之处。所以，漆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漆器艺术品重要甚至可以说主要的一部分。



【图14】日本的漆器

[\[84\]](#)萨评：或许，这就是作者对于此书书名《菊与刀》的理解。实际上日本人的儿童时代远没有作者所写的那样浪漫幸福，他们的矛盾性格更多地来自于争夺社会资源和被迫在狭小空间共生的需要。日本传统上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大多数战后幸存的日本人回忆自己的童年，多半伴随着苦难和艰辛，很难有机会享受作者所说的这种快乐。日本人往往喜欢抒发返回母亲怀抱的温暖感情，大体和中国人把美好时光寄托在尧舜禹时代的思路差不多。作者关于日本人的童年对其一生的影响的内容，也是本书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备受质疑的部分。



【图15】在美国“战时隔离收容所”中的第二代日本人

[85] 萨评：有资料说以上结论来自于多罗西亚·莱顿博士对美国“战时隔离收容所”中的第二代日本人所作的罗尔沙赫检查结果，其内容由弗朗西斯·霍尔特分析。罗尔沙赫检查是由瑞士精神病学者罗尔沙赫首创的检查法。该检查法是对被检查者出示搞乱的但左右相称的黑白或彩色图形，并令其回答自己的理解，然后根据回答判断被检查者的性格。说起来，作者对日本人幼年的描述，倒是很接近于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生活，而她所提到的性格，也接近他们在“战时隔离收容所”的心态。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人，而“战时隔离收容所”的环境又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里的研究成果，和在动物园研究大象的生活有着同样的问题——那实际上不是他们正常的生活。

[86] 萨评：从这一段美国人模糊的描述中，依稀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以一张清丽的画卷代替窗外的美景，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或许是一种修养和享受。只有在日本生活过之后，才会理解日本人的思路——日本这地方寸土寸金，窗户外头就是墙，有几家能弄个花园呢？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贴张画自娱一下，不过中国人会声明自己是在“穷乐和”，没办法，只好这样。此时，日本人独到的地方就显示了出来，他们贴一张画，并不是聊胜于无，而可以深深陶醉于虚幻的画卷之中，并表示贴上这幅画并非不得已的选择，而是喜欢画更胜过真正的花园，或许和他们自古以来不得不适应严酷的生活环境有着重大的关系。

[87] 萨评：仔细看来，这些享受无一不是与现实脱节的，甚至可以说干脆就是有意回避现实。人们常常对日本人身上“菊与刀”的矛盾感到困惑，高雅如菊又怎能血手持刀？这个人不是要精神分裂吗？然而日本人自己却并不觉得困惑。他们的刀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而菊则是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就像一个数学家从事他

的专业固然要计算精确，但一点不妨碍他进入厨房时大手大脚一样。在日本人身上，这二者完全是分开互不影响的。

[88] 萨评：这显然是不太符合日本农村的情况。在日本进入工业社会以前，由于田地少，赋税重——中国康熙皇帝宣布永不加赋的时候，日本农民的赋税已经达到收入的70%，日本农民可说是全世界和平年间最为痛苦的农民了。

[89] 萨评：这就是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在典型的日本人看来，在从众、屈服于权势和按照真理去做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常常下意识地选择第一或第二项。假如这和自己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会安慰自己——“大多数人的选择肯定比自己的选择聪明些”，或者“高位的人总比我聪明些”。作者只提到了日本人怕与别人不一样，这个话题似乎还可以更进一步——为什么日本人怕与别人不一样？日本历史上并不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物，但他们大多拥有足以使他们特立独行的身份。一般人怕与别人不一样，关键问题是认为自己在体制中没有那个资格。

[90] 萨评：怎样确认什么是“侮辱”呢？举个例子来说，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只要你地位够高，就可以将你的原则贯之于他人，而地位低于你的人应该欣然接受——如果他觉得难以接受怎么办？他应该仔细思索你的原则的妙处，让自己“开悟”，最终还是接受。所以，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原则，在那时的日本人（因为现在的日本人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中不算一种挑战，更不是侮辱。然而，假如一个居于下位的人居然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以此反对遵照上意改变自己的原则，那他对上位的人就是一种“侮辱”。这样的“侮辱”可能会引发猴群中争夺猴王一样的战争。

[91] 萨评：美国人常常谈起他们的社会支柱，这种时候“自由”是绝不会被忘掉的。说到底，美国是一群从欧洲跑到新大陆去追求自由的人建立的国家，这种传统，一如大英帝国的那些传统一样，构成了他们国家精神的一部分。

[92] 萨评：这是一个微妙之处。杉本夫人未必是真的认为这块土地种土豆比种花好，所以她说自己“荒谬”，然而她还是种土豆，因为这让她体会自由。当人们刚刚获得选择的权利时，他们常常不是去选择最好的，而是去选择最极端的。少年把头发染成葱绿，并不是因为这个颜色最适合他，是因为这最能代表他实施了选择的权利。对一切都反对，未必是真的有了个性。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去做，而不在乎这个结论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新意，那才是真的有了个性吧。从这一刻起，杉本夫人也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日本人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就像木乃伊一样终究是难以见风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种原因，在美国的日本“二代”，极少有能恪守或尊崇日本传统文化的。他们仅仅是长了一张日本人的脸而已。

[93] 萨评：这一点中日之间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记述的是同样的问题。所谓矫揉造作，大体和这种文化背景有关吧。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人留下很多照片，要是看这些照片，会以为当时日本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和文明。然而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为了拍照片，日本人会去租衣服、手表等等，所照出来的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符，但是他们要给后代留下的，恰恰是这个“影”（中国也有这样的时代，不过多是用于相亲这样功利的场合）。鲁迅先生曾经长期旅居日本，不知道他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日本人。



[94] 萨评：作者估计错了。日本战败后狂热地接受了美国的精神和道德，给予的评价之高和心意之诚超出任何外国人的预料——这固然是因为自由精神充满魅力，更因为，那是强者的东西。强者的东西总是好的。我常常想，如果征服日本的不是现代文明国家，而是一个野蛮的政权，日本人又会怎样呢？从这个角度讲，日本民族算是颇为幸运的。

[95] 萨评：以日三省吾身的风格来检验自己对于自由的接受程度，这种对自由的接受方式，恐怕也只有日本一国了。

[96] 萨评：只要不赋予刀那么多它本来没有的含义，日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扔掉刀只保留菊花。刀就是刀，一种兵器，一种工具，一种艺术品。这种简单的生活态度，可能需要日本人长期地去体会呢。



盟军在日本的阅兵，日本孩子和美国孩子一起表达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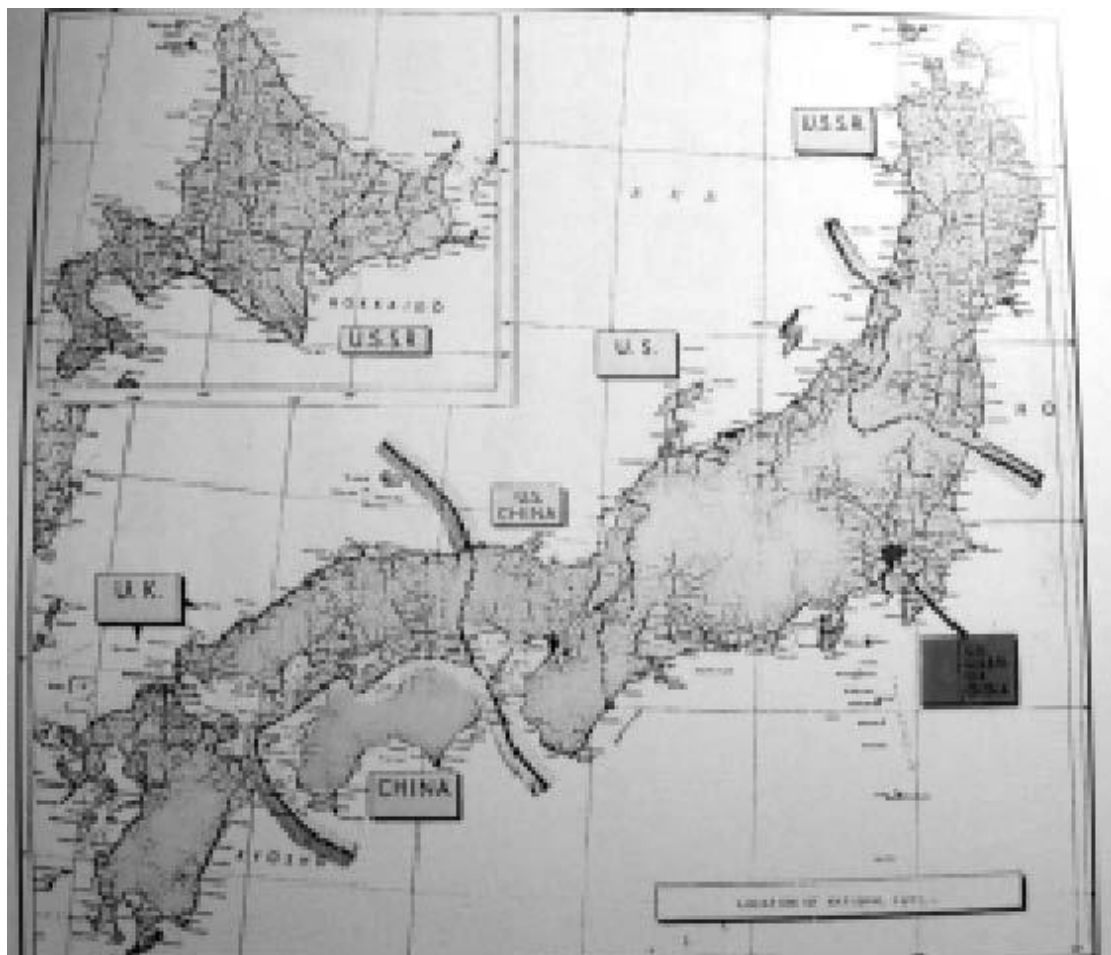
# 第十三章

##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政府对于美军是十分细心、考虑周到的。这是从菲律宾归来的日军退伍兵，正在奉命交出在菲律宾美军发给的被褥——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回到日本后继续保留占领军的物资属于“不当使用”，理应追回归还占领军。

自从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管理日本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sup>[1]</sup>1945年8月29日电台颁布了美国的政策，它是根据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而颁布的，并由麦克阿瑟将军<sup>[2]</sup>以其卓越的才能付诸实施。然而，由于美国报刊、电台中到处充斥着具有明显党派特征的褒贬不一的评论，因而普通民众也对美国为何如此引以为荣的原因不甚了解，只有极少数深谙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够确定美国当前的政策是否恰当。



【图2】对于日本，最初盟国的协定是进行多国共管。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驻军。可以看出地图上中国预期派遣的占领军管辖区域将是包括整个四国岛，并与美军共同管理本州岛的部分地区。因为苏联和美国关系紧张，这个协议很快就改变了版



本，排斥了苏联。英国此时没有力量在远东投入太多，而中国预定用于占领日本的军队也被抽调去打内战了，于是最终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占日本的局面。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盟军占领日本的性质问题。战胜国对现任政府甚至天皇是应该保留还是应该废除？是否由美国的军事政府官员直接对日本的县市进行管辖？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采取的模式是，在当地建立盟军临时政府（A.M.G），并将它作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将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权交于盟军行政官员的手中。在日本投降后，负责太平洋区域盟军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则希望在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占领模式。日本当局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保留多少权利来处理地方事务。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盟国必须对日本领土上指定的地区进行有效占领，<sup>[3]</sup>以确保盟军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并永远清除“欺骗和误导日本民众进行世界战争的势力的权威及影响”。

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向麦克阿瑟部队发出的命令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大决策，并获得了麦克阿瑟部队的完全支持。日本国民自己将负责战后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中各个机构（甚至是天皇）来行使自己的管辖权，并且这样做有助于美国在日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将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sup>[4]</sup>因而，麦克阿瑟对战后日本的管理方式与盟军对德国或意大利的占领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它纯粹是一个总部组织，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进行管理。它直接向日本政府作出指示，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他可以提出辞呈；但是，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对指令进行修改。<sup>[5]</sup>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模式。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个政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的那样：

利用日本本国政府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那我们不得不亲自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复杂的管理机构，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截然不同。通过对日本政府的清理并加以利用，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在让日本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提供具体的要求。

然而，当华盛顿在制定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许多美国人还很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愤怒和敌对的态度。一个时刻准备报复的民族会破坏

任何和平计划。但这些担忧是无根据的，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文化的特异性，用关于战败民族政治、经济方面的一般道理无法进行理解。<sup>[6]</sup>除了日本，这种“善意”的政策对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会产生如此的效果。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就意味着消除战败所带来的耻辱这一现实，并激励他们实行新的国家政策。日本人之所以能欣然接受这一政策，确切地说是由于日本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



【图4】令美军惊讶的情景——日本人很快就忘掉战败，和占领军和谐相处了。

美国人总是在永无休止地争论和平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掌握好分寸，这不仅能摧毁日本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模式，而且能为他们确立新的目标。选择哪种手段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sup>[7]</sup>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根植于家庭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必须对德国确定一定的和平条件。而对日本要制订不同的、明智的和平条款。与日本人不同，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有所亏欠，他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偿还无法计算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品。和其他所有身居高位的人一样，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正如成语所说，父亲“强迫别人尊敬他”。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他就会觉得心里不痛快。在德国每一代人，儿子在青年时期都曾经对权威的父亲表示反抗。然而成年之后，还是要向单调的生活低头，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人生的高潮期毕竟还是青年人反叛的狂飙时代。

日本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那种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喜爱在西方很少见。日

本小孩认为儿子与父亲的某种亲近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们还公开表示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只要父亲的声音稍有改变，他们就能马上明白父亲的意图。<sup>[8]</sup>但是，对小孩子来说，父亲并不是一个纪律检察官，青春期也不是一个反抗父母的时期。相反，根据世人的评判标准，孩子在青春期应该是一个负责并且孝顺的家庭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作为受尊敬的对象，父亲是等级制和正确为人处世的象征。

孩子在儿童时代早期与父亲接触中就学会了的这种态度，它现在已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些由于等级地位而受他人尊敬的人其实并不能够任意行使权利；等级制度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从天皇到下层官员，他们在行使权利时，都有顾问或其他隐蔽力量在幕后起作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极端沙文组织的代表黑龙会<sup>[9]</sup>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方面作了确切的描述。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由大头针在一角进行控制。”<sup>[10]</sup>换句话说，大家都能看见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形。而大头针是不可见的。三角形有时偏向右边，有时偏向左边，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藏的轴在摆动。如同西方人常说的那句话，任何事情都由“镜子”来反映。努力消除专权，使一切行动成为对地位象征的忠诚，虽然这个象征已永久地与实权分离了。如果日本人一旦发现了这个未经掩盖的权利来源，日本人就会觉得它具有剥削性，不应包括在他们的体系之内，这正是日本人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

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社会，并且认为不革命也可以消除剥削和不公正。他们不能打破整个社会。他们在不批判现有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对社会组织进行彻底的变革，如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革新。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为“重建”，即“回到”过去的意思。<sup>[11]</sup>日本人不是革命者。有一些西方作家寄希望于在日本发动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有的则夸大了战时日本地下力量的能力，希望他们在日本投降中起到领导作用；有的预言日本战后的激进力量能够在选举中获胜。<sup>[12]</sup>他们都严重误解了当时的情况。保守派代表币原男爵<sup>[13]</sup>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曾公开发表演讲，它准确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将具备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意愿的民主形式……自古以来，天皇就以全体国民的意愿为己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而我所说的民主政府能够真正体现这种精神。

在美国人看来，上述日本政府关于民主的措辞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相同的上述基础上来

扩大国民的民主权利、为国民提供更多的福利。<sup>[14]</sup>

当然，日本也愿意尝试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正像在美国一样，西方的制度并不是一个可信赖的改善世界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虽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sup>[15]</sup>当这些困难进一步严峻时，日本人将修改我们所赖以获得民主的方式。因而，一些美国人会认为这场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对自己民主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但是，对于一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和平的国家而言，普选充其量对日本的重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第一次试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如小泉八云<sup>[16]</sup>所描述的传统问题不会重新出现。



【图5】日本战败后，选举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

在这些付出如此多生命代价的激烈竞选活动中，并没真正的个人仇恨的因素；在议会的争论当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会使旁观者感到惊讶。个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政治斗争，而存在于各团体和党派利益当中。而每一个团体或党派的忠诚追随者都会将新的政治视为一种新的战争——一场为了领袖而进行的战斗。<sup>[17]</sup>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的较近选举当中，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往往会说：“我已洗好脖子，为砍头做好了准备。”这种说法将选举



竞争同过去有特权的武士攻击平民的做法相提并论。甚至在今天，日本选举的含义仍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不论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这种差异都依然存在。<sup>[18]</sup>

日本赖以重建为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承认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失败的”，并将自己的精力转向其他方面。日本人有一套善变的观念。他们试图通过战争使自己在世界上占有“适当的位置”，然而他们却失败了。于是他们当然能够抛弃这种政策，因为日本人所受的教育能够使他们改变方向。持有绝对性道德观念的国家总是相信自己在为原则而战斗。甚至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他们也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消亡了。”自尊仍要求他们为下次“正义”的胜利而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自我惩罚并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日本人却不会这样。在日本投降五天之后，在美国登陆日本之前，东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讨论日本的失败以及它带来的政治变化。它说：“但是，它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应当牢记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了。由于日本企图仅仅依靠武力来提高日本地位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那日本就必须坚定地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外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sup>[19]</sup>也在同一星期刊登专门文章，认为日本近些年“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其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失误”。因而，“我们应当抛弃陈旧的思想，它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应当采取根植在国际合作和热爱和平基础上的新态度”。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并对它表示疑虑。但这是日本人性格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日本人的某种行动未能达到目标，那他们就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人们就抛弃之前的工作，因为日本人不习惯从事失败的事业。<sup>[20]</sup>日本人说“啮脐莫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之一，这种尊敬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而现在日本人也为他们的这种计划付出了全部代价。1945年8月，日本的代表人——天皇向世人宣布：日本失败了。他们接受战败带来的一切后果。这意味着美军将要占领日本，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的到来；这意味着日本征服其他国家的战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愿意制定一部防止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信，军事上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毫无关系，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全民族的失败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对世界的真正认识，才能以客观的角度了解事物本来的面目。必须通过坦率的分析才能够消除那种歪曲日本人思想的

非理性因素……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面对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我们也必须）深信日本文化的前途。”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试验过一种行动方针，但却失败了。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日本的社论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因而，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sup>[21]</sup>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以及偏远山村的普通民众也同样经历着根本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友好的国民是曾经发誓要用竹矛战斗到死的人。美国人对日本人伦理道德中许多东西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其他民族的伦理道德中也包含着许多有利的东西。<sup>[22]</sup>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军对日管理当局承认日本能够开始新的航程，他们没有采用令人感到耻辱的方法去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根据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西方伦理观念认为，羞辱和惩罚是使做坏事的人确信自己的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样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sup>[23]</sup>我们已经了解，日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们的伦理观认为，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而过失所产生的后果会使他确信自己行为的不妥之处。这些自然而然的后果也可能是一场战争的全面失败。但是，日本人并不把这些情况作为耻辱而去憎恶。对日本人而言，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对他或他国诽谤、嘲笑、轻蔑、鄙视以及不断使其蒙羞等都是一中污辱。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不论西方的伦理多么强烈地谴责日本人的这个信条，美国对日本的有效占领却依赖于美国人在这一点的自我克制。因为日本人将自己非常憎恶的嘲笑与“自然的后果”区分开来。而根据他们投降的条件，后者包括解除武装，甚至有斯巴达式的苛刻的义务，等等。

日本曾经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的胜利表明：在敌人最终投降时，在日本不认为那个国家曾经嘲笑过它时，即使作为胜利者，日本也要小心避免羞辱战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那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拍摄的。照片上的俄国人佩带着刀剑，只能依靠制服来区分战胜者和战败者，因为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sup>[24]</sup>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记录了俄军投降的情况：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建议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马匹都被俄军宰杀充当了粮食。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当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sup>[25]</sup>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

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钦佩日军的勇猛……乃木将军则赞扬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深表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纯种的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接受这个礼物，但它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但是乃木将军许诺，如果他得到了那匹马（他自己也十分相信天皇会把马赐予他），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爱护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26\]](#)



【图9】斯提塞尔和乃木的会见

有人说，日本人从上次俄国投降后到占领菲律宾期间改变了很多。[\[27\]](#)例如，他们在菲律宾的大肆破坏和残忍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随着情况而极端地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不一定会有上述结论。首先，在巴丹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只是局部的投降，虽然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但日本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蔑视日本”，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看不起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对《排日法案》[\[28\]](#)、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29\]](#)以及在“海军协定”[\[30\]](#)中所起的作用的反应。



对于美国在远东经济中的作用增强，以及美国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日本人也有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战胜俄国和菲律宾的美军，昭示出日本人行行为中最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受过侮辱是一种态度，没有则是另外一种态度。

美国取得的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的处境。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常情况一样，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以前所执行的方针。日本人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将过去的罪行冲刷得一干二净。<sup>[31]</sup>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给日本人带来需要清洗的新的耻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眼中属于战败的“自然的后果”，这种做法奏效了。

保留天皇非常重要，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将军首先去拜访天皇。这次有目的的拜访使西方人很难理解。<sup>[32]</sup>据说，在向天皇建议让他否认天皇神性的时候，他曾表示反对，说让他抛弃自身本来没有的东西使他很难堪。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从西方的角度来把他看做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敦促他，西方人认为天皇仍具有神性的看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接受了否定自己神性这件令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媒体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对此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明显感到困惑，为什么天皇对发表声明感到高兴。<sup>[33]</sup>

美国的政策也使日本人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命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个劳动、工业和农业的组织，应对其进行鼓励，并给予支持。”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曾经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农民组织也重新开始活动。<sup>[34]</sup>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这就证明了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一位美国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满面笑容地说：“日本‘胜利’了！不是吗？”现在日本举行的罢工与旧时日本的农民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过去的农民反抗是因为赋税和徭役过重，而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减慢生产。工人们喜欢采用的罢工形式就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照常工作，通过增加产量而使管理者丢脸。”<sup>[35]</sup>在三井财团所有的一家煤矿中，罢工者禁止管理人员进入矿井，并且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一倍。”



当然，不论所实行政策具有怎样好的出发点，对战败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总是很困难。在日本，食物、住宿、重建不可避免地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会至少同样严重。在战争结束之前，复员军人问题令美国当局颇为苦恼。由于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程度毫无疑问地减轻了一些，<sup>[36]</sup>但并非容易解决。日本人是深知这种困难的。去年秋天，日本报纸充满感情地写道，对于那些历尽磨难却失败的日本士兵，战败的确痛苦地难以让人接受。报纸恳求他们不要因为失败而妨碍了自己的“判断”。总体上讲，那些被遣返的军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过去的秘密团体，去实现国家主义的目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容易产生憎恨心理。日本人已不再给予军人昔日的那种特权。以前，负伤的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走到街上时行人都要行礼。和平时期，村庄在新兵入伍时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有美酒佳肴招待他们，还有歌舞表演助兴，士兵们都坐在上席。现在，遣返的军人不再受人关注，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人们都对他们冷眼相看。不难想象，这些日本人对行为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多么痛苦。因此，很容易想象这些军人在与往日同伴相聚时，回忆那些把日本的荣耀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他们会是多么高兴。有些战友会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中国山西、中国东北与盟军作战了，<sup>[37]</sup>为什么要绝望？他们的战友告诉他，他也将再次去战斗。在战前，就有国家主义的秘密社团存在，它们是日本历史悠久的团体，它们要为日本“洗刷名誉”。只要还有复仇的任务没有完成，有些人就习惯于感觉到“世界不平衡”，他们极有可能参加这种秘密社团。根据日本的伦理道德，允许这类社团（如黑龙会、玄洋社）<sup>[38]</sup>使用暴力，因为它是“对名誉的情义”。为了消灭这种暴力，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日本政府必须进行长久的努力，强调以牺牲“对名誉的情义”为代价的“义务”。



【图12】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为目前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提供谋生的手段，并给予“适当的地位”。必须改善农民的生计。<sup>[39]</sup>每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日本人就回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土地狭小，更有沉重的债务和租金，使农村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也必须开始发展日本的工业。由于强烈反对平分遗产，只有长子能够继承家业，其他孩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机会。<sup>[40]</sup>

日本人面前是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毫无疑问，如果重整军备的费用不包括在国家预算当中，<sup>[41]</sup>他们就有可能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十年间，日本财政的一半都用于军备及军事力量上。如果日本放弃这类开支，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地租，它就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在日本农产品的分配当中，耕种者获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税款和租金。<sup>[42]</sup>这与同是稻米生产国的缅甸、暹罗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的。日本耕种者所缴纳的巨额租金最终用于为国家战争机器提供了资金。



【图13】日本到处可以见到的士兵墓地，也说明日本在二战中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肯回头。

在今后十年间，任何欧洲或亚洲不进行备战的国家，都将比进行备战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的财富可以用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sup>[43]</sup>在美国，我们在制订亚洲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考虑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不会因为国防计划的巨大开支而陷入贫穷，美国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有完善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和机械设备。如果不进行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以及研究，我们的人民就将失业。资本投资的盈利需求也十分迫切。<sup>[44]</sup>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甚至在西欧也很不同。德国尽管要承担巨额赔偿，但因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建立起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日本也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行军事化，而且美国支持其雄心。<sup>[45]</sup>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如果不包括军事化，日本的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繁荣起来，并成为东方商业贸易的举足轻重的国家。日本能够将自己的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爱好和平的日本将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如果美国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日本的这项计划，这对日本将是莫大的帮助。

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做不到，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在任何被占领的国家，这种办法从来没有获得成功。<sup>[46]</sup> 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一国都不能命令它遵循外国的生活模式。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使日本人承认被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也不能使他们忽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得其所”。立法也不能使他们选择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方式，那是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模式。日本人也不会强烈要求独立，以及拥有选择配偶、职业、住所和承担各种义务的激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表示必须朝这个方向进行转变。他们的当政者在日本投降后说，日本必须鼓励国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当然，他们没有这样直接地说明，但每个日本人都明白：他们已开始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了，希望在国民中发展出新的自由，即从对“世界”的批评和排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sup>[47]</sup>

不论其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过多。这些社会压力要求隐藏感情，放弃欲望，而作为家庭、团体或民族的代表面对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磨练。但是，他们身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极力抑制自己。不敢冒险以轻松的心态去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充满代价、毫无希望的道路。在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且变得鄙视那种在道德方面比较宽容的民族。<sup>[48]</sup>

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是一次失败，是日本人迈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他们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赢得尊重，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扩军备战，日本则将利用它的知识参加那场战争。<sup>[49]</sup> 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让我们对日本成为和平国家这种可能性产生怀疑，因为日本的行为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条件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反之，它也会加入武装阵营。

目前，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将密切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已经失败。如果没有，日本会重新点燃自己好战的激情，并将证明它能够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能够自我证明，它已经如何汲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绝不是通往荣誉之路。<sup>[50]</sup>

---

<sup>[1]</sup> 萨评：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也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同时把日本迅速转化成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堡垒。这里面，麦克阿瑟等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得当是一方面，日本人习惯服从的民族性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因素。



[2] 萨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世代簪缨，曾以西点军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任远东美军司令，在菲律宾战败后几乎赤手空拳逃到澳大利亚，并由此筹划反攻。自1942年起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负责对日本的占领，有日本的太上皇之称。作为军人，麦克阿瑟有着悍不畏死的勇气，但是他的喜欢作秀、喜欢吹牛、任人唯亲等毛病也堪称举世闻名。



【图1】天皇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拜会这位驻日本的太上皇

[3] 萨评：事实上当时盟国的确有共同在日本驻军的考虑，并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中国政府也派出先遣队，为中国陆军荣誉第二师进驻日本做准备。局势的变化使这种安排最终停留在纸面上。虽然各国都有军队登上日本土地并进行了阅兵，但最终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由美国一家执行。

[4] 萨评：这一决定，对于美国占领军来说，是一个成本最低的做法，因为保留天皇和日本的政府机构，日本人依然可以在旧的体制下“各安其位”，不会引发无所适从的混乱。于是日本人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开始为新的目标而服务了。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我怀疑作

者等人对日本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决策上起了某种作用。然而，这种对于美国来说轻松的做法，却使亚洲蒙受入侵的国家难以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罪行，并且为今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保留了火种。

[5] 萨评：在德国和日本，美国都采取了这种使用代理人的管理方法。虽然日本更为明显一些，但是代理人就是代理人，一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就会被轻易处理掉，而不管你是否讲道理。日本战后的币原内阁，德国战后反对采购美国军用飞机的哈特曼，都“享受”了这样的命运。我曾困惑于美国的这种手法，因为我所见的美国人大多是大孩子，他们对于自由民主等观念的坚持、崇尚公正，也多发自内心，但是为何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做出违反这些原则的事情呢？慢慢才理解，原来，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对原则问题有这样一个处理顺序的——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最不可动摇，这个奶酪谁也不要乱动，不然会被唾沫淹死的；第二个，则是美国的利益；然后才是对外国人的自由民主。所以，美国人和外国人的问题掺在一起，考虑的首先是美国的利益。如果和自由民主原则冲突怎么办？请参看对原则问题的处理顺序。

[6] 萨评：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期间，对于占领当局的命令，执行中绝少阳奉阴违，其坚决彻底，连美军都感到惊讶。相比于抗战中伪军里面的无数脚踩两只船或者人在曹营心在汉，还有今天中国人常常采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两个民族的区别非常明显。

[7] 萨评：中国人的说法是因人而异，对症下药，这是中国儒家的典型思想。而美国的做法其后隐藏着迥然不同于东方的思维，那就是利益至上原则，他们选择的手段和措施，只看最终价值是不是最大。



【图3】实施以日治日的结果是美军中的日裔大兵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8] 萨评：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的父子关系，大概应该用上那句话“距离产生美”。日本的父亲常常“公而忘私”，无暇顾家，所以和儿子相处的时间少，而且也不多承担对于孩子的养护。但是，孩子还无权责备父亲的这种做法，因为他是孩子的榜样，越是无暇和孩子亲近，越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大，越证明他的高尚。假如日本的孩子也像中国一样被父亲每天督促着写作业，只怕就未必对父亲“既尊重又钟爱”了。说来，倒是美国的父亲和孩子更像朋友而不像上下级的关系。

[9] 萨评：黑龙会，头山满建立的日本民间团体，创立于1901年，目的是促进日本对于亚洲的控制，训练殖民和特务人才。日俄战争期间其会员曾充当日本军部的密探，也曾深入参与中国的内部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先锋，专门从事反共活动，战后被解散。

[10] 萨评：引自战中出版的厄普顿·克洛斯的《幕后日本》。

[11] 萨评：在需要革新的时候，打出“复古”的幌子，比较容易取得社会认同，这一点东西方并无二致。中国古代认为人类的黄金时期不是在未来，而是在遥远的三皇五帝时代，所以政治家的种种改革，打的幌子往往是要回到“三代之治”；而西方的工业革命，也是起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说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说起来，人们总是对存在过的东西放心一些，而对新鲜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充满疑虑。

[12] 萨评：日本战后一度产生了各种激进政党甚至宗教，竞选、罢工以异常激烈的形式展开，但是，最终激进的派别还是没有获得日本人的普遍支持。这其中，日本人“高抬腿，轻落脚”的习惯起了很大作用。假如当时激进政党取得了政权并给日本带来好处，那么日本会不会把这当做一个类似“九一八”的契机，发展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激进政体，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了。

[13] 萨评：币原男爵，即日本外交家币原喜重郎（1872~1951），战前和战中先后担任过五个内阁的外相，也担任过驻美大使，是日本政府中对西方较为了解的人物。战后曾担任日本首相，不久其内阁因对天皇的态度暧昧而被麦克阿瑟当局解散。

[14] 萨评：最后还是说天皇是对的，可见占领军也是在天皇的意旨下招来为日本国民造福建立民主制度的。这种逻辑虽然荒谬，却是日本右翼势力宣传的重要内容。

[15] 萨评：作者的话让人叹息，为何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作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到了二十一世纪，赖斯的助手却说：“一个国家想要成功，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社会，都应当以美国为唯一、永远的楷模。”这既是对其他文明的粗暴否定，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前面所说，美国今天所谈论的普世真理其实在美国自身也经历了多次扬弃的变化，而逐渐变得更加合理。相信只要人类发展进步，普世真理就会不断变化。美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建立在一个选举上面。几年前，当美国人开始走向单边主义的时候，我曾想，也许，美国人有个共同的孩子气毛病，那就是赢了会把眼睛放到头顶，从而看不见真实的道路，直到摔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单是适用于东方国家。

[16] 萨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1904），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希腊人。生于希腊，长于英国，去过法国读书。19岁时到美国，生活21年后，1890年作为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特约撰稿人抵达日本。赫恩来日本的目的是为了搜集写作素材，却不想终老于此。在日本生活期间，赫恩娶士族之女小泉节子为妻，并育有子嗣。为了让妻儿将来能继承自己的遗产，赫恩依据日本法律随妻姓，入籍日本，改名小泉八云。在日本生活的14年间，小泉八云生活辗转。1903年小泉八云曾准备赴美讲学，却因故未能成行。1904秋，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日本期间，小泉八云创作了大量向西方人介绍日本的书籍，可谓“日本通”。

[17] 萨评：今天，日本的政坛上依然盘根错节，其间的裙带关系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治维新，让屡经革命的中国人感到惊讶而且困惑。然而，门阀的存在就是日本政治的现实，民主选举并不能消灭它。今天日本的首相和外相，通过几个前首相的家族，也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呢。

[18] 萨评：日本的天皇自然不会是选的，首相也不是直接选举的，选举选的是执政党而不是领导人，这大约是美日之间社会制度最大的区别。

[19] 萨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至今是日本最大的报纸，他们的舆论，代表着日本人普遍的看法。

[20] 萨评：这一点略可争议。日本人可以平静地接受失败后的转向，但他们决非灵活的民族。熟悉日本人以后，会对他们的固执感到无奈。所以我们似乎应该补充一句——日本人在接受可以导致转向的失败之前，会使出令人惊讶的蛮力来看现在的路是否走得通。





【图6】盟军在东京阅兵，可惜没有中国军队参加。

[\[21\]](#)萨评：这里面有一点日式的好面子和自欺欺人，其实战败后日本发展的“新艺术与新文化”很明显是西方的东西，与日本的传统格格不入，但日本人却可以宣布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是被强加的，与战败不战败没有关系。于是日本人又因为自己明智地选择了先进的东西而可以傲视亚洲其他“不开化”的民族了。如果对日本人这种毫无羞涩的“拿来主义”还不理解，可以问问日本人咖喱饭是哪国料理，大多数日本人会很肯定地告诉你——日本料理。日本人自己选择了引进咖喱饭，并且很喜欢它，所以，它要不是日本料理才怪……



【图7】面对美军培训的女警察，普通日本人非常好奇。

[22] 萨评：美国人在越南吃苦头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把日本和越南对比，并且困惑不解——都是亚洲人，差别咋这么大呢？他们不知道，日本人的性格，在亚洲人眼里也是很另类的。

[23] 萨评：不幸，也许采取严厉的手段长期看更有利，东京审判中被放跑的日本战犯如此之多，以至于最终被推上绞架的战争恶魔还不及美军在伊拉克一次误伤的平民多。对这样一场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来说，这简直就是不负责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跑的战犯们洗心革面的结果就是纷纷质疑东京审判是不是合法。这时候日本人仿佛都忘了，他们签署的是无条件投降。

[24] 萨评：即俄军失守关键的203高地以后，日俄两军将领在旅顺水师营的会见。今天旅顺还保留了他们会见的小房子，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25] 萨评：乃木将军即乃木希典（1849~1912），是前面提到的为明治天皇殉葬之人。他是日俄战争时日本第三军司令官，日本所谓的军神，也被同僚称为只知道硬拼的无谋将军，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在阵前被杀得尸横遍野，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图8】二战日本战俘营中的美国兵，形同骷髅。

[26] 萨评：从日本的文化性格角度来说，乃木在这时的表现还有另一个解释。他打败了俄国人，而俄国人属于比日本人高一等的白人。当时，即便俄国人战败了，也并不能改变白人仍然高于日本人的总体格局。所以，俄国人在乃木眼里，既是败将，也拥有高于自己一等的肤色。于是，一面沾沾自喜，一面急于显示自己“文明”的一面，也就顺理成章。在上海和南京，面对被认为低于他们一等的中国战俘，日本人可没有显示任何值得一提的文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丹，当日本人的眼里白人已经不值得那样尊重时，等待“白鬼”的，就从礼遇变成了死亡行军。

[27] 萨评：即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1941年日军占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洋诸岛。1905年，是日本自认跻身列强的时间，而1941年，则是日本军国主义膨胀的极点，那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可以主宰半个世界了。在美国，日军在菲律宾的暴行被极度渲染，大多数美国人对南京大屠杀毫无概念，但对巴丹“死亡行军”耳熟能详。我们通常的看法是这因为南京大屠杀是与美国人无关的暴行，不过仔细研读史料，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麦克阿瑟。最初的美军作战计划中，美国海军认为远隔重洋，菲律宾的日军不必去管，可以让他们像“被割断了藤的瓜一样自然枯死”。然而，这位被日军从马尼拉赶出去的将军始终耿耿于怀，因此极力鼓动美军反攻菲律宾，以实现自己“我会打回来”的诺言。为此，麦克阿瑟精心准备了大量的材料说服罗斯福总统，他明白军事上海军的道理无法反驳，就从政治入

手，大谈日军在菲律宾的暴行，以及菲律宾对美国的期望。最终，他成功了。应该说麦克阿瑟的政治眼光的确不错，菲律宾人的亲美态度，至今是那些美国没有去“解放”过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所不能比的。美国人也经由麦克阿瑟了解到日军在菲律宾的种种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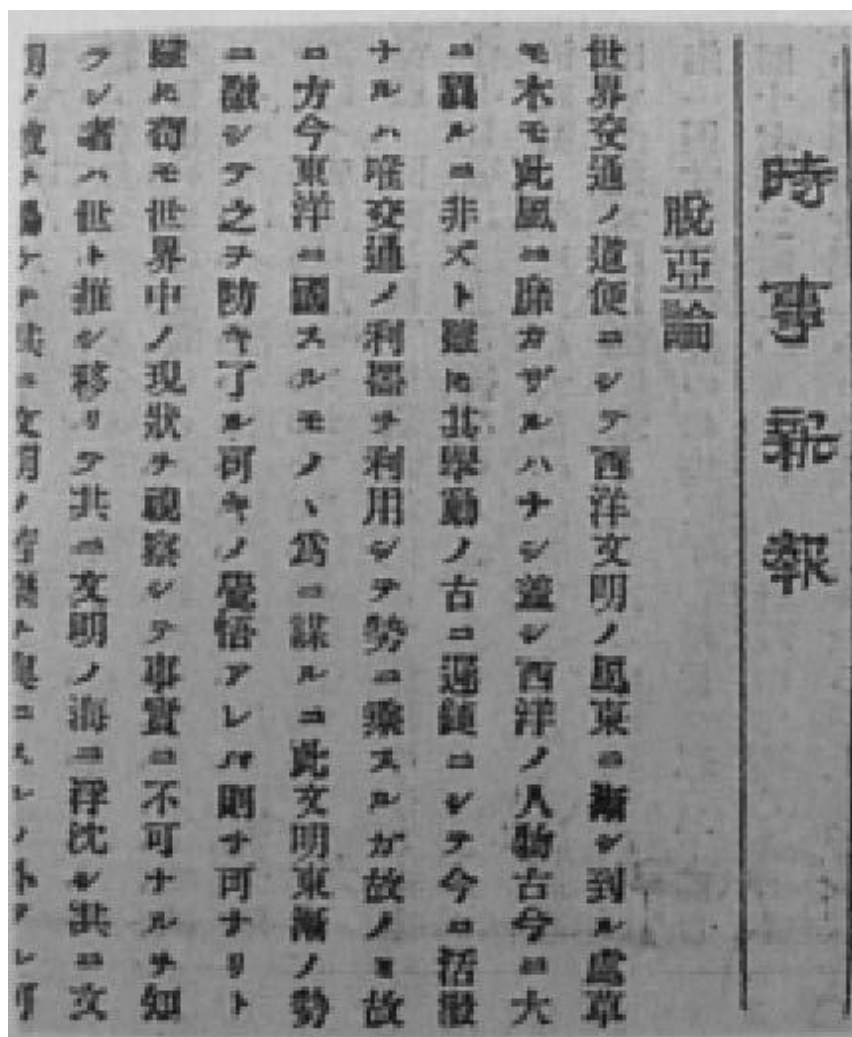
[28] 萨评：这项法案实际是对美国移民法第十三项C款的修正案，规定了日本人移民美国的配额。这是美国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期对外国移民进行控制的一系列举措之一。日本人对此愤怒异常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美国没有将日本人等同于欧洲人，“排日移民法将日本人与其他有色人种同样对待，这一点让日本人的体面受伤”。日本人愤怒的时候显然忘了看看自己皮肤的颜色。

[29] 萨评：1905年在美国朴茨茅斯船厂签订的日俄和约，条约规定将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所有外国人都认为日本大占便宜的条约，却在日本国内引发极大愤怒，激动的人群烧毁了街上的电车，反对停战，让人们大跌眼镜。只有在更多了解了日本人的秉性后，才能够理解——胜利会让日本人疯狂，冲昏头脑，欲望大膨胀。倒霉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因为调停了这个和约受到日本人的愤恨，虽然老罗斯福实际上颇为亲日。

[30] 萨评：应该指的是《伦敦海军条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两个限制世界各国海军舰艇比例的协定。在这些条约中，日本取得了仅次于英美的配额，名列世界第三。如果看当时各国的总产值，日本这个比例已经太大，然而日本人却非常不满意，愤怒地攻击列强压制日本。至于条约之前日本已经是列强中军费开支比例最高的国家，条约签订后大大缓和了日本的社会紧张，就没有人提起了。

[31] 萨评：表面上看，英国人也有一点和日本人相似。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英国将军康华丽在约克敦向华盛顿投降，仪式上仍然仪仗整齐，如同阅兵。其实二者有些区别。英国人是很顽固而且好面子的，以传统著称，阅兵式表示我虽然战败，仍然是职业军人，有大英帝国的荣誉。日本人呢？则是表示以最恭顺的态度面对征服者——如果我变成了你的奴隶，就让我做个好奴隶。





【图10】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著名文章——《脱亚论》，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至今，日本很多人还把自己与亚洲其他国家分得泾渭分明，以亚洲的欧美国家自居。

[32] 萨评：当时天皇被迫乘汽车到麦克阿瑟充做司令部的酒店求见，只这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就足以奠定麦克阿瑟当局成为日本太上皇的地位。

[33] 萨评：最后还是“天皇作了正确的选择”。

[34] 萨评：日本在战前曾有共产党的存在，并且发动过多次劳工运动，发动日比谷公园集会、“烟囱运动”（左派政治家站在高高的大烟囱上做宣传）等等。后被日本政府和黑龙会等民间组织压制而销声匿迹。二战后劳工运动重新觉醒，保留下来的照片显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早期日本有很多相当激烈甚至暴力的劳工运动发生，显示了日本人在失去控制情况下容易走极端的特点。最终，日本通过工会组织构成了劳资的“和谐体系”，一切重新归于控制。只是至今，工人依然保留了每年4月争取提升工资的“春斗”传统，不过已经没有暴力的成分了。



【图11】日本的游行队伍

[35] 萨评：用增加产量来抗议剥削，在欧美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老板们大概会以为自己或者雇员的精神出了问题，一如拿破仑的名言——“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

[36] 萨评：事实上美国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很巧妙，充分利用了日本人的性格特点。美军自己不去处理日本退伍军人问题，而让日本的官员去做，所以有矛盾也是日本人之间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多少民族主义的对抗了。那么，在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官员们会演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来。日本呢？日本是不会的，官员们反戈一击，对付自己的凶猛超过抗战中的汉奸，而决无汉奸的心理障碍。

[37] 萨评：日本一部分官兵在二战结束后留在他国成为雇佣军，比较典型的是印尼独立运动中的若干旧日军士兵和中国内战中分别在国共双方参加战斗的旧日军士兵。不过，方式各不相同。印尼的日军多是怕回国受到惩罚，被迫留下。国民党军中的日本兵以山西元泉警部为首，是组织起来为“复兴日本帝国”战斗的团体。共产党军中的日本兵则多通过阶级教育，促使其作为技术人员和教员自愿参加的。

[38] 萨评：玄洋社也是头山满组织的秘密团体，创立于1881年。号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在日本的右翼团体和政界中颇有势力，1946年解散。

[39]萨评：这些二三十岁的人正是军队的骨干，也是发展经济的主力。各国当时都面临退伍军人问题，美国是最轻松的，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广阔的国土使美国士兵真正心甘情愿地解甲归田。即使是美国的将军们，战争结束后也纷纷忙着回家——家里的日子比兵营中好过。中国比其他国家多打了三年内战，但是它的军队复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军队培养出的组织纪律性和严谨的生活习惯，使退伍军人成为推动这个略有些散漫的大国前进的催化剂。日本，如文中所说，在美军和完全转轨的日本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重新各安其位。事实上日本战后没有太多的反抗举动，也是因为长期的战争在客观上使日本士兵也充满了厌战心理，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契机改变这种惯性。最糟糕的是英国人，从荣耀的胜利战场上回来，看到的不仅是满目疮痍，而且是帝国的分崩离析，在他们的困惑和不满中，大英帝国进入了瓦解和衰落的时代，一直持续到北海发现石油为止。

[40]萨评：日本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所以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依然是一副“大不了我回家种田去”的态度。但是，日本战败的时候，早已经走上工业国的道路。土地稀少、山势崎岖的日本，已经无法回到以农业为主的道路上去。所以二战退伍的日军原士兵在回到家乡后往往又被迫到城市中寻找生活出路，无意间成为了日本现代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劳动力。

[41]萨评：事实证明，日本长期将军费开支定为国民收入的1%以下，并没有使日本陷入邻国的侵略这种危险。遗憾的是日本良多国民在享受着低军费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又在骂日本的武装不够“正常”。

[42]萨评：这是在日本运气比较好的农民，事实上二战中日本的农民仅仅能留下糊口的粮食而已。而且，当时所谓的农民，也只是妇孺老弱，青壮年都变成了士兵。

[43]萨评：集中军事建设可以有促进科技发展的好处，比如美国在二战中就获得了核技术的突破，而德国那个时代发展的航空理论，今天还在服务于人类。然而，以亚洲各国薄弱的经济基础而言，当时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今如此。几乎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给它和平发展的时间，都可以因为其富饶的资源 and 勤劳的人民而创造经济奇迹。所以，和平对于亚洲各国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44]萨评：这一点也造就了美国的经济特点——全球化。是全球化支持着美国的繁荣，也使美国不得不关注其在全球的利益。与此对应，中国的经济特点是集中于国内，通过国内企业的发展，增进出口，扩大国内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这让中国缺少对外扩张的动力。日本则处于两难处境——一个没有资源和能源，也缺乏国内市场的国家，在世界经济逐渐稳定后立场艰难。比如，日元升值，日本人会很紧张，因为他们的市场主要在国外，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出口。而日元贬值，他们也会很紧张，因为他们的原料主要来自海外，这将严重增加他们的成本。如何对策，就要看日本经济学家今后二十年的水准了。

[45]萨评：不过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放弃了中国作为其亚洲最大伙伴的政策，改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得以复苏的重要原因。真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图14】李承晚访问日本，朝鲜战争使美国不得不依靠日本的后勤供应，从而为日本的崛起注入了强心剂。

[46] 萨评：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美国总统都看过和赞同这段文字，所以在伊拉克，美国人正在努力地去完成这个“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的任务。如果说美国失去了理智，这是不够公平的。应该说，是认为今天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然而，这个任务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或者说暴力就能完成呢？

[47] 萨评：尽管日本这方面做得实际并不充分——日本的人民安于等级制度。但是这无疑可以给我们在对自己国家的建设上提供一些启发。也许，当每个人珍惜自己的权利，爱国从爱家做起，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就不再是神话了。

[48] 萨评：作为在日本的中国人，我想这条批评是十分中肯的——日本对于宽容精神的消极看法，或许将成为日本未来进步的重要障碍。缺乏宽容精神的结果，就是强调自我的正确和习惯用刀来解决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最为宽容的民族，因此犹太人只有在中国才会被真正地融合。如果对比于日本，中国的宽容精神恰似流水。水和刀无法相比锋利，然而刀再利也不能断水。假如今天让我们决定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我想这部分精神将是中国人宝贵的财富。而对于日本，我们期待的，或许是刀化为犁，只见菊花。



[\[49\]](#)萨评：幸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虽然于理想主义者而言，没有通过一场战争就决定了世界一极的命运，未免过于无味，然而作为普通人，我们感谢这种和平的结局。

[\[50\]](#)萨评：《菊于刀》这本书，至此全部结束，我的评论也将随之结束。我想，就用徐永昌将军在密苏里号上于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的话作为我的收尾吧。这位没有受过正规基础教育，在军队中自己习字看书成长起来的老将军，却在此时说出了一段与其他人很不相同的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以史为鉴，或许就是本尼迪克特女士这本书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价值。